



宋斐如文集



宋斐如先生（一九〇二～一九四七）是我國台灣省台南人。

即今台北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畢業。他具有熱誠和愛國主義激情，於一九二二年二月由台灣西渡大陸，入北京大學就讀，與負有盛名的《台灣民報》，或自辦雜誌，投身於當時的民主和文化啟蒙運動。早在一九二五年就以發表在東京的《台灣民報》的文章《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開始了他短暫卻厚實的、以文筆啟蒙與鬥爭的生涯。一九三五年，他到日本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修習政治經濟學專業，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帝全面侵華之寸前，毅然回到祖國中國，以他深厚的日本語文能力，得以多讀戰中日文資料，並以其精到的社會科學訓練，展開深刻的抗戰研究、日本敵情研究和台灣研究，對於我國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對於光復台灣，對於將台灣同胞從日帝殖民桎梏中解放出來，做出了很大貢獻。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戰敗投降，台灣復歸於祖國。一九四五年十月，宋斐如先生回台，很快投入光復後台灣政治、社會和思想、心理的去殖民化重建工作，呼喚省內外同胞的團結與「融合」，不遺餘力。不幸，回台後堅決站到人民群眾一邊的宋斐如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台灣民眾因國民黨接收集團的惡政而嘩變後的鎮壓行非法逮捕，很快就仆倒在國民黨法西斯刑場。英年而壯烈犧牲，得年僅四十五歲。嗚呼！

—— 陳映真



定價：250 元

宋斐如文集 卷二

第二輯 台灣問題

第三輯 日本軍事外交

深圳台盟 主 編

楊 益 群 執行主編（特邀）

宋斐如文集，卷二／宋斐如著．-- 臺北市：
海峽學術，2006[民95]

面；公分

第2輯：臺灣問題；第3輯：日本軍事外交

ISBN 986-7359-35-6(平裝)

1. 臺灣 - 歷史 - 日據時期(1895-1945) 2.
日本 - 外交關係 - 昭和時代(1926-)
673.228 95001212

宋斐如文集卷二／
第二輯·台灣問題
第三輯·日本軍事外交

著者 宋斐如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596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二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treviaw@ms17.hinet.net

台灣總經理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〇二) 二二六七七七八八 傳真：(〇二) 二二六七七四三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二三五)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十樓

電話：(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八 傳真：(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三

香港總經理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三〇之三三號華耀工業中心十四樓十室

電話：(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八九八 傳真：(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〇〇五

澳門總經理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一二九號地下

電話：(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偉旭資訊工作室 (〇二) 二五八五四四四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定價 二〇〇六年二月廿日

版價 二五〇元(平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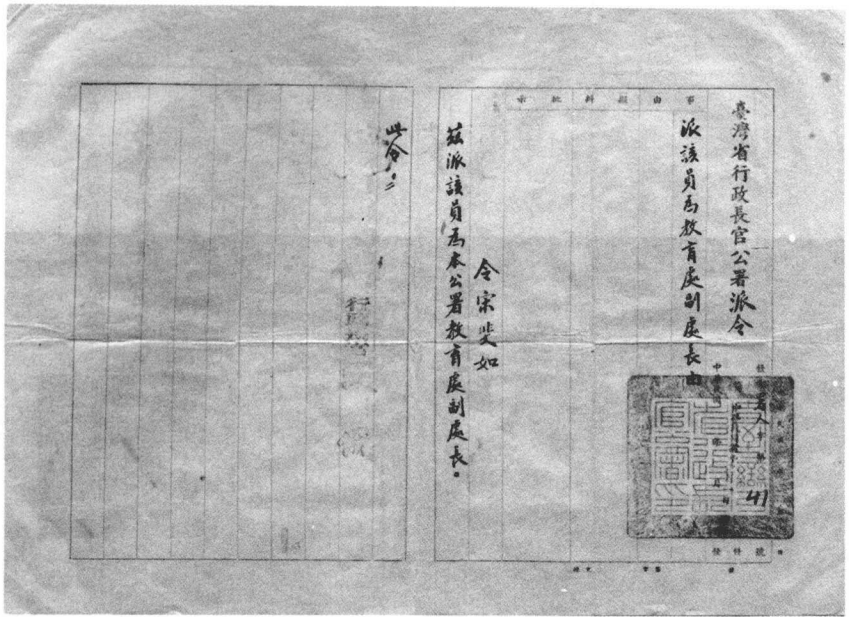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986-7359-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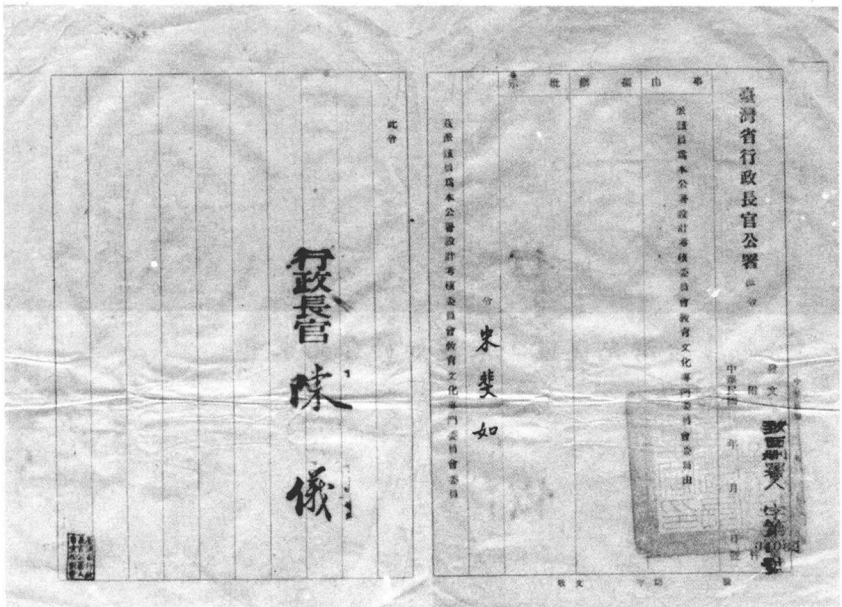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台灣光復後，宋斐如於台北家中



宋斐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之「派令」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派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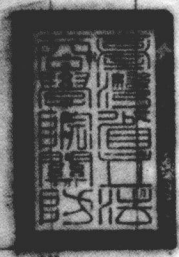
臺灣省立法商學院 聘書

第 號 聘 書 第 號

本院為發展學術特定於本月十日開始授課二月至三月止聘請
上開特聘教授

特聘為本院專任教授
余元為新聘
宋生如先生

院長 周德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兼任教授聘函



1934年宋斐如與馮玉祥泰山讀書研究室部分教員於泰山普照寺西北側馮玉祥讀書樓前合影。前排：研究室主任宋斐如（右一）、蘇秉琦（右二）、趙澄之（右三），後排：陳定民（右一）。



抗戰時期，宋斐如（後立中）與劉思慕（前一）等好友在一起。

目錄

宋斐如文集 卷二

第三輯 日本軍事外交

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3

敬神嗎？民族自殺！（一九二七年三月）／6

「德化政策」下的台番暴動（一九三〇年十一月）／12

台灣農民的慘痛——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三日（一九四二年四月）／15

台灣的慘狀與祖國的責任（一九四二年四月）／18

如何收復失地台灣——血濃於水 台灣必須收復（一九四三年三月）／25

台灣在急激演變中（一九四三年十二月）／30

論台灣的革命戰略（一九四四年四月）／34

《人民導報》發刊詞（一九四六年一月）／43

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長官公署教育副處長宋斐如播講）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七日於台北廣播電台（一九四六年一月）／45

中韓兩民族的關聯性——

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先生的講演（一九四六年一月）／49

- 論台灣基本人權——並祝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一九四六年三月）／55
- 國家為什麼要保障人民自由（一九四六年三月）／57
- 台胞應踴躍參加師範教育
——為台灣師範教育宣傳周而作（一九四六年三月）／59
- 「台灣日」的回憶（一九四六年四月）／61
- 台灣民主國對日抗戰（一九四六年五月）／64
- 反抗滿清統治的暴動（一九四六年五月）／71
- 我們要溶化在一起
——五月十二日在省訓團精神講話（一九四六年五月）／75
- 孔夫子的偉大（一九四六年八月）／78
- 報人的使命——為紀念記者節而作（一九四六年八月）／80
- 台灣教育設施的現階段——全省省立中等以上學校
校長會議閉幕感言（一九四六年九月）／83
- 談談台灣農業的改進
——祝中華農學會成立（一九四六年九月）／86
- 推行合作事業的檢討
——並祝台灣合作事業健全發展（一九四六年十月）／90
- 成功之道——在成功中學訓話記錄（一九四六年十月）／93
- 國父與國慶（一九四六年十月）／99

回顧與希望（一九四六年十月）／101
學生深造的第一步

——延平學院講演記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102

如何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一九四六年十二月）／108

本報創刊周年紀念感言（一九四七年一月）／110

如何推進台灣生產建設——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在省訓團對全體學員精神講話（一九四七年一月）／112

台灣心理建設問題——三十六年二月八日

對青年幹部訓練班學員演講（一九四七年二月）／115

第三輯 日本軍事外交

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一九三二年十二月）／123

日本軍事法西斯論（一九三八年一月）／149

最近日寇的外交動向（一九三八年二月）／155

日蘇最近的糾紛（一九三八年五月）／157

日本軍隊的莫斯科（一九三八年十二月）／164

日本進攻英國嗎？（一九三九年二月）／166

日本再度向蘇聯屈膝（一九三九年三月）／168

日本排英運動（一九三九年三月）／170

日本對第三國政策的二元性（一九三九年六月）／172

日本為什麼沒有參加德意同盟（一九三九年六月）／174

德意軍事同盟與日本（一九三九年六月）／176

日軍南侵北攻下的新出醜（一九三九年七月）／179

日本軍事代表團赴德意（一九三九年八月）／181

美日鬥爭的新開展（一九三九年九月）／183

蘇德協定與日本（一九三九年九月）／196

日本設置「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意義（一九三九年九月）／204

日本對美軟硬並施（一九三九年九月）／206

美日談判的前途（一九三九年十一月）／208

日本外交往何處去——親英美可能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210

日本急於與蘇聯談判的認識（一九三九年十二月）／220

日本最近對美外交的剖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223

日蘇談判及其問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232

提防日閥製造「東方慕尼黑」的陰謀（一九四〇年四月）／239

日寇南進與對華策略

——日寇結束中日戰爭三部曲（一九四〇年十一月）／243

五 目 錄

- 日寇南進呢？西進呢？（一九四一年三月）／254
日寇東亞圈外的圈圈（一九四一年三月）／257
再論日寇南進呢？西進呢？（一九四一年六月）／260
日寇欲勾結德國平分世界（一九四一年六月）／264
美日談判的展望（一九四一年十一月）／267

第二輯

台灣問題

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

台灣遠離北京有幾千里，台灣人氏到北京遊歷者寥寥。遊歷北京且曾實地作種種調查者，更無幾。故台灣一般人之於北京各界莫從切實知曉——不只常人莫從知曉，即受過相當教育者與夫理應洞悉世界情形之新聞記者，亦黑暗然，凡所登載，亦不過耳食而已。

最近某報登載關於王悅之氏之談話一節曰：「歸自北京之王悅之氏談云。台灣學生之留學於北京者十餘人，內僅二三人受部之推薦焉，得以正式入於北京大學。然亦太無理，何則，英漢文及他諸學科，皆不相聯絡。欲入北京大學者，須經過小學中學高等中學，是其順序。若以台灣公學校畢業生，而云入學於彼校者，豈有此理。此不過騙騙父母之金錢，到北京漫遊漫遊而已」。

此節談話，於台灣學生之北京留學、前途消長攸關，是以不耐緘默，略而言之。其中之「內僅二三人受部之推薦得以正式入北京大學」云云者，最使吾人百思莫解其究何所指。北大台灣同人，只就十三年截算，亦已有十二人——或正式考入，或受華僑特別考試。華僑特別考試，雖與正式考稍有出入，亦非王氏之所謂「受部推薦」者，乃正堂堂按該校之入學規則入學者也。然則王氏所指者何？確為正式考入者乎？簡直言之：北大之正式入學考試，乃鐵面無私之入學考試委員會，用神不知鬼不覺之試卷匿名法舉行者。自蔡元培先生長斯校以來，不但教育部無從周旋，即大總統、太上大總統之三鞠躬九叩頭，亦未聞曾錄取任何推薦生。如此論之，在信仰權威萬能之台灣人士中，必有疑吾言者曰：「北大已是國立大學，自應受教育部統轄與命令，豈有部薦不行之理」。吾人宜知北大雖直隸於教育部，而教育部卻無干涉其內部行政之權限。偶值教育總長，人格墮落、措施乖方時，則北大評議會且有宣告脫離教部而獨立之實例。前之驅彭（允

彝)驅王(九齡)與現之抗章(士釗)，皆其著者也。

王氏係教部之一等部員(?)若已知某某受部推薦，得以正式入北大，則應知其確定數目，而曰「二三人」，其遁詞可想見也。王氏亦苦矣！又曰：「然亦太無理，何則，英漢文及他諸學科，皆不相聯絡」。教育部為一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欲推薦學子，不慎重權衡其學識高博，足以與該校相聯絡者，反而孟浪作為，推薦不得其人，乃曰：「然亦太無理，何則……」其前後之矛盾，於理不通，其遁辭之更拙劣，已流露言表，識者自能分辯，無庸多論。唯是現當台灣一般人，對北京留學界懷疑之際，此半節談話，足使後進裹足不前。願吾台人氏考諸事實，而深察之！竊謂王氏敢出如是談論者，非不知其荒謬。乃料遠離北京，言於幽暗之中，北京同人，無從知覺，黑白莫辯，可以伊於胡底。詎知無知記者偏要與他作對。噫！王氏之運，何其乖歟！

今者吾人再退一步論：假定確有某某二三人受部推薦，得以正式入學之事實，則王氏正在教部占高位，某某二三人得王氏之恩賜斯大矣。凡德之不可埋沒，亦獎勵之方也。敢請王氏將被薦之二三人明指之，俾某某好在報上稱頌大德也。

然而王氏談話之後半節云云者，當此一般人對北大懷鬼胎，或曰北大程度不及日本高小，或曰北大皆錄取小學畢業生，是非之論，百出無窮之際，是論庶足以解答之。於矯正是非，其功不小，亦不可抹殺者也。要之：吾人之所貴乎智者，貴乎能分辯是非取捨虛實，毋徒恃揣測而據之為參驗也。願一般人士踴躍前進，切實研究北京各界之情形以至中國各界之情形！

正當一般人對北京留學界，猜疑莫定，眾難塞胸之時，順叙幾句以總括北京留學界之情形，並寄一片希望。北京留學界中，黑者自黑，而白者自白。抱滿腔熱血、兢兢業業者，自是抱滿腔熱血、兢兢業業；放蕩漫遊者自是放蕩漫遊，誠不可同日語，亦各時

各地所不能免者也。希望一般父兄，毋因噎而廢食，毋因有放蕩漫遊幾學子，遂一筆勾銷其兢兢業業者。有志留京之遠抱學子！其深察之！阻止子弟來京留學者，亦可以已矣！

(民國)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午後三時脫稿於三齋

原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台灣民報》第七十七期

敬神嗎？民族自殺！

台灣民眾，自古來沾染迷信的毒素頂深。信神諂鬼的習俗，風行全島。祀神祭鬼的行為，已成為一般社會的病態。迎神啦，進香啦，建醮啦，普度啦，清河啦……到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都可以看得到，聽得到。稅輕收成好的年頭，不用說，即在大戰後，百業衰萎、景氣不振的過去幾年裡，我們仍然看得見。一年中各地祀神祭鬼的次數，並不減於過去，其熱鬧的程度，也未嘗低於往年。

然而這種病態，在往昔只發現於民眾社會，官吏階級不但沒有參加過，並且因欲防絕每於迎神進香人群擁擠的時候，發生的打架、殺人等等擾亂社會秩序的犯罪行為起見，也常常干涉過，禁止過。想不到近年來，統治台灣的官吏，尤其是總督，竟然肯下賤輕駕，出拜城隍，上供媽祖。氣象一轉變竟被傳為美談；因為御用新聞報紙善能替他們宣揚傳布。因此民眾信仰神鬼的心理，愈深切；從而祀神祭鬼的病態，愈瀕於危篤。

我們仔細考一考，想這輩最高官吏階級的拜神，果出自何樣的主意，為的是什麼？若以客觀的態度觀察、分析之，大概可得下列三項中之一：（一）因尊敬鬼神的前身，賢聖英烈而然的；（二）因欲求神鬼庇佑他們升官發財而出於諂媚的；（三）此種行為是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們且逐次推論，定出一個黑白來。按（一）項的假設，他們拜神的動機，果因尊敬鬼神的前身賢聖英烈而然的；那末，神鬼的前身賢聖英烈，那一個比得上文聖孔子、武聖岳武穆？為什麼不拜文聖、武聖，不祀文廟、武廟，反來上供城隍小鬼呢？他們的本意不在此，不用多贅也就明白了。再照（二）項的假設，他們的拜神和一般的愚百姓一樣，因欲求神鬼的庇佑賜福而然的。然則他們都已受過科學的洗禮；幸福並不是因諂神而可以得來的，災禍也不是因媚鬼而可以消除的，這道理他們懂

得頂深切，那有這樣愚罔？（一）、（二）兩項的假設，既然均不合理，那末，其主意自然屬於（三）項——此種行為是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這種手段是種很值得考究的問題；我們不妨也來試一試想。

要知道此種手段，須先明白他們的本職與根本目的。這輩最高官吏到台灣來的使命，是在統治台灣。台灣是塊殖民地。殖民地的特質，是在供給本國以財富，調節本國人口的密度。換句話說：經營殖民地的根本義，在使本國的過剩人口，得移殖於該殖民地，而除掉本國人滿之患；而且從該殖民地吸收財富。所謂吸收財富，不限於政府直接的徵稅；匯回本國的總金額，也應包括在裡頭。然則欲達經營殖民地的目的，統治殖民地的官吏，自然不得不講究手段。故凡殖民地的官吏，莫不考慮出特絕的手段，使該殖民地的社會平靜，甚至入於病態，使該地的人民穩健至如公猪，永遠愚若土塊，馴馴然安於現狀，以任憑其本國人民宰割，榨取膏血，肉吃淨血喝淨，進而咀嚼骨頭，然後其治績乃大顯著。台灣的統治官吏，自然逃不出本例：慘殺的手段也用過了，恫嚇的手段也用過了，高壓的手段也用過了。往昔民智還沒受世界新潮流的洗禮的時候，強硬的手段還使得。無奈太平洋的潮流，偏要洗滌著台灣海岸；火車、船舶等交通機關，偏要把文明的空氣搬進台灣島來。致使民眾的知識日漸開進，趕快要跟著潮流走；起來疾呼，要求生存在廿世紀的人們應該要求的人權——自由平等。而且這些要求又皆合乎人道，符乎正義，強硬的手段，也就使不得了。是以新近的統治官吏，自然而然地要看風勢，變更其本來的面目，改用軟索捆人、暗箭殺人的手段。是則近來一輩最高官吏好心裁，考慮出的拜神手段，乃應運而生的產物啦。蓋他們認清台灣社會的病理，利用台灣人民迷信的弱點，從而提倡之，加重之，以施行其政策，再妙的沒有了。譬如這輩官吏一拜起神鬼來，占台灣人民最大多數的無知的，而且官尊民卑的觀念深已入骨的愚民們，對於鬼

神的迷信中毒必愈深重；一面「聽天由命」的惰懶性加倍增長，反抗精神也就磨滅以至於盡；一面惰懶成性，諸先進國的文物制度，就沒暇顧，結果跟不上現潮流而落後，甘心安於現狀。如此，他們就盡可以奏事半功倍的偉勳。這種手段也可謂妙哉！我們叫他做「拜神政策」；但也只是新改用政策中之一而已。

我們雖然明白了最高官吏們拜神的主意，乃「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們更須進前來討究人民方面的問題。台灣民眾祈神祭鬼的動機，大別之可為下列兩種：（一）出自迷信心理的；（二）出自娛樂心理的。愚夫婦，因病理或其他原因，永久沒產過男孩，或絕沒有過生產，則必禱祈神鬼，求貴子早日降生。厭惡勞作，終日無所事事，只坐著盼望上天降黃金的懶鶯蝦，也常向神鬼，禱祈庇佑他們發橫財。甚至不事正業的賭徒，也向神祇立願，求其庇佑他們賭錢必贏。其他如髮白齒落的老頭子，因欲延長他們的「苦命」，而向神鬼禱祝的。因近來多病多禍，而向神鬼懇祈替他們治病除禍的也大有其人。以上均屬（一）種動機。下流社會，尤其是青年，因平時已缺乏高尚的娛樂知識，又沒有適當的娛樂機關以供他們消遣，故每逢進香迎神的際會，均極興高采烈地，踴躍直前以助成大規模的舉行。這種動機屬於（二）種。但是迷信心理，總要算為主要原因；而娛樂心理為副從原因。

我們再就信神詔鬼的誤謬與其弊害，討究一下。鬼神之不存在，科學昌明的今日，不必等我們的論長證短，其理已極明瞭。縱欲論長證短，也非本文的篇幅所能容許，只得待後日有機會再來談談。讓千步，姑認神鬼果然存在，照信神鬼者言，神居於天堂，鬼藏於陰界。天堂陰界這些地方均極莊正，神聖得不可侵犯；他們的職務與權能，又是在窺察人間的善惡行為以備將來做賞罰的標準。然則神鬼的不敢私偏，是當然的道理。神鬼既然神聖不敢偏私，而能答應無理而且不義的要求，我不敢相信。不生育的夫婦，

不究明其不生育的原因，是病理呢，或是交接不得其法呢，只一味傻氣，向著鬼神禱祈；鬼神不是能施人工妊娠的醫生，焉能包辦這種事？奉勸這班夫婦，多懂些「性的知識」，看看張競生編的《性史》。能這樣做，我相信一定可以得六七成的好成績。厭惡勞作只盼望著「橫財」的死尸，我寧咒他們早死，免多社會的擔負。賭徒，如果誰都禱祈鬼神庇佑自己賭必贏，那末，賭徒眾中，誰當輸者？其乖謬可見。欲求長命而不講衛生，反向人群擁擠、空氣污濁的地方跑去，簡直是自縮其命。還有病者，不就醫服藥，反乞求骯髒的爐灰泡喝，是走錯了天堂的路，反向地獄去，是找死……，誤謬不過。至若找娛樂於迷信行為中，蒙著益小害大的舉動，殊非二十世紀的文明時代所應該有的。其他高尚的娛樂，舉不勝數，何適不宜？總觀上述，可知迷信鬼神的荒謬絕倫的道理。

而且迷信鬼神的弊害，若滋長擴大必能使民族墮落退化。獨立自主的國家變成殖民地；人民淪為殖民，淪為奴隸。既成的殖民永久為奴隸，為刀下肉。何其利害？蓋一旦迷信心理堅執，則惰懶性成，苟且偷安，失卻進取的精神，而甘於現狀故也。其在物質方面的損失也屬巨大。迎神祭鬼的行為，在片面的觀察者言，似能集中市面，興旺商業，間接於生產有益。但就大體而言，因這樣行為而起的一切消費盡屬實質的消費而非生產的消費，並且是「非必要」的消費。例如：燒化金紙香燭，信男信女們的南北奔馳，賽錢祭品……：花費。一面停止生產工作，一面只管著實地消費，尤其非必要的消費，財富的必然虧損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關於這層我回台的時候曾得有一段有趣的談話且引之：

有一次正值迎神的際會，到一鄉紳家，寒暄之餘，談話涉及祀神祭鬼之於物質上的得失。這位鄉紳則曰：「在這種行為中，農工買消商家的貨，錢財雖然流入商家；但商人一旦再買農產品、製造品，其金錢則重歸農工，輪迴流轉，終流不出島外……。」一班知識稍為開進的台人，對於迎神之於物質上的損失的評判，都因這句「輪迴流轉，終

流不出島外」而惹起很大的錯誤的觀念。其實他們全不懂得現在的經濟現象，其交易不限於島內，而是島外的，國際的。商家所買的農產品，製造品，不僅是台灣農工所生產的，恐怕大部分都不是；即裡頭有一小部分台灣自產的，也不是台灣人民所專利的。台灣人民只管著實地消費非台灣人民所專利的或來自島外的貨物，就市面觀之，好像由台人手裡轉到台人手裡，財富終流不出島外，而實際，台灣的財富已於無知覺之間，層層重重流溢於島外，台人一天窮似一天了。聽說每年全島花費在迎神、進香、建醮、普度等迷信動作上的總金額，在千萬元以上。這千萬元以上的巨額，即是台灣島民因信神鬼得來的「純正損失」。島民苟能免去這種迷信心理，這千萬元以上的巨額，的確是島民的年年的額外的財富，還可以利用因迎神所花費的時間於生產上而得更大的利益。島民有此現成進款更大的利益不取，反偏要妄冀無有的錢財，做無謂的舉動，再無意義的，沒有了！

台灣島民，傻頭傻腦地只知道「求丁、求福、求延壽」，卻沒留心到搬走台灣財貨、榨取台灣民眾的膏血的總督們「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政策。丁，福還沒求到，壽命還沒延得，恐怕自身的肉，已經被人吃盡了；自己的血，已經被人喝淨了；三百六十多萬的死亡，已被制於無形中了。俗語說得好：「明刀易避，暗箭難防」，可不是玩！

要而言之：總督們的拜神並不是出於敬意，而是手段。是政策，是用以暗制三百六十餘萬台灣人民的死亡的愚民政策。腦筋頑固的老百姓以及土紳士們若不早些醒悟，痛快地改除去一切的迷信，則淪為更苦慘的奴隸，變成刀下肉，「民族自殺」的終局必可立待。頑固的同胞呀，快醒悟吧！即刻明白這「明若觀火」的結論吧！如果你們不願意淪為更苦慘的奴隸，變成刀下肉，目睹民族自殺的終局；避去的方法也並不難，是種最簡單而且自能的。古語說得妙：「物先腐而後蟲生，心先疑而後讒入」，台灣民眾若沒有迷信的弱點，這樣愚民政策，自然歸於無用。

「德化政策」下的台番暴動

本年十月台灣霧社發生土番殺害日人，日人統治者立派大兵「剿滅」。在此事件當中被害者，日人據報當為一百二十三人；番人若自所謂「剿滅」推論，當在數千以上。此事不得不謂為東方最近的重大事件。且係發生於殖民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其重大性更可想見。我們對此，自然不能等閑視之。

惟自十月廿七日事件發生以來，為時已將二（個）月，且其經過的情形，各報皆有扼要的記載，所以我們對於事情的經過，無需贅述。我們只就問題的所在，加以檢討，並略述我們的感想。

我們先就本事件的發生原因檢點看。據視察台灣的東京帝大教授慶松氏談話，此次台番暴動的原因有四：其一為積怨甚深，其二為國勢調查引起番人的恐怖，其三為日人之欺弄番婦，其四為新換警官不諳番情，常使番人不滿（據十一月五日《大公報》所載門司四日新聯電）。但是據我看來，上列四項皆係書生之談，無足憑信。蓋因第一項乃暴動的要素而非其原因；二三四三項的發生非始於近日，其不能構成此次暴動，自不待言。我們以為台灣警務局長的電報所列，較切事實。據台灣警務局長發廿九日晨拓務省管理局長所接電報，台番暴動的原因或許如下：（一）同方面番人最近因人夫的徵發頻仍而有訴苦之聲；（二）豪果番社出身的花岡一郎（小學畢業後目下霧社乙種巡查在職中）因其薪水等等少於其他同級生而常洩不平；（三）番婦關係（載十月三十日《東京時事新報》）。若於上列原因之外，再加入一般所揣摩的「強迫移住」，則本事件發生的真因，大略可以想見。

帝國主義者之經營殖民地，目的在於「經濟的剝削」。而經濟剝削的方法，在於「光

明的榨取」與「秘密的積蓄」並行。日本剝削台灣經濟的方法，也莫不循此軌道。一般殖民工資薪水的比日人特別低下及人夫之被任意徵用，是「光明的榨取」。因土地登記關係而日人取得土地（例如竹山嘉義斗六的竹林所有權的移動——見蔗農譯《台灣民眾的悲哀》），及以各種企業公司募資的名目取得殖民地人民的財產（台灣日本政府常以官權幫助日人資本家募資——見本刊本期《日本資本在台灣的發展》），就是秘密積蓄之顯著者。若上引台灣警務局長電報所列（一）人夫的徵發頻仍，與番人花岡薪水之特別少，豈不就是「光明的榨取」？為著日人資本家的水電工事的經營而強迫原住其地的番人移住，「秘密蓄積」的赤裸莫過於此？

然而番人也是人，衣食住皆不可稍缺。勞動的報酬過少，則生活窘困；常被徵用人夫，則本人及家族的生活失去保障。況且強迫他們離去久住的故鄉而他徙——自然遷入生活資料更不可靠的深山，生性頑固不願喬遷的番人，自然不能堪忍。不平則鳴，強壓則反抗，人之通性也。莫怪受過日本教育的花岡一郎竟為此次暴動的指揮者。且他一倡，則霧社全部番人起而應之，聽其指揮，其志皆在必死，更是事理的當然歸宿。

日本統治台灣，常以「一視同仁」、「醇化融合」、「引誘善導」為口頭禪。對於生番則標榜「撫順」、「德化」。「一視同仁」、「醇化融合」、「引誘善導」為口頭禪。對於全島，革命之起屢有所聞。「撫順」、「德化」的結果，最近又有此次番人大暴動的發生。無論台灣的日人統治者怎樣掩飾，欲使本問題不至於重大化，但是這種「優良的成績」，卻是永久留在世界的報紙上，印在關心被壓迫民族者的腦海裡。並且在本事件發生後，標榜「撫順」、「德化」的日本統治者，派出大隊兵馬，斷絕番人的歸路，遣飛機擲炸彈，大有滅盡台番之勢。「撫順」、「德化」土番三十多年猶有暴動發生，本即為文明國家的耻辱；而日軍耀武揚威，自鳴戰勝，不知道素以世界第一等國（！）東亞文明國（？）自豪者，將何以自解？！日本《中央公論》十二月號小評中（卷頭言）所言：

「我們不能不在世界公義之前痛切感覺羞耻」，可謂痛快的「當頭一棒」。

原載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新東方》第一卷第十一期

台灣農民的慘痛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三日

殖民地人民以農民為最多，且最慘痛，台灣也不是例外。帝國主義者之徵用物資，掠奪物資，先自農民開始；土地資本之吞併土地，自然是以農民為對象；第一期資本原始積蓄，也皆以農民為搶奪的對象。

先自土地之掠奪講起。台灣的土地兼併最顯著事實，為新式製糖會社之強買台灣的土地，該會社在十數年前所有土地面積即達七八〇一甲，佃權取得地也有二五二三七甲，合計一〇三八二八甲（每甲等於二·三英畝），約占台灣耕地面積八分之一。其中，花蓮港廳鹽水港製糖會社所有耕地為五〇〇一甲，竟占該廳耕地總面積四分之一。這種土地買賣的秘密，日本作家山川均已經說得清楚：「製糖會社之取得土地，雖說是依據買賣形式，而事實上各會社都強制收買農民的耕地，這種事實強行於台灣，可以大書而特書的。」這種強制收買，是幫助於警察力的，其賣價不決定於賣主而只單決定於買主。

就中，日本資本主義之無償地強占台灣土地，尤為強制土地兼併的極端事例。且舉林杞埔事件為例吧，林杞埔是台灣最有名的竹林，一千六百戶，一萬二千農民的祖遺產業和生活手段。在日本侵占台灣的初年，還承認這些竹林是農民的產業。到一九〇八年九月忽有一天，鄉下皇帝的警察當局，召集農民，宣布把這些竹林編為帝室御料林地，硬要他們在預備好的紙上蓋印劃押。於是民有竹林一變為帝室御料林地，但不久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再變為三菱製紙會社的租賃林，不久又再變而為「三菱造紙會社地所有林」，舊時的竹林主人，卻只充當會社的苦工，出賣勞力罷了。

日本資本對台灣農民的剝奪，第二表現在製糖會社與蔗園勞動者之間的關係。製糖會社自營蔗園的農業勞工，固是一種新式的佃傭奴隸。即佃種糖業會社的土地的蔗農，也莫不是一種隸農，其會社與佃者的關係，既不是一般的主佃關係，更不是地主與農業資本家的關係，佃農租佃土地，無利用土地的自主權，而種植的是製糖會社指定的甘蔗，地主的目的不在於佃租的收入，而是原料的繳納。佃農的工作須受會社的指揮，月須供給佃租糖約以外的餘閑勞動，由會社付予隨意的工資，蔗農的剩餘生產物，亦須賣給會社，而依指定價格決定價格，所謂指定價格自然是最低價格。製糖會社還可以隨時由軍方收回耕地，佃農無主張耕作權的自由。

日本資本對於台灣農民的剝奪，第三表現在製糖會社與甘蔗生產者之間的買賣關係。台灣農民生產甘蔗，必須賣予製糖會社，幾家製糖會社並且將台灣蔗園，劃成區域分轄收買，阻止買主競爭並可以自由剝奪。製糖會社剝奪蔗農的方法，約有二端：其一是甘蔗的價格表明為共同規定，事實則完全決定於製糖會社單方；其二是數量多少也完全由會社衡定，普通一萬斤以八千斤計算，或甚至更少。這種關係不是普通「等價交換」，而是帶著強制性的不平等交換，賣主不能以商品換取買主相等價格的貨幣。這裡頭有警察的魔手在擺動。會社普通利用「無法無天」的警察權，干涉甘蔗的買賣，強制蔗農服從會社的條件。會社並且運用預貨款項的手段，束縛蔗農的買賣自由，在這種買賣關係之下，台灣自由農民淪為半封建的隸農，而只能過著低物程度的生活。

台灣被剝奪的農民，不只屬於蔗農，即其他稻農及什麼農民也莫不備受同樣哀痛。日寇每年須由台灣徵用五百萬石的特種米，稱為蓬萊米。台灣農民須辛辛苦苦耕種，而獨自己不得一石，台灣同胞亦皆只能望粒興嘆。同時，糖業獨占資本家（稱沙糖國王），為保持並增大它們的利潤，而愈益企圖擴大蔗園的面積。於是台灣中南部的蔗園，逐漸侵占米穀的耕地。這是台灣耕地問題與朝鮮耕地問題不同之點。而自由的台灣農民，就

日益淪為半農奴的蔗農，須待台灣革命成功，始能得到解放。因此，光復台灣，是民族革命，同時也是社會革命。

（四月三日於陪都）

原載一九四二年四月六日《益世報》



台灣的慘狀與祖國的責任

本文係台灣革命同盟會常駐委員宋斐如先生在台灣光復宣傳大會的演說。其中敘述台灣人民的戰鬥經過，並對日寇統治台灣的方式和台灣解放問題，提出了他的意見。茲特刊載如下，以供內地同胞參考。

各位長官，各位來賓：

今天是台灣光復運動宣傳大會，兄弟首先代表台灣革命同盟會及全體台胞，向幾方面道謝。第一，今天天氣不佳，道路泥濘，而各位長官，各位來賓，猶踴躍到會。第二，差不多在這兩個禮拜來，陪都各文化團體為了本大會的籌備而熱誠贊助。第三，今天陪都各報都為我們出版台灣光復運動專刊或掲載專論及社評。對我們這個運動表示熱烈的襄助。以上三方面的厚誼隆情，都非常可感，所以在報告之前，謹致感謝之忱。

關於台灣的歷史和割讓後的情況，剛才主席覃院長已經提到，我在這裡，只能作一個簡短的補充，說明台灣與祖國關係之密切。

從地理上說，大家都知道，台灣距離福建很近。從廈門坐船到高雄只要四個鐘頭，兩地相隔不過一衣帶水，台灣實是全國的海防屏障。從人口上說。大多數都是中國人，台灣與祖國的關係更為密切。至於中國人怎樣去的，可謂由來已久，用不著我多說，大家也很清楚。不過大多數是鄭成功領導扶明倒清運動時帶去的。現在全部人口是五百七十四萬，中國人計有五百三十九萬三千餘人，大部分是福建和廣東人。日本人占一個渺小的數字，大約三十萬的樣子，另外，外國人有四萬多，其中還包括華僑在內。所以從歷史上（主席已經提到）、地理上、人口上這三者觀察，都可以證明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我們怎能讓它受敵人的宰割呢？

還有，台灣除了上述三點之外，尚有一個中華民族所不能忽略的特點，就是它始終是抵抗異族統治的堅強根據地。不但是過去明朝抵抗滿清的最後堡壘，四十七年來抗日運動未嘗停止過，也就是將來瓦解日本帝國的一個強大的據點。民族英雄鄭成功在三百多年前，為了拒絕異族的統治，帶了數千同胞，尤其是福建的同胞，渡海到台灣去繼續作戰。雖然大功未成，但卻播下了反抗的火種。所以終有清二百六十餘年，民族運動始終沒有停止過，計大舉三十餘次，小事件就更不用說了。台灣的反抗使得清廷大感頭痛，李鴻章就曾說過，台灣「五年一大叛，三年一小亂」，這正是鄭成功播下的火種的延續。

一直到一八九五年甲午中日之戰，清廷敗北，剛才主席已說到，當時敵人已占有遼東半島，而清廷以為遼東半島比台灣重要，所以願割台灣換回遼東半島（其實在今日看來，敵人發動南進，台灣的重要是遠遠超過遼東半島的）。不過清廷雖然甘願把台灣割給日本，而台灣人民卻不願受異族統治，所以起而抵抗，由丘逢甲先生領導，成立東方第一個民主國家。以台撫唐景崧為大總統，以號召守卒，並以總兵劉永福為幫辦；自己親任義軍大將軍。直抵抗到奉清廷電報：「台抗京危」，就是說，要是你們繼續抵抗下去，北京便危險了。唐劉二位接到這個電報才罷手。而丘逢甲先生猶眷戀三百多萬同胞不肯委棄，後作滄海詩集，詞極悲痛。

不過當時官兵的抵抗雖已停止，而民眾的武力抵抗，從一八九五年以後十餘年間還是繼續下去，使敵人不安寢餓。總計為抵抗敵人統治而死亡的計五、六十萬。當時台灣人口只有三百多萬，五、六十萬的死亡，不能不說是壯烈的犧牲。後來敵人統治武力日趨強大，舉義雖然不容易，但台灣同胞反抗敵人的意識依然濃厚，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採取社會運動的形式繼續進行，相信此後也永遠不會消滅的，必定繼續到日本統治瓦解為止。

其次，要報告敵人如何統治台灣，這可分三方面來說：

第一，在政治上，敵人的政治制度本來是很野蠻的（是半封建的政治體制），而對台灣的統治尤其野蠻。割讓後的台灣並不是由所謂天皇直接統治，而是由《六三法律》（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日公布的第六十二號法律）授權台灣總督一手統治。在殘酷的《六三法律》支配下，台灣的統治可以說是一種暴君的專制；個人生殺予奪完全操在一個人手上。而這種專制的統治，是透過警察制度執行的。警察的權力最大，他可以隨意對人民加以逮捕或毆打，隨便侵入人民住宅，因此，常常釀成反抗的事件。這種事件，多到不勝枚舉。

第二，在經濟上，敵人不只是實施經濟的剝削，而實在是超乎經濟以外的掠奪。譬如砂糖、樟腦、米鹽、茶、水果等是台灣的特產，而幾乎完全成了日政府或日本資本家的專賣品或獨占品。台灣有砂糖王國之稱，就是敵人利用台灣製糖會社、日本製糖會社，強占農民的土地，強迫農民栽種甘蔗，造成經濟王座。不過他們向老百姓收購，並不是用普通買賣的方式，數量價錢完全由會社規定，由不得老百姓作主，例如普通一萬斤的甘蔗只能作八千斤或六千斤計算，所以一般蔗農都叫苦連天，過著非人的生活。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日本強盜統治的苛刻了。

第三，在教育上，敵人所能給我們的只是奴化教育，而待遇上尤有厚薄之分。日本人讀的小學叫做小學校，中國人讀的小學校叫做公學校，後者的程度比前者者低得多。而且中學以上，就很少中國人能夠進去與日本人共學，因學校裡有厚薄之分，所以常常鬧出民族的鬥爭。比方日本學校，普通高年級學生的地位是哥哥，低年級學生的地位是弟弟，但是中國學生便不適用這個規例，無論年級怎樣高，對日本學生來說都是弟弟；日本學生無論年級怎樣低，對中國學生來說都是哥哥。在某一個學校，中日學生曾經因

此引起鬥爭，約定到練兵場去舉行決鬥，後來被偵探偵出，才被禁止。這不過是指其一端，其實在教育上的束縛毒害，又何止待遇上的不平而已。

從政治、經濟、教育三方面看，日本統治台灣用的是半封建的野蠻的方式，我們五百多萬同胞所過的是非人的生活，所以四十八年來，民族解放的武力鬥爭，始終沒有中輟過，但大多數是地下的孤立無援的行動，很少得到祖國同胞的瞭解。到了今日，才能夠向祖國同胞公開提出光復的口號，希望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來。在祖國方面也正如剛才主席所說過的，過去四十八年來：我們一直表面緘默著，到今天才能作公開的呼號，同胞的悲痛，可想而知！

我們今天的要求（目標）很簡單。台灣和別的淪陷區不同。六百萬同胞只要求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來。我們很清楚，我們除了這條路以外，更沒有別的路可走！同時，我們也有權利要求祖國表示收回台灣的決心，宣布台灣是一塊失土，和其他淪陷省份一樣看待。我們還要求祖國趕快完成收復的設施，如正式成立省政府、省黨部、支團部，設置參議會及國民參政員。有了這些設施才算奠定了未來的基礎，集中黨政軍及社會文化教育各界的台灣人才，而發揮更大的力量。

不過，在一般祖國同胞心目中，常常存著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以為台灣革命運動向來不統一，要我們首先統一起來，然後方能夠從事上述各級的準備。我今天可以負責告訴大家，台灣革命運動並沒有分裂的事實，並沒有不統一的地方；雖然表面上有許多團體，在兩年前也有許多黨派的存在，但這並不是政見的不同，而是因為地理的限制，同志們不能公開集中起來所產生的現象。自去年以來，由於祖國抗戰的關係，各團體已經完全統一，各黨派的意見也完全一致，大家都在台灣革命同盟會這一個組織下努力進行種種革命工作，雖然還有地方組織和特殊單位，但都服從同盟會的領導，以同盟會為公開的對外的代表。因為同盟會是代表全台五百多萬同胞的一個總體，所以我們主張在

省政府未成立以前，它要具有政治機構的性質，在省參議會未成立以前，它應該是代表民意的機關。上次我們要求增設台灣參政員時，行政院曾經質問過我們：各省參政員是由省參議會選出的，台灣尚未有省參議會，為何產生參政員。我們的答覆是：在省參議會未成立前，台灣革命同盟會就是代表民意的機關，參政員可由同盟會提出以供當局圈定。當時，行政院方面也很以為然。

總之我們可以綜括地告訴祖國的同胞們，台灣的革命團體已經完全統一，祖國也要設法加強這個統一。台灣革命的目標是非常單純，就是要求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來。祖國黨政當局，應當熱誠接受這個要求。我們知道這種工作相當艱巨，要完成這種艱巨的工作，固然需要五百多萬台灣同胞的努力與奮鬥，同時也要靠祖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協助。老實說，收復台灣失地，已不只是台灣人民的責任，而是全國同胞的共同責任。我們非常誠懇的要求黨政當局，及祖國同胞負起這種共同責任。孫院長曾經預祝我們：「相信到了《馬關條約》五十年紀念的日子，台灣的同胞一定可以在祖國的懷抱裡，以自由平等的國民地位，享受新世界的幸福」（《解放已在目前了》）。我們懇切希望祖國當局以孫院長這個預祝為方針，推進收復台灣的工作，同時，我們相信這個預祝將來一定成為事實，使五百多萬呻吟於敵人魔掌下四十八年的台灣同胞撥開雲霧，重見天日。

原載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新華日報》

中央設計局任用書

字第 754 號

任用宋斐如為本
局台灣調查委員
會專任專門委員

總裁蔣中正

中華民國



月 十二 日

監印 吳佑昭
校對 謝天德

如何收復失地台灣

——血濃於水 台灣必須收復

台灣問題已上中國及國際的政治日程。台灣為中國四十八年前的失地，日本雖蠻橫統治將近半世紀，但其地人民皆以回歸「唐山」（移居海外如台灣、南洋群島之閩、粵同胞，稱內地為唐山）為夙願，台灣革命志士亦以推翻日本統治拯救同胞歸宗祖國為第一種決心，將來打败日本後台灣之歸還中國，在理在情已無可否認。且中國政府早定收復大計，國際人士亦多著論支持，如顏露爾和拉鐵摩爾兩氏，皆主張戰後台灣須歸宗中國，朝鮮須獨立。但，不幸之至，邇來美國輿論對於戰後中國復土問題多有錯誤的主張，其謂「台灣應劃歸國際共管，台灣不宜劃為中國領土，台灣居民亦不得投票，要求歸回中國」（美國一九四二年八月號《幸福》雜誌附刊所發表《幸福》、《生活》及《時代》三大雜誌合草之《戰後和平方案》中第二件備忘錄），尤為荒謬絕倫；台灣與中國的歷史和地理上，皆有極其密切的關係，血濃於水，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固無庸疑義，此種措置亦為法理及人情所支持，實不容國際人士因別種戰略上的打算而有所變更。此點，孫院長哲生及《大公報》均已著文闡述，茲再略抒管見以告我國人士。

台灣與祖國的血水關係至為密切，談論台灣問題，不能不先認識台灣的歷史和地理，然而「血又濃於水」，民族主義在台灣問題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台灣同胞不先恢復國民資格，復土運動必大減效果。

葡萄牙人雖先發見台灣，讚賞其美麗而稱曰：Formosa！但卻不是台灣的主人。而正格的台灣主人，是漢民族，台灣人民是漢民族的民族先鋒隊。台灣與漢民族的關係，據說是自禹貢時代起，後漢孫權也曾派人至台灣勘察過，至隋煬帝，而正式占領台灣。但

這些還都是消極的一時的意義，直至明末，台灣始成為漢民族生存上永久而積極的根據地。明末，滿清入寇，內地盡陷，萬民稱臣，獨鄭成功率八閩子弟，據台灣孤島，布政施教，開發經濟，欲借台灣以為扶明復清的根據地。於是土著生番移住深山，漢人耕於平地，其後閩、粵兩省不服清制之士，皆相率而至台灣，台灣文物制度遂具備，經濟大發展而蔚成文明地域。

台灣是漢民族抵抗異族統治的基地。先自明末清初講罷，滿人入關，全國披靡，屈從清制，獨鄭成功據台灣抵抗滿清到底，終其世，清兵無可奈何。即至鄭氏三世為清所降服，但台民仍武力抗爭不已，故李鴻章常嘆曰：「台灣三年一小叛，五年一大亂。」甲午年清廷無智，割台灣予日本，也半由於此。即至甲午年清廷戰敗於日寇，割台以求和，台灣民眾並未降服，先成立台灣民主國，繼而武力抗爭二十餘年之久，壯烈犧牲者五十餘萬人。近仍以社會運動的方式抵抗日本的統治。總之，台灣人是漢人，充滿著漢族的血，富有「國姓爺」鄭成功的精誠與氣魄，且有八閩兩粵的冒險精神。

漢民族經營台灣歷三百餘年之久，現在蕃殖成了五百五十多萬的大部落，經濟的發展也已趕上世界資本主義的水準，物產不但足以自給，且有剩餘可供輸出。大部分的米和糖輸往日本，樟腦和茶葉皆大量輸出世界，水電力可以充分供應現代工業之用。熱帶物產應有盡有。自然界皆甚美滿，只在人文上殘留著一大遺憾，就是二十多萬的日本人統治著二十七倍多數的漢人。其統治方式的殘酷與野蠻，終使台灣社會在資本主義相當發展的今日，仍以民族界線劃開人類的鴻溝，於是台灣的五百五十多萬漢人，沒有幸福可言，只過著異族統治下的奴隸生活，有時也奮起，作無後援的反抗，而以孤軍全沒為下場。台灣民眾之抵抗日本強權，國內人士或少知其「血流漂杵」，但如余清風、羅俊之役，死亡達十萬；如霧社之「征剿」，日軍竟用飛機毒氣燒山洗村，其壯烈與淒慘，亦足道矣。

然而台灣漢人最悲慘者，厥為徒具堅強的民族精神，而事實上卻是無國無家。以前祖國因限於環境與力量，對於台灣沒有關心，也不能關心，故一任日本挑撥民族感情的毒計橫行於國內，台灣人在祖國的地位遂成了外人，一般同胞皆歧視台灣人。抗日軍興後，國人盡視台人為日諜。因為這個原因，凡不服日寇統治而潛逃歸國者，也不敢公開，只能借閩粵籍貫以為掩護。台人之服務貢獻於祖國教育文化如許地山者，功績不為不偉。北伐之年，為完成三民主義革命效死疆場者，以數百計。抗戰軍興後，踴躍投效於黨政軍文化教育各界的台灣人，總在數千以上。但是台灣人與祖國的關係依然淡薄，表面為國人所知之台灣人，似甚寥寥無幾，其固有必然之理，可不言而喻了。

然聞英明領袖早決完整國土之心，黨政當局已定收復台灣之計劃。尤其自太平洋戰起，台灣的戰略地位更加增高。台灣隔我內地僅一衣帶水（海峽最狹地方，行舟四小時可達），加以血肉關係甚深，收復原屬易事，日本帝國在台灣，並未立足腳步。依國父的分析，「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見民族主義講演），其方法固在政治力、經濟力，及人口壓迫。日本在台灣的人口政策已經失敗，其政治經濟壓力之成功，也只占領了台灣，並沒有征服了台灣人。最初的「手槍政策」已告失敗，最近乃發動同化政策，欲強制台人改易姓名，廢祖宗而祀天照皇大神為始祖。其獎勵漢人與日人通婚，結果無一漢女嫁日人，其同化政策將因祖國的台灣政策運用得宜，而完全成為泡沫。

收復台灣須自收攬台胞人心下手，而收攬台胞人心之妙，在於運用民族主義。國父指示過我們：「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族，再推至宗族，再然後方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的關係，當中是很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的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當容易聯絡得多」（民族主義第五講）。台灣人的宗族觀念極深，每一家或一族，皆與「唐山」保持著族譜關係。用宗族關係去聯絡台胞，容易親密混成一片。只是今日於宗族之外，顯已形成

另一個更大的單位，那就是國族。國族原構成於宗族與家族，但此台灣宗族與國族的聯鎖，卻已為法律所阻礙，為日寇離間民族政策所遮斷，故欲運用宗族關係以發揮民族主義於台灣，須先接上宗族與國族的聯繫。其方法就是祖國積極宣布：台灣人即中華民國國民，祖國已為收復台灣而苦心孤詣。首先要著，就是集中台人的力量。但是台人回國皆以上述關係而變成潛伏的力量，皆不肯顯身說法，台灣人的國族地位不恢復，台胞的潛伏力量如何能夠集中，更如何能夠集中組織，集中意志？

收復台灣的第二要著，應該是爭取「台胞內向」。爭取台胞內向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民族主義的運用。台胞受治於日寇達四十八載之久，加以政治經濟的壓迫，其民族精神不無多少變化，故欲爭取台胞內向，必須先復活台胞的民族主義，這是國父遺教中最緊要之點。但是過去台胞宗族與祖國國族的聯繫久為法律所切斷，祖國政府一向亦未關懷及此，缺欠正確一致的台灣政策，遂致嚮往祖國之士，雖有悍然冒犯日本法規毅然歸國者，常抱滿腔熱血而來，掃興垂頭而去，大都遭遇白眼與歧視，能堅持奮鬥以底與立足者，實千萬份之一而已，故今日欲爭取台胞內向，須先打開國門，這就是公開承認台灣人的國族關係，確定台灣的政治地位。中國古來最重名分，以名不正則言不順，縱有台灣志士欲為祖國效命，亦唯恐死得不明不白。若仍誤認台人皆為日諜，請問台人的力量將由何出？最近台灣革命同盟會的活動方針，一面著重於台灣島內工作，一面又公然提出設省建政，正式設立省黨部，成立台灣正規軍，請設台灣參政員，自有充分的理由，其動機也十分純潔。現在敵人不但在積極謀同化台胞，且欲利用台胞為橋梁，繼由宗族關係，來懷柔我淪陷區的同胞。以前日寇驅台灣流氓及罪犯等敗類於我沿海各省，今則改變策略，收束這些敗類而代以所謂善良商人，其心叵測，良可警惕，願當局三思現勢之轉移，考慮適當辦法，以相抵制。

台灣之政治設施，已無可顧忌，美國顏露爾及拉鐵摩爾兩氏，已為我國主張正義與

主權了。我國對日宣戰只在消極方面撕毀了馬關條約，但台胞之恢復國籍，尚須政府正面的宣布。今日台胞先覺者之復籍復權運動，已成合理要求，國人應予以積極支持，不應再事懷疑猶豫。中國宣布台灣人為中華民國國民並從實際上推進政治設施，還有一種更大的作用，就是安定國際人士，乃至各國政府當局，有錯誤的主張或措施，如前引美國《幸福》及《生活》等三大雜誌的《戰後和平方案》提議台灣歸國際共管。戰後台灣之歸復祖國，為中國合理的要求，數年來國際大多數人士皆已極表同情，並積極支持。深願黨政軍當局透視國際的變動趨向及台灣革命的主觀客觀情勢，對於收復台灣工作，能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以收攬台胞人心，以利失地之克復，並阻止國際間不正確的思想與措施之發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

原載一九四三年三月卅日、四月一日《大公报》

台灣在急激演變中

在開羅舉行的三強會議，已經決定了台灣歸還中國，台灣的同胞，在戰後必然是重回祖國的懷抱的，但是台灣的同胞久處於水深火熱中，如何早日把他們救出，這是我們當前的任務，而處於日寇宰割下的台灣同胞之悲慘，尤值得我們深切的關心。

處於日寇鐵蹄下轉輾半世紀的台灣同胞，其命運與環境，時常在演變中，近年的演變尤其激烈。自四十九年前，昏庸的清廷將台灣割予日寇以來，台灣同胞即處於異族隨意屠殺的命運之下。後來，日寇採用愚民教育奴化教育，台灣同胞受愚弄的程度，日益加深。但自九·一八事變以後，台灣在日寇侵略上的重要性格外增加，而日寇對於台灣人民的愚弄，改變一種新花樣，著重了同化政策，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總督府更對台灣人民實施所謂「皇民化運動」，強迫台灣同胞改名易姓，廢宗祀而拜天照女神，強要台灣人民食豆漿湯、著和服、捆腰巾、履木屐，等等，不一而足。台灣人民若不照辦，則其日常生活將感極度困難，如乘車搭船，購買必需品，皆遇非常的不便，甚至如子弟的教育權，將完全被褫奪。

尤其是日寇的「戰時設施」，使台灣同胞受到更慘痛的遭遇。日寇在台灣統治專靠軍警網，而以保甲連坐制度為其助，戰爭爆發以來，更變本加厲，日寇為防台胞革命，而實施了《保甲連坐法》，並且組織所謂「防謀團」及「保甲互助隊」，加給台灣人民以沉重的鎖鏈。同時，日本政府還強制台灣人民，普遍組織各種反動團體，如所謂「報國勤勞少年團」、「青年團」、「壯年團」、「女子少年團」、「女子青年團」、「皇民化運動推進少年隊」，及各級學生「救國勤勞奉仕作業隊」等等。其用意，一面固在苦擾台胞並收以台制台之效，一面又在迫使他們參加日本強盜的陣營，給日寇增加多少力量。

台灣同胞命運的惡劣變化在服務戰時工役及兵役上，開一新紀錄。據年初的消息，日寇在戰爭初期施於台胞的軍役，在台灣島內強迫貧苦台胞，挨餓建築各種軍事工程；在島外則抽調壯丁，派送中國及南洋各戰場，擔任勤務，大多死於戰場上。至前年六月間，台灣總督府更公布了《台灣特別志願兵制度》，實施於去年二月一日，規定凡滿十七歲以上（沒有最高限度）的台灣人民，皆有被征的義務，是為服務兵役的進一層束縛。

《台灣特別志願兵制度》，規定訓練期間六個月，每年實施兩期。第一期開始於去年六月，第二期開始於去年十二月，今年五月間即可畢業兩期。其畢業者資格等於特種兵，須入伍在營房生活，聞第二期畢業者，已編入第一補充隊。據去年二月中旬，台灣《日日新報》的記載，「台灣特別義務兵的志願者，統計總數已達二萬餘人。其中台胞一萬九千餘人，番人九百餘人，女護士二千餘人」（皆據《半月文萃》上，本人拙作《太平洋戰爭中的台灣》）。

台胞服務兵期，據最近（據東京九月廿二日電稱）「兵役制度」的實施，變成鐵一般的確定，自十九歲至四十五歲的台灣同胞，皆要被用以與祖國或祖國的盟邦作戰。其具體的條例，及實際施行的結果如何，現尚不得知，但是日寇此種措施，實在值得我們深慮，茲舉其服務者，剖析於下：

第一，日寇在此後作戰上可以增加一大批兵備。台灣漢族人口約為五百五十萬，生番也有三十萬，合計五百八十萬。假定其半數為男性，其有服兵義務者，又假定為四〇%，則日寇可在台灣獲得的兵補為一百六十萬。即台胞百多萬人，不派進來中國而分到南洋各地，其對同盟國的影響，也自甚大。

第二，此種新兵種，即能在各戰場發生的作用，大堪注意。日寇的對外侵略，慣用所謂「以夷制夷」政策，對我中國則為「以華制華」了。日寇之「以華制華」政策，前

後方式與用意，固有不同，但已相當有效。其利用台胞於我華中及華南，前者強迫「台灣惡狗」以□□中華民族的感情，後來改用懷柔政策，利用所謂善良商人以拉攏沿途淪陷區的同胞，此後皆用以拉攏南洋華僑，又是一種新效用。第三，徵兵則對於國民宣傳者的作用，亦有可注意之點。征台民服兵役，而為對台胞的壓迫之加厲者，但因半世紀的壓迫，及台胞鬥爭的孤立無援，已有一部分人趨向於爭取面子上的假平等地位，其中尤以民族叛徒及御用紳士為最，他們希望「平等」待遇，徵兵制之實行時，在形式上也都平等，他們大可以借此擴大宣傳，以蠱惑一般人。此種身份及地位上的混淆，再與改名易姓、移風易俗聯結起來想，經過相當時期，確是一種可怕的前途。

總之，日本侵略者是在採用種種方法消化占領地的物力與人力，殖民地人民的「皇民化政策」，是其一等罪。在今日台灣這片錦繡河山上，確如先烈丘逢甲先生所慨言，「東海餓蛟作人舞，萬里炮雲挾槍雨；相公款關奉盟語，玉斧一揮恨終古」了，現在尚可咏「去日兒童今漸長，燈前都解問台灣」，再過幾年後，人民皆著和尚服、結腰帶、履木屐之現象，景況完全改變，其時，才真「不堪回首論台灣」了。

我國政府對於日寇這種「民族同化」的陰謀，決不能等閑視之。日寇今日大陸政策發展到現階段，碰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漢族的文化太高，中國的人口太多，若以七千萬融入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有繼元遺亡國滅族之可能。但若其民族同化政策果能成功，則其對異民族的對抗力量可收加倍的效果。台灣皇民化政策可著效，朝鮮也埋伏著同樣危機，我東北四省也不能無慮。假定日寇的毒計得售，則其民族力量在數量上增加七千多萬人，正與其本國人數相等，若無適當辦法相抵制，數十年乃至數年後，情況則不可樂觀。

若此，則我國的抗戰，不會失敗於上海南京、廣州漢口，也不至於失敗於河南河北，自較大的處所著眼，或有失敗於玉山（台灣舊名）雞籠（今之基隆）、鴨綠江畔、白山

黑水之間。則國民的本質的改易，實堪吾人深思遠慮。吾人非故作危言聳聽，據我的所見所聞，當局實有早定民族對策，以抵抗日寇「皇民化」的民族侵略政策咧！

原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廣西日報》

論台灣的革命戰略

中美英三國領袖開羅會議決定「戰後台灣歸還中國」，算已把半世紀前的失地台灣，再度列入中華民國的版圖了。這是兩年前對日正式宣戰，撕毀台胞賣身契《馬關條約》的高一層的發展，也就是我國當局對於收復台灣的積極措施，國際正式承認台灣為我領土的具體表示和條約保障。

惟其如此，所以台灣革命工作者負上更重大的責任與使命，其對於日本統治者的鬥爭，不僅必須加強努力，且須有覺悟的更新，其鬥爭方式不僅要在台灣革命陣營內，虛心坦懷作自我的批判，且須在祖國社會上披露，並公開討論，以供領導台灣革命的黨政當局抉擇、參考。因為台灣忍痛割予日寇統治已達半世紀之久，台灣其政已不能上達，其社會情形亦有多少的變化，台灣革命者數十年來也只是作「孤軍的奮鬥」，所以一切未免有內外隔絕之憾。一向祖國同胞很少人注意台灣問題，正確瞭解台灣問題者，更是寥寥少數，深刻注視台灣現階段的內外情勢、台灣革命的發展與癥結所在的人，更是少數的少數，即在自己標榜為台灣革命者之間，恐怕也不可多得。爰特融解化合台灣革命同志的意見，撰成本文以公於社會，並供當局作參考。

一、應有的自我檢討

為要能夠切實而有效地加強內外的有利條件和克服或削弱內外的不利條件，我們認為創造和加強作為台灣革命可能成功而有決定作用之本質的條件，是現階段的首要任務。換言之，現在第一首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和鞏固台灣革命的統一。然而不可否認的，到

現在這種統一還未曾建立起來，雖然在祖國參加抗戰的各種革命團體，曾於不久以前已經聯合成立了「台灣革命同盟會」，而它也曾經或多或少地完成了這種「統一」性的任務，但是實際上還是非常不夠，在統一上或團體上看起來，還是十分嚴重而可悲觀的——名是統一團結，實則散漫異常，甚至進行著不應有的明爭暗鬥和互相攻訐，互立門戶，彼此排擠。

在指出怎樣去克服這種不應有的散漫、爭鬥而促進真正的健全的統一團結的辦法以前，我們應先簡要研究一下，組成或建立台灣革命統一的主客觀需求，是怎樣迫切。其主要方面有如下列：

(一) 內部方面

一、由於異族統治者的軍事政治經濟的奴役、壓迫、剝削的手段空前的加厲所促成的全台灣無分階層的民族反感和革命反抗，已經迅速地匯成為空前的洪大怒潮了。這很明顯的無論在客觀上抑在主觀上都正要求著台灣的每一個革命集團以至於每一個革命者，如果不願或不能放任這一日益高漲澎湃的革命怒潮自然的氾濫，而應該且必須使之向著正確的方面去奔流、沖撼。那末，就必須毫不遲疑地舉起鮮明的無分階層的民族革命統一的大旗來。

二、反對異族統治而日益組織化的台灣「番族」，誰都不可否認的，是台灣革命的一支相當強大的生力軍，但是為要使她不被統治者所利用，而能夠早一刻爭取團結到革命陣營來，那末，這很明顯的就只有趕快高舉起無分階層並無分民族、種族的革命統一的旗幟，來作鮮明而強有力的號召。

三、日本統治者六年餘來的對外戰爭，已大大地削弱了它自身各方面的力量，就中，對殖民地統治上所發的力量，在各方面是時常不由自主地或隱或顯地暴露出「外強中乾」

的脆弱性。這在革命組織上是非常有利的條件。然毫不掩飾地說，到現在台灣革命集團所努力、所組織的革命力量，何以還未能達到應有的程度呢？這雖然不可抹殺的是受了各種客觀條件所限制著，但主要的還是由於主觀努力的不夠，特別是在於對敵作戰上十分缺乏著領導和指揮的統一性所致。如此，無疑問的為要能夠加強領導和指揮的統一性——加強島內外的革命力量，而在不久之將來的某一歷史的特定階段上，能夠順利而有力地配合祖國戰略上的總反攻，以便一鼓擊潰日本統治者，就必須趕快建立和鞏固台灣革命的統一。但要順利達成這一目的，還須從來出頭領導革命的人們，放棄門戶之見，降低過分的領袖欲望，並須運用全副精神和時間專一努力，以免革命行列鬆懈與失望。

(二) 外部方面

一、祖國對日寇的反侵略抗戰，業已英勇堅持到將近七年，而且已經日益接近最後勝利之境。這不待說明是由於全國的無分黨派、無分階層，也就是全民族能夠一致站在同一的戰線上對敵作戰的結果。這非常有力地而且十分正確地證明著台灣革命力量要能夠加強，台灣革命要能夠早日成功，就只有加緊建立和鞏固無分黨派無分階層的革命統一戰線。

二、此外，與台灣同命運的朝鮮，近來能夠更加有力而有成績地協助中國抗戰，和更加普遍而勇敢地開展其半島內的革命工作，未始不是得力於前年間已經建立了的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這又證明著，也就是客觀地要求著：台灣革命集團（包括在祖國的）如果能夠更加有成績地協助祖國抗戰和更有力地推進台灣島內的革命工作，就必須趕快建立和鞏固無分黨派無分階層的革命統一戰線。

三、日寇所發動的這次太平洋戰爭，促成了中美英蘇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集團，已經能夠切實地建立起來，這不待言，是正確地配合了更加有力打擊並

早日消滅人類罪魁的世界法西斯強盜集團之主客觀需求的。這又證明著：為要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保衛民主，消滅法西斯），就必須無分國家與民族地站在同一戰線上作戰，才能夠發揮強大的力量。同樣台灣為要打倒一個共同的敵人——異族統治者，也必須無分黨派、無分階層地，站在革命統一戰線上戰鬥，才能夠發揮堅強的民族力量。

二、現階段的首要任務

根據上面所列幾點看來，台灣革命戰線必須趕快建立和鞏固，已經不是觀念上的研究問題，而是現實上的實踐問題，應該是沒有疑問的了。然要怎樣去克服不應有的散漫和鬥爭（主要的是在祖國參加抗戰的黨派間），以便促進真正健全的統一和團結，也就是促進全台（包括在祖國的）無分黨派無分階層的革命統一戰線的加緊建立和鞏固？試述一二管見如下：

（一）消極的辦法

大膽不客氣地指出，在過去，而且在現在，我們的有些革命團體，特別是其負責者們，大都或多或少的或重或輕的犯著「徒事空喊」和「爭奪形式」的毛病，所以才會不幸地產生了上面所說的散漫和鬥爭。特再縷述如下：

一、徒事空喊——抗戰六年餘來，在祖國活動著的台灣革命團體或革命者之中，對抗戰，對台灣革命作過不少有意義的宣傳工作的，固然甚多，但作過並且還在繼續作著無內容（指革命的）的空喊工作的也在不少，他們或許是因為缺乏革命的認識，或許是因為沒有勇氣再前進，所以大都以為只要高興時喊幾句過時的口號，發幾張欠缺內容的宣言，或者寫幾篇順應時會攀龍附鳳的文章——滿想盤足安坐大後方，等待祖國抗戰勝

利，台灣革命也就自然地會跟著而成功！至於要怎樣更加有力而有效地，切實而正確地協助抗戰勝利早日來臨，他們是不敢也不能過問或關心，他們甚至於絲毫沒有深入考慮，也沒有積極盡其應盡的力量。

二、爭奪形式——換句坦白話就是爭奪領導權；這個毛病是由於上項的「徒事空喊」發展來的。他們大概是或重或輕的染著「大頭（領袖）病」，所以大都以為所有的革命團體，只要歸於自己一人或者一派之領導下，革命就會成功，或者至少也較易成功。至於革命怎樣才會成功，或怎樣才能較易成功這些問題，說好聽些，他們如果不是單憑主觀的理想，便是專待客觀的變化，而沒有科學的根據。

要糾正第一項毛病——徒事空喊的空洞行為，我們對於「缺乏革命認識」的人，要十分誠懇地勸請他們除了要勇敢多多正視現實之外，尤其要取消輕視理想研究的錯誤偏見；「沒有革命理論就沒有革命行動」，所以，革命的正確認識不是那麼簡單容易得到的，過時或無內容的「空喊」（雖然是熱情的表現），結果未必有補於實際。必須有相當豐富而深刻的理論修養和經過無數次的艱難的實際鬥爭，才有正確認識成功的希望。因為如果沒有革命的理論修養，就不能瞭解和把握客觀現實的發展規律。同時，如果沒有把握客觀的規律，也就不能有正確的主觀行動，而就會必然的變成盲目的空洞的行為。又對於「沒有勇氣再前進」的人，我們也要十分誠懇地勸請他們不要只斤斤於欣賞過去的一些成就，而本諸過去的鬥爭精神和運用豐富的經驗，重新正視和把握現實繼續奮進。不然，革命也正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結果，他們不但會一天一天地離開成功之境愈遠，並且連過去所獲得的一些成果也必然地會終於變為泡影而消散的！

要克服第二項毛病——爭奪形式的可耻觀念，針對著他們的病源——不正確的領袖欲，我們又要十分懇摯地勸請他們首先去瞭解並牢記著：「領導權」不是一個團體或一個人所可能憑著主觀的願望而奪得的，它必須有各種革命黨派，特別是要有各階層的大

多數人的真正擁護，才可獲得的。這是一個很平凡但很正確的真理。因而鼓勵他們改變不應有的念頭，多多面對現實（革命的客觀的迫切需求是什麼？），以便加強主觀的革命力量。也就是說，與其努力於形式的爭奪，不如更實際些推進和開展在革命過程中所有的每一階段每一瞬間的中心工作，才是正確。這樣，也必須這樣，對於革命良心始過得去，對於革命又比較有益，而對於「領導權」的獲得（不是爭奪），也才有真正的希望。

很明顯的，由於上面所述的這兩種有聯繫性的毛病——空洞行為和錯誤觀念的加劇發展，才會產生了一些不應有的散漫、爭鬥——不統一無團結的現象，而自然地影響到革命統一戰線的未能建立，或未能健全地建立。因此，我們再三懇望並再三強調：只要他（無論是一個團體或一個團體的負責者）是一個真正正的革命者——有勇氣正視並把握現實（台灣五百餘萬同胞所迫切需求的是什麼？祖國反侵略抗戰所迫切需求的又是什麼？——即整個台灣革命的主觀需求是什麼？又是怎樣？）而為這現實奮戰到底的革命者，那末，他也就必能為著共同的目標，自我批判，勇敢地發見和克服對於革命無益而有害的錯誤觀念以及空洞行為。不然，他在某歷史的轉變的階段上，是不能幸免地必會被革命的大眾，無情地拋擲到革命陣營外去，變為淒慘的沒有軍隊的將軍！

（二）積極的辦法

一、展開實際工作的競賽。

一個具有正確世界觀的革命團體或革命者，他應該是而且必須是十分重視革命的群眾基礎的，也就是說，他必定是存在於或生活於群眾基礎上的實際工作中的。惟其與實際的革命基礎有著密切的聯繫，所以也就是自然的很少犯著「尚空喊」或「爭形式」等的錯誤傾向和行動。這是稍具革命常識的人們起碼應有的常識問題。由是觀之，我們的革命團體間所以會產生如上面再三指出的不應有的現象——散漫（起因於尚空喊），爭

鬥（起因於爭形式）問題，不容否認的，其主要的因素，實在是「對於缺乏群眾基礎上的實際工作」。因此，為要克服這種不應有的散漫、爭鬥，我們認為最正確且最有力的辦法就是廣泛地積極促進所有的台灣革命團體起來開展實際工作的競賽。這種「競賽」的辦法，或許有人會認為不能克服爭鬥而反加劇爭鬥，不能促進統一和團結，而反妨礙統一和團結。誠然，某種爭鬥會加劇或不可避免，某種份子的團結會受妨礙也不可避，但是我們相信在競賽過程中，特別是在競賽達到激烈的階段，這種所謂「爭鬥加劇」和「團結妨礙」，已經是屬於很少作用的次要問題了。這一種結果的產生，當然不可不預想到，但是祖國領導者的廣大包容，英明判斷，乃至於這「競賽」所企求對於統一的加緊建立，對於革命組織的加強發展，必定發生決定作用而「減少爭鬥」、「加強團結」。具體些說，這種「競賽」是具有現實鬥爭性的，所以，偽革命者固要退避三舍而不敢一試，而「空喊家」在這一競賽中，如果不能一革他原來的空洞性，表現出他自己應有的真實力量來，那無疑問的他不是可憐地落伍在十萬八千里外，便是悲慘地被無情的歷史現實的絆腳石所絆倒。至於真正的勇敢無畏的革命者群，他們遲早終必達到預期的目的——真正的統一和團結之壯麗的境地。所以「工作競賽」，我們不但不要忌避，而且要積極地去鼓勵和開展。此點，祖國領導者更應注意及之，並賦予能夠專責辦理的人，以專權推進工作的機會，並激勵他們運用全副精神從事於台灣革命工作。

二、懇求祖國黨政當局更加切實援助。

(1) 在經濟方面——自抗戰開始以來，我們的各種革命團體（在祖國的）所受祖國黨政當局的經濟援助已經不小，然何以我們所表現出來的成績，還未能達到應有的程度？這一方面，固然因為台灣革命團體主觀上努力不夠；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抹殺的是由於祖國黨政當局的經濟援助未達到應有的程度，其援助原則及方式也有所欠妥，以致有些團體的工作經費時常陷於支絀的狀態，因而影響一些工作開展的重要機會，有時也不得

不忍痛任其消失。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祖國當局或因台灣脫離祖國政制久而下情不能上達，致使「任能選賢」有時難免有不合「適才適用」的事實。誠懇大膽地說，也正由於祖國黨政當局的援助原則和方式有所欠妥，以致或大或小助成了台灣革命團體散漫爭鬥加劇，其結果又自然地影響整個工作不能如意地開展。因此，我們認為：對於台灣革命大家既然公認為是中國革命的一環。那末，祖國當局無論在責任上，在義務上，以至於在反侵略抗戰的政略上戰略上，對於整個台灣革命工作的推進和開展所必需的經費，實應有更切實援助的必要。同時，為要有效地幫助克服台灣革命團體間不應有的散漫和爭鬥，以促進真正的健全的統一和團結起見，對於援助原則和方式，更應重新考慮，對於此點，我們大膽地認為應該採取：根據具體的實際情形的需要而決定全盤費用及整個的援助方式，改變一向個別的援助方式。

(2) 在精神方面——台灣革命既然是中國革命的一環，那末，在經濟的援助固勿論，在精神的援助——如革命領導上的戰略指導以及策略應用等方面，當然在祖國黨政當局須再擔負更大的責任和義務，是不待言的。過去，台灣革命團體以及革命者直接間接所受祖國當局的指示和教導之處固然甚多，然而在祖國當局方面或許是還有著各種不得已的原因，以致對於台灣革命領導上的上層機構，還是欠著應有程度的統一性。不可忽視的，也正由於上層機構領導欠缺統一，所以自然地影響到下層組織（台灣革命團體間）散漫，甚至於爭鬥加劇！因此，我們認為要使這種不應有的現象能夠早日消滅，台灣革命團體的真正統一和團結能夠早日實現，那末，除了懇望台灣團體間自動奮起，在消極方面能夠自我批判重新檢點，在積極方面能夠爭先恐後的開展實際工作的競賽之外，還是懇請祖國黨政當局由上而下促成上層領導機構的統一，同時並對台灣團體加以應有程度的強制性的推動。這應該是較為有力且較為容易的方法吧。

簡單的結語

現階段台灣革命的客觀條件，是明顯地達到相當程度的成熟了。它正在十分迫切地需求著台灣的每一革命團體或每一革命者趕快把握和有效運用，以完成歷史所賦予的偉大使命。然這一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任務，無疑問的不是空喊或等待，更不是不能也不敢深刻研究台灣革命現實或只盤腳安坐大後方的人所可完成的。而是需要準備足夠的主觀力量並經過無數次驚人的血的戰鬥，才有達成的希望。因此，在現階段擺在台灣的一革命團體或每一革命者面前的台灣革命的中心任務，應該是「如何去加強主觀力量」這一點了。在理論上，在實際上，須能發見和把握到這個中心任務，始可以妥善配合發展中的客觀規律。台灣革命領導者，能夠發揮這一點中心任務，祖國當局再予以有力的督導與鼓勵，則台灣革命的完成應該是沒有什麼困難的。這就是總理所指示的「知難行易」的真理。正因為台灣革命領導者不能正確認識台灣革命實際及不努力加強主觀力量，遂致我們的革命團體間，還是缺欠應有的統一性和團結性，也就是台灣革命統一戰線還未健全建立起來，以至於變成了「知易行難」的不應有的狀態！

然而，「既往不咎，來者可追」，沒有錯誤傾向的發見，也就不能有正確路線的決定，所以，我們敢大膽地再三強調：如果是一個真正正的革命集團或革命者，他為著協助祖國抗戰勝利，為著促進台灣革命早日成功，那末，在台灣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相當成熟的階段，實不可也不能再有所躊躇於拋棄不應有的偏見或錯誤觀念，實不可也不能再躑躅於尚空喊和爭形式的夢境中，而必須「我為人先」，站在無分黨派無分階層的統一戰線的革命旗幟下，勇往邁進，發揮所有的力量，推進和開展對革命有決定性的工作。

《人民導報》發刊詞

五十年的慘澹反抗，八年堅苦抗戰，贏得了台灣的光復。但是離開祖國五十年的台灣，許多方面已和祖國變得生疏，特別是文化方面更需要一番的調整。有人以為台灣的文化教育程度已經相當的高，但這也只是片面的觀察。台灣的物質文明或已建立了基礎，但是上層的精神文明卻還在荒蕪中。事實上，台灣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實施殖民地政策奴化教育的結果，充其量只完成了文化的畸形發展。台灣文化的正軌和合理的發展，還有待於此後的開拓。

我們若再具體地分析台灣的實情，則更可證明吾人立論不為虛構。第一、台灣教育雖然相當普及，但是受過教育的人材，很少運用學識的機會。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哪裡有幾個得以使用他們的高級學識？台灣哪裡有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文化工作者？第二、台灣雖也有大學及不少的專科學校，但是哪裡有文科、法律、政治、經濟、教育，乃至哲學的合理施設？聊可自慰的教育，不只是局限於醫學嗎？第三、台灣雖也有日本三流以下的文化活動，但這更不足以誇張。一來台灣人很少參加的機會，二來日本文化在世界系統中究占如何地位，尚屬疑問。第四、台灣工業及科學雖也相當發達，但尚不能自滿。台灣工業猶停滯於食品生產，紡紗織布工業還不能自立，機器生產等重工業只是近年的萌芽。美國人《今日之台灣》著者評論台灣工業並未發展，自為切合事實的論據。

然而台灣自有台灣特殊的文化存在，台灣文化還承續著漢、明的正統。只是它的發展中途為日本帝國主義所壓抑，所閉塞，終於走入歧路罷了。所以今日台灣的文化必須側重於啟蒙、發揚，與溝通。我們有鑒及此，爰特創刊本報，用以啟發過去的閉塞，發揚固有的祖國文化，溝通國內外的消息與論說，宣揚政府法令，報導民間隱情，以期建

設三民主義的新台灣。本報願為台灣文化的「掃雷艇」、新文化的「播種機」，使台灣文化走入合理的正軌。

不過，我們的力量單薄、學識淺陋，深願省內外先進，多加指導，多加贊助。

原載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人民導報》

新年

宋斐如

出版

發揚人民意見爲宗旨

總發售處

本報啓事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不勝感荷。茲因業務擴展，遷往新址辦公，特此啓事。本報宗旨，在於報導事實，服務社會，望各界人士繼續支持。

發行人

鄧明祿

經理部

董北市

編輯部

董北市

印刷所

大業印務局

人民導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一日

本報地址：台北市中正路

電話：XXXX

零售每份：XXX元

訂閱：每月XXX元

廣告：每行XXX元

三民主義上人民之意義

董北市 姜琦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不勝感荷。茲因業務擴展，遷往新址辦公，特此啓事。本報宗旨，在於報導事實，服務社會，望各界人士繼續支持。

三民主義，乃我中華民族之精神，亦即我中華民族之靈魂。其意義之重大，非筆墨所能形容。余嘗思：三民主義之真義，在於「民生」。民生者，即人民之生活也。人民之生活，乃國家之基礎，亦即民族之生命。故欲求國家之強盛，必先求人民之幸福。此即三民主義之真義也。

余嘗思：三民主義之真義，在於「民主」。民主者，即人民之權利也。人民之權利，乃國家之靈魂，亦即民族之生命。故欲求國家之強盛，必先求人民之權利。此即三民主義之真義也。

余嘗思：三民主義之真義，在於「統一」。統一者，即人民之團結也。人民之團結，乃國家之基礎，亦即民族之生命。故欲求國家之強盛，必先求人民之團結。此即三民主義之真義也。

于右任

河山

發刊辭

本報之發刊，旨在報導事實，服務社會。望各界人士繼續支持。

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

(長官公署教育副處長宋斐如播講)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七日於台北廣播電台

諸位同胞、諸位父老、兄弟、姊妹，本人離開台灣二十四年、返台亦已三月，今日始得機會來和全省同鄉談話，覺得抱歉，又覺得慚愧。今晚想向諸位談的話，只是改進台灣文化教育的一點小意見。因為關於台灣的施政方針及設施經過，陳長官、葛秘書長，以至各處會主管官，皆已有詳盡的指示，用不著本人再來重複，今晚只提出台灣文化教育上的一些問題，供給諸位同胞研究、參考罷了。

在講述改進辦法之先，應先分析客觀的現實。原來，台灣是漢、明的正統，只因為離開祖國五十年的結果，致使文化正統起了變化。台灣受日本奴化教育及皇民化政策熏染的結果，其文化內容變成非常複雜，既不是純粹漢、明的正統，但也不是純粹日本式的文化，在日本和服之內，還保留著一些漢裝。這是日本奴化教育強制下，台灣同胞的民族精神頑強抵抗的結果，不能不說是一種可歌可泣的燦爛的成績。五十一年前，日本帝國主義想占領台灣，滿清又以「台抗京危」的口實，勸告同胞接受日本的統治。其後日本統治者更以槍炮政策壓迫同胞，運用皇民化政策，想自台民的衣、食、住、行各方面奴化台灣同胞。固然也有小部分御用紳士曾經企圖接近日本統治階級，日本也向世界誇稱其治台成績優良，但是大多數同胞始終厭惡日本的風俗習慣、文物制度、譏之曰「四腳文化」。日本文化的優劣問題及應如何取捨問題，不是今日廣播上要說的話，不過總而言之，受日本蠻橫統治五十年的台灣文化，至少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其一，在日本

奴化政策所干涉、壓抑、禁絕之下，漢、明的正統文化，自然停滯於五十年前的地步，所以沒有趕上祖國五十年來的進步。其二，日本對於台灣採取殖民地文化政策，殖民地以上的學問和事物，是不能給台灣人民學習的，所以世界五十年來的進步，台灣並沒有充分吸收進來。其三，日本統治者一向的文化設施，目的只在使全國人民得以瞭解或接受統治者的法令和指揮。簡單一句話，日本對於人民所施文化教育，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宗旨。台灣是日本殖民地，更不能例外。

台灣因為受到上述三種影響的結果，其文化的發展，自然走入不純的歧路。即令我們不能說台灣五十年來的文化完全停頓了，至少可以說台灣的文化確是一種畸形的發展。台灣省民自己或許有人誇稱台灣教育相當普及，台灣的物質文明也已相當建立。但是我們仔細想想吧，上層的精神文明不是還在荒蕪中嗎？中等以上的教育，不是給少數住民的日本人，占去了絕大的比率嗎？我們若再具體分析台灣各方面的實情，則更可以證明吾人的立論不為虛構。第一，台灣初等教育雖然較為普及，但是受過教育的人才，很少有運用學識的機會。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哪裡有幾個得以使用他們的高級學識呢？台灣哪裡有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文化工作者？第二，台灣雖然也有大學及不少專科學校，但是哪裡有文科、法律、政治、經濟、教育、心理，乃至哲學的合理施設？只有為個人生活開一方便之門的醫學界，稍為發達罷了。第三，台灣一向沒有足與世界比美的文化運動，即如祖國五·四運動一類的活動，從沒有發生過，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文藝復興運動（Renaissance）更不消說了。即有一些三流以下的日人文化活動，但這又文不對題，台灣人也沒有普遍的反應。第四，台灣工業及科學雖也相當發達，但尚不能自滿，台灣工業猶停滯在食品生產的低級範圍，紡紗織布工業還不能自立，機器生產等重工業，更只是近年的萌芽而已。台灣工業發展的前途，還非常遠。莫怪美國人《今日之台灣》著者，批評台灣工業並未發展。

然而上面分析，並不是拿來證明台灣人頭腦低能，或無志氣上進，只是說明應該充分發揚光大的台灣文化，因為日本統治者五十年來的壓抑與干涉，致使停滯、衰弱、走入歧路罷了。從上面的分析，我們才可以正確認識台灣文化的正體，同時也才可以對症下藥，考慮如何改造台灣文化教育的問題。

今日，台灣文化教育的改造問題，和國內新收復區，自有根本不同的地方，絕對不是表面的、事務的、或單純接收的問題而已。實際上最重要之點在於本質的改造、正統的接續，世界新文化的灌注。從此原則出發，台灣今日的文化教育改造的重點，應該放在下列各點，也可以說是三大原則：

第一，應該教育六百萬台胞，變成「主人翁」。台灣同胞受日本統治者五十年的壓抑，差不多可以說「去了勢」，即在光復後的今日，陳長官再三指示給我們「台灣已經是主人」，但是台灣人在許多方面還不能發揮主人的權能，遇事非常畏縮含糊，主管一件事又不能指揮處置裕如。至於如何學做主人的方法，一面固要台胞自覺自發，一面又要靠文化界教育家的啟蒙指導，應擬具教育台胞成為中國人。台灣只在日本教育下保留一點兒中國的舊文化。

第二，舊文化，故須灌注國內各方面的學識及常識，使「歸宗」二字名符其實。但同時還要教育台胞能辨別是非真偽，使得擇其善者而學之，其不善者而棄之。世界上真理只有「近真」的程度，決無絕對的真理，「善」的本身，也具有發展性。況祖國也在發展過程中，我們必須教育台胞跟祖國進步而進步，我們的古訓說得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就是今日台灣教育者及學習者的指針。

第三，應該培養台胞成為「世界人」。一向台灣為島國，又為日本統治者所限制、所壓抑，所以眼光常是短小近視，眼光狹小的只顧到自己一身或一家，眼光較遠大的人，

視線仍不出台灣島外，很少考慮全國、全世界、全人類的問題，或想到後世百年的大計。六百萬人不能團結，一家之中不能和氣，都是這種「人生觀」的具體表現。這當然也是受了日本「盆栽文化」影響的結果（日本社會評論家厨川白村氏對於日本盆栽文化，曾有嚴厲的批評，請讀《苦悶の象徴》及《象牙の塔を出で》，但是此種人生觀必須改造，必須改變。我們教育者應以長江大河、五嶽長城的雄壯觀念，灌注給台胞。我們應把日本風景的纖秀觀念，從台胞腦中洗滌乾淨。台胞也應該自覺自悟，勇敢接受新的潮流、新的人生觀。

今晚只就台灣文化教育的改造，舉出三大原則，台灣文化人及教育，能從此三大原則去擬訂實施辦法，相信不會有大錯誤。台胞也必須從此三大原則去學習作人，作主人，作中國人，作世界人，然後才可以由歧路走上正軌，然後才可以避免「井底蛙」之譏，然後才不會變成時代的落伍者。

今晚只列舉台灣文化教育改造上的原則，至若改造文化教育的實施辦法，可以讓文化工作者及教育技術家，或事務人員去擬訂，這裡暫不具論。

原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十二日《人民導報》

中韓兩民族的關聯性

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先生的講演

編者按：這個講演要旨是韓國同志把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韓籍官兵集訓隊的日語講演速記下來的。固然這是向韓國同志的演說，但是可使我們明白抗戰中的我同胞於國內為光復台灣如何奮鬥過？還有韓國同志是如何與我同胞共同從事抗戰工作的？然後在那期間，宋先生是怎樣活躍的？這一篇文章是為瞭解台胞同志在抗戰中於國內的活動情況最正確的資料。同時對於今後研究韓國情況也是最寶貴的文獻。因此在取得韓國同志的諒解之後，登載於本報。

講演要旨

今日有機會在此與韓國同志見面，感到非常愉快！

來這裡之前，我曾與貴國臨時政府的要人交往親密。不過以金九先生為首的許多位先生幾乎都回國了。所以現已中斷了聯絡。如果你們當中有哪一位得到他們的消息的話，請告訴我。各位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離開了祖國的。我在二三十年前也是由於日本的壓迫、剝削政策而離開台灣到了祖國的。

因此今天主要就中、韓、台的歷史的、地理的關聯性和共同性講一講。之前，先簡單地說說我參加中韓台的抗日工作的經過。當然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起初我在北平組織了「東方問題研究會」，以孫中山先生的東方革命的遺訓為宗旨，開始

為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徹底解放與獨立進行鬥爭，其主要會員當然是中、韓、台、越南、印度等國民。我們的運動不僅是在北京，而且波及南方。在上海事變當時，完成了指向日軍司令官白川大將和重光葵的「投彈事件」任務的韓國同志尹奉吉氏，就是該會中優秀的實踐者之一。

後來發生了七·七事變，自從日本對中國全面的侵略開始之後，在北京、南京方面我們就無法進行充分的活動。因此一時撤退到漢口，就在那裡組織了「日本問題研究會」。我也做為發起人之一，特別提出戰時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問題，揭露了日本的弱點，打破了日本的虛偽宣傳。其結果喚醒了眾多的恐日病者，強化了抗戰建國的意識，該會的活動一直持續到日本投降。在該會活動的韓國戰士中有眾所周知的金若山氏和朴青天氏，金若山氏是韓國義勇隊的隊長，朴青天氏為後來的韓國光復軍的司令官。現韓國臨時政府的要員——韓一來、金奎光、趙業昂等幾位也都在該會活動過。

到一九四一年，這些人受孫科先生之命，發起了「中韓文化協會」。當然我也是該會發起人之一，會長由孫科先生擔任。「中韓文化協會」至今仍然存在於重慶。這次我回到台灣，想為建設太平洋永久和平竭盡微薄之力。所以我想從新年度開始發行《人民導報》。目前在逐步推行計劃。也請諸位多多投稿。

其次就「中韓兩民族的歷史的、地理的關聯性」這一問題談一談。很早以前在歷史上就記載著殷朝末期來自中國的名叫箕子的人東渡朝鮮建立了朝鮮國這一事實。自古以來，中韓兩民族之間就已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各位一看地圖便知，朝鮮作為半島，位於亞洲大陸的東南端，在對外方面得以進出，同時受外來侵略的可能性也大。過去長達五十年間東亞的糾紛全是以此地為基點開始的。如此說並未言過其實。不言而喻，其最大原因是來自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總之，日本帝國主義企圖通過對外的途徑來化解因經濟發展滯後帶來的內在矛盾，所選擇的最初立腳點就是朝鮮。日本以「明治維

新」在發展條件不足的情況下，從封建主義走向資本主義。開始發展時，地球上的殖民地早已被瓜分淨光了。滯後的日本資本主義工業結果只能是以低效率的家庭工業及輕工業為主。對內依靠低工資來剝削工人，對外不得不採取掠奪殖民地和國外市場這兩種侵略行徑。於是其侵略對象即指向中國大陸。而做為其開端的就是侵略朝鮮。日本所謂的「日清戰爭」，即我們所說的「甲午中日戰爭」歸根結底也是以朝鮮問題為中心爆發起來的。

一八八二年七月，在朝鮮發生了襲擊日本公使館的事件。當時朝鮮有兩個黨派在互為抗爭。就是以大院君為首的「親華派」與日本的所謂「進步派」——「親日派」。一八九四年的「東學黨之亂」是中日戰爭的直接原因，而戰敗的清朝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八日與日本之間締結了《馬關條約》。依照該條約，日本從中國奪走了台灣和遼東半島，又強迫我主要港口和長江沿岸的開放，並且強奪了三億五千萬元的賠償金。（但是由於所謂的三國干涉，遼東半島又歸還給了中國。）日本就用這筆款項做為迄今為止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礎。日本強迫中國締結的《馬關條約》，其對外的效果，超出條約本身的内容，而且對中國的將來更是致命的。也就是說世界帝國主義列強沿著日本侵略中國所開闢的道路追隨而來。如諸位所知，中國曾蒙受多麼大的損害。在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的俄日戰爭中，戰敗的俄國竟把所蒙受的損失幾乎全部轉嫁於中國。還有經過兩次戰爭完全奪取朝鮮主權的日本終於在一九一〇年八月吞併了朝鮮。就這樣，日本侵略亞洲與稱霸世界的野心隨著擴大的市場以及殖民地的獲得日益膨脹起來。

下面我講一講關於中韓兩民族的共同抗日工作。很早以來，中國的東三省就已經成為朝鮮革命志士的活動根據地了。即在一九一九年就有「大韓獨立國」、「大韓西路軍政署」、「大韓征日軍」等組織成立於東三省。從那以後，朝鮮同志一直是以東三省為中心繼續活動下來的。然而九·一八事變（日本的所謂「滿洲事變」）後，由於日本帝

國主義的鎮壓，在東三省南部的活動日漸困難，因此依次轉移到北方，終於進入蘇聯境內。據傳說這次進攻北朝鮮地區的蘇聯軍，名義上是蘇聯軍，實際上即幾乎由朝鮮革命分子組成的純粹的朝鮮人軍隊。再說在中國國內的朝鮮革命戰士們於七·七事變後組織了「朝鮮義勇隊」。其隊員多的時候高達六百人，而且全都受過相當的教育和訓練的優秀人員。隊長是金若山氏，他的功勞很大。當然他們當中已有多人犧牲了。前幾天我們在重慶為這些犧牲者舉行過追悼會。接著成立了以朴青山氏為司令的「韓國光復軍」，該本部設立在西安。

其次在政治方面，組成了以金九氏為主席的「韓國臨時政府」。不過以上三個組織都是在中國政府的援助下活動到今天的。這些人都抱著「日本必敗」這樣堅定的信念為貫徹初衷在邁進。我們共同組織了一個有朝鮮、台灣革命志士和少數進步的日本人參加的「日本朝鮮台灣反法西斯聯盟」進行了抗戰。現在介紹其宣言中的一節：「……世界人類如果想清除世界的不安寧和危機，保衛民主主義的堡壘，擁護世界和平，就必須反對日本對中國的法西斯強盜式的侵略，擁護中國的偉大抗戰，在日本法西斯的統治下，我們被壓迫的人民群眾——日本國內的勞動人民，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台灣的人民群眾，一定要認清我們目前正處於最嚴峻的關頭。」僅看這一點就能推測到我們工作的一部分。參加這個聯盟的少數進步日人有青山、鹿地、塩見、岡野等人，我們就是這樣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主義做鬥爭的。

日本的野心現已受挫。我們的抗戰雖然已經取得勝利，但我想還要多考慮我們今後的問題，就是韓台共同努力的目標。目前尤其要想一想韓國與台灣的前進方向的異同處。首先關於共同點：日本對台灣在政治上加以種種壓迫，在經濟上進行任意掠奪，在社會方面則實行奴化、愚民化政策。占台灣人口全部的台灣人不得干預政治，而只由少數日本人在搞政治，台灣人根本沒有政治發言權。在經濟上最顯明的例子，如製糖工業，日

本人任意剝削。說「文化水平提高了，城鎮變得漂亮了」，這話意味著只有日本人的幸福，而相反，我們台灣人的生活卻日益陷於窮苦的境地。

從社會方面，可看到在衣食住行各個領域都強行皇民化（奴化）政策。如不許穿中國服裝，而強迫日式和服的穿著。還有食品和吃法也都管教用日式的。在台灣原來就有祭祀祖先的美德，可是日本置此於不顧，不僅予以廢除，而且強行祭拜「天照大御神」。甚至連房屋都強制要改為日式住宅，不過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多的木材，結果沒能實現弄得啼笑皆非。在行動方面當然也要用日本式的行動模式，如行禮的方式、走路的方式，就連笑的方式都要日本化。其他例子不勝枚舉。我相信你們韓國也同樣受到了壓迫、掠奪和奴化教育。

綜觀以上所述，韓國和台灣同樣在過去吃盡苦頭。所以將來在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中也有很多的共同點，即：一、在政治上必須確立民主政治。二、經濟方面，不能像日本人那樣只肥大財閥，而應為多數國民的幸福謀發展。三、社會性方面，更加注重發揚優秀的民族精神。其次關於差異點；韓國總是要完全獨立的，至於台灣，原來是中國的領土，由於此次的抗戰勝利，一定要歸宗的。也可以說我們是「殊途同歸」，因為前進的目的是同一的。

關於三民主義的和平政體。在現階段不妨說，民族主義已經達到目的了，但是為民權和民生主義，應該努力去辦的事情還很多。畢竟為了維護太平洋的持久和平，我們必須通力合作。為此我們該做的工作，從消極方面而言，必須徹底地管制日本，以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這對日本人來說，多少苛刻了一些，但為了實現我們的目的，一定要實行的。再者，從積極方面而言，就是培養日本真正的民主主義。所以我們不得不協力進行日本人的再教育工作。而且我們為了掌握日本人的內情要經常取得聯繫尤為必要。總之，為了太平洋永久和平的建設，我們要去做的工作太多太多，我們肩負的責任重大。

衷心祝願大家頑強戰鬥！我的話到此結束。

原載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二廿四日《人民導報》日文版

由台盟深圳支部副主委翁曉波翻譯

論台灣基本人權

——並祝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

最近中央政府頒布了保障人民自由的辦法，各省各地也都相繼成立了「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台灣也已由台北省會首先發動了。這是一個保障「人權」的重大進步，有感及此，爰特為文申論之。

社會原是人类相互結合的總體，沒有社會即沒有個人，沒有個人即不能構成社會。所以社會中的每個人的權利和義務應該是相互的、平等的，同時也應當是自由的。但是自古以來的每個社會階段中，當是不平等，一部分人當是不自由的。這種現象隨著社會的進步而有逐漸改善的傾向，至最近始臻於人民自由的保障。例如在奴隸社會中，奴隸是沒有自由的，在封建社會中，貴族和地主束縛了另一部分的人權和自由，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階段，自由仍為某些人所壟斷。

至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因為商品經濟之逐漸發展，個人的人格開始被發現，而要求尊重個人人格之獨立、平等，與自由。這是歷史發展中必然的結果，但初期的人權運動只限於「自然權」，「天賦人權說」之產生即由於此。

申論之，資本主義初期所要求的「人權」，尚只限於「自由權」，即人格的平等權，如身體自由、居住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營業自由等等。後來因為這些自由，只是起碼條件的「人權」，所以又產生「政治權」及「公民權」，這就是民主政治的由來。具體言之，民主政治就是政治的平等權，如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及罷免權等。政治權和公民權的發達，也就越發充實了人權。後來更高的發展，就到了

「社會權」即經濟平等權的要求。

現在回頭來看看我們中國的情形，中國的人權運動，現在僅由萌芽到了成立的階段，還須人民多加努力。中國幾千年來的專制壓迫，「人權」並沒有伸張，加以近百年來淪為半殖民地，又受封建社會規程的束縛，而全國的民眾的人權問題，曾經相當嚴重化過。至最近起碼的人權，即上述各種自由，始被確認，即如真正的公民權也只在建設過程中。幸而我們全國上下所信仰的三民主義，是在注重「人權」的，並且是「公民權」、「社會權」也都包括在內，例如民權主義是尊重公民權的，民生主義是尊重社會權的，這些人權、公民權，及社會權的互相滲透，而始完成了三民主義的人權。必須如此而人權才算完全，同時也必須如此才能夠使每一個人，負起對國家社會的義務，三民主義必須實現這種完全「人權」，才算達到三民主義的最終目的。

大家都期待著台灣變成一個模範省，這應當是實現真正三民主義的模範省，我們多希望台灣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乃至社會建設，也必須從此尊重「人權」、完全的「人權」做起，深願官民大家本此三民主義的基本宗旨，努力向人權的充分發展方面邁進。敬祝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健全發育。

原載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人民導報》

國家為什麼要保障人民自由

最近中央政府頒布了保障人民自由的辦法，各省各地也都成立了「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來推行這個辦法。台灣也已首先由台北這個省會發動了，大概不久可以通行全省。這是保障「人權」的重大的進步。但是很多人還不大曉得中央政府為什麼要保障人民的自由，所以兄弟昨日即在本報上寫了《論台灣基本人權》的一篇短短星期論文，闡述人民自由的意義，但嫌言焉不詳，所以今晚再來播講《國家為什麼要保障人民自由》，希望政府人員和一般人民，更加深切瞭解，免有無意中濫用職權、濫用自由的弊病。

本黨總理老早就指示過我們：政治裡頭有兩種力量，一種是自由的力量，另一種是維持秩序的力量。政治當中有這兩種力量，好像物理學當中有離心力和向心力一樣。先解釋物理學當中的這兩種力量，就容易明白政治當中的兩種力量，乃至政治當中必須有自由的道理。離心力是要把物體裡面的分子分開向外，向心力卻要把物體裡面的分子吸收向內。如果離心力過大，物體就分散到處亂飛，沒有歸宿之處。如果向心力過大，物體便向內集中，而愈縮愈小，擁擠不堪。所以物體的運行必須這兩種力量平衡，這兩種力量的活動能平衡，物體才能夠保持平常的狀態而不亂衝亂撞，鬧出問題。

政治的運用的道理也是相同。政治裡頭的自由力量太大了，人民無規則的濫用自由，社會便變成無政府狀態。這固然不好，但是政府若束縛人民太過度了，政府變成了專制的政府。專制政治下面的社會，會弄成死沉沉無生氣。所以總理的結論說：中外數千年來的政治變化，總不外乎這兩種力量之往來衝動。這兩種力量，應該予以適當的調節，使二者平衡不偏，而此二者調節至最合理的時候，政府與人民自然混合成為一體，而政府與人民之間再不會有什麼摩擦，有什麼矛盾發生。

由上述政治當中的兩種力量，再加申論，則政治裡頭有兩種人，一是「治人」的人，一是「治於人」的人。這就是孟子所說過的，有勞心者，有勞力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勞心者就是有智識的人，勞力者就是沒有智識的人。從前沒有智識的人，愚蠢，好像一個小孩，所以需要別人來管理他、來治他。所以在無形中便形成兩個階級，即所謂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但是現代教育普及，民智已大通，人民個個都有自覺，都知道有一個「我」的存在。所以社會便發生「人權運動」，想要廢除這兩個階級，而其基本人權當中，包括了種種的人民自由，如身體自由、居住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營業自由等等。說到人民自由運動，中國與外國正是相反的程序，據總理遺教：外國的政治以前是專制，至十八九世紀始發生人權運動而要求各種自由。而中國在古代則為堯舜日，人民享受極大的平等自由，到後來政治愈益敗壞而入於專制，自秦漢以後一直因襲到滿清。至總理始大聲疾呼要給人民以自由，至蔣主席始決意確立真正的人民自由。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剛剛開始推行，可見人民自由的保障運動，剛要普遍發展，此後還應要政府與人民積極協力，以完成總理的理想，實現主席的德意。

原載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九日《人民導報》

台胞應踴躍參加師範教育

——為台灣師範教育宣傳周而作

今天台灣師範教育宣傳周的第一天，光復後的台灣，在百政待舉中，如何灌輸台胞正確的思想，鏟除過去日寇統治下的奴化教育，實在是當務之急，本人願為此略抒蕪見：

第一，今天台灣師範教育的推行，實在要比全國其他省份來得重要而迫切，台灣淪陷了五十一年，日寇的陰謀是奴化台灣，叫台胞乖乖做順民，因此中國話不許說，中國文字不許使用，今天我們所碰到的四十歲以下的台胞，沒有一個人不是滿口日本話，而對中國語文則茫然不解。為下一代著想，我們急迫需要推行中國的語文教育，但叫什麼人去推行，卻是個極重要的問題，今天師資問題的缺乏更顯得師範教育之重要和意義的重大。

第二，過去台灣的師範教育，在日本統治下也相當重視，但自然是為日本人自己打算，所有師範學校，日本人要占九〇%以上，台灣同胞很少有就學的機會，日本人生怕台胞去做人師，教壞了學生起來反對他們。老實說，那種「奴化」的師範教育，台胞不去還好些，可是現在台灣是光復了，最實際最有意義的工作莫如獻身於六百萬台胞的教育工作，因此我們希望有識之士，鼓勵自己的子弟進師範學校，以革命者的精神去從事此崇高而富有意義的實際工作，使五年十年之內，一掃過去日化教育，建立起新的中國文化教育。

第三，我們一面鼓勵台灣同胞推行師範教育，但對政府當局，卻又不能不有所建議，誰都知道教育工作是最神聖最崇高，但生活卻是最清苦，最沒有保障。以目前教員的待

遇來說，實在未能令人滿意，要叫大家安心工作，首先一定要使大家肚子吃得飽穿得暖，否則徒事空喊，誰願意來枵腹從公。公務人員的待遇，本來已經很菲薄，而教員的薪給更低一籌，當局如果不設法提高，使其可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誰願意來坐冷板凳。還有一點，教員的職業也沒有保障，以目前慣例，任期是每學期或每學年聘請一次，往往和官場一樣是「一任官一任人」。上面換了校長，下面的教員就不得不更動，做教員的這個學期要擔心下個學期的飯碗問題，職業得不到保障，試問何能安心從事教育。因此我們建議當局，教員的職業，必須要有保障，能如此，才能談到推行師範教育。

第四，師範生的社會地位應該提高，因為教員工作既清苦，生活待遇又低，物質生活不能滿足，精神方面自應加以鼓勵。因此，我們要提高師範生的自尊心，叫社會人士尊敬他們，對師範學校的地位，自亦希望引起當局的注意。

以上數點，可說是最實際最起碼的問題，特提出來，作為參考。

原載一九四六年三月廿九日《人民導報》

「台灣日」的回憶

民國三十一年始定四月五日為「台灣日」，這是仿法「緬甸日」、「印度日」……之設定，用以紀念聯合國領土之淪陷，喚起各國注意收復工作的用意。當時關於收復台灣之收復宣傳，因阻於國內外的特殊情勢，殊不易即收效果，曾經不少挫折，今吾台經已光復，痛定思痛，不無撫今思昔之感，特寫數言以誌不忘。

四年前春間旅渝台胞鑒於太平洋戰爭（日本稱為大東亞戰爭）之爆發，美英法各國皆成日本的敵國，收復台灣舊失地已可公開提倡，乃由台灣革命同盟會第三屆代表大會，決議擴大宣傳，並向黨政軍當局呈請收復台灣的種種施設，陪都各界咸寄深切的同情。首由陪都二十二個主要國際文化團體，如東方文化協會，世界反侵略會，國民外交協會，中蘇文化協會，中美文化協會，中英文化協會，戰時日本研究會，朝鮮義勇隊，台灣義勇隊，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等，發起舉辦「台灣日」，作一周間的擴大宣傳工作。其主要宣傳節目，約分三部門進行。其一，召開「台灣光復」擴大宣傳大會，敦請黨政軍首長及各界代表參加，由東方文化協會會長覃振（司法院副院長）主席，致詞《痛憶台灣》，歷述渠昔偕故國府主席林森、中央委員張繼及林紹庭先生蒞台的感想，見台灣江山之變化，曾悲泣得飯不下咽在江山樓上吟詩，有「如此江山如此樓」之句，全篇演講句句動人，聽眾皆為之淚下。繼由兄弟代表台灣革命同盟會報告《台灣的慘狀與祖國的責任》，後由中央黨部吳秘書長鐵城，立法院孫院長科，軍委會馮副委員長玉祥，總政治部梁副部長寒操，及各團體代表致詞，訓勉努力收復台灣。其第二節目，為編刊《台灣光復運動特號》，由各報闖欄專載，陪都七大報二小報均著社論或專論，鼓吹收復台灣「歡迎同胞內向」。其第三節目為向國內外廣播，由梁部長寒操擔任普通話廣播，由吳委員茂

蔭擔任英語廣播，林委員嘯鯤擔任台語（閩南語）廣播，由日人反戰領袖青山和夫擔任日語廣播。結果引起各界關心台灣問題，「收復台灣」變成報刊的一般論題。

此外，還呈請中央黨政軍各機關，建立台灣省政府，設置台灣參政員，請求建政建軍（當時台灣黨部業經成立），後經各方同志繼續不斷之努力，收復台灣的方案逐漸具體化。大凡一事之成，於客觀情勢之外，必須配以主觀之努力，台灣今雖已光復，而萬般建設尚待振興，願六百萬同胞繼往開來，積極協助政府，以完成建設工作。特附梁部長寒操當日詩，以為同胞共勉：

詠「台灣日」詩

民族聖戰將及五年，國人更誓志，他年必當收復台灣，定四月五日為「台灣日」，以示不忘，賦此誌憤。

嶺雲海日久銜愁①，淪我台灣卅八秋！

客帝顛預輕授敵，遺民沉痛不忘仇。

國門兩眼②嗟都挖，疆土千年誓必收！

今日莫揮閑涕淚，神州光復待從頭。

斐如先生正之

弟寒操三十一年四月三日

注釋：

- ① 丘滄海先生有《嶺雲海日樓》詩集，大半皆寫亡台之痛。
② 謂台灣與瓊崖也。

原載一九四六年四月六日《人民導報》

台灣民主國對日抗戰

編者引言：昨日為台灣民主國紀念日，台北市參議會及台灣黨部，假中山堂召開紀念大會，今日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經開始，從民主國到民主政治，從下種到發芽，此後正是開花、結果的時期，民主國值得紀念，而其可歌可泣的事實，尤值得敘述，因此特向前戰時日本研究社社長宋斐如先生，借得五年前撰寫的珍貴資料兩篇論文，掲載於此，以供青年「慎終追遠」、「繼往開來」之用。

世界上任何民族受到異族侵略時，皆能表演極堅韌的反抗，這是民族精神的表現，同時也是政治、經濟、社會壓迫的恐怖心理所促成的。台灣也自不能例外。

台灣同胞不但抵抗滿清的統治，並且更堅強抵抗日本的統治。這除上述政治、經濟、社會壓迫的恐怖心理而外，還可以找出漢明文化本質的原因及當時文化階段倒懸的理由。數千年高度文化的民族，自然不願受治於文化低下的異族。固然歷史上這種抗爭有時歸於失敗，但其抵抗之特具堅韌性，則為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台灣之抵抗日本，終日本統治之年，未嘗中斷過。本章先剖述台灣民主國的武力抗戰。而此種武力抗戰，目的仍在於恢復漢明的正統。

一、國姓爺精神的復活

甲午戰爭是台灣民族革命運動的轉機，反滿清運動的終結，是反日本運動的起點。又是奴隸易主的時候，當積弱的清廷敗戰之時，日寇的南進論者則要求割讓台灣及澎湖群島為殖民地。台灣官民間清廷允割台訊，即電北京政府反對出賣台灣，但是日寇的要

求至為堅決，割台已為勢所難免，台民憤激莫以。此時林本源乃提議以一百萬兩贖回台澎群島，又為日寇所拒，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割台之議已成事實。以《馬關條約》之一紙，將二百八十八萬的台灣人與台澎群島人一併出賣了。這是滿清政府辜負台灣人的無耻的行動。

到了這個時候，台灣人的前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做日寇的奴隸或逃回祖國；另有一條路就是抗戰。但在這個時候的台灣，抗戰的條件一切都不夠，就人力而言，人口僅有二百八十萬人，而日寇已有四千三百餘萬人，實力相差甚遠。論財力，每年稅收僅三百萬元，此時日寇的經常預算已逾九千萬元，至於武器的問題更可憐了。以情理論，最聰明的辦法是做奴隸或跑回祖國，可是台灣人終局還是不做聰明人，不惜犧牲而堅決抗戰，這是祖宗遺下來的不屈服精神的再生，國姓爺精神的復活。

何謂國姓爺精神？原來鄭成功受明室賜姓「朱」，故台灣人專稱為「鄭國姓」或「國姓爺」。明亡後，鄭成功率漳、泉、惠、潮四屬的健兒，與滿清抗戰到底，明知勢力懸殊，孤島難以制勝清廷傾國之師，尚且不妥協投降，為保全漢民族的人格，不計利害，堅持成仁取義的精神，與異族抗戰到底。這就是「國姓爺」精神，「三年小叛，五年大亂」的史蹟。答覆日寇的侵略，並不是屈服或逃亡，而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抗戰。是故處在絕境的台灣人，振作國姓爺精神，執起干戈與日寇相周旋了！

二、台灣民主國的抗戰

《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人的命運只靠自己解決，清廷再不為台灣人的後盾，又不援助台灣人的抗戰，故被出賣的台灣官民，至此乃決定自力抗戰以禦強寇，組織台灣民主國，由新政府領導抗戰，經過許多曲折，乃選定唐景崧為大總統，以劉永福副之，

以「永清」為年號，採定藍地黃虎旗為國旗，向中外發出獨立通電及布告。其布告原文如下：

台灣民主總統，前署台灣巡撫布政使唐，為曉諭事，照得日本欺凌中國，大肆要求，此次馬關議款，於賠償兵餉之外，復索台灣一島，台民忠義，不肯俯首事仇，屢次懇求代奏免割，總統亦奏多次，而中國欲昭大信，未允換約，全島士民不勝悲憤，當此無天可籲，主可依，台民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以為事關軍國，必須有人主持，於四月廿二日士民公集本衙門，進呈請余暫統政事，經余再三推讓，復於四月廿七日，相率環籲。五月初二日，公同刊刻印信，文曰，「台灣民主國總統印」，採用國旗藍地黃虎旗捧送進來，竊見眾志已堅，群情難拂，不得已為保民起見，俯如所請，允暫視事，即日議定改台灣為民主之國，國中一切新政，應即先立議院，公舉議員，詳定律例章程，務歸簡易。惟是台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兩百餘年，今雖自主為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供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照常嚴備，不可稍涉疏虞，民間有假立旗號聚眾滋事、藉端仇殺者，照匪類治罪。從此台灣清內政、結外援、廣利源、除陋習，鐵道兵輪，次第籌辦，富雖可致，雄視東南，未嘗非台民之幸也。此曉諭台灣知之，永清元年五月。

這就是東洋最初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宣言，議會制度雖先此四年前在日本已經採用，但是民主共和的政治表現，在東洋方面自以台灣民主國為第一個，同時又是辛亥革命運動的前驅。從這點立論，台灣的抗戰，亦可謂雖敗猶榮的。

建國宣言發表後，台灣民主國的主要任務，當然是備戰禦侮，保衛新生的國家。編練壯丁隊，協助官軍抗戰，發行紙幣及郵票，以為籌募戰費之手段，整理內政，加強抗戰力量等，逐步推行。但是日寇的進攻來得很快，五月廿九日已在澳底登陸，因守兵僅

一百人，經接觸後即告失守，戰爭在多忙中開始了！

三、基隆的炮戰與密敕棄城

《馬關條約》於五月八日得兩國政府之批准後，五月十二日，日政府通告任命樺山總督為接收台灣島之全權委員，並限兩星期內通知清廷之割地全權委員名單，至五月十五日，直隸總督李鴻章乃電伊藤博文云：「目下台灣兵勇人民極其騷擾，願與奉天省放棄問題一併商議，故望樺山大將展期出發。」

此電乃為清廷援助台灣民主國抗敵禦日寇的正式表示，日寇自然不願接受，五月十七日伊藤覆李鴻章電云：「鎮定台灣地方之騷擾事，該島主權依據《馬關條約》已割讓日本，當不必附諸兩國之協定，故在清國政府唯有將行政及官守讓交日本全權辦理大臣耳。」

日政府聞台灣獨立之訊，乃決定以武力接收，陸軍派遣近衛師團第二師及第四師團等三師大軍進攻台灣，海軍由有地司令長官率常備艦隊協助，海陸並進。日本雖以為此雄厚兵力，還不敢從正面攻我雞籠（即基隆）要塞，由北白川中將率近衛師團的精銳兩聯隊，迂迴澳底，採取包抄雞籠側面的戰術，金山衛登陸的戰術早在四十餘年前已用於台灣澳底，此時守澳底的官兵僅一百人，皆英勇抗戰來犯日寇，在澳底，在頂雙溪，在三貂嶺，在金山頂，在金皎蔣，處處抗戰，日中隊長、小隊長及士兵陣亡不少。至六月三日，日寇始迫近雞籠要塞。自是日下午二時起，日寇乃開始海陸軍聯合總攻擊，發出子彈達一二，三九〇餘顆，至下午六時炮台守軍始全軍退往滬尾（乃今日之淡水）。此時官軍總數不過五千人，日寇所消耗之人力及時間比上年日軍進攻遼東為重為長，驕橫無狀的日寇，遂大起恐慌，軍部乃督責陸奧外相向清廷辦交涉，陸奧向李鴻章致電抗議云：「清國政府若不從速命令在台灣官軍停止抵抗，撤回全師返國，日軍將長驅直取北京。」

這個「外交彈」的威力，卻比陸軍三師及海軍常備艦隊的聯合炮擊，更來得利害，積弱的清廷，皆庸碌無能的清官，接得抗議驚得魂不附體，立刻以皇帝的敕令電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唐景崧，其電文云：「台抗京危，速班師回國」。唐景崧倒是一位清官，皇帝的命令高於民族的神聖使命，遂命收拾官兵，六月五日乘德國商船離滬返廈門。僅留官兵五六十人守台北城，維持治安。六月六日，英商易姆遜及美國新聞記者台維遜兩人為外僑代表，赴基隆見日司令官，報告台軍放棄台北城，但日軍還未敢置信，至六月七日，始由外僑及台奸辜顯榮嚮導而入台北城。

台灣民主國成立後一個月有餘，因唐景崧堅持「民可抗官，不能違敕」的主張，遂不戰而放棄台北城，民主國要員含恨而退出首都，但仍擁護劉永福為大總統，下鄉發動民眾，收編未及退回祖國的軍官，重整部署，繼續抗拒日寇的侵略，將「一寸地一滴血」的策略付諸實行了。

四、日寇三路進攻台南城

官軍放棄台北城後，近衛師團乃沿枋橋、大料坎、三角湧、新竹、安平鎮、龍潭坡、銅鑼塞、牛瀾河、龜崙等地進攻。此時守軍盡是義勇軍，在日寇的北部，掃蕩戰中可泣可歌的故事甚多，如指揮滬保衛戰的女將軍的故事，保衛竹塹的少年白安的助虎掃，都是足以垂芳千載的英勇戰績。白虎隊的隊員皆十六七歲的少年。北部抗戰中的戰蹟，處處表現著義勇軍的勇猛善戰，勝過官軍。我們隨便摘錄幾段戰史，以誌古人的勳蹟。

(一) 安平鎮的保衛戰

在北部掃蕩戰中，安平鎮的爭奪戰是一個壯烈的陣地戰爭。此時守軍是黃娘盛及胡

嘉猶麾下的義勇軍，陣地是一座小小的竹圍，以舊式土槍的兩百民兵，與日寇三木少佐的護路隊及近衛師團，山根旅團的第四中隊抗戰。日寇於六月廿八日開始攻擊，血戰十三小時，打出子彈三千四百餘顆，仍不能拔此小寨。至是夜八時日寇乃以燒夷彈放火燒毀四鄰鄉村，燒殺無辜的民眾，包圍安平鎮，相持三日不下。至七月一日上午七時半，日寇又以優秀的炮兵隊轟擊安平鎮，台軍沉著應戰，日寇仍不得逞。九時半又增援兩中隊及炮兵中隊，發出巨炮六十彈，還不能破其堅壘。是夜日寇用十五啟羅瓦的炸藥，由工兵炸台軍陣地，亦不見效。日寇以三個中隊與一炮兵中隊及一工兵隊，仍無法攻破安平鎮，夜間又懼反攻，乃退守中壠。七月二日清晨四時半，日寇再攻安平鎮，此時守軍彈糧俱盡，抽選敢死隊二十名，衝破重圍，殺日工兵十七人，乘夜棄守。此役日寇打出子彈七五八〇顆，大炮九十一彈，炸藥十五啟羅瓦，傷亡三十五人。為日寇登陸後最壯烈的一幕。

(二) 三角湧的大勝利

義勇軍放棄安平鎮後，胡嘉猶部乃退守大料坎石岸及三角湧的山地，七月十三日山根旅團的坊城部隊在二甲庄陷入重圍，打出子彈五，九八〇餘顆，衝圍走桃園，傷亡七十九人，路經三角湧的山徑中伏，櫻井小隊三十二人中陣亡二十八人，四人負傷出走。此時坊城部隊之兵力八九四人，而胡部僅七百餘人，台軍傷三十四人，日寇所消耗的子彈達一八七三五顆，比雞籠炮台的攻擊更為困難。

(三) 大料坎的爭奪戰

日寇為在大料坎在三角湧及二甲莊受大挫折，老羞成怒，遂開始採用最殘酷的燒殺戰術，沿路逢人便殺，逢屋便燒。七月十四日在高平原之戰，義勇軍守兵僅一千人，日

寇乃以四個中隊之眾進攻，義勇軍分數隊截擊日寇為數段，並斷其退路，圍困於山中。日寇是日打出一六，五八〇彈，十五日又打出一五四〇〇彈，企圖衝破重圍，但仍是失敗。十六日援軍至，山根部隊與壇城部隊聯合進攻大料坎，至是日下午五時義軍始棄守。日寇為欲得大料坎之據點消耗子彈六萬二千餘顆，棄糧一七〇包，梅乾三十箱。

現在日寇歌有「三角湧三十士」，乃弔三角湧劇戰的遺物，該歌詞意云：「卿我同是日本國民，既是日本國民，怎能忘記三角湧三十士？」不但日寇不能忘三角湧的故事，一切的台灣人更未忘記三角湧的光榮歷史。

日寇得竹塹（新竹）後一路南進，但沿途仍遭強烈抵抗，後方的交通線亦時常被義勇軍的游擊截斷，枕頭山、導筆山、苗栗高地、葫蘆墩、頭家廟等地的激戰，皆載於甲午戰史上的戰聞。他如八月廿六日日寇攻八卦山的炮台，守軍乃劉永福麾下的黑旗軍及義勇隊，總數約五千人，炮戰三晝夜，日寇稱為近衛師團登陸後所遭的最壯烈的戰爭，山根中將乃陣亡於彰化。日寇得彰化後，再向他里霧、雲林、嘉義前進，十月九日得嘉義時，傷亡殆盡，已不敢再進，須得增援或補充，方能進攻台南。

日政府得樺山總督報告，知征台軍損失奇重，乃命台灣副總督高島中將率第二師及第四師來援，以高島中將為司令官，大島少將任參謀長，設南進司令部於台北，限各軍師旅於十月八日在澎湖島聚齊，然後分三路進攻台南城。伏見第四混成旅已於十月二日由台北出發，十月十日由布袋嘴登陸向打狗炮台推進，近衛師團殘部由嘉義，南進會攻台南城，海軍常備艦隊又自海面協攻安平炮台及打狗炮台。這是日寇的總攻擊計劃，十二月十三日日寇開始總攻，相持九天，安平、打狗及台南三城相繼淪陷，劉永福乃乘英輪返廈門，台灣民主國至此始悲壯下場。

反抗滿清統治的暴動

編者引言：台灣民主國值得紀念，但其動機又胚胎於鄭成功反清復明的民族精神，此種精神即在台灣被滿清征服後仍然繼續存在，所以說滿清的武力並沒有征服了台灣人心，今日台胞的心理建設特別重要，值得同胞研究。故再揭載本文，以為參考。

鄭成功逐荷人，撫番族，慘澹經營台灣，不幸中年早逝，至今猶令後人慨興「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衫」之感。幸成功後人鄭經，初尚能繼承父業，屢圖克復內地以竟父志。永曆二十七、八兩年（清康熙十二、三年），吳三桂及耿精忠先後反清，經認為有機可乘，乃興兵渡海而西，一時閩中舊部，望風來歸，三年之中奄有東南。後以尚可信為虎作倀，引清師入閩，經師為所敗，終卒於永曆三十五年，克塽襲位。清以「經已死，子少國亂，時不可失」，乃於翌年出兵攻台灣，克塽屢戰皆敗，終率群臣納印迎降，明寧靖王殉難，明祀遂絕。自鄭成功初起，至克塽降清，明朝正朔延續三十七年，在中國歷史上，遺留不朽奇績。唐景崧、丘逢甲曾有題鄭氏廟聯曰：「由秀才封王，為讀書人別開生面；驅異族出境，唔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

台灣建立統一政府是在鄭成功占據台灣以後。自鄭氏在台灣設置延平館，政治始漸趨統一，確立漢民族的統治權。滿清入關侵占中原全土以後，反清復明的最後根據地算是台灣，直至康熙二十二年（西曆一六八三年）始為清廷所併吞。但是「中國有志者」仍「再鼓雄風」，繼續抗清，自鄭克塽敗亡後，至日寇侵占台灣一八九五年為止，先後二百十二年間，台灣人發動滅滿興漢的革命運動，共有三十二起，都是為著反抗滿清的統治，現在只就主要的列表如下：

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吳球的反清復明運動，拜朱佑龍為國師，因林盛告密，功敗垂成。

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年），劉卻率天地會起義，在諸羅發動反清復明的革命軍事，至康熙四十二年被捕，遂告失敗。

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年），鄭盡心由遼東率海軍入據淡水，北部台灣一部響應。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朱一貴率天地會起義，是年四月二十七日占鳳山縣，五月一日陷台灣府，稱「中興王」，震動清廷，全台灣都為漢族收復，後為藍廷珍軍及「助清義勇隊」所破。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吳福生在台南起義，倡反清復明，宜蘭方面之黨人亦響應未成功。

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年），十月一日，黃教在台南起義，與牛盜黨合作，亦未成功。

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嚴烟於乾隆四十二年來台，復興「天地會」之組織，南北會黨之統一戰線告成，舉林爽文為盟主，至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初起事，十一月二十七日陷彰化城，組織「盟主府」統治收復地。十二月莊大田亦在台灣南路起事，攻台灣府，占鳳山縣治，幾收復全島政權。至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始失敗。

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二月十日，天地會領袖陳光愛及陳周全發動反清復明之革命運動。

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年），楊兆在台灣台北起義。

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年）至嘉慶十四年止前後十年間，蔡牽每年率其海軍攻台灣，在陸上響應者，北有洪老四，南有吳淮四，蔡牽稱「鎮海威武王」。雖陷鳳山縣及彰化縣，進攻台灣府，惟因與新興地主階級為敵，彼此未能切實合作，遂致失敗。

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六月十六日，高夔在台北起事，為同志告密而敗。

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三月，林永春在哈仔難（即今日之宜蘭街）起事，與夥伴合作，聲勢頗大。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許尚與楊良斌在南部台灣下淡水起義。

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四月，黃斗奶在台灣起義，與台灣番人合作，組織漢番聯合軍，與清軍抗戰。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四月，武生郭光侯在嘉義領導農民暴動抗拒田租，此為農民暴動之始。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八月，吳槎及林汶英起義。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天地會領袖黃位在淡水起義。是年四月，李石也在台起義，響應太平天國之反清運動。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天地會領袖戴萬生，響應太平天國，發動反清軍事鬥爭，至同治六年，始失敗。曾占彰化、嘉義兩縣，震動清廷。

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陳心婦在集集起義與清軍抗戰八年，至同治十三年，始被捕。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日本藉口琉球藩民為台灣番人所殺，興兵攻

台灣，台灣人乘機在各地暴動。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四月，蔡顯在布袋嘴起義。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八月，為反對劉銘傳之清丈政策，施九段率農民反抗，此為第二次之農民暴動，規模甚大，波靡彰化、嘉義兩縣，流血至慘。

這是滿清統治下的台灣實景，一個小小的台灣島，到處都有漢民族的血迹，二百年間，清廷所謂大亂竟有二十餘次，所以李鴻章曾警告曰人說：「台灣三年小叛，五年大亂」，決非空洞的恐嚇，而是鐵一般的史實。

原載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九日《人民導報》

我們要溶化在一起

五月十二日在省訓團精神講話

今天承韓教育長好意，要兄弟到這裡和各位講話，兄弟感到非常榮幸！

兄弟是本省南部人，從小就離開台灣，有二十五年之久，在這二十五年中沒有回來過，因此對日本政府統治台灣的一切，只由各種情報及文獻上求得瞭解。本來像我這樣的人，假如沒有這次光復的機會，就永遠沒有回來的希望，因為我們不滿意日本政府，到祖國去發動抗日的工作，另與台灣方面時時取得連絡，做復興台灣的運動，日本政府很注意我們。二十五年，時間不算短，這期間在國內奔走呼號的同志們很苦，尤其在八、九年抗戰中受的苦很大，但一回想到台灣同胞受日本政府的欺侮壓迫，其痛苦自比我們更多。本來斷無再見面希望的同胞，今天見面了，而且能夠聚會在一處談話，共同過生活，這是最值得紀念的一回事。

記得二十年前，我曾寫一本小冊子，書名是《台灣民族運動史論》，許地山先生（許南英先生的哲嗣）為我寫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裡說：「台灣和祖國原是一家人，好像兄弟一樣，一時因為家庭經濟困難，把小弟弟賣給別姓去，表面上算是脫離了家庭。這小弟弟在別姓管轄之下，受了很多痛苦，可是他的哥哥應該不會忘記他弟弟的痛苦的」。而今，許地山先生雖然死了，但是這些話還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今日台灣已重返祖國，親兄弟「久別重逢」，這是人生最快樂的一回事！不幸，在這歡樂聲中，有一種不好的現象，就是近來在社會上輿論上，看到本省人與外省人有些隔膜，國內同胞對台灣同胞有種種批評，而台灣同胞對外省同胞也許有多不滿，兩方面

都有相當的理由，因為時間和空間的關係，許多事往往不能如我們理想，這是難免的現象。但是這種現象是否讓他繼續存在，或是想辦法來消除呢？因此「我們如何溶化在一起」這個問題值得我們研究。兄弟在國內二十多年工作的目的，就要台灣重回到祖國的懷抱，因為台灣的人民，也就是祖國的人民；台灣的土地，也就是中國的版圖。總理在遺教中說：「構成民族的要素，就是血統關係，國家是由家族到宗族，再由宗族到國族結成的」。我們可以說普通台胞家族的族譜中，看出從前台胞一部分是從福建漳泉來的，另一部分是從廣東潮州梅縣來的，我們之所謂「唐山」，就是我們的祖家。我們的所謂「唐人」，就是指內地人，這就可以證明我們同胞是一個血統，同是一個民族，我們今後要互相親愛，互相團結，更要溶化在一起！

台灣因過去五十年離開了祖國，在歷史的認識上難免有一部分脫節，今後應恢復五十年的關係。二百年前中國遭外族滿清的壓迫，一部分有志之士起來反抗，鄭成功就是一個代表人物。他圖反抗「滿清」恢復中國，不幸結果失敗了，帶了一部分有氣節的人退到台灣來，繼續神聖抗戰的工作，我們的祖先就是從那個時候來到台灣，我們應該恢復過去的光榮，發揮鄭成功的精神！使台灣變為中國的模範省，台胞為中國的模範國民。

我們欲達到這一目的，應如何努力呢？

五十年來台灣在科學上物質上建設上是有進步的，誰也不能否認，另一方面就是精神文化，比較差了些，這是受了日人殖民地教育的影響。我們不要以物質建設有進步，就要自誇，相反地我們更要虛心接受祖國的文化，祖國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吸收世界進步的思想，實是光輝燦爛文化。不幸在這五十年中，日人實行文化封鎖政策致使大家對祖國文化不大明瞭，不知道祖國就在這五十年中，各方面都有進步，比如以政治來講：從戊戌政變到辛亥革命，從辛亥革命到北伐完成，以及軍政、訓政、憲政的實施；不斷在進步著。再從社會思想來講：有「五·四運動」，雖是當時北京大學學生發動的，但

卻不是單純的學生運動，而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藝復興運動，這種文化運動的成果值得我們來接受的。

再講到日本從明治維新後，雖然在表面上看是進步很快，其實是「外強中乾」，革命沒有徹底，社會醞釀著內在的矛盾，政治表現著種種的缺點。大家都知道日本是個專制政體的國家，社會上男女是不平等的，階級的分化是很明顯的。記得我在內蒙古張家口時，有一個日本領事會見馮玉祥，馮玉祥就問他說：「你是賤族不是？」那領事無法回答，馮玉祥接著說：「你們貴國不是有貴族嗎？怎樣沒有賤族呢？」弄得他啞口無言，這是一個很幽默的故事。

再說到日本人的一切都很短淺，從生活方面講：日人的房子多矮小，用板鋪鋪，房內用紙糊糊就成了，一座小小的房子，還裝設有什麼山水花樹，不如英美用鋼鐵水泥建築幾十層大廈的壯大堅固。再如日人吃飯用的「御箸」也是用杉削成的，用一次就不要了，不如中國用的牙箸、木箸的堅固耐久，這雖然有些瑣事，但足以表現日人沒有遠久的打算，處處是短淺的。就是從歷史說：日本只有二千年的歷史，不如中國有那般光榮悠久的歷史，和光輝燦爛的文化。再從地理上說：日本的本土不及我們的一省大，日本的山水更比不上中國的五嶽的雄壯，長江黃河珠江之偉大。

如此說來，我們受本國自然地理環境的熏陶，所以有遠大的眼光，也應該有長久的計劃，我們應該學習雄偉的精神。我們中國的歷史文化是這般光榮悠久，我們更要虛心去接受，所以我說：我們今後要互相親愛，互相團結，更要互相溶化在一起。

孔夫子的偉大

萬世千秋得一人，只顧公益不行私利，只謀社會之福利，不貪個人之榮譽，不怕環境之惡劣，迎困難而勇往直前，其理想即不能實現於當前，亦期影響於後世者，就是孔夫子了。我國數千年來，尊奉為萬世師表，不是沒有原因的。

孔夫子生於戰亂時代，憂世憂民，無時不想有以貢獻於當時的為政者，平定天下，拯救萬民，建設一個合理的社會，所以周遊列國，欲其理想透過當時的為政者，實現於政治上，無奈當時的為政者只顧眼前的得失，不考慮後世百年的成敗，只謀鞏固個人的權力，不計一般社會人民的興衰，結果只落得浩嘆「吾道不行」。

普通人如果遇到孔夫子這樣的遭遇，必定失望灰心，壞的，頹喪墮落；好的，恐也只能做到「不能兼善天下，就獨善其身」，退隱山林以觀時變。然而孔夫子不然，其理想的抱負，即不能實現於當前，亦期有以貢獻於後世。故雖退隱山林，猶集弟子三千，從事教育工作，不羨慕現世的富貴，不嫌棄窮陋的生活。若以時人的「世利眼」看來，必大嘆息「其愚不可及也」，但他終於得七十二賢人，著書立說，風靡全中國。雖夷狄之邦無不受其感化，其學說傳述數千年之久，本人被尊奉為「萬世師表」，其愚固不可及，其智亦不可及也。

時人有以孔子的學說思想不適合現世而非難者，但若平心而論，至少孔子的精神實值得吾人尊崇。至於社會環境之變化與進展，乃社會進化必然的歸宿。數千年前任何大聖大賢，都無法保其主張能通行於萬世之後而不逾越。因為真理沒有絕對的，只有「近真」而已，世界任何大科學家卻不敢保其學說永久不變，「相對論」的價值也即在此。時人之有「以變衡定」非難孔夫子，無乃太過乎？尤有進者，有人以其出生私德批評孔

夫子是非者，若非別有用心，即為喪心病狂。猶如時人動輒以私德攻擊政敵者，然何況不配稱為政敵，只是殷勤獻媚討好而已，孔夫子有知，能不捶胸悲憤乎？

相傳孔夫子為一達觀賢者，高瞻遠盼，不為威武所屈，不為權力所誘，當時不染於阿附諛承，不會拍馬吹牛，今日當仍值其所值，而非其所非，不怕無聊的任何中傷吧！今日台灣世景漸變，人心不古，慣造謠言中傷，密告升官，亂戴帽子以謀獨占權位的風氣，逐漸侵入，逐漸分布，老奸巨猾，精於「官場之游泳術」者，應捫心自問其惡影響的責任，更應知百年之後必有「春秋」出以問世。一般人民尤須「知廉耻，明禮義」，勿為卑鄙寡廉者流所蠱惑，努力充當忠實的新台灣建設者，凡有誣讟忠實建設者出現，必須「鳴鼓而攻之」，舉凡有利於台灣合理建設的工作，必須勇往直前。凡有溝通官民感情使得實際協力融化者，應多尊崇。凡有貌似忠於政府而實為政府摒絕人民者，政府固不易覺察，人民亦應知檢舉。是為「春秋之義」，孔夫子精神之偉大，即在於斯，這裡特以紀念孔聖誕。

原載一九四六年八月廿七日《新生報》

報人的使命

——為紀念記者節而作

報業之發展，正如革命之發展，今日的成功就是過去的犧牲，過去一代報人的血汗生命，充當後代報人的踏腳石，造成今日報人言論自由的地基。吾人今日紀念記者節，切不可忘記過去犧牲血汗生命的報人前輩。同時，每一個時代，有革命自然也有反革命，所以有為言論自由而犧牲生命的報人，也有為自己權位而摧殘報業、破壞言論自由的報人。過去如此，今日也是如此，紀念記者節，更不能忘記報界害蟲的肅清工作。

二十多年前北京在張作霖軍閥統治下，華北是一片黑暗，報界自也無光明可言，我們幾個學生朋友創辦《新台灣》，反對這種黑暗的統治（當時我用的筆名叫做「奔流」），坐了兩夜的警察局冷板凳，幸而沒有掉了腦袋。名記者邵飄萍及林白水，則因批評潘復興、張宗昌的勾結而被槍斃了，那時候我們黨的革命勢力還沒有到達北方，前進的報人先為言論而犧牲了生命。

前天承台灣畫報社的招待，看過《風塵佳人》的影片，表演蔡松坡將軍為反對袁世凱稱帝推翻共和民主制，如何受難，如何冒險逃出北京；但另一方面卻又有一批阿附趨承利欲熏心的小人，製造輿論，稱各方有力者歡迎帝制，用以迎合袁世凱的歡心。但是，一到蔡松坡、李烈鈞等人舉起義旗發動討袁而各路義軍逐漸迫近平津的時候，袁世凱始恍然大悟於專制勾當不可幹，皇帝美夢做不得，於是埋怨趨承迎合的近臣，怒打主謀者，捏死皇娘子，不久自己亦羞憤而死。

這種對照在古今中外，不乏豐富的史實，而每一事件都有報人穿插其中，為烈士為

罪人，後世均有公正的判定。吾人以為今日報人最重大而正當的使命，在於忠實報導，反映民情。一個時代，一個地方，乃至一個國家的為政者，大體上皆抱有為民謀福利以鞏固信望的高遠理想，所不同者只在於運用政策之得當與否，但欲運用政策得當，必須先洞察實際接納民情，而民情與實況往往不容易上達於最高當局，於是一般報紙乃有其效用，公正的報紙就是報導民情的機關。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任何國家都需要這種忠實的報導，所以報人的第一使命，在於不帶主觀意氣的忠實報導。

報人的第二重大使命，為公正善意的批評，每個為政者大體上都想把政治弄好，把經濟、社會，乃至教育、文化，統統弄得合於人民的希望，因為如無好的成績，他的政權和地位就無從鞏固下去，中外古今的史實，都在確切證明這個道理。不過，當其運用政策時，常常出於正常軌道之外，結果得到相反的效果。我以為政治是「眾人之事」，「眾人之事」應由「眾人的意志」來決定，較能合於實際。俗語說得好：「一人主張，不如二人商量」，少數人商量，究竟不如多數人商量，來得確切。多數人商量的方式，除了開會討論以外，就是透過報紙輿論的民意表露，所以現代的民主國家重視輿論，尊重輿論。所以報紙的批評，也應當公正而善意。

報人的第三重要使命，在於積極而具體的建議。報紙對於政府施設及人民言行，若單限於批評，還是消極的，更重要的，還需要積極而具體的建議，以備政府及社會採用，這也是集思廣益的一種辦法。常聽見政府及社會方面的反批評，說報紙只會罵人但無辦法，也是值得注意的，所以批評要公正，並要有建設性，至若空洞的或虛構的批評，就更會犯上「謾罵」的毛病。這又正如有些官報硬說「暴民要把報人推上斷頭台」，是一樣的錯誤。所以報紙的批評，最要避忌的，就是意氣的、偏見的意見。第二要避忌的，就是空洞的、抽象的說法。一切批評要積極而具體，才能收到效果，達到輿論的目的。

總之，在此民主潮流澎湃全世界的現代，政府要洞悉民意所在，而報紙就是民意表

露的最好的機關。政府要重視報紙的報導，尊重報紙的批評，但是報人也要自重，務求報導要忠實，批評要公正，並要積極的建議，方不辱報人的神聖使命。

原載一九四六年八月卅一日《人民導報》

台灣教育設施的現階段

——全省省立中等以上學校校長會議閉幕感言

台灣光復經及一年，教育文化雖說應該配合政治經濟社會的需要，但實際上確已走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前頭，這不是我們自吹自擂，實有許多事實可為作證。

日本固然給我們造成台灣教育文化的基礎，但並未完成合理的發展，尤其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教育文化的發展，已為侵略戰爭所阻礙，體育退步了，科學以至各種學科，都呈現停滯的現象。我們初來到台灣，在教育文化上遇到的困難，不獨是校舍破爛而已，教育文化本質的改造、教育文化程度的恢復等等，尤其成了我們推進教育文化的課題。

我們教育文化的推進工作，全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遵守陳長官的指示，以造成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的意識形態，並培養實踐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的人材。我們推進教育的第一期工作，是接收與整理，把破壞零亂的教育設備，接收過來加以整理。台灣教育的特點，就是普遍，而此普遍恰好使我們在整理過程上，必須花費更大的精神和更多的時間。在整理過程中遇到的第一種困難，就是日人師生的撤退和我們自己的補充，這些困難因限於交通工具缺乏及人才條件不合。一直把這些問題，拖延下來，還沒有完全解決。不過，接收整理工作，可以說大體上業已完成。

這個接收整理工作所完成的特色，第一，把不同教育宗旨所造成的教育制度，予以廢除，例如日本男女教育的不平等，可說從根本鏟除了。第二，種族的差別教育，也已不存在，一般台胞乃至高山族都得受同等教育。第三，階級差別所產生的教育傾向，也

在矯正中，貧窮的學生正在設法補助獎勵。第四，已往閉塞孤立的教育，已被打破，將六百萬同胞帶入四萬萬人大舞台門路，業已開闢，甚至帶上國際舞台，使他們得以變成現代的世界人。第五，過去偏於維持個人生活的傾向，例如醫生、律師及商家等傾向，漸被拖入為國家社會的教育修養方面。例如法政、經濟、哲學、文藝，及高深技術等方面。

若舉事實來說明，我們總算完全接辦了日本時代的官公立學校，並且運用同胞熱心教育及青年好學的優點增設了不少學校單位，現在只就中等以上學校說，省立的即有七十餘所，加上縣市立的，總數當在二百個以上，而地方設立私立學校的風氣又很濃厚。第二，教員的配備也漸漸合理化，質地也在提高過程中。我們的原則是國語文及公民史地等有關精神文化的教員，採用外省的好教員，而數學、物理、化學，及生物等自然科學，乃至超國界的學科如音樂、雕刻、體育等，則要多多採用本省人。初期不得已而暫用的代用的教員，及外省質地不良的教員，已漸予以淘汰。第三，教科用書，不但已由四大書局印刷提供，其不夠部分也在設法供給。教科書的內容更力求其合於台灣特殊情形的需要。第四，一般教育宗旨，在於建造民權主義的基礎，職業教育更求其能配合民生主義的推行，此外還專設師範學院，增加師範學校，以培養大量的中下教員，以解決台灣最嚴重的師資問題。專設法商學院的用意，也即在於補充過去當然缺欠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人才，以鋪設人民合理行使民權的道路。專設台南工學院、台中農學院，及其他種種職業學校，目的不獨在於培養生產人才，更重要的意義，尤在於實際經營各種產業，以為民間提倡，例如農學院及各農業職業學校，就準備經營大農場，以為大農耕種的示範，並擬由此組織合作農場，以獎勵推廣，民間的合作農場，使台灣農業機械化，農村工業化，而台灣整個產業體系現代化。

然而我們並不滿意於現狀，雖說台灣教育已由整理步入改進的階段，但未做到的地方還非常之多，我們還要繼續努力做去，我們並且相信要推行台灣教育到理想的路上，

到理想的地步，必須各學校校長及一般獻身教育的人士，予以積極的幫助。我們還準備接受各方面的批評和建議。

原載一九四六年九月廿二日《人民導報》

談談台灣農業的改進

——祝中華農學會成立

昨日中華農學會台灣分會成立，內地既成的團體在台灣成立分會，又多一個實例。日來中外合組的農業技術視察團，也為視察台灣農耕實況忙了一陣。這些都是很好的消息，大家都是為著改進台灣農業及農民生活。就中尤其值得欣喜的是農學會的組織就現狀言是以省農林處為主幹，為首腦部，所以研究所得辦法想都可以應用於實際農政上。爰擬略抒意見，以貢獻農業諸專家。

台灣的農業情形比之國內有點特殊，並且具備特別的基礎條件，此後台灣農政實施得法，台灣農業經濟確實可以大收效果而為實行民生主義的模範，但若原則儘管良善而實施辦法及人事問題不能圓滿配合，則或實施初期難免有離題愈遠的弊病，甚至至背道而馳，是大家應該特加留意慎重從事的。所以研究性計劃授權的農學會，首先應多著重於台灣農業實情的現在，並精密研究辦法，使應用於實際農政時，將與民生主義及現代農業趨勢相吻合，並不致妨礙其他農業部門的發展，使不重犯過去日本偏重政策及台灣農業畸形發展的弊病始可。討論農業問題及農政施設，應知兩種不同的範圍，是在互相效應，互為因果。其一是農業經營的改進，其二是農村經濟的改善。假使農村經濟不能改善而只農業經營進步，其成效及利益勢必偏在於少數人，而社會發展變成畸形；假使單求農民生活改善而農業經營不進步，則其社會經濟必成世界水準的落伍者，而農民所得福利也極有限。民生主義指示我們一個高遠理想的目標，但只偏於農民生活的改善，而農業經營的世界趨向，尚有待於農業技術家及農業經濟學者，來努力發揚光大。

單就農業經營言，台灣確已具備一部分良好的條件，台灣同胞之間，尚無了不起的大地主，一向也無了不起的大農耕種，而廣大土地集中於日本政府及日本資本家手裡，如廣大無垠的官有林，及已相當集中經營的糖廠農場就是。自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以後，這些農林及耕地全部歸我政府公有，正提供我們以經營大規模示範農場的良好條件。我們苟能善為利用這些農林地，使其經營收穫優良的成果，則再進一步鼓勵農民協力經營合作農場，自可一帆風順，普遍登台灣農耕於世界水準以上。但是問題仍在於能否獲得優良的結果，假使大規模農耕，生產費意外的浩大，冗員與浪費依然不能避免，如一般公營事業那樣，則雖有改進農民經濟的良好動機及為民示範的德意，實際上，農民仍必裹足不前不敢效法，而改進農耕無從普遍。

所以農耕規模的改進，還要人事配合得上，經濟的進步，有待於政治的革新，自非宣言或善意的建議。我國的經濟建設原則，著重於國營或公營，用意至善至美，而實際國營公營事業常不能開展的原因，即在於此政治的問題上。其次，農耕的進展不能獨善，經濟各部門是互相聯繫息息相關的。假使一地方的工礦業沒有相當發展之農村，人口自不能減少，都市人口再流於農村，則農耕機械化、大規模化，自屬不可能。人口若集中於農村、發生農村勞動力過剩時，工資自必低下，擬欲採用機器機耕種，其生產費必至昂貴，機器生產費若高過人力耕種費，則機器必至無人問津。

再就其他與農業經營有密切關係的產業部門言，亦必須有相當的配合，例如新式耕種須採用電力灌溉，台灣過去業已相當發達，但近來則因電費昂貴而棄留不用者，已漸有所聞。再如新式農具之製造及採購，也有待於工商業之發展，農業資金之運用，更有待於金融機構之合理提供。此外如農耕規模須受地勢之限制，在日本本部雖具重要性而在台灣則無多大意義，尤其是南部台灣如台南、高雄兩縣，更無阻礙。總之，台灣農耕

能否改進，大體上要以政治的及別部門經濟的條件來決定。

談論農業經濟之改進，不能忽視農民生活之改善，台南某縣長曾晤筆者說，現在台灣人民生活若不能改善，則台灣光復自無意義，這是多麼透徹的良言，實具政治家的風度。此言應用在農村建設上，也有獨特的意義。假使農民生活不能改善，農村經濟不能普遍好轉，則農業經濟建設失卻根本的意義，此點不獨關係農業經營的問題，而且是農業改進成敗的關鍵。

台灣過去大地主是日本人，日本資本家以封建的方式剝削著台灣農民，糖蔗的不等價交易，不公正的分量規定，及強制性的栽種，屬於「經濟外的剝削」。但是現在台灣同胞卻喧嚷著。現在的大地主是政府。此點同胞固有未盡瞭解我國經濟建設之處，但實際的運用，必須確能於農民有利，不發生日本人的經濟外剝削情事，始可以證明我國經建原則的正確性。此點，陳長官經已深切關注，而其所關聯的問題多而複雜，如土地制度之合理化，土地利用之經濟化，乃至田賦負擔及徵收之公平化等等。

關於土地制度問題，一個共通理想，就是減少或消滅佃農，更理想的辦法還在於土地公有制，而長官所著重之點，即在於公有土地之有利合理運用。但若自耕農的負擔，大於佃農時，即欲「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實現，事就不容易做到。現在已有地稅負擔重於地租（佃租）的傳說，也堪我們注意。

台灣省五年經濟設計計劃中，規定：「根據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分配（土地）給有耕種力的農民，配地每戶面積，田以三甲，地以四甲為原則，但這應當解釋為分配給田地的使用權，而非所有權，而此零細耕種更應以合作農場的獎勵，來補救其缺點。五年經建計劃中，也規定改善租佃關係，而此問題之複雜微妙，為各國所共同，台灣更需實地精密的調查，和合理周全的設計。

農業經濟比工業經濟複雜而微妙，這裡只因農學會成立有感，略述數點，提供當局好檢討，並以請教諸專家，祝農學會健全發展。

原載一九四六年九月廿九日《人民導報》

推行合作事業的檢討

——並祝台灣合作事業健全發展

合作事業的興衰，可以說明一個國家現代化的程度，同時也證明一個政府是否關心中下層人民的福利，是否在謀接近人民。

歐美先進國家的合作事業，大體上相當發展，而落伍國家則因人民缺乏合作性團結力，大規模經營的力量，而一般皆甚衰微，我國各省則為一例。但是總理遺教的民生主義卻包括著發展合作事業的意義，並且是民生主義辦法中主幹之一，合作事業如能合理健全發展，則民生問題可以說解決大半。信奉三民主義的人們，不可不多留意於合作事業之是否合理健全發展的問題。更應督促政府獎勵推進合作事業。

台灣合作事業原已相當發達，其事業單位達五百以上，其事業範圍包括也甚廣泛，其主要者有農會，遍立於各縣區鄉鎮。此外尚有漁業會、信用組合等，皆有相當成績的表現。陳長官為推行民生主義於台灣，特別注意合作事業之改進，省公署特於最近成立合作事業管理委員會，其目標在使過去及現在合作事業得以銜接，並謀配合台灣五年經濟建設計劃，發展合作金融，增加生產，加強供給與增進一般人民的生活，用意至善。

建設合作事業的目的，在於改進人民生活，在於增進各部門產業，所以事業的種類包括生產的供應、運銷、信用等等，而其運用又普遍及於各經濟部門。所以合作事業的管理，應注意產業的健全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合理改進，特別要注意中下級產業發展的獎勵和中下層人民生活的改善。過去日本政府對於台灣合作事業的推行，不能說沒有相當的成績，但其發展只偏於一面，就是產業的發展，而一般人民生活的改善卻未完全顧到。

雖說日本的社會經濟政策，置重心於中堅社會層明保護，但在台灣因為民族界線的作祟，常出了軌道之外，台灣的合作事業雖然相當發達，而本省人所沾得到的利益甚少。

過去台灣是大和民族統治著漢民族，所以發生上述畸形的現象，現在已經是漢民族領導著漢民族，並且政府人員是人民的公僕，而人民是以中下層人民占大多數，所以此後合作事業管理的第一重要方面是為改變過去此方面的缺陷，而完全遵從民生主義的教訓，特別將合作事業的利益，普及於中下層民眾。

我國為合作事業的後起，各省推行的成績不算圓滿，也未完全合於合作事業的宗旨。例如合作金庫的放款規定很多擔保辦法，須有實物抵押或殷實擔保，如法放貸款；但是實際上，中下層小實業家或小資本商人，皆未具此等條件，所以合作金庫的放款，大部分為大商巨賈所獨占。此點在台灣今後應設法改革。再如農民銀行之設立，原為放款給中小農民，以謀改進農業經營及農民生活，但其農貸的實績，則又因抵押擔保的限制，兩大批放款又為大農富農所得，而一般小農則依舊叫借無門，甘心忍受高利貸的剝削。各省小實業家、小商人，及小農民所忍受高利貸的剝削率，聞高至月息二〇%。此後台灣的信用合作，一面要靠國家銀行出力支持，一面要放到小農民小商人身上去。

更重要的如生產合作部門，如合作工廠、合作農場之舉辦，尤須注意一個原則，就是經營的公開化、民主化。合作工廠是集合小廠家組織成功的，合作農場是集合小農民組織成功的，大家都是所參加單位的主人，而經營者只是經理，或僕人，主權在主人，經理或僕人只是執行或聽使役而已。所以經營方式要公開要民主化。政府方面，即使參加資本或人員，亦應嚴守這個原則，才不致有流於官僚化的危險。

合作事業落後的國家政府對於推行或獎勵，初期還要先開辦模範事業，例如大規模農場之經營，採用最經濟而合於農業耕種潮流的經營方式，經營得法管理得法，以舉卓

著的業績，對於一般人民發生示範作用，然後集合人民舉辦生產合作事業，始可容易組織成功。再如運用資金、生產工具（如新式農具）、生產運輸等等，政府都要給予相當便利與補助，以資獎勵。政府能如此扶植培養，民間的真正合作，單位始可以日益增加，而合作事業臻於健全發展的地步。

政府方面最緊要的，是要避免各省各種公營事業所犯的毛病。我的同學安昌文專門研究合作事業，曾於抗戰艱難時期，在重慶南岸經營一個合作農場，經過幾年慘澹經營的結果，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其事業範圍也日益擴大，後來農林部對此頗有所動，收為部營，給經營者安了三個位置。農林部的用意原是很好的，想借此擴大為示範的大規模合作農場，但可惜結果卻為相反，我這位帝大農經同學，現在卻須跑到廣西大學去當教授了，其南岸合作農場失敗的原因，雖無詳細資料，但其在公營之後失敗的卻很確實，我不是反對公營，但希望公營要為人設法。

民政處現已注意及此，特別舉辦合作人員講習班，參加人員達七十二人，訓練各企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其主要課程為合作政策，工作綱要，合作法規，合作理論，中國合作運動，乃至登記須知，組織須知等，都是重要功課，又都是偏於管理方面的，當然是目前所必需的。但於經營技術合作事業致政治意識、經濟意義等等，吾人還希望再多舉辦些講習班，更深入養成專門的合作人員。因限於篇幅，今天僅說到這裡，並以祝台灣合作事業發展。

成功之道

——在成功中學訓話記錄

今天承何校長的好意，請我前來講話，我覺得非常高興。

成功中學的前身是台北第二中學校，這學校過去有他的光榮歷史。台北二中的在日人時代純系台灣學生讀書的地方，當時日人歧視本省人，採差別待遇，日台分開，二中收納台灣學生，其他一中三中四中等均招收日人學生，後來雖亦曾招收台灣學生，但為數極少。當時日人是說，一中三中四中等校成績比二中好，但在現在按照我們立場來說，二中全係台灣生，這實實在在的保存漢民族思想，不像其他學校少數台灣學生就在日人學生中難免受其熏染，日人的野心是想先同化學生，由學生浸透家庭，固然我漢民族意識□□難為所動，然除二中外的其他學校，當不無多少受其影響，這層是二中不同於其他學校而有其光榮歷史的來由。大家當然還是曾記得光復之初因學校命名曾引起了兩次爭執，原第二三四等校並為第一中學校，但二中的學生，尤其學生的家長以二中有其光榮的歷史，要求教育處把一中改為第二中學，其理由為漢民族思想保存得獨厚的學校，這就是證明二中光榮的地方，不過校名次序的排列只不過是個名義而已，求其方便而已，其在社會的地位必須以實際成績來決定。後來這爭執平息了，仍別以數而以成功來命名，我們應該認定須學生們努力讀書，遵守校規，現在做個好學生，將來做個好國民，這樣才是以提高其學校在社會的地位，並不在第一第二的名義之爭，萬勿存這機械的念頭，須切合實際的不斷努力才好。

你們學校有一〇，二五〇人學生，可說是台北各中學中人數最多、設備最完整的學

校，其和建國中學比較起來，社會自有定評。這因過去建國校長，用不得其人，今已另派任新校長，陳文彬先生，相信此後必收良效，可望蒸蒸日上。而成功中學亦須一本過去精神貫徹始終，和其並駕齊驅，共相比美，成為本省中等學校的雙璧。

今天我的講題為青年成功之道，人均須努力求上進，尤其青年更須及時努力，事業方克有成。這學校校名為「成功」，我們勿忘其義，凡事須存著尚未成功的念頭，如總理努力革命四十年尚於臨終時訓示我們說：「革命尚未成功」。真的，民國鼎建以來，一切待我們努力的地方還多。再說，蔣主席勉示我們須繼續努力，勝利之後諸多待舉，舉凡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建設尚未成功，國事如此，個人的事業亦莫不如此，做人由青年而壯年而老年須努力不懈，勿抱已成功的念頭，不思進取，須望一切事業我們還沒有達到完全成功的境地，能如此，則社會賴以發展，國家賴以發展，全人類亦賴以發展。現在我就這成功之道，亦就是這學校校名所標揭的本旨，提供一點意見以供參考。

凡人做事欲求其成功，簡單說起來其努力目標，不外乎「智」、「仁」、「勇」三者，分析之，所謂智識、仁義、勇敢，表面看來，非常簡單，但其內容涵養是多面的，有著種種的解答，願就個人經驗和瞥見所及，提出來和大家談談，希望大家能身體力行。

(一)「智」，智識、學問包括在內，「智」，學問從學習而來，所以一個人要希望自己事業，有所成就，則必須抱定活到死學到死的態度，特別是青年學生更須全部時間放在學習上面，一切以學習為重。但怎樣去學習，學習應取的態度這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學習不是盲目的，更不可因循走馬看花的看完了一本一本書，就算數。學習首先必須有一科學學習的方法，與正確學習的態度。我們要新的智識，好的學問，除在學校，校長老師的教誨指導我們學習外，我們時時刻刻應採取主動自發的精神，才有濟事。時代思潮日趨實際，過去國內習法空洞不務實際，如民國前科舉時代做八股文章，做詩

排好七律五絕，僅從形式上做功夫，全為應試秀才舉人進士，只要一舉成名榮任出仕，所以這種學習是空洞的，與實際不符已分家且與時代脫節不合。此在目前，我們這新時代，新的環境，是要求我們學習的方法與態度，必須適應社會實際需求配合科學文化的思潮。在學校方面，要注重實驗實踐；例如化學因素配合須要實驗證實定理原則，實驗農業耕法不切實際者很多，所以學農的必須到農場去實際工作，才來得切實。還須學校學理論的，要去工場實踐實驗，職業教育甚至管理方面，我們才能與社會配合，所以學校教育重在實驗。學習必要以實踐相輔而進，實踐是將來做人的方法。例如你們將來要做國家的主人，我們就應該怎樣去學習做主人的法度，要是現在不實踐體驗，出社會謀事必不合實際，例者之，此次台灣光復照我國憲政時期辦法實行民主政治，選舉民眾代表，組織縣市省的民眾機關，參議員在選舉過程中因為無實際民主的教育，所以初期難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問題所在，就是人民缺乏一種新的政治講壇，即選出代表後，也因為尚欠民主的政治教育，所以行使職權時，也表現糾紛，這不是說參議員不好，至少可說他們在替人民說話的程度上的不夠，在行使職權方面不妥當尚多。現在我們是在學生時代，民主實習表面看起來似乎是不可能，其實在學校可以學習學習民主的常識，與培養民主的作風，如學生自治會、讀書會各種學術研究會，都可以民主以公開的方法來辦理。比如伙食、居住、服務，諸問題，都可以現代民主方式來處理。這也是將來準備做國家的主人的很好的訓練機會，從這機會一定可得著很好很豐富的學識和教訓，更可訓練自身體貌和精神。但這是在互助協力共同策動始可進步，所以「實踐」這個問題在學生時代也是同樣可以做到的問題，只是在工作後師生的志趣如何「智」這點在學生時代要注重在「實驗」。

「實踐」上面在社會也是如此，還有一點應用到教育方法，要緊不僅是接納方法，

宜以演講方法來補助。因此古代聖賢君子許多話及外國科學先進所有的理論，固然足以學習也可以實用，但學習的方法，必須求有效果，節時間節省精力。特別要注重時間與空間限制，外國的科學文化很昌明，很發達，但不一定都適合我國。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心必持檢討的態度，抱懷疑的方法，研究這種辦法是否適應我國。對於古代文化也應要以同樣態度和看法來研究檢討，因為古人所處的時代環境與目前時代環境不同，例如孔夫子學說及其治學做人的修養，我們要學習無疑。但在目前男女平擺時代，連小學生也通曉的常識如他所說「女子與小人為難養」，這在過去的情況說來尚可原恕，但在現代研究起來，許多婦女就起來反對的，所以古人的言行原則上要學習，但必須以檢討的方法去研究。但最終還要「實驗實踐」，要師法中外舉賢先進，而加以現代眼光的檢討。

(二)「仁」字看起來很空洞，簡單說起來，即是國父的革命精神的「博愛」照以自由平等。博愛自由平等應用在人類社會上就是不分彼此大家推誠；相與應用在我們學生時代方面，則應革除日人統治之下的教育差別觀念。第一，種族差別，日人與台胞待遇的差別，對男女間待遇也是不相同，但光復後這種觀念已無由存在。在國內種族無論是漢蒙滿回藏——一律都平等待遇，現在在台省內地來的外省人無論是那一省也是如此要像一家人一樣親愛。對男女間絲毫無差別，只要婦女智能水準提高皆可與男人平權相等。台省與高山族同胞亦是同樣同等待遇，陳長官此次出巡曾為高山族教育文化及經費解決甚多的困難，即一明證。在政治上亦是如此，凡是中國人都應該博愛平等。但是最近常看到本省人與外省人表現若干不必要的隔閡迹象，如某學校本省人與外省人同學發生意氣糾紛，本省人即呼喊打「中國人」，我們問問，難道自己不是中國人嗎？我們自己都是中國人應該博愛。到社會上更要博愛，只要不是壞人都要一視同仁，同樣看待。尤其到了社會上所幹行政事務的同胞，更要遵守這種良好原則，要博愛。假如自己一旦

負責什麼工作，需要人員協力，採用自己的親友們也好，問題只要有能力肯負責。假如他們萬一有不法貪污之點，不問是親友關係，得依然嚴法照辦。自己要以身作則，要勇敢博愛以仁愛精神，大義滅親大公無私去應付，現在我們學生時代也同樣，要應用這種法度和精神，去學習去生活。

(三)是「勇」，簡言之，「勇」就是勇敢、勇氣，凡做事情，缺乏勇氣，不勇敢去做，「畏首畏尾」的，事情一定做不好，是故必先培養勇氣。但勇之為用，必須與「智」、「仁」相配合，否則，必不得其賞。「勇」必行實於公並不能以之利己，現代世界思潮趨於重公德這一方面，凡有益於社會、國家、人民之事，要勇為之不計犧牲、利害、成敗。我們八年抗戰苦鬥，從困難中得到最後勝利，乃係勇以致之。就日人發動全面侵略戰爭時，就彼時情形言之，我們是毫無勝算把握，但我國是站在反侵略的立場上，亦就是站在「仁」的立場上，到底在連連失敗中站起身來。戰爭開始，未知須忍受絕大犧牲，但一再服從主席的領導，就要堅持到底，這乃「勇」在「仁」的法則上發揮其力量。說到主席我們都曉得他是我國古往今來歷史上偉大的人物，其成功要訣不外是他能分別清楚公私利益，以國家第一的原則下領導抗戰，結果成功了，歷史上有他的重要的地位了。反過來說，一切勇氣如不衡之以「仁」以「智」，則必至得到相反的效果。像貪污、犯罪其亦算得上很有勇氣，但結果是須受法律處分，身敗名裂，這「勇」係自利之「勇」，不足取。正正當當的勇須要具有「勇氣在仁」和「當仁不讓」的精神。如學生在學校，對學校有益的事，如排斥校規制裁少數犯過學生，或於學校服務事項鼓其勇氣去做是應當的。假如學校的校規規定考試學生不許看或作弊，而竟違規去作弊了，這也是勇氣呀！但這恐不對了，是故勇必明是非明曲直，萬不可盲目的輕舉盲動。

總言之，「智」、「仁」、「勇」三者表面似乎不相關連，其實是相互為用，息息

相關的。研究其理辨其是非訂其步驟，擇其途徑然後去實行，實行時須起以勇氣持以毅力。青年學生須好好的瞭解這中間的道理，切實奉行，好好的運用，這是成功的三個程序。建立健全偉大的人格，做個健全的國民，將來做個優秀的國家主人，切勿有負這個學校的名稱，願共勉之。

(十月七日)

原載一九四六年十月八、九日《人民導報》

國父與國慶

國慶為中華民國立國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多年始創造中華民國。所以我們紀念國慶不能忘記國父，尤不能忘記國父的理想及其事業。國父的理想在於解救四萬萬五千萬生民，在於解放世界被壓迫民族。現在抗戰雖已勝利，帝國主義所加於我國的枷鎖雖已掙脫，但建國頭緒萬端，還有待於革命同志及一般國民繼續努力。先烈鮮血未乾，同志不應健忘，我們尚須「和平、奮鬥、救中國」，勿負國父遺志，願與國人共勉之。

原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人民導報》

國慶紀念特刊

宋斐如題

國慶與辛亥革命 國民政府 司法院長 正

三十年的紀念，在我們這民族中，是極其偉大的紀念，是極其神聖的紀念，是極其悲壯的紀念。在紀念這三十年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來紀念它呢？

三十年的紀念，在我們這民族中，是極其偉大的紀念，是極其神聖的紀念，是極其悲壯的紀念。在紀念這三十年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來紀念它呢？

三十年的紀念，在我們這民族中，是極其偉大的紀念，是極其神聖的紀念，是極其悲壯的紀念。在紀念這三十年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來紀念它呢？

國慶為中華民國立國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多年始建中華民國，所以我們紀念國慶不能忘記國父，尤不能忘記國父的理想及其事業。國父的理想在於解救四萬五千萬生民，在於解放世界被壓迫民族，在於抗擊強權，帝國主義，善於加於我們的枷鎖，雖已掙脫，但應頭顱為瑞，還有待於革命同志及一般國民繼續努力，先烈鮮血未乾，國志不能健忘，我們尚須一和平奮鬥，教中國人勿負國父遺志，願與國人共勉之。

臺灣首度 夏歷

國慶紀念述感

國慶的回顧與前瞻 黃朝琴

抗戰既勝 建國必成
欣逢國慶 遍地歡聲
美哉臺灣 民族之英
張其民權 裕其民生
富強康樂 亦知光榮
用以慶祝 國之光榮

二十五年双十節
萬教恩題祝

回顧與希望

台灣光復皆已一年，自大體上言各種推進成績尚稱良好，自然值得我們慶祝、紀念。雖然「大戰之後必有荒年」，台灣也發生過數十年來未曾有的大颱風，減少了豐收不少，而此「荒年」又不只包含自然界，即如戰後復員的紊亂也應算上。但是台灣各方面情形，平心而論總算不惡。比之其他各省兵禍災連，哀黎遍地，則更值得慶祝。今年台灣紀念光復，且獲主席偕夫人蒞臨，台灣萬民得仰瞻尊儀，或且得以聲訴日本軍閥的壓迫、淪陷時期的苦楚，及現在生活的困難，又是榮幸中的榮幸。

不過，我們也不能以現狀為滿足而鬆懈了奮發建設新台灣的意志，各部門努力未夠的地方，我們必須加緊努力。具體言之，政治業已開始人民參議、參政，而此參議、參政是否已經健全合理發展？經濟已在依照民生主義推進中，而公營事業中有無不合經濟法則的情事？有無摻雜政治的阻力在其中？教育各機關均已接收接辦，而此接辦及施設，是否沒有不正確，沒有不合台灣實情的地方？社會也已向現代中華國民化的道路邁進，而此邁進是否受著某些原因所阻礙而致遲滯？凡此種種實情，都還需要我們嚴肅詳密的檢討，並研究、討論適當辦法來補救。而此補救辦法尤應多多領會陳長官指示放與守適度，可放則放的原則，政府要體貼人民，人民要協助政府，雙方都要尊重輿論。只就輿論一點言，政府固須多加尊重，人民的支持、擁護，和合理合法運用，尤要加倍熱誠，加倍出力，願各界共勉共勵！

學生深造的第一步

延平學院講演記錄

本社社長宋斐如氏本月六日應延平學院之請，赴該校講述《學生深造的第一步》，聞其內容指引學生深造之路至為正確，其分析舉例詳盡而恰合，其敘述深入而淺出，不但對於延平學院一處學生有大裨助，即對於全省乃至全國的大學一二年級學生，亦可為求學之指針。特請講者口述其大概，刊出以為大學師生之參考。

——編者

（前略）學生修完國民學校及中等學校，在現代國家裡，還不算成功了學業，而只完成充當一個國民應具常識的學習而已。由中等學校進入大學階段，才算學生深造的開始。你們在深造學問的初期，對於羅列在眼前的許多學科應係先有一番的認識，從這認識中去擇最適合自己興趣及特長的學科。此點可稱為「學生深造的第一步」，也就是學生選擇學科的準備。在志願深造學問的大學生，是很重要的。假使這個重要問題，沒有得到一個妥當的解決，則他的學習及做人，會浪費很多無謂的時間和精神。世界上，特別是在中國社會裡，時常聽到「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的話，就是這種浪費的指證。例如中國大文豪的魯迅（周樹人先生），起初是學海軍的，後來卻變成文學家、思想家。另一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和抗戰期間死於日人毒手的郁達夫先生，都是中國當代的文學家，他們都是畢業大學醫科的。再如現任行政院副院長翁文灝先生是學地質的，前任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是學礦學的，他們所用的，和他們所學的，都相差數千萬里之遠。假使他們所用的為他們所學的，相信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和精力而其效率也可特別高。即令在學

習期間中途改科系，亦要吃相當的虧。例如工學系本科三年生要轉文科，必須從一年級學起，文科生要轉醫學院也要從頭入第一學年。所以志願深造的學生，必須慎重這第一步。

選擇學科表面上雖很簡單，但事實上不是容易的事，要選擇不錯，必須認識正確。所以一個大學生在其深造的第一步，必費相當的苦心考慮深造的對象的問題，例如我個人，當北京大學預科修了時，對於將要升入的系別就費了相當的思慮，也曾請教過師長和朋友。最初想入經濟系，但緣臭錢味太重，整天以數目字為對手，以打算盤為工作，未免無聊。繼想入哲學系，又以哲學雖為各種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天文科學）的結論，但又嫌太過空洞，抽象不切實際，許多哲學家往往因為解決人生和宇宙的一個問題，花費一生還得不到結論，悲觀自殺的人也不少。法律系呢，太古板；政治系呢，根本就沒有獨特的課程。最後選學經濟系，以為它比較實際而有內容，但最後決定的經濟學對象，卻與最初決定者不同，而是包括政治、社會，及法律等部門的廣義經濟學，即所謂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選擇一種深造的對象，要從幾方面來考慮。第一要考慮自己的志趣，即志向與趣味。一個人想在這一生做些什麼事，什麼事業對於自己感覺有趣，也須在這時期考慮清楚。凡事「有志事竟成」，志向是作事成事的前提。作一件事若感覺乾燥乏味，則如機械人生活，事也不能做得好。第二要考慮自己特長和個性。要深沉寡言的人，去當外交家、交際家，一定辦不好外交；要浮躁輕俏的人，去研究哲學，人生社會就會變成花花世界；要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去當兵，要膽怯心細的人去衝鋒陷陣，一定打敗仗；要雄赳赳、殺氣騰騰的人去講人道主義，慈善事業，結果是要唬死饑餓線上的人們。第三還要考慮未來的勞力市場，及一國一地方的情勢。「學以致用」，究竟是個原則，沒有不為致用而學的，雖說中國社會到處講人情，有人事關係會夤緣苟營的人，逢迎巴結走外線內線的

人，就是沒有學問也可以位高祿厚，根本就用不著學問。但是無論如何，主子總要有用的奴才；何況時代是在不斷改進中，無用或不適用的人，終會被淘汰。自己國家或地方未來所需要的人才，就成了選擇深造對象的條件。工礦業將要發展的地方，需要各理工礦業的人才，醫生滿山滿谷的地方，再學醫學就缺少出路。師資缺乏的時代，代用教員都被用為正式教員；會計制度需要成立的地方，粗通記帳的人，都可充會計師。所以未來市場也為學生深造時考慮的焦點，「學校需要」或「需要為學習之母」，即此之謂。

先仔細考慮內外的條件，即本身的志趣和特長，時勢和環境，然後決定深造的對象，大體上可不致大錯。但是趣味和志向有時會變化，最初認為最合適的學科，到實地學習時或應用時，有時也會和初志相違反。例如志趣淡薄的人深認當教員為清高單純的生活且受人尊敬，也可免去趨炎附勢卑恭獻媚的俗技，但一到生活在趕時間，吃墨粉，領平價布，買配給米，甚至請願發薪，索取欠津時，也會感到煩厭。所以不但要細思，並且要實地演習一下。又如想當一個政治家，以為治權可以支配一切，一道命令，可以左右全部人民的生命財產。但在民主時代，許多決定要經過幾層決議，要公開討論，公開民主的會場，有時彼此爭執，公婆各持一理，也是不易處理的事，尤其到中國民主方式與美國民主方式發生爭執時更難應付。所以想當政治家的人，可先試試自己有無兼收並從容應付而得公允的才能，學生可先自學生自治或研究討論的演習做起。再如病人的伺候，人身的解剖，化學室的實驗，礦山的粗污生活等等，都可以充當決定深造學問選擇上的準備工作。

然而離開內外條件的主觀選擇以外，更重要的，是就學問論學問的選擇智識，即是選擇學科的基本學識，更須先為準備，此點是深造學問的實在在的第一步。此點可分（A）科學的系統，及（B）各學科彼此的關係兩項來分析。

(A) 就科學系統言，哲學列為各種科學的前茅。學問是一元的，無論是自然科學，抑為人文科學，哲學的原則皆可適用。在哲學上可以求得科學方法論，本學院只有社會科學，可適用的即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正確的、科學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指示給學生以正確而捷近的路徑。求深造的學生，往往因為方法論的錯誤，弄到迂迴曲折，多費了很多時間與精神，才得到正確的結論，有時甚至得到錯誤的結論。這正如走路，走錯了方向或路線，弄到多耽誤時間，或終於到達不了目的地。哲學在各學科上，正如一本書的緒論，不可不先讀，讀了緒論，可以明白這本書的大概內容和所著重之點，就此線索去找讀者在本書上所應獲得的部份，讀之可事半功倍。大學者大讀書家博覽群書，不一定每頁每字都要讀完，其簡便方法也就是先讀緒論後，再選擇本論的要點讀之即達目的。所以哲學對於志願做大學問家的人，具有最大的吸引力。

其他各學科如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教育、歷史、心理等等，即可列為科學系統中的分論，但各科系之間皆有彼此相互的關係，如政治學系並無獨特的學課，不屬於經濟系的，即屬於法律系的。又如法律系的課程不獨限於條文，各種法律的來源是基本法的憲法，這又是政治系的範圍。對於這些分論，各人各有其不同的趣味和志向，可由各人的志趣去擇定，但其欲獲得分論部門的正確學問，必須先能應用正確的方法，所以和哲學皆有密切的關係，志願深造的學生須能滲透哲學上的正確方法論於各種學科，即科學的各種分論上。此點因為科學系統的要點，同時也為各學科彼此關係的要點之一。

(B) 各學科彼此的關係。若再就社會現象分析而言，則經濟學又為各科的基礎。一切社會現象的發生和變化，皆依存或決定於經濟關係，所以各科系的學問，也要以經濟學為基礎。例如政治動向要決定於經濟條件，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經濟組織，或可稱為生產關係，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不能否認私有財產權。即

法律言，其判定和運用，也要以經濟為條件。例如中國法律規定女性可以捉奸，治夫罪，但因妻的實際經濟力量，或更確言之，普遍的婦女經濟力量不穩固，致其法律的行使仍不能健全。各地禁娼之令雖經三發五申，而娼妓之風仍長，但卻無普遍的男娼出現，其原因在於經濟關係上。再如教育第一的課題，若社會經濟不獲得合理解決，教育自無法普及或提高。其他如衛生設備以至個人衛生，更有待於經濟條件。管子說過：「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廉耻」，這一代的大政治家並沒有輕視過經濟的力量。香港一島上，讀書知耻的列為上層，是有錢的商號；上海街及西環一帶的貧民，既無力讀書，也難顧到禮節體面。

總而言之，社會科學的任何部門，要獲得正確的認識和瞭解，必須以哲學上的正確科學方法論為出發點，而以正確的經濟學為基礎，運用正確的經濟眼光，和正確的科學方法，去瞭解一切的社會現象，政治動向，法律問題，乃至教育衛生興頹問題及其振作的方法，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但是這裡要保留一句話，就是經濟固為各種社會現象的基礎構造，但是上層構造也可以影響基層構造的經濟。例如民生主義要能用以解決中國的經濟建設問題，必須民權主義先得到合理正確的運用，以民權的確立，改正人事上的錯誤，使政治上的運用有效，而經濟上的施設才能合於民生主義的法則。民生主義的建設重點，在於公營事業能夠有效而經濟，其效果必須比民營為大，這正如大農經營之比较小農經營，忠誠科學的管理占最重要地位，這又大半為政治問題而非純經濟問題。再舉一例，現在上海等地的消費日漸美國化，吃的、穿的、住的，都用美國貨。美布壓倒中國紡紗廠，罐頭牛肉壓倒屠牛場，美國奶粉迫使上海乳牛無出路，美國活動房屋便宜而安適，一切民族工業遇到絕大的危機。這是在表面上好似是經濟的問題，但絕對不能以純經濟的方法求得解決，要保持民族工業命脈振興本國經濟，必須運用關稅保護政策或

彼此互利的合作方法，始可做到。這是外交的問題，當然也是政治的問題。社會的上層構造可以影響基層構造經濟，正如經濟學上生產關係本來左右或限制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到某程度時也可以突破生產關係的限制。不過，前者為原則，後者為變則；前者為常態，後者為變態。變態之發生，一般稱為革命，是求學上值得特加注意的。

原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導報》



如何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

有一天宴會席上，國語推行委員會何副主委容，大談其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的問題，稱「反對者均為陳文彬先生鎮壓下去，而宋副處長為第一個反對者。」何先生剛作了結論，主人即宣告結束宴會，故令聽者只相信何先生片面之詞，信以為是絕妙的結論了。然而今日的問題並不在於應否恢復，而在於如何恢復，負責推行國語的何先生，似應多注意此點，不必斤斤於哀訴和表功。

凡略通台灣事情和語言關係的人，相信應該沒有反對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的，何先生的主張雖曾遭《人民導報》來論之反對，但為何先生辯解、贊助的，何先生只知其為陳文彬先生而不知陳文彬先生之為導報之總主筆。所以何先生大聲疾呼宋副處長為反對的第一人，未免太「神經」，正如傳奇小說所載，紮好一個草人擬為某某對象而加以射殺，其用意如何雖不得而知，但未免太滑稽。

本人曾經口頭反對過，在國語文的兩邊，一面注國音，一面注台灣字音，而主張索性單注國音。其理由是：（一）國語文所注台灣字音並不是台灣話，如「不懂的地方」，台灣話應該是「不識的所在」（這還不正确，根本無法注出台灣話，正如廣東話一樣）。（二）台灣話也不統一，有閩南話，有客話，也有高山話，即在閩南話當中還有漳泉、南北部之別，如「念書」南部為「讀冊」，北部為「讀書」，且其「書」字音也各不同。（三）讀書記字在專不在分，分則亂而無效，故與其叫學習的人同時記兩種音，不如先記一種音，較容易記得，我們不能以語言學者的態度叫學習的人開始就跟我們學語言的比較。（四）據熟悉國音的台胞言，用國音不能精確注台灣話，我是外行人，也姑認為理由之一。

總之，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本人既未反對過，而重要點不在應否恢復的理論，而問題的重心，已進到如何恢復的具體辦法了。負責推行國語的何先生，諒也痛感及此。在國語文旁邊加注台灣話，是否可能、是否合理、能否辦得通？乃至如何恢復台灣話的具體辦法？我想熱心的外省語言專家，還該多與本省懂得國音的人交換意見，所以我提議國語推行委員會應多採用本省人，或閩南人，或熟悉台灣話的國音家。

現在普及國語的問題，已經進入新階段，即同時普及國文。吾人早經痛感到台胞的大多數將變成「文盲」的問題之嚴重，何先生也曾和本人痛切討論過。這個問題和我在重慶所想像的相差太多，當時我以為台灣一光復，台胞都有漢文根底，一下子就可以恢復我們的文字，殊不知經過最近十幾年日本政府嚴禁漢文與獎勵日語的結果，台胞大部分只知日語而不識漢文，甚而至只知日語的意思，不知漢字的意思，有很多人看漢字不懂意思，聽日語音始能瞭解漢字的意思，如日本人一樣，如一部分日人看報紙、雜誌然。現在禁止用日語日文（當然我是贊成的），許多台胞竟然變成了文盲，這可真危險。

所以現在問題已進到如何普及國文，救濟文盲的階段了。這裡我要提醒一件事，現在讀國音熱雖是很好，但要避免死讀音，不要再踏過去讀日語音的覆轍。必須使學習的人，知其音同時也知其義，才好。此點我又要多餘的提議推行國文的當局，多採用識漢字的台胞，或者先訓練一批台胞教員，由一而十，而百，而千，而萬。則問題就較易解決，目的也可達到。問題已十分嚴重，我所深切希望的，是具體解決的辦法，如何恢復台語的方言地位，如何推行國語文，請社會賢達專家參加討論！

原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人民導報》

本報創刊周年紀念感言

今天是中華民國三十六年開國紀念，同時也是本報創刊周年的紀念日，中華民國憲法也正於今日公布，在這數重紀念慶祝當中，使人不免感想紛紜。

我們知道中華民國開國以至制憲，是經過無限無限痛苦艱難，才有今日的成就。正如本報自誕生以來，也日在慘澹經營之中，以至今日，所以本報與國家是同一樣的遭遇與命運。

中華民國的開國有賴於先烈的奮鬥犧牲，所以我們對於先烈應共致崇高的景仰，而本報在辛苦維持辛蒙社會人士之肘助，故今日亦應向各方深致謝意。

憲法公布後，國家已是要進入憲政時期，而人民已是國家的主人，今後憲政的成績如何，須視人民的力量如何為斷。本報於此彌感職責之重大，因為報紙是人民的喉舌，民意之伸張，有輿論於輿論力量之加強，本報顧名思義，則所以為人民服務者，亦即為國家盡一分之貢獻。尤其是光復後的台灣，如何使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以配合憲政的開展，更是一件艱辛的工作。

台灣粗具的經濟規模和人民的守法精神，是為憲政之基礎，可是還須加緊溝通祖國文化積極推進政治訓練，這樣才能夠發揮巨大的人民力量，從事國家建設。回顧一年來，本報的工作，我們不敢自誇成就，只是站在人民的立場，為文化教育而努力，則可捫心無愧，今後更不容故步自封，當用力求進步。

時代的巨輪是在不斷推進之中，中華民國由軍閥專制進而為民主憲政，由被壓迫民族而躋於五強之列，今後前途方興未艾。本報由小型而擴版，由草創而長成，雖尚未達

成熟期，總在不斷生長之中。中國的建設有待於人民之奮鬥，本報之將來亦有同人之努力，一年之計在於春，同人當益自勉再接再厲，為民前鋒，所望各界，繼續愛護扶持，指導批評，則幸甚。

原載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人民導報》

如何推進台灣生產建設

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省訓團

對全體學員精神講話

今天韓教育長要兄弟到這裡來同諸位講幾句話，我想就把《如何推進台灣生產建設》這個問題來講一下。

台灣光復已經一年多了，在這一年中因為各單位都忙於接收工作，實際建設事業到現在才算開始。雖然自接收以來各種生產未曾停頓，但是產量還不夠多。所以維持消費的物資，一部分還要靠過去遺留下來的一些東西，今後就需要加強自力更生的工作。大家來努力生產，不然物資就會發生恐慌。今後台灣最大的問題，還是「生產建設」。擴大眼光來看，不但台灣是如此，就是全國各地也是同樣情形。我們試看現在國內各大市場無論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到處都充滿著美國的舶來品和罐頭食物以及烟酒等物品。譬如就上海來講，現在上海人民無論衣、食、住、行，沒有一件不靠外貨。穿的方面如布匹、衣料，甚至褲帶，都是美國的舶來品。吃的方面如麵粉、牛肉，甚至雞蛋、牛油，都是美國來的。美國的牛肉罐頭，比中國的鮮牛肉還要便宜，一般人都愛吃美國的牛肉罐頭。既可免起火麻煩，又不要用醬油，烹調非常利便。因此上海許多畜牧場大受影響，便紛紛停業了。住的方面現在流行一種流動房子，一輛卡車可以裝載一間房子的材料，而且房子的設備又很完美，客廳、食堂、浴室、廁所，樣樣都有，價錢又比普通房子便宜。這種房子，現在也在國內漸漸流行起來了。至於行的方面，到現在我們還不能大量的自製火車頭汽車交通工具，差不多都由美國運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外貨一

天天充斥到國內各市場上來，結果我國無形中變為人家的銷貨場。據近來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抗戰勝利後的一年來，入超數目非常驚人，這無異是我國每年要拿若干萬萬元給外國人一樣，如此我們可以想像洋貨傾銷的情形和民族工業的嚴重危機了。

再說到我國輸出物產，如茶葉，過去華茶在國際市場上都是很有地位的，現在茶葉外銷停滯，茶市受很大影響。其次如台灣的樟腦和蔗糖，因種種原因也無法和外貨競爭。就是說香烟，美國烟，比中國烟品質好，而且價錢便宜，許多人都歡喜抽美國香烟。比如現在台灣專賣局本地製造香烟，大家都不愛抽，這麼一來我國各種工廠因為不能和美國競爭，便紛紛倒閉，民族工業遭受了很大的打擊。這原因就是因為美國是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工業發達無計劃的生產，結果商品過剩；而中國又是個科學落後，產業不振的國家。所以美國貨拚命的向我國市場傾銷，吸收我們的經濟，這種危機我們如不加以挽救，全部民族工業，必至無法發展。國家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陳長官對這個問題非常注意。他想把台灣經濟復興起來，以減少外貨的輸入，所以定明年為「生產年」，集中各方面的力量來從事生產建設。比如工業方面，明年在台灣無論任何工廠都要使它開工，使生產增加。大部分的工業都由政府來合理的經營，希望能配合全國所需要的而從事生產，不需的暫時停止，需要的把它加強充實起來，使今後一切日用品能自給自足不靠外來的洋貨。同時如果各工廠都開工了，許多人都有工做也可以減少社會因失業而起的恐慌。在農業方面使所有土地能發生效用，無論山地、森林地都使它儘量發揮生產力。過去台灣土地多集中在大地主手裡，許多小農在大地主剝削之下，不能充分發揮生產力，影響農業生產很大。自明年起第一步要合理的分配土地，依照國父遺教「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去做。凡是有力耕種的，都配給他一塊田去耕作，普通一家配與二甲到四甲耕地；但無能力耕地者，想經手他人坐享其成的便不配給土地，這是很合理的辦法。但是我們要知道「耕者有其田」的意思，不是給與土地所有權而是

給予土地使用權，目的在使大家有田耕，有飯吃。現在第一步工作是土地調查，這種工作現在已經開始進行了。定明年一月起實行土地分配，我想今後台灣農產一定可以增加，農產增加了，食米的問題就可以解決。台灣原是產米之區，一年豐收可供三年三食，我們可以把剩餘的米向外換取其他需要的物品，不必付現金。比如以台灣的米，運到國內華中、華北，去換取棉花，這是最好的辦法。此外如台灣的水果和蔗糖，除本省消用外，還可以運往國內各地銷售或去外國換取其他各種必需的機器來開發本省各種工業，如此我想今後本省工業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我們既然定明年為生產年，但為充實生產起見，最要緊的是人才問題。諸位雖不是技術人員但都與建設工作有關係，所謂建設問題，並不是單指工業或農業而言的，而是需要其他各部門互相配合的。譬如我們明年注重生產工作，我們就不能因為注重生產而把教育工作停頓下來。如果教育辦不好，生產工作也就無法推進，因為生產人才就要靠學校培養出來，所以教育也不能離開生產。明年本省教育中心為加強職業教育，如農業職業學校及工業職業學校，都要重新調整與生產相配合，工業學校要有工場，給學生實地練習，農業學校要配給農場，給學生自己去耕種不像過去只注重書本上的理論，而不切實際。這是單指教育一項來說，其他如民政財政、交通……等等，都與生產相配合，然後才能促進生產的效率。總之希望大家要認清目前國家經濟的危機，今後應如何努力去從事生產工作。把台灣建設起來，為全國各省的模範，那末本省前途才有發展的希望。本省能夠建設起來，此後再以我們的力量幫助整個國家的建設。諸位包括很多方面的人才，所負使命和責任非常重大，希望深切瞭解目前嚴重的危機，認清各自努力的方向，群策群力，以底於成。

台灣心理建設問題

三十六年二月八日對
青年團幹部訓練班學員演講

昨天接到韓教育長的通知，要我到這裡來和各位談一個問題，他給我的題目是「心理建設問題」。俗語說「一人主張，不如二人商量」，我想這個問題還是大家共同來討論，才有意義。因為世界上沒有永久絕對的真理，只能說比較近於真理，所以對於一個問題，愈研究就會愈近於真理。諸位平日對於任何一個問題，腦子裡先要有疑問，有了疑問，然後才會去研究，否則「人云亦云」，盲目的附和，是毫無意義的。尤其是現在是民主時代，大家都是國家的主人，做主人應當對國家的情形要有深刻的瞭解。過去專制時代，是君主的統治，「統治者」對「被統治者」是採用愚民政策，即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現在是要使人民知道政治的道理，同時來管理政治，然後，才能發生人民的偉大力量。

陳長官常常說「公務員是人民的公僕」，公務員既然是人民的公僕，應該為人民去做事。如果人民自己沒有主意，公務員又不知道告訴他們如何去辦？那末民主政治就不會實現了。所以做一個民主時代的國民，要認清時代的要求，知道做主人的道理才好，這是我要談這個問題的原因。

講到「心理建設」，因為我們所處的地方不同，我想應加上「台灣」兩個字。因為在台灣談心理建設，和內地各省又有不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台灣過去五十年是在日人統治之下，在這五十年中，日人對台灣都是採用離間民族的毒辣政策，就是把台灣

一切和祖國隔離開來，不但地方隔絕了，就是對人民思想、文化，和祖國都斷絕了關係。所以在日人的教科書中，中國地理只講到很簡單的一小部分，而且還加上許多曲解蓄意挑撥離間，比如對中國稱「支那」，這就是含有蔑視的意思。又叫中國為「大陸」，「大陸」兩字的意思，明明是說中國不是一個「國家」，乃是一個區域，無意中否認了中國有國家的存在。還有，日本人平日提到中國問題，總是說中國遍地土匪，人民多抽鴉片、賭錢等等不好聽的話。固然中國地大人多，難免小部分有這種現象，但要知道世界任何國家都不免有這種現象的。記得我在東京時，日本人常常問我：「中國有汽車嗎？有自動車嗎？」我回答他們說：「請你們到中國去玩玩好啦」，他們又說：「中國不是遍地皆土匪強盜嗎？」這完全是日本政府平日對人民惡意宣傳的結果。所以一般人民都受了欺騙，以致對中國印象不好。我在過去沒有到過內地時，也有同樣的感覺，後來到了北平，見到北平是個多麼美麗的都城！從此才知道日人所講的不是事實，而是欺騙我們的。因此，我們要把過去錯誤的觀念改變過來才好，這就要談到心理建設的問題了。

然而心理建設應當怎樣去做呢？照總理遺教所說「造成一個民族的原因，是血統和言語、風俗、習慣」。先要每個國民知道四萬萬七千萬人原是同為一家，要由家族擴充到宗族，再由宗族擴大到種族，由種族擴大到國族，然後結成一個國族的「大團體」。比如講台胞血統，誰也知道不是日人的血統，強然台灣受過日人五十年的統治，相信我們血統是沒有變化的，台胞的自尊心又很高，即使有台女與日人通婚，也是很少數。可以說台胞血統純粹是中華民族的血統，回想過去兩三百年前，台胞是從福建的漳泉、廣東的潮汕各地遷到這地來的，任你日人如何宣傳，如何改換台胞姓名，如何用種種方法想把台胞同化，結果終是沒有有效的。古人有一句話說「血濃於水」，這就是說不同性質的東西，沒有辦法化合起來。同樣道理，一個種族的差異，也是沒有辦法變成一樣的。我們試看過去日人配給物品，總是日本人民自己配給夠了，然後才配給台胞，這就是很

顯明的差別了。所以總理說「血統是造成一個民族的原因」，這是很合理的。

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以後，更要知道我們國家幾千年來的歷史，尤其是近五十年來歷史的演變。中國近五十年來的變化很多，雖然進步慢，但總是繼續不斷在進步中。比如就政治來講，滿清末葉政治腐敗，造成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後，又形成軍閥割據，後來國民革命軍起來打倒軍閥，掃除國內革命障礙，由軍政府時期進到訓政時期，再由訓政時期到憲政時期。現在憲法公布了，這樣看來，中國政治是不斷的進步，軍閥時代比滿清腐敗政治是進步了，國民革命時期比軍閥時代又進步了，現在是憲政時期相信將來更會進步的。這幾十年來連續不斷進步的歷史，日本人多加以曲解，不給台灣同胞知道，所以我們不但要知道祖國的歷史（特別是近五十年變演的歷史），同時更要知道中國地理的國際情形。日人抹殺中國稱中國為「大陸」，其實中國地廣人多，資源豐富，與日本比較，是目前更多立國的條件的。中國是個資源豐富很有前途的國家，就以資源來講，日本輕重工業的原料都很缺乏，土地也只有本州、九州、四國，普遍稱為三島（北海道是後來開拓的），人口（朝鮮、台灣除外）也不過七千萬人。所以日本這個國家，是先天下不足資源缺乏的，只有向外掠奪一途。先前侵占我國東三省，以後又發動七·七事變，想侵吞整個中國，結果自食其果，遭受空前的慘敗。這些情形下不但諸位要瞭解，同時要使台胞大家都能瞭解。我在內地二十五年走遍各地，各地方都住上半年載，為的是做解放台胞的工作。在學生時代曾經組織「東方問題研究會」，聯合東方被壓迫民族如印度、安南、緬甸、馬來亞，以及朝鮮、台灣等地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那時就注意到台灣心理建設的問題，討論將來對台灣心理建設該怎樣做，在光復以前我常常對內地同胞說「台灣心理建設如果做不好，對一切的建設必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在重慶發動台灣光復宣傳時，深得各界熱烈稱讚，《新民報》發表一篇社論，題目為《歡迎台胞內向》，這一個問題也可以說是台灣心理建設的問題。我們很客觀的講，台胞內向

原沒問題，在光復初期，台胞那種熱烈歡迎的情緒，是內地各處所沒有的現象，這就是台胞內向心理的表現，以後這種情緒又漸漸冷淡下來了，今後應該如何加強這種內向的心理，就要靠我們大家來努力了。

在光復初期，台胞歡迎祖國情緒很高漲，大家心理都以為光復後「台灣便會變成天堂了」，這是一種錯誤的思想。要知道民主時代是要人民自己來管理政治，絕沒有天上派天使下來為人民製造樂園給人民來享福。比如說，我們有一個花園，要在花園裡長出美麗的花樹，必須要自己努力去耕種，下一番拔草、澆水、除蟲的功夫。同樣道理，台灣的建設也要一般人民自己來努力，這並不是看輕了政府的官吏，無論官吏或人民只要是為社會造福，為人民服務，都是一樣的重要而可尊敬。為著整理花園、除蟲拔草的工作，當然歡迎大家一齊來參加。倘使有人來攀折花木，或把害蟲放入花園裡來，把花樹踏蹋了，那末我們就毫不客氣的反對他。然而中心工作還是在我們自己努力，決不能存有絲毫依賴的心理。

再講起頭到日人時代與光復的不同，日人的教育是嚴厲的統制，他們的目的是要把每一個國民都變成天皇的順民，「接受政府的命令」。自小學至中學以及大學，都是施行軍國民的教育，不使學生瞭解世界進步的思想、學說，好的書籍都在禁止之列。在日人本許多前進的作家、思想家都被拘捕死在監牢裡，好像日本小說家小林喜三郎，因為介紹新思想潮，便被日本政府拘捕入獄，施用毒刑而死了。還有河上肇（世界有名教授），亦因思想問題，被日本政府判處重刑。其他各種思想家和學者，被毒害的很多。對台灣更加厲害了。外面的事情一點不給台胞知道，幾乎把台灣和外地隔絕起來，另外立一個世界。談到教育，國民小學教育雖很普遍，中等學校就加限制，至專科大學的學生，多是日人。談到工作，在台灣文化學術及政治工作，日人是不願給，台胞多充任苦工和下級職員，因此台灣五十年來文化，造成畸形的發展，就是有少數台胞僥倖得受高等教育，

也是偏重醫科方面，學文法科的很少，其間有一兩個讀文法科的學生，畢業出來，也沒有使用所學的機會，結果還是去做生意或經營小工學。在這種情形之下，台灣文化學術無疑的變成停滯的狀態，完全是日本人統治的害處。

總之，在日本時代我們形式上是侷限於一個小島上，精神上也無法得自由發展，今天大家都做了中華民國的國民，不但活動舞台擴大了，並且帶上了國際性。我們的教育是國民主義的教育，大家如有才能，盡可充分發揮，學術上盡可自由研究，今後有才能的可儘量受高等教育，造成專門人才。我國有名的大學很多，如北京大學，在世界上很有聲名，這原因就是因為當時校長蔡元培先生，廣大包容，提倡學術自由研究的風氣，聘請世界各國學者教授來講學，不論何種思想，不論什麼黨派，共產主義者也好、社會主義社會者，無政府主義者也好，國家主義者也好，只要對學術界有貢獻的，都聘來擔任教授，如蘇聯盲詩人愛羅先珂，美國教育家杜威、羅素，都是當時北大的名教授，因此北大造就了許多人才。現在北大的學生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現，對國家也有很大的貢獻，這完全是廣大包容的功効。回想台胞在日人五十年嚴厲壓制之下，學術思想是怎樣的一種情形？現在光復了，從此大家可以自由發展才能，多多貢獻於國家社會，這是和日本時代絕不相同的，希望大家要徹底的瞭解，還要灌注給一般台胞。

台灣最危險的現象就是大多數人悲觀失望的心理，要知道這是一種消極的表現，這事實毫無裨益的，比如栽花、植樹，一旦花樹發生了病蟲害，就消極起來，而不想法來改良，是不對的。我們必須加緊工作，積極地想辦法，把害蟲除去，把花園整理好，不讓花園荒蕪下去，因為花園是自己的，就要自己來耕耘，歡迎好人來耕耘，不論本家人外邊人，如果自己不知努力。專靠別人耕種，想坐享其成，那就永遠沒有希望了。我們再來檢討過去日本時代有好的習慣，也有壞的現象，好的應當把它保留、壞的務思把

他革除。好像過去的守法、守秩序、愛清潔，這都是很好的習慣。可是現在不同了，你看太平町街上的行人多麼紛亂，一般人不知愛清潔。尤其在近來學生鬧風潮日甚一日（學潮之起固然也有原因，但絕不能只管鬧不想法子整頓），如此下去，好的沒有保留，壞的逐漸增加，那末台灣前途是多麼危險呢！再就語文來講，做一個中國人，應當知道中國語文，過去學好的日文，當然也要保留，因為文字是學術的鑰匙，用在學術上，是可以的，然而大家平日講話，偏偏不用國語或台語，愛用日語，這也是一種不適合時宜的習慣。

總之擺在目前的種種心理上的缺點很多，值得大家來檢討而加以改正，希望今後我們不要盲目歡喜，或過度悲哀，要儘量發揮自動、自覺、自治、自立的精神才好。台灣的青年團工作，在李友邦先生領導下做得很有成績，李先生一向是苦幹、實幹的人，不悲觀，不消極的，你們將來擔任團務幹部工作，很可效法他的精神，建設起來全台灣的正確心理，台灣建設才有希望，才有前途。

原載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三日《人民導報》

第三輯

日本軍事外交



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

一、帝國主義戰爭的俗論

日本帝國主義的武斷派對東北的軍事暴行，震撼了全世界，它自九·一八占領瀋陽以後，幾乎循著直線狀的發展，看看向南北猛進，占城掠地，殺戮奸淫，為所欲為。現在，居然藉口於國聯所授於的所謂「剿匪權」之行使，並認「中國軍隊即土匪」，而派遣數萬重兵，於七日攻陷了中國方面在東北所保持的最後營壘的錦州。日本帝國主義者這種橫行，自時間上說，已將及四個月之久；自性質上說，它曾經蔑視了許多的強國和公約，簡直是目無世界，實與歐戰爆發前德帝的 *might is right*（強權即正義）的氣概無異。

日本帝國主義這次將近四個月的橫行，的確震撼了全世界人類的耳鼓。在這長期間各國陰險的外交家，雖然對於這種無可原諒的事件的態度曾經幾度奇突的變化，關於這次事件的處置曾經排演過不可捉摸的妙劇，但是各國人民腦筋的緊張，依然沒有一刻鬆弛過。各人腦筋裡所烙印的深刻的觀念，依然是「日本帝國主義破壞了遠東和平的局面」。人們因為過度的驚駭，腦筋受到奇突的震撼，遂感覺世界風雲將因此驟然大作。他們直視日本帝國主義此次的暴行，為塞爾維暴民之殺奧國皇子及皇妃，直認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為一九一四的六·二八。在一般人看來，似乎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迫至眉睫了，因為促它爆發的導火線已經燃著了。尤其自日本攻陷錦州，英美法協議採取什麼進一步的一致行動，意國並且要求加入的消息傳來以後，一般人們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立即爆發的自信，越發堅固。

然而我們對於這種論調，不敢完全置信。世界第二次大戰，果能爆發在這時候嗎？英美法等帝國主義者，果能因為帝國主義夥伴的日本侵略了東三省，而驟然向之宣戰嗎？現在，世界的情狀如何？世界一般的經濟情狀如何？由經濟關係反映出來的世界政治現勢如何？英美法等帝國主義者本國的情狀又是如何？這些事情對於本問題的決定，實是重要的因素。尤有更重要的先決因素，英美法等帝國主義與東三省的關係如何？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和日本夥伴，有無共同的敵人？其間的關係又是怎樣？在未深切考究過這些種種問題以前，遽即斷定帝國主義間的火併——帝國主義戰爭，有立刻爆發的可能性，我們實在不敢相信，不敢共鳴。這種論調未免過於通俗；我們對於這種俗論，只能以批判的態度來作一番的考究。

二、帝國主義戰爭論的根據

一般人皆謂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暴行，已經點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戰爭——的導火線了，所以帝國主義戰爭之爆發已經迫至眉睫了。但是他們究何所據而云然？我們即欲以批判的態度來考究這個問題，我們應先追究他們立論的根據。

- 帝國主義戰爭論的根據，固然非常複雜而虛渺，但是歸納起來，約有下列三種論據：
1. 道義上的論據；
 2. 法律上的論據；
 3. 利害關係上的論據。

(一) 道義上的論據

當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瀋陽的當時，一部分帝國主義戰爭論者，或許以道學先生的

眼光來觀察，驚訝而相告說：不得了！時勢變了！暴日竟敢無視「公理」和「人類的幸福」，擅自侵占他國的領土，肆行無忌。這種無視「公理」，破壞「和平」的暴行，其他的列強必不能輕易放過，必不能聽其肆意橫行，必能根據「公理」、「正義」採取有效地制裁辦法。尤其是對中國賣弄保護善意而倡締華盛頓九國條約，又是暴日的世仇的美國，必定出來主持「公道」，加以更有效的制裁，他方面，具有充分決心的暴日，亦必不能輕易接受任何方面的善意（？）的勸告，而提出駁覆。於是，帝國主義間的直接衝突和抵觸，乃臻於成熟，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無疑。這完全是根據「道義」和「公理」以證明列強必將對日加以有效的制裁而帝國主義戰爭爆發的論調，是屬於第一種論據者。

然而這種論據靠得住嗎？帝國主義者果能單為「公理」及「正義」的道義上的感動而輕易開啟戰端嗎？帝國主義者能單為別個帝國主義夥伴之侵略他國而輕易花費金錢，犧牲人命，以對之開戰嗎？我們若就帝國主義者的本質就是侵占人國，榨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點，及帝國主義者的慣技就是「趁火打劫」，帝國主義的本性就是「幸災樂禍」之點，略加考究，上述道義上的帝國主義戰爭論的根據，然不難加以一個「否」的斷定。

否定上列論據的事實，在過去的事例中，也不難找出證據來。歐洲大戰中，日本帝國主義者曾經「趁火打劫」，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一九二三年意大利侵略希臘的哥浦島時，帝國主義集團的國際聯盟，未曾加以半句的異議。這些事例都在證明：希望英美法等帝國主義者單為道義上的原因而制裁日本，實是靠不住的。再進一步想，當此世界一般的經濟恐慌無微不至、無孔不入的年頭，那一個處在沒落第三期的帝國主義，不想在產業落後的中國，尋覓一劑「續命湯」呢？懷此抱負的其他帝國主義者，現在若對此次日本的侵略加以道義上的制裁，豈不是設法自制？「自繩自縛」嗎？這樣一來，豈不是斷絕了他們將來同樣侵略的泉源嗎？怎樣傻瓜的帝國主義者，也不會出於這種舉動！

同時，怎樣戴著道學先生的眼鏡的論者，也應該不犯這種無稽的錯覺！固然，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東北的期間，其他的帝國主義者曾經作過「微小」、「脆弱」的不平鳴；但是這種不平鳴，並非出於道義上的責任，並且它的本身是有極限的。只要日本的暴行不擴大至東北的範圍之外，不侵及其他帝國主義者的所謂「權益範圍」，這種不平鳴就必始終殘留為不平鳴而已。帝國主義戰爭從何而爆發？

(二) 法律上的論據

帝國主義戰爭的第二種論據，就是法律上的論據。可以適用來制止日本在東北的暴行而致引起帝國主義戰爭的法律之中，最具體而且應該有效的，約有三種：其一為非戰公約；其二為華盛頓九國條約；其三為國際聯盟的約章。當暴日占領瀋陽的當時，世界一部分人士，尤其是公法學者及國際條約大家，莫不皆以日本在東北的行動為實質的戰爭，侵占中國的領土，破壞了國聯的盟約，而斷定這些公約的關係國必將共起而採用有效的制裁辦法，假若暴日不聽，終必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無疑。他們的根據就是上引三種公約的規定。蓋因非戰公約的意旨，在於絕對禁止任何種類的國際戰爭，即使國與國之間發生了糾紛也應以和平的手段解決之，絕對不能開啟戰端；各條約國倘不遵守此旨，則其他條約國皆認其為公敵而加以有效的制裁。國際聯盟的約章也有類似而更具體的規定。其第十條規定：

「聯盟會員國應擔任尊重並保持各聯盟會員國領土的完整和現存政治之獨立，以防禦外國之侵犯：如遇此種侵犯或此種侵犯的任何威脅及危險時，理事會應籌劃履行此種義務的適當辦法。」

第十六條又規定：

「聯盟國中倘有任何一國，漠視本約章第十二、十三、十五各條的規定而

徑向他一聯盟國開戰，則該國當被認為即與其他聯盟國全體挑釁，其他聯盟國全體應即截斷與該國之商務及財政的關係；……凡遇此事件，理事會應盡其職，陳述意見，通告有關係之各政府，使聯盟國得以派遣任何有效的陸海軍，以保護聯盟約章……」又華盛頓九國條約的規定，對於中國領土及主權的保護，猶其具體而周至。其第一條規定：「除中國而外各締約國協定原則如下：一、當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二、當給與中國以最完全及無障礙的機會，俾中國得以自行發展，並維持一有力而鞏固的政府。」

根據上述各條文的規定，其他列強對於暴日此次的行動，實有充分理由可加以有效的制裁。日本在東北的軍事行動實質上是向中國開戰，違犯了非戰公約的規定。所以非戰公約的締約國可以視之為公敵，共同向它作戰。它的行動破壞了聯盟約章所規定的「各聯盟會員國領土的完整和現存政治之獨立」，而且是「徑向他一聯盟國開戰」，所以主要聯盟會員國的英法等帝國主義應視日本為「即與其他聯盟國全體挑釁」，「聯盟國得以派遣任何有效的陸海軍，以保護聯盟約章……」這樣一來，遠東的局勢立可風波大作，風雲驟變，帝國主義戰爭真有一觸即發的危險。再自華盛頓九國條約的規定言，日本也違反了該約第一條規定，破壞了「中國主權之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並且妨礙中國的「自行發展」的機會及擾亂中國「鞏固的政府」，所以其他八國可以採取有效的辦法，制止日本的暴行，不聽則以武力對付之。於是遠東的風雲也有立即掀起而帝國主義戰爭爆發的可能性。

然而事實並不如是之單純。條文的規定自規定，有效的制裁自制裁。實際上，各種條約的規定，徒成了具文。並且，暴日可以捏造事實，利用條文的解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只要日本是個強國，又在无害及其他強國的權益的範圍內行動，則無論怎樣鬧得天翻地覆，任何種的法律都不能奈何它！事實上，日本豈非顛倒事實，混淆是非了嗎？

它竟悍然否定侵略而代以「自衛」，否認破壞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而以「實現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餌其他帝國主義者。其他列強會有什麼辦法奈何它？！

老實不客氣地說，非戰公約只是帝國主義者為防止他們自身的帝國主義戰爭，以期暫時的安定而締約的，所以強者對弱者的戰爭當然不受該公約的拘束。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者共同壓迫及榨取弱小民族或被壓迫民族的總機關，任何帝國主義者只要不侵害其他帝國主義的權益，則怎樣任意蹂躪被壓迫者，總不至受到若何制裁。又華盛頓九國條約之為中國保全領土及主權，用意並非真正有愛於中國，無非是防止在華權益之獨占而欲由列強均霑的勾當而已。同條約第一條在規定不妨礙中國主權獨立及自由發展之後，即附以(3)當協力維持並確立各國人民在中國全境的工商業機會均等及門戶開放。(4)各協約國當自行抑制，不得利用中國情勢以謀取特殊權利。第四條尤有具體的規定：「各協約國協定，不得於中國境內的特定部分，設立任何勢力範圍，或規定享受彼此獨有的機會。」於此，日本只要暫時能抑住名義上的統治權而只攫取實質的經濟權，且在互相諒解之下，默認其他強國在中國別部分享受同種特殊權利，再能允許他國在東北的多少利益，則其橫行當不至受到任何阻礙。帝國主義戰爭不知道從何方面發生？！

據以上的剖述，帝國主義戰爭之不能發生於法律的拘束，尤其不能發生於東北事件震撼中的現在，可以無庸我們更詳盡的贅述了。

(三) 利害關係上的論據

帝國主義戰爭立即爆發的第三種論據，就是英、美、法、法等帝國主義者在東北的利害衝突。歐美各國拜上次歐洲大戰之賜，經濟上陷於萎靡的狀態，一般人民的購買力大為減退，歐戰前在歐洲大肆活躍的商業資本和工業製品，竟碰到「此路不通」的高牆。自經一九三〇年世界一般的大恐慌以來，這種高牆尤其高築起來。於是，歐美的商業資本

及工業品，就如水之下般，極自然地轉向東方流注，尤其企望以中國市場為尾閘。這種流注的情勢，近年來且漸由長江一帶，直向東北澎湃，各國商品在東北的活躍，及各國大商人在東北的勾心鬥角，已有非常顯明的徵象。這種徵象及其愈益進展的情勢，就是促使自付「質劣難與角逐」的日本毅然出以武斷行動的主因之一（參閱本專號《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換言之，日本欲借武力阻止其他列強的資本及商品在東北優勢的發展。這樣一來，日本的確可以阻止東北交通委員會對美英直接的購買，奪取該二國在東北的大部分銷路。這自表面上看來，實在是日本與英美等國直接的利害衝突。再者，日本果真侵占了東三省，則其在太平洋上的勢力可以加倍，而如顧維鈞所言，「太平洋的情勢失去均衡」，在太平洋上與日本鼎足而立的英美，當然不寒而慄。這是間接的利害衝突。

由於這些直接間接的利害衝突，一般人遂下斷定說：英美法等國必不能坐視日本之膨大，更不容忍日本侵食其優勢的發展，他們必定起而阻止日本在東北的橫行，以保持他們在該地方的利益，相持不下，最後只有一戰決個勝負，所以帝國主義戰爭將因此次的東北事件而爆發無疑。

但是這種論斷仍未可盡信。日本此次的暴行，誠然和英美法等國發生利害關係的衝突，但是此種衝突的性質非常的複雜，不能只以表面的情狀來決定內部的實質。英美法各國在東北所要求的，是些什麼？日本與這些國家在東北利害衝突的性質如何？這種衝突果如一般人所臆想的那麼嚴重嗎？或者，這種衝突有無相抵銷的可能？即使這種衝突非常嚴重，且無可抵銷的可能，我們還須問問英美法各國本部能容他們因為在東北和本利害衝突的單純理由而即開戰？這些種問題都是我們決定帝國主義戰爭目下有無可能性者所應加考究的，這些問題實在不是三言兩語所可道盡的。至少，也應分作(1)列強在東北的利害關係及(2)列強本國現在的情勢兩方面來考究。詳細的剖述俟諸下節的檢討。

然而，我們先提前下個斷言：帝國主義在東北的利害衝突，目下尚不足以構成帝國

主義戰爭；帝國主義各國的現勢，尚不容他們單為東北事件而驟啟戰端。

三、列強在東北的利害關係

且先自英美德法等國在東北利害的情勢談起。

究竟英美德法現在在東北利害的性質如何？我們不能不先加以研究。數百年來即以「日不落國」的豪語誇耀於世界的英國，沒有耗費心力再來擴充領土的野心，是可以斷言的。尤其是在他那「強國的弱點」完全暴露出來的今日，他更無心於領土的擴充。各自治領及印度等地的要求獨立，及因此發生的叛亂，對於老大的英國，的確已經是一種煩悶。現在英國所要求的，只是商業資本和工業成品的銷路。他所要求於東北者，當然也不過如此。

美國如何？美國自身擁有廣大的資源供給地和眾多的生產生力軍。他本來就是一個大量生產的國家。在歐戰前後，他的商品大部分輸向歐洲，歐洲大陸儼然是他的好主顧。不幸歐洲各國受到歐戰的影響，購買力大為減退，一九三〇年恐慌後，這種減退尤其顯著。於是，美國不能不轉移目光，向東方來尋覓商品的銷納場。美國現在所需要的，只是這種商品的銷納場。而年來社會上比較安定的東北，就自然而然地中選了。質言之，美國現在所要求於東北者，也不過是商業資本和工業成品的銷路。美國之疾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更可以具體證明。

他如法意在太平洋上既無多大的勢力，事實上且難兼顧，他們不敢問津於遠東，並無侵佔領土的野心，可無庸言。經過歐戰後百孔千瘡本身危在旦夕的德國，不敢對於東北的領土「作非非想」，也是極自然的結論。充其量，也只有法德二國希冀在東北沾染些少貿易上的利益吧了。

總括一句話說，英美德各國在東北的利害關係，不是主權，也不是領土，只是貿易上的利益而已。

我們既然究明英美德各國在東北利害關係的性質，那末，且來檢討這種利害和日本在本地利害的性質之異同，以斷定二者是否衝突，或衝突的程度如何？

英美德各國所要求於東北的，雖只限於貿易上的利益，而日本則大異其趣。日本不但希冀東北可充其資本和商品的市場，並且希望由東北獲得他本國所缺乏的一切資源——生產原料。此外，日本的食物問題也希望在東北求得解決；日本國內及朝鮮擁擠的人口，也希望在東北覓得出口……英美德各國在東北的利害，除了貿易和投資一點而外，皆未與日本的利害關係相衝突。

我們若再進一步，來就日本和英美德等國在東北的貿易內容加以檢討，這個唯一的衝突，尚且可以減低至非常微小的程度。

且先自量的方面，檢點各國東北貿易的重要程度。且將本題討論上有關的各國，近年在東北貿易的情況，列表於下：

全滿輸入貿易的國別表（單位千海關兩）

順位	年份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八年
第一位	日二九，七七五	日六九，四五二	日六七，八六九	日一〇九，一六五
第二位	俄二一，三四六	美一一，〇五五	美一六，五九八	俄二八，一九二
第三位	韓三，四三一	韓七，一〇二	俄九，四二三	美一九，六二七

（續下表）

第四位	美二，五〇三	俄五，四九三	俄九，四二三	韓一三，六三一
第五位	香港二，〇八〇	香港四，六四〇	香港五，四九六	香港一〇，九四八
第六位	英二，〇八一	坎一，一〇七	英二，九五二	德八，八一六
第七位	德一，九〇五	英七五五	德二，四九八	英六，六四七
第八位	印五五八	印二五四	印一，三九九	
第九位		澳洲一〇一		

本表編自《滿蒙事情十六講》一八四至一八五頁。

自本問題的觀點上應注意東北的輸入貿易，故只列輸入表。

根係上表，可知英美德在東北的貿易地位不及日本多多，法國的奢侈品尤其絕迹於東北。一九一三年，在英美德四國之間占最高位的美國，自全體貿易國言，不過占第四位，其輸出貿易量不及第一位的日本十分之一，且在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之下；英本國占第六位，德占第七位。日本若與朝鮮合算，他的輸出貿易量，當數十倍於英美德本國及殖民地。一九一八年，美國雖升至第二位，但其數額尚不及日本六分之一；一九二三年，沒有多大的變化；一九二八年，一方面為俄國駕而上之，他方面日本急激增加，美國的貿易量更加相形見劣了。其他各國更無甚可說的重要地位和進展。

現在，自質的方面來考察英美法等國輸向東北的商品。據《滿蒙事情十六講》一八七頁及一八八頁南滿輸入重要商品國別表（一九二八年）所列，英法輸向東北的重要製品，是機器類、車輛類、石油、烟草類及棉織物毛織物。再據東亞經濟調查局所編《列

強在中國及東三省的市場爭奪戰和外商在華的活動》一文（讀文載《新北方》第二卷第四期），我們可以得一更具體的解釋。該文關於美國在東北的貿易載：「東北交通委員會對美直通短波無線電台的建設計劃中，也曾決定購買美國的無線電器，更有對瀋陽的電車、電燈的擴張及水道的設備計劃之投資運動……」……慎昌洋行……專司出賣電氣機器及其他機器類和藥品染料等。……美孚洋行大抵專賣石油、洋臘及其他油類；……公懋洋行賣機器、金器、自動車（汽車）及其附屬品；開洛及壽寧各公司賣金器、自動車附屬品及機器建築材料等；馬克敦工程建築公司，包辦各種工事及電氣機器類；泰昌洋行也為發賣機器建築材料而奔走……」總括言之，美國在東北活動的商品，是汽車、機器、建築材料等生產工具及石油。又關於英國在東北的商品活動，有如下一段：「……在此英商中，最主要者有怡和有限公司（各種機器、電氣材料、機關車）與兵工廠，交通委員會，瀋海及北寧鐵路等都有連絡；安利洋行、仁記洋行（均為金屬器具及一般輸出入品商）與東北大學及兵工廠有關係；老晉隆洋行（金屬品、保險箱、保險雜貨）與交通委員會及兵工廠也有關係……」質言之，英國在東北推銷並希望推銷的貨色，也幾乎同樣限於機器、機關車、電氣材料及金屬貨物等生產工具。即如目下絕對不能干涉日本行動的德國，它在東北活動的商品，也都約略相仿。此外，法國在東北的貿易活動，實無可言者，最主要的商品是鐵鋼及烟草，但其地位也極低下，前者占第四位，後者占第五位。

這樣看來，英美德各國的東北貿易，除了幾種不甚關重要的商品而外，大體上均與日本沒有很大的抵觸。他們最主要的商品應推機器、建築材料、汽車、車頭等生產工具。這些生產工具在東北的銷路，不但不能因為日本之占領而受到惡影響，倒反可以增加推銷的數量。因為日本在東北的主權得到保障之後，即必積極從經濟建設方面下手。這種經濟建設，不用說，必定需要大量的生產工具，如機器、建築材料、汽車、車頭、

金屬貨品之類。而這些貨品，日本本國必不能充分供給，勢須仰給於英美國。其時，英美國向東北輸出的貿易，必更加進展。

再自英美各國看，他們的商品賣與中國方面，和賣與日本方面，都是一樣；只要在量的方面不減少，那有什麼計較的必要，能夠增多，豈不是更歡迎的事情嗎？本來，日本的南滿鐵路公司就是美國的一個好主顧，直至一九二六年截止，其買了美國一二，五〇〇萬元日金的貨（據滿鐵紐約公所一九一九年發表的數字）。一九二五至一九三〇年間，又購買了美國五百萬元美金的貨。日人還計劃在關東州設立大鋼鐵廠，預定向美國購買十億元日金的機器。近年來，英國賣給滿鐵的貨量，也不在少，且有年年增加的趨勢。英美各國不會絕對反對日本侵占東北，是很顯明的事情。

目下，英美各國現在所要求於東北者，不是主權，也不是領土，只是商業資本和工業製品的銷路。只要這種銷路得到保障，實質統治權握於誰手，他們是不過問的。但要這種銷路得到保障，或能擴大，第一要件就是東北社會的安寧，政治之上軌道。凡能完成這個要件的辦法，不管是直隸於中國中央政府的主權，或是什麼新政權，甚至是復辟政府，英美德法無不歡迎。希望英美德法等國為著東北的利益關係來對日本採取有效的制裁，因而引起帝國主義戰爭，是絕對沒有希望的。

四、列強本身的現勢

英美德法等國，不但不能因為他們在東北的利益關係而與日本開戰，即使他們本國的種種矛盾和危機，也使這種戰爭不可能；至少，他們也要因為顧慮目前的安全，而不願意在破壞之後加以破壞，危機之上重以危機。且在本節檢討各強本國的現勢。此項，本專號述之君所作《東北事件與國際政治》文中，已言之頗詳，為避免重複起見，只用他

方面的材料分別略述於下：

(一) 德國全身不遂

德國是列強的共同債務國及賠款國，英美法各強的財政能否富裕，因而具備戰鬥力，完全視德國能否支付巨額賠款及債務以為斷。所以要究明各國的現勢，以決定帝國主義戰爭目下有無可能性，應先檢討德國現在的經濟狀況。

一般人皆贊德國能以戰敗國努力奮鬥，終使危機百出的德國經濟臻於安定，狂呼「合理化萬歲！」、「德意志國民性萬歲！」但這個一般人認為所謂「復興」的初曙，事實上卻是「危機潛伏」的開端。「復興壯觀」的背後，豈不是巨大外債的堆積嗎？復興的外觀進一步，豈不是債台增築一層嗎？賠款和債務，皆以借款支付。用債務支付債務。合理化的資金，也大部分由外國借款構成。一國經濟若建築於外國信用的基礎上，無論外觀怎樣美麗而雄壯，結果也不過是沙漠上的大廈，其危機的程度實不堪言！

這種險象在道威斯案及楊格案的改訂即已表露出來。再經一九三〇年九月總選舉後，因受政治不安的影響而促外國爭相收回債權，該種危機乃益深化。雖經英國極力救濟，結果仍難免於成為中歐金融恐慌國家之一。外國短期信用的提取風卷雲湧，終使德國一切支的支付完全陷於不可能。迫得大總統興登堡元帥不得不發出SOS的非常信號，美國胡佛大總統不得不提出戰債賠款延付案。德國目下的難關，不但大地主及重工業者們所希望的「膨脹政策」不能打通，即德國國家銀行總裁魯鐵爾及白魯寧總揆所堅持的「緊縮政策」也難有補於事。簡直一句話，德國目下的經濟已陷入「全身不遂」的狀態。

復次，且來檢點德國這種經濟危機影響各國若何。德國現在所負外債、長短期債務合計已達二，四四〇億之巨：

(貝斯爾十日亞細亞社電)德國所負外債總額，已經核算為二，四四〇億馬克，一切文件已送交世界銀行顧問委員會附屬技術委員會，加以審查。上述數額包括長期與短期債務在內，其利息以長期債務而言，在明年即須一二，〇〇〇萬馬克之巨。至於短期各債，其利息亦在八二，五〇〇萬馬克之譜。而德國更在上數之外，更須交付道威士借款利息六，三〇〇萬馬克並楊格借款利息二，一〇〇萬馬克。依照德比世界大戰時訂立之務約，按此債券發行乃為救濟德國貨幣跌價之用，以及其他美國等需求，又須六，六〇〇萬馬克。如此德國去年須付外債之數，將達二十一億馬克，而清償短期債款與商務賠款，尚不在內。至於德國於明年交付短期債務之數多少，當視將來各國委員柏林會議結果為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北平晨報》)。

長期外債不說，即短期外債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截止，已達四十四億馬克(據《改造》雜誌本年新年號一〇一頁各項數目)。只此數目的短期外債，即無能力支付。各債權國終不得不聽從巴捷爾委員會的勸告，締結九月一日以後六個月間(二月底止)短期債權提取的停止協定。外債母金的清還不用說，恐連上列利息也無支付的能力。而這種支付不可能，因為締結種種延付協定的結果，影響英美法各國財政甚巨。只就上列短期外債言，四十四億之中，美占三七·一% (一六億餘馬克)，英占二三·九% (一五五，〇〇〇餘萬馬克)，法占六·八%，(約三億馬克)。又，楊格賠款支付金之中，法國的純得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度)在四二，〇〇〇萬馬克之譜；英國的分額也為五，三〇〇萬馬克。美國的影響更大。於上述十六億餘馬克的短期外債之外，尚有一〇〇，三〇〇萬馬克的戰債。

德國經濟不能健全的復興起來，英法美各國的財政還有辦法，使得運轉裕如嗎？莫

怪白魯寧在洛桑會議開會前大發表其高見：「……德國立腳點，以為世界經濟生命當須復興，則不論在現在或將來，德國均不能賠款……」（載一月十一日《北平晨報》）。

（二）英國的危機深化

年齡最老的英國，其經濟危機，也隨暮景之增長而愈呈頹狀。現在，撇開一般經濟的危機不說（因為本專號別篇論文剖述頗詳），單就金融恐慌略為說說。

英國是「食利」的國家——利用他國的資金以營貸金業而從中獲利。所以，金融的恐慌是英國經濟的致命傷。英國之為中歐各國的金融恐慌講求救濟策，為奧地利設第一防線，為德國設第二防線，也是當然的事理。便是結果，可惜得很，皆毫無成效，第一防線，第二防線，皆先後崩潰，落得素以真正金本位國誇耀於世界的本身，也不得不於本年九月廿一日停止金本位。

歐戰後，倫敦的繁榮可以說大部依靠於外國的資金。據倫敦銀行家的報告，外國銀行在倫敦的存款額及使用於倫敦的資金總額，較比倫敦對外國銀行之貨款及所承受者合算，在二倍以上。據一九三一年三月底的計算，倫敦金融市場的外國資金總額，達四億鎊以上。現在英國就是使用著這種差額，繁榮她的國內事業，並向外放債，投資。

然而，利用外國資金以作投機事業，是非常危險的勾當。因為由外國吸引的資本，大抵是短期信用，英國自己所投資的，卻是長期信用。在這當中，萬一風雲驟變，金融界發生了窒礙，自身難免陷於不能應付的地步。果然，這種風雲先翻捲於中歐，繼而波及於全世界。事勢終把英國救濟中歐各國金融恐慌的努力，溶化在大西洋中；而英倫終不得不發生下列幾種事實：

1. 因為德國經濟的危機而英國投在德國的資本固定化；

2. 受德國經濟危機影響的其他歐洲各國，為預防本身的金融恐慌，而繼續由倫敦市場收回資金；

3. 且因赤字問題引起的信用低減，而資金外流；

4. 法國為救濟德國而提取巨額資金。

其結果，終使英國不能不仰美法的鼻息，告貸巨額借款五千萬鎊來彌縫。他方面，凝結在德國的短期債權，一〇五，〇〇〇餘萬馬克，及其他的長期債權、賠款均無收回希望。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財政自然窘困至萬分。再加以一般經濟的恐慌和失業群眾，殖民地群眾的威脅，英國要積極干涉關係不十分密切的東北事件，目下似乎不可能，恐也不願意多事吧！

(三) 法國的繁榮動搖

一般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皆甚羨慕法國的剩餘資金，並謂法國只要能維持他的巨額現金，無論世界經濟怎樣恐慌，本身的繁榮依然可以繼續。但是事實果如是嗎？且來檢討一下。

誠然，法國的經濟至一九三〇年四五月間始發其端，較之英美德等國之早即開始於一九二九年底，約略遲後半年以上，即入恐慌期以後的恐慌程度，也未若英美德各國的尖銳。一九三〇年度生產指數的低落比率，德為二三·五%，美為二〇·五%，英為一五·五%，而法國則僅為七%。但是，這種勉強維持的景色，自入三一年度以來，即以急速的速率日益惡化。生產總指數，由一月的一三三，低至八月的一二一。失業者八月截止即已近百萬；短縮勞工數達就業勞工總數之三三%（一月頃只一四%）。股票價格也有很顯著的低落，由一月的三六五低至八月的三〇四。此外，普通物價的運動的情狀

更可以證明恐慌的深化。在三〇年度未大跌落的普通物價，入三一年度以來也有巨大的跌落趨勢。在三一年度的八個月間，批發物價指數，低落一〇%，零賣物價指數低落八%。

法國在一九三〇年以前能在英美德等國恐慌的漩渦中維持原來情狀，大抵得力於下列三種原因：

第一，對於各種產業的保護政策，如農產物關稅的提高，交附股票補助金，交附輸出貿易獎勵金，尤其曲盡農業保護的手段；

第二，一九二八年後法國經濟的轉佳，其餘音延長至於一九三〇年末頃；

第三，利用得自德國的巨額賠款為過剩資本，擴大國內的市場。

但這三種原因也不是永久可靠的。固然，法國農業人口占半數以上，所以法國政府採用農業保護政策，例如主要的農產關稅之提高，抵制了外國農業恐慌的襲來而得到暫時的安定，但是結果適足以引起「關稅鬥爭」，於本國的商品輸出仍歸於不利。又第二項之好景氣也無再續的希望。第三次德國賠款也已前後不繼了；要如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三年間合計獲得三四〇億法郎的超過收入，恐怕沒有希望。良善的因素消滅後，壞的現象就跟著而來。防禦世界恐慌的堅壘，終被世界恐慌的洪水沖決了。金融恐慌雖不至大作而止，三一年度前半年的生產指數之低減，卻近於一〇%。

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所煩悶的，是商品和過剩資本的出路。法國目下仍欲以此過剩的資本來維持他的繁榮，所以目下所希冀的世界情勢，就是「和平」及「投資的保障」。帝國主義戰爭當然不是他所願意加入的。尤其是不願加入與他關係不切且足以阻礙他開拓在華新市場的帝國主義戰爭。他寧可默認日本之侵占東省而自己獲得他在中國西南部開闢市場的機會，以容納最近由英美德收還的巨額過剩資金——本年九月初至十月二十日，美國流出了七億元美金，其大部分即流入於法國。在日本侵占東北的聲中，

法國竟一方面派兵侵犯我國西南部，他方面和日本秘密諒解，也勢所必然的。下列的消息可以證明：

(廣州特約通信)最近廣州國府據桂省李宗仁等報告，略云：宗仁前據龍州對泛督辦韋雲淞迭電報告，法國政府在安南準備軍事情形，曾經隨時呈報在案，茲計兩月來，越府行為，影響我西南邊防，及侵我主權事實列下：(一)前月元寒兩日，法飛機兩架入我領空，並到龍州偵察形勢，經我抗議後，越府機師道歉了事。(二)藩案發生後，河內報論調袒日，謂日保障東方文化及條約利益，足為歐洲借鏡。(三)前月江日電，法在諒山築飛機場已完成，各邊界均有增兵。(四)儉日電，越府除另募新兵外，即二十餘年前之退伍兵，亦召集在河內訓練，以五個月為期，準備分防各地。(五)將越境內之馬路，延長至我邊地平而水口各關，並拓大其路幅，又在諒山增建一師人之兵房。(六)越南本年禁止糧食出口，並廢止法光洋，冀圖吸收現金。(七)上月號日，法兵七八十名，無故越境攻掠我高板村農民，肆意掠略，前月又入我商店，此為向我挑釁最重之事件，已電陳部長交涉抗議。聞雲南方面，亦有法兵入境騷擾。(八)昨齊辰電，法運大炮步槍彈藥及軍服二萬套到諒山，聞係發給民兵(按即退伍兵)。(巴黎十七日路透社電)美國某報載稱法日間成立一協定，根據是項協定，日本應擔保法國占領中國之一省。此間官方對此說，極為驚異，並加以正式否認，謂其毫無根據。

(四) 世界恐慌與美國

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之由於矛盾的發展而互相爭奪，而爆發了歐洲大戰。

歐洲大戰的結果愈使帝國主義的危機成熟。大戰後的工業恐慌發其端，農業恐慌隨其後，獨占最高形態的金融，也終難免於恐慌、紊亂。整個歐洲各方面的經濟恐慌，據以上三段所剖述，大約可得個梗概的瞭解，總括一句話，歐洲經濟的恐慌已經無微不至，無孔不入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擁有二十八億美金元的金準備，全世界一五七億美金元的長期外國投資，十七億美金元的短期外國投資，及七十七億美金元的戰債的美國，對於歐洲的經濟恐慌，因而全世界的恐慌，曾經一度保持「隔岸觀火」的態度。他以為歐洲的烟火絕對不會越過大西洋而燒及美洲。但是世界經濟已聯成一片的現在，經濟恐慌的傳染性，卻比空氣傳染的流行性感冒還要厲害。美國的經濟恐慌自一九三一年以來，乃呈現顯著徵象。工業生產的縮小，農產物價的暴跌，失業勞工群眾的增多及威脅，企業公司的利潤的低落，大小銀行的繼續停業關閉，等等，迫得美國不敢再以「富強」誇耀於世界了。茲略述於下：

據美國聯邦準備局的調查，工業生產指數由一九三〇年九月的九十一（以一九二二—一九二五年為一〇〇基數），低至一九三一年九月的七十六，若和一九二九年四月之一二九相較，約為四〇%的低落。其中，美國主要工業的鋼鐵及汽車的生產指數，低落尤巨：鋼鐵自一九三〇年九月之八十五，低至一九三一年八月的五十一，九月又低至四十五，與最高水平之一五五相較減低七一%；汽車生產也自一九三〇年九月之六十二，低至一九三一年八月之五十二，九月更低至三十九，與最高指數之一五三相較，激減七四%。

美國農村的恐慌尤其厲害，農產物價的暴跌遠甚於工業製品。農業產品與工業產品的價格的差額，隨恐慌之進展而愈增大。即被視為美國農業危機的一九二一年，農村收受價格對於支付價格的比率尚為七五%，至一九三一年八月則減至五九%，九月又減至五六%。

在這種極度不景況之下，美國各種企業的利潤，自然激減。據本年新年號《改造》，美國二十重要公司的純利，一九三一年九個月間，與一九三〇年較減少五五·八%，與一九二九年較減少七四·七%。美國鋼鐵的純利，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四，七六〇萬美金元，減至一九三〇年之九，二〇〇萬美金元。一九三一年更減至一，七三〇萬美金元。股票的價格也隨之而低落。

產業一般的恐慌必定招來金融的恐慌。即在一九二一年度的恐慌期，停業銀行數也不過五〇一家，存款總額一九，六〇〇萬美金元；而一九三〇年前九個月間即有六七五家，存款總額二八，七〇〇萬美金元，一九三一年的前九個月間的情勢尤其可驚，停業數目激增至一，二三四家，存款總額達九二，九〇〇萬美金元。銀行股票價格之暴落，也是自然的歸宿。一九三〇年一月紐約二十大銀行股票的價格指數（以一九二六年為一〇〇基數），為二一一四，同年十二月低至一二三八。一九三一年十月更低至七八七。世界產業恐慌，金融恐慌的狂風終把暴富的美國，捲入歐洲金融恐慌的漩渦中，終使胡佛不得不提議聳人歡聽的 *Moratorium*（編按，延期償付權之意。遇緊急情況時，依法令規定，債務人在一定期間應償還的債務可延期償還。）

只要世界不安定，各國購買力低減，德國經濟破產，東方的市場紊亂，富甲世界的美國也不能獨自繁榮。所以，美國寧願吃點兒虧，倡議德戰債延付，以維持他的歐洲市場的命脈。同樣，他也在設法促東方，尤其是中國的社會安寧，好讓他的大量生產獲得出路。美國在他的經濟恐慌現狀之下，不但不能戰；且為他的利害打算，他亦不願意戰。希望美國現在積極干涉日本，因而引起帝國主義戰爭，直等於夢囈。日美雖然是世仇，但是利害具有「疏通恩怨」的魔力。在日本侵占東北的期間，被稱為最強硬（？）的美國的態度，不是已經明白告訴我們了嗎？美國之所謂強硬的態度，豈不是乍硬乍軟，並且聲明「絕對不以武力干涉日本」嗎？

五、帝國主義戰爭不可能

帝國主義戰爭在目下不可能的原因，除了三四兩節所述帝國主義者們在東北的利害關係及帝國主義者本身的經濟恐慌二種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原因，就是帝國主義者所共同「希望」的繼續繁榮。由於這個希望，產生了下列幾種「必要」：

1. 避免帝國主義者自殘的必要；
2. 抑制本國社會革命爆發的必要；
3. 反蘇俄戰線齊一的必要；
4. 共同榨取殖民地民眾的必要。

帝國主義者之間雖因他們自身的矛盾的尖銳化，使他們自家人有時處在對立的情勢之下，但是他們也有他們共通的敵人，即時時在威脅他們的存在和勢力。並且，這種勢力的消長，和他們的強弱，適成「反比例」。他們的強度的總和低減多少，威脅他們的勢力就增加多少。具體言之，帝國主義者少一個，則他們的勢力弱一個的成分。因此，帝國主義者之間極力避免自家相互的殘殺。自經驗了歐戰以後，這種避免就由無意識的，變成了有意識的。帝國主義戰爭已成有意識的不可能了。

但是，他們本身的矛盾依然不斷地，把他們向墳墓裡推進。贏利的企業已漸不可靠；獨占適足增長經濟的恐慌；無產者及無業者群眾的數量與年俱增。舊有的生產關係已成了新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新社會的雛形孕育、生長在舊社會中。這種雛形正在準備破殼而出。這種準備就是一般之所謂社會革命的醞釀。但是新社會形成的反面，就是舊社會的消滅；社會革命的完成，也就是帝國主義壽命的終了。而社會革命又常借帝國主義戰爭以爆發；歐洲大戰中曾經改變了兩個強國的國體和社會制度。因此，帝國主義的主

人常懷戒心，極力避免足以引導社會革命爆發的帝國主義戰爭。

上述二種努力只是消極的罷了。帝國主義要維持其繁榮繼續，尚須在積極方面用工夫。蘇俄社會主義建設之成功，是帝國主義存立的一種大威脅。再加以標榜世界革命的潛勢力，常在帝國主義國中浸淫滋蔓。二者又有密契的地方，蘇俄雄厚勢力之進展和確立，自然是帝國主義者的腹疾。帝國主義者自然覺得有齊一戰線，向蘇俄進攻的必要。他們也都明白：他們之間，或世界的其他部分，多為蘇俄赤化一部分則喪失一部分的根據，而增加一部分的危險，要避免這種危險，就須互相原諒，齊一戰線，而帝國主義戰爭不可能。

帝國主義者一方面向威脅的勢力進攻，以減少壓迫的危險性，他方面還須充實內部的力量，以消滅本身的弱味。在現在，壓榨殖民地民眾的膏血，實與榨取本國勞農群眾相拚，是無二法門的良法。不過，在壓榨殖民地民眾膏血的實行當中，最容易引起殖民地爭奪戰，而反危及他們本身。萬全的方法就是「共同的榨取」和「互惠的劫掠」。甲帝國主義對於乙帝國主義之侵略弱小民族或被壓迫民族，只得在不害及自己權益的範圍內，或機會均霑的協約之下，互相諒解。乙帝國主義者對於甲帝國主義者的同樣行動，也以同種態度報之。於是，殖民地爭奪戰可以避免，而帝國主義戰爭絕對不可能——除非帝國主義的分贓不能均勻，協定的內容不能議妥。

不但理論如此，事實也是如此。自經歐戰以後，帝國主義者之間的衝突，尚未有一回用武力直接周旋過，結果都運用政治的手段圓滿解決。不戰條約之締結，更是此種精神的表現。近年來，任何帝國主義都未肯輕易和外國正式開戰，為的就是避免本國社會革命的爆發。反蘇俄的戰線，已由各帝國主義分別布置，並且聯繫成一體系，由歐洲而近東，而中東，而遠東，差不多各地皆有友方擔任防禦。目下已完成的聯繫，述之君在本專號《東北事件與國際政治》詳言過了；此後恐更要加工整備。剩下的就是一個殖民

地民眾的共同榨取；此項在此次東北事件當中，也已證實大半了。

英美法無論自他們本身的現勢言，抑自他們在東北的利害關係言，無論自理論言，抑自實際言，他們絕對不能積極干涉日本在東北的行動，或採較「深加注意」及恫嚇式的干涉，更進一步的措置。故自東北事件發生以來，行將四個月，英法為主人的國聯每次的決議皆極空洞，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即最近議決的國聯滿洲調查團的工作——本即無工可作，有之也不過滑稽的工作罷了——也在故意延宕之中。查該調查團產生於十二月十日的國聯決議案，距今已將四旬之久，尚無半點踪跡。據說，歐洲的調查委員尚須繞美洲然後至遠東，作個世界一周的遊行，而開始工作尚須兩個月之後。下列電訊，給與我們信任國聯的一個總結：

（日內瓦十二日合眾社電）據現在所得確息，知國聯滿洲調查委員會之抵遠東，尚需時日。在最近將來，委員會在英委員黎頓公爵主席下，將在日內瓦舉行全體會議，然後赴美，與美委員麥馬癸將軍會合，在美作短期勾留後，渡太平洋而赴滿洲。但該調查團在三月底或四月初前，不能開始其調查工作。現在中國之國聯交通股股長哈斯（Robert Hase）氏已被任為調查團秘書。國聯秘書處法職員皮爾特氏、柴里黎氏，及巴柴達夫氏三人，已被任而輔助調查團。該調查團係根據十二月十日國聯理事會所通過之決議案而產生，當時深信該團將立即向遠東出發，但因委員人選問題，延緩至今。現似調查團開始工作之時期，將在國聯理事會通過議案四個月之後。

這是日美英《倫敦協定》及《日法密約》的必然歸宿。他們之間的協定和諒解，已漸具體化，現在所差的只是協定的內容和諒解的程度。最近期英文《國際通訊》，曾經揭破此項消息，即一月號日文《改造》雜誌也公然承認：

「然而在那事關滿洲的範圍內，日本全國的必死的反對（反對英美大借款之將日本撇開，事實上的表現就是東北的侵占——作者注），係對於蘇俄的本質的威脅，同時又促英美對於排除日本於支那財政共同管理之外加以考慮。在此考慮之下，英美自不得不與日本協定。關於此問題，日本與美國在不發表的約束之下，進行頻繁的交涉。自國防的立場上，反對支那共管的日本，果與英美之間發見何種妥協之點，我們雖不得而知，但在九月以後的國聯理事會的經過當中，可以想見之。」「例如最初在國聯日本雖是刑事上的被告，而事勢卻急轉直下，現在國聯反為世界和平而抑制支那的要求。並且，實質的國際財政共管的計劃依然在進行中。……」

一月十四日《北平晨報》所載下列電訊，更足以證明日英美所進行交涉的經過，及英美所要求的是些什麼東西，證實我人前言之非謬：「東京十三日新聯社電」關於滿洲事態，美國政府七日向日本政府提出節略之意向，欲間接慫恿其他九國公約締結國採取同樣之行動。但英國及他締約國，皆不採取任何正式之行動，已經明白。惟英國九日發表聲明同時向松平大使聲明，請日本證實滿洲門戶開放政策宣言，該聲明穩健請求證實日本關於此點之擔保。日政府於一、二日中，將訓令松平大使重為說明日本在滿洲之立場，且對於英國政府對日政府表示信賴之態度，甚為諒解。業經松平大使轉達西門外相。

據《日本記錄報》（Japan Chronicle）載稱，英美法三國政府關於錦州時局，曾照會日本外務省質問。日外務次官永井已將日政府覆文送交三國駐日大使。美國駐日大使福比斯氏亦曾赴外交部訪問永井次官，彼等對滿洲事件，談話極久。美使力言日本在滿洲之軍事行動，危害滿洲之開放門戶主義。又謂自滿洲各地通商大埠為日軍占領後，致各地美國商行，完全不能取償前政府時代所有欠款。且一切商業上往來，亦同歸於盡，

故美商所受損害極巨。美政府已接到各美國商業公司通電，責備當局放棄在滿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權利。因此之故，希望日政府尊重此點。當時日外交答稱，日本政府極力履行此種主義，並言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主義，現時尚未實行，由於滿洲之紛亂狀態尚未平靜。日可擔保滿洲新政府繼續履行前政府對美之義務。美使已將日方答復轉達華府，美政府對之是否滿意，刻尚不明。

美國對於日本在東北的軍事行動的懸念，只是「危害滿洲之開放主義」，及各地美國商行完全不能取償前政府時代所有欠款」。英國之意也不過如是。所以，只要日本能證實近日所發表「滿洲門戶開發政策」，英美自無吹毛求疵之必要。

法國則更進一步，實行「趁火打劫」了。繼西南部所侵入，近日在天津方面也有動作：（天津本報電話）法兵侵占老西開後，設立崗位，並徵收捐稅，業經市府向法領提出抗議，昨日上午十一時，法領有覆文致市政府，聲明法工部係在老西開，維持公共次序，並否認有徵收捐稅情事……（一月十四日《北平晨報》）。

六、中國民眾應有的覺悟

在帝國主義末期，帝國主義戰爭之不可能，是極自然的歸宿，是辯證法的轉變。帝國主義者之爭奪殖民地，產生了歐洲大戰，由於歐洲大戰的經驗，否定了殖民地的爭奪，而代以「機會均等主義」、「互惠的劫掠策略」。在這階段中，帝國主義戰爭必被揚棄（aufheben）。而將來的戰爭，必將採取另外的形式表現出來，或以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戰爭形式，或以被壓迫階級與壓迫階級的戰爭形式。

在這種辯證法的轉變當中，東北事件的歸趨幾乎可以不言而喻。不過，東北事件的胎中，將來必定孕育更大的變化，也是我們應加注意的。我們民眾不要和當局的一部分

人陷於同樣「不識事務」的弊病，專向國聯或更有力量的美國哭訴，我們現在急應進行的，只是對付將來更大變化的「準備工作」。請大家睜開眼睛，看看現在國際情勢何等緊張！國內政治又是何等的混沌！而民眾的昏迷和狹隘意識的衝動，尤使我們不寒而慄！覺悟吧！

認清我們的敵人！

認清我們的朋友！

我們要利用時機，

從改造東方運動中改造世界！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原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新東方》第二卷最近遠東問題專號

日本軍事法西斯論

近年來，日本社會科學界已經公認日本資本主義乃至帝國主義的軍事性。九·一八事變以來，特別是本年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許多事實更加證明這種軍事性之存在。這是理解敵人的一個關鍵。我們能夠理解敵人的本質，才可以決定我們的抗戰方式。

像日本軍部那樣政治地位的優越和政治行動的跋扈，在普通的民治國家裡，實在找不出第二個來。日本的法典及習慣皆保障軍部的優越地位。日本軍部的幾個重要中央機構，如軍事參議院^①，元帥府^②，參謀本部^③，軍令部^④及侍從武官長等，都是直接輔佐天皇而握有帷幄上奏權的機關。日本陸海軍部大臣不隸屬於內閣政府，而是代表軍部意志的資格或權威。這一點是日本和歐美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國家截然不同的地方。在日本的憲法上，規定許多種為各國憲法所沒有的天皇大權。其中，關係軍事的重要事項，例如規定陸海軍的編制及常備兵額的大權（憲法十二條），宣戰、講和及條約締結的大權（憲法第十三條），皆可以不得國會通過而直接由天皇行使。特別是頒布戒嚴令的大權（憲法第十四條），甚至可以剝奪憲法所給予人民的一切權利。但是關於軍事方面的天皇大權的行使，事實上都是由軍部的幾個中央機關去決定的。陸海軍部大臣不隸屬於內閣，而直屬於天皇，事實上與總理大臣並列；他們對軍部負責，但不對內閣負責，也是最大的特點。再如陸海軍部大臣不能由總理大臣選任，而必須由軍部選任，也是一個當然的特色。例如政黨政治色彩最濃厚的大隈內閣（明治三十一年），尚且不能由總理大臣選任海陸軍大臣，而向薩派的前任海軍大臣西鄉請求海相，向長閩的前任陸軍大臣桂氏懇求陸相，結果只有懇切地請求他們留任。桂陸相在答應留任時，且聲明自己是以「異份子」入閣的。一九三一年以後，隨著日本對外侵略的發展，軍部的優越地位更加增強，

甚至於軍部負責的大事變，如五·一五事件^⑤發生時，內閣全體總辭職而陸海軍部大臣倒反泰然留任。二·二六事變^⑥後，內閣總理竟須在軍部的要求條件下成立，廣田因與寺內磋商條件，幾至流產。最近的宇垣內閣也因軍部之拒絕選派陸海軍大臣而中途流產。這些都是鮮明的事實。

日本軍部的地位雖是如此優越，但它並不是一個架空的集團，而是有它政治經濟的基礎的。它是背後有所依屬的一種力量。日本軍部無論在過去或現在，都是為著某一種政治經濟的權力服務或與結托的；它聽命於一種首腦，而自己只充當四肢。在明治中葉以前，日本資本主義還帶著濃厚的封建色彩的時代，日本軍部是為官僚、地主服務的。到了後來，獨占資本（包括國家托拉斯資本及財閥獨占資本）充分發展，官僚和財閥合抱，日本軍部就自然地轉而為獨占資本服務。這裡或許有兩種事實值得考慮。其一是軍閥支配財閥的一般看法^⑦。日本軍部勢力的猖獗，表面上好像軍部支配著一切，軍權支配著財權；但是軍部的任何主張並沒有根本否認財產私有制，反之，他們提倡軍備的大擴充，倒反增強了官僚支配下國家資本托拉斯的力量，培植了個人財閥資本的膨脹。其二是個人財閥支配軍閥的另一種看法^⑧。過於機械地評量日本金融資本勢力的人，常把三井、三菱等財閥的力量估得過高，說事實上軍閥只不過聽命於幾個大財閥。但這種看法忽略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忽略了日本產業資本主義及金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特性^⑨，乃至無視了日本財閥成立過程中的特殊事實^⑩。

從表面上看來，日本軍部常直接間接與財閥衝突，政黨與軍部之間也發生不調和的事象，但是軍部始終是為某一種經濟權利服務的，近年來幾乎可以說完全是在為獨占資本服務的。從本質看來，我們說日本軍部服務於日本獨占資本可以，說日本軍部完全服務於財閥則不可以。日本的獨占資本和其他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官僚操縱下的國家資本托拉斯的比重，大於個人財閥的獨占資本。個人財閥獨占資本又是官僚政府育成

的，始終收在政府統制之下^⑥。這一點就是過去充當官僚的四肢而現在充當獨占資本的手足的軍部所以表現為主動力量的經濟根據。

日本資本主義是在封建的土地經濟基礎上，在家長或政府的溫床裡發展的。由封建經濟的遞變，在極短期中確立了產業資本，緊跟著就是金融資本的成立。歷史要求著日本更高一層的發展。在日本現存經濟組織下，日本資本主義不能向社會主義轉變而很自然地要求著法西斯的實現。獨占資本和封建勢力的融化，個人財閥獨占資本和國家資本托拉斯的結托，皆要求著法西斯的實現。日本幾年來的政治過程，都是在這種要求下摩擦過來的。有一部分急進法西斯份子不滿意財閥，也不滿意官僚和政客，於是發生過多次次過激的暴動，如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等。但是日本的政治機構不容許急激的改革，只能容許一個合法的法西斯。於是需要著政黨與軍閥的融合，還需要著政黨、財閥和軍閥的合抱。二·二六事件以後每一任的內閣皆努力於這種工作。寺內，廣田內閣^⑦的努力，失敗於政黨與軍部的尖銳對立。繼起的林內閣也不過成功了政黨與軍部的調和，而未及完成三者的抱合。到近衛內閣才算成功了這種偉大功勳（？），而日本政治就急速地向法西斯的方向發展了。

然而日本資本主義乃至帝國主義在其開始第一步即已帶上軍事性，軍隊培植政治經濟向前發展，目前的政治經濟也靠軍隊及軍備來維持下去，軍部的勢力依然占著優越的地位。現階段的日本法西斯，不但需要著軍隊的膨脹及軍需工業的發展，並且要由軍部的少量來維持這個秩序，來推進這個發展。又在對外的關係上，日本經濟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必須侵略外國，獨占外國的資源、市場，以及勞力，以補強它先天及後天的缺陷。於是現階段的日本法西斯更需要著強大的軍權來維持，來開拓道路。根據日本國內外客觀的條件，日本法西斯承受日本資本主義的衣鉢，帶上了更濃厚的軍事性。從本質上考察，日本資本主義是軍事性的資本主義，日本帝國主義是軍事性的帝國主義，現階段的

日本法西斯依然是軍事性的法西斯。一九二一年以來，日本軍閥與獨占資本的共同要求，把日本經濟漸向戰時經濟體制方面推進，本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以來，日本軍部又把日本的政治、經濟，及軍事的一切推上戰爭的軌道上。日本法西斯發展過程上的種種摩擦，居然依賴這個發展而消滅下去。日本政黨、財閥和軍閥的緊密的抱合，居然在對外侵略戰爭的軌道上完全實現，軍部充當四肢的作用更要發揮，軍事法西斯的色彩也更要加濃起來。

然而我們要深刻瞭解日本軍事法西斯的本質，我們還須更進一步研究日本資本主義軍事特質的歷史條件及其經濟基礎。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非常遲後的，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各國大多完成了產業資本的發展而步入帝國主義的階段了。這個時代的落伍性就逼著日本政府採用人工來培植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主觀上固然是為了國內外軍事的必要而建設了軍警網，創設了軍需工業及重工業交通工業，而在客觀上卻造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日本因為這個帝國主義時代性的決定，及其先天的缺陷（資源缺乏、市場狹小）而急激走上對外侵略的途程。日本軍隊領導商品及資本向外進出是其特色，恰與英美等國相反。此外，產業，特別是基要產業（*key industries*）的創造和發展，皆生於軍事的目的，並且是由軍需工業領導著普通產業，又與通常的產業發展形成顛倒的關係，也是軍事法西斯的歷史條件。又如，日本近代三次對外戰爭的結果，取得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條件等等，也都是軍部的優越政治地位及今日軍事法西斯的歷史條件。

其次如軍事法西斯的經濟基礎，在日本經濟體制中也有許多特殊的事實可提。日本軍部所以能與財閥結托的原因，即在於這個日本經濟的特殊性。貫通日本近代經濟的發展過程，軍需工業占著最重要的地位。日本軍部要求軍備的大擴充，日本官僚和財閥要求軍需工業的大膨脹。所以不相稱的龐大財政，皆能很容易年年增加下來。軍需工業經

營於國家托拉斯資本，及財閥獨占資本而受到軍部的統制，也是軍部勢力繼續膨脹的原因之一。但是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經濟原因，還是在於日本軍事資本主義的特性，不但在其初期需要對外侵略以建造它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即在帝國主義階段的今日，也需要更大的市場和更豐富的資源，否則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將無法維持。日本經濟要求日本軍部執行這種任務，日本軍部也很強硬地執行這種任務。幾年來因軍費急增引起的通貨膨脹的景氣，及因軍備大擴充引起的軍需景氣，阻止了日本經濟的衰退，還進一步增大了一般工業的生產指數。這種動向，雖是軍需工業資本的要求，但其發動則須歸功於日本軍部忠實地強硬地執行它的任務。日本軍部把日本經常的經濟推進準戰時的經濟體制中，已有六年的期間，近衛內閣以來又把準戰時經濟體制帶上戰時經濟體制的途程去了。今日日本帝國主義對我作全面的侵略，就是日本軍事法西斯經濟發展的結果。在對外戰爭期間，日本法西斯的軍事性更要增加它的作用和威福。日本軍事法西斯是否能受到挫折，要看我國全面抗戰的努力如何來決定。所以說，中國的對日抗戰不獨為中國的民族解放，並且帶有解放日本大眾的意義。中國抗日戰爭是反帝國主義的，同時又是反法西斯的，特別是反日本軍事法西斯的，中國的大眾和日本大眾正站在同一利害關係的基礎上。這是分析日本軍事法西斯的結論。

注釋：

- ①軍事參議院是應天皇重要軍務的諮詢而上奏意見的機關，是以元帥、陸海軍大臣、參謀總長、軍令部長及陸海軍將官組織的。
- ②元帥府是關係軍事的最高諮詢機關，是從陸海軍大將當中選出功勳卓越的列為元帥組織的，等於政界的元老。
- ③參謀本部是由參謀總長管轄而為天皇參劃帷幄的軍務，掌握國防及用兵的計劃。

- ④軍令部參預帷幄的機務，計劃國防及用兵的事宜，軍令部長直隸於天皇。
- ⑤五·一五事件是以陸海軍軍人為中心的暴動事件，理論應由陸海軍部大臣負責的。
- ⑥二·二六事件，便是純粹以陸軍近衛師團一部分中堅份子，發動的大暴動。更應由陸海軍部大臣負責。
- ⑦目前我國所謂日本通及一般理論家，都是這種觀察，普通的報章皆充滿著這種論調。
- ⑧日本左翼陣營之一的勞農派就是有力的代表，開明一點的布爾喬亞學者也持同樣的主張。
- ⑨野呂榮治郎、山田盛太郎及平野義太郎等講座派，首先發見了日本資本主義特殊性之一的軍事性，詳見《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及《日本資本主義的社會機構》。
- ⑩貫通於日本資本主義的整個發展過程，日本財閥不但是為軍事設備的必要而抬頭，為日本軍閥政府所創造，並且始終得著軍閥政府的維持並受其統制。
- ⑪整個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史幾乎可說是軍需工業史，而占大比重的軍需工業，不但開始為政府所創設，即在今日大部分的主要軍需工業仍為政府所經營，他如交通事業及專賣品生產及販賣也皆由政府一手經營，此外尚且擁有廣大的官有土地。
- ⑫二·二六事變後的組閣者，軍部和元老原屬意於近衛文麿，因近衛膽怯不敢出擔時艱，轉薦廣田。但是軍部提三大要求以為廣田組閣的條件。廣田不但組閣時接受軍部的條件，其後事事皆受陸相寺內的牽制和指揮，時人遂稱這個內閣為寺內廣田內閣。
- ⑬關於日本軍事法西斯的歷史條件及經濟基礎，原有許多資料及數目字，因限於時間及篇幅，不能應用上去，只有留於另題詳論。

最近日寇的外交動向

日寇御前會議閉幕以後，接著又是議會的舉行。在日本政治機構上，這是一重大事件，它決定了戰時國策基本原則。基於這原則之下的外交方針如何？這是目前一般讀者所關注的問題。現在我想對日寇最近外交動向加以分析。

日寇軍事法西斯一貫的對外國策，就是征服中國，獨霸東亞，為達到這個目的不惜冒險國際的最大危險。所以御前會議後的對華方針就是繼續加強對華的全面軍事侵略，企圖藉此逼我國民政府屈服，締城下之盟。所以在御前會議開會的前後，日寇即已做過這種嘗試。我們退出南京後，日寇總司令松井大將對記者的談話及其後短期間的軍事行動即已證明過。松井竟大言不慚地聲言：「……吾人殊願予中國以充分時間，俾可考慮其態度」。但是我國政府始終不為淫威所屈，於是日本軍閥乃更進一步決定一面繼續做軍事侵略；另一面進行分化工作，製造偽中央政府。其具體的方案早在大本營與內閣聯席會議上決定好，為取得最高權威起見遂召集御前會議，隨後對華宣言就於十六日發表了。其最主要之點，就是今後不以我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並聲言「期望真能與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與發展，而擬與此新政府調整兩國國交」。

不以我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就是說中日大戰在目前已無法和平解決。同時，表明我國政府堅決抗戰到底。這一層自從一月廿二日日寇外相廣田宣布德國大使調解經過並揭露日寇所提最低限度的條件後，差不多可以說是確定的事實。我國駐日大使業已回國，日寇駐華大使川越也回去了，此後的動向更不難窺見一斑。至於製造偽中央政府當然也在其積極進行中。不獨限於偽中央政府，還要隨時隨地製造偽地方政府，也在我們意料之中。因為日寇侵略中國的政治慣技就是分化中國、以華制華的把戲。在最近的將來，

日寇還要在華中成立幾個偽地方政府，並準備在華南方面造成設立偽組織的形勢。這自然是與分化和封鎖有密切的關係。

日寇既然要繼續或擴大它對華的軍事侵略，並且期待著一個全面控制的局面，自然要對英美各國耍它的狡猾外交手段。在御前會議後的狂暴宣言中還有兩個要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其一是聲言「日本政府尊重中國領土與主權」，其二是尊重「列國在華的權益」。這當然完全是撒謊，是狡猾的辭令。關於前一點，日寇政友會領袖島田在本屆議會上說得好：「政府常常愛說什麼日本對華沒有領土的野心這種話，真奇怪極了。」他還說：「政府也許沒有領土的野心，可是除了日本，誰在哪裡管理這個區域呢？」此後日寇不但在政治上即在軍事上也要加強以華制華的手段是可斷言的，因為日寇的軍力原不足以對付一個大規模的國際戰爭。現在戰場擴大了數倍，它只有編練華人軍隊打華人。但它是無暇顧到此中危機的重大性。

至於尊重列國在華權益一層，更是瞪眼的大撒謊。華北偽組織已經強奪了天津關稅權，擅自改變關稅率，日本軍人在上海橫行霸道，蹂躪租界英美的租借主權，並且隨時侮辱英美各國人士特別是婦人，這就是日寇尊重列國權益的具體表現。此外，有一點我們要特加注意的，就是最近日寇為緩和它的孤立而採取緩和進攻英國的外交空氣，及向美蘇表示好意。最近，近衛的談話與末次的狂言，正成一個對照。但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絕對不會有任何效果。

日蘇最近的糾紛

一、日本軍閥的惱羞遷怒

自從我們第二期抗戰廣大展開以來，踏著冒險路程的日本強盜即便一步步吃著苦頭，軍事損失的巨大實出了他們的意料之外。自去年七月八日起至本年三月廿五日止，敵軍傷亡的情形，在陸軍方面達三〇七，三一人，在海軍方面達二七，〇三〇人，在空軍方面也有一〇，二一〇人，被我擊毀的飛機數約計四六二架以上，被炸傷軍艦共計二五艘，沉沒者四艘，若再加上台兒莊三次大會戰傷亡的二十三萬人，日寇海陸空軍的傷亡總數當在三十七八萬人之多。日本軍閥原擬用十五個師團使我們「屈膝」，但是現在僅傷亡人數即已超過十五個師團，而其作戰的困難又隨著戰場的擴大而日益增加。中日戰爭遂至如日本士兵所怨嘆的，「血腥的戰爭究將繼續到什麼時候呢！」（東戰場俘獲敵軍未發的家書。）這不但是日本一般士兵的苦惱，同時也是日本軍閥的苦惱。日本侵略者過去在中國所吃的甜頭太多了，這次竟然碰到我們的硬釘子，致使他們對於國內人民的諾言完全落空，激起了國內人民熱烈的反戰運動。於是日本的侵略者思索失敗的原因。不求自省而專責他人，是侵略者一貫的劣根性，於是很輕便地把失敗的責任歸屬於別個國家對我的援助。幾年來，日本強盜一貫地藉口於「防共」以遂行其對我的侵略，把侵華戰爭美化為「防共聖戰」。但到大戰爆發不能馬上使我們屈服戰爭復又遷延不決的時候，它又嫁禍於英國，於是末次內相大倡其反英的論調，煽動反英的輿論。迨至最近中外商業新聞也作專文批評日蘇關係說：「苟蘇聯始終對中國作有力的幫助，……蘇

聯援華即為對日之非親善行為。」該報還大放厥詞說：「日蘇關係之調整實賴於蘇聯方面。」尤其可笑的就是「蘇聯應知中日事件起源上發展之真實經過，惟有如是，蘇聯對日之態度始能改變」的結論（中央社東京五月八日路透電）。在第一期抗戰中「由防共聖戰到驅逐白種聖戰」的詭計，現在又要集中到舊技「防共聖戰」的奸辭上了。

二、日本進攻蘇聯的宣傳戰

在日本強盜是把「赤露膺懲」和「支那膺懲」相提並論的。所以在我們抗戰期中，他始終是把蘇聯拉進中日糾紛的問題上來。大肆其造謠和恫嚇的能事。遠在去年十二月間，素以侵略中國及攻擊蘇聯著名的荒木貞夫，即已「大發其粗鄙的反蘇聯論調，甚至直接要求對蘇作戰」（十二月廿一日大公報），致使駐日蘇聯大使向日外相廣田提出書面的抗議。上月前日本駐蘇聯大使田中更進一步大造其謠言，並謂「日蘇將難免發生衝突」。日本中外商業新聞也載專論說：「日蘇因滿蒙蘇邊境問題時有糾紛，兩國形勢已甚惡劣」。該報更照日本政府的政策依樣畫葫蘆說：「蘇聯在中國漢口方面勢力日張，日蘇雖不致有武力衝突，而兩國對峙之形勢亦將更加嚴重」（以上皆據四月九日新聞社電）。不消說，完全是用以欺騙歐美各國的烟幕彈。當此英法對德意步步退讓的今日，尤其是當此歐洲醞釀著締結四強協定乃至五強協定企圖孤立蘇聯的今日，日本所以如此大造謠言以響應德意，自然不是偶然的。所以，中外商業新聞報又宣稱：「如果日本再向蘇聯抗議（指日本駐蘇聯大使重光葵向蘇聯政府抗議蘇聯援華事），必仍無結果。……但日本如以武力阻止蘇聯援華，則結果將更加嚴重」（據上引同電）。其心虛膽怯也足證其恐嚇之無根。

日本進攻蘇聯的宣傳戰，更由日本政府積極地發動了。最近日本情報部分送小冊子

給外國記者，極度指責蘇聯對日本的非法行為，現其「莫斯科政府於完成五年計劃之後即決定肅清外人之權利」（四月九日塔斯社東京電）的措詞，即可見日本企圖孤立蘇聯的一斑。這本小冊子還列舉許多片面的事實以為例證。他們說蘇聯壓迫日本駐蘇聯的外交機關及通商權利，並說近來這種壓迫更加增加。他們說日本在堪察加半島的捕魚及庫頁島北部的石油礦租借權受到蘇聯的壓迫。又說日本駐蘇聯大使館不僅受到嚴密的監視，還有十二位「柏克烏」偵探在大使館門前身穿便衣開一商店從事於特殊工作。據日方的宣傳，蘇聯之壓迫日本人，使日本使館的職員或武官赴蘇聯各地遊歷時遭遇沒有旅館投宿的苦境。莫斯科以及其他各地日本使館及領事館的蘇聯本國人職員，也常受到「無故的拘捕」。他們說「日本駐敖得薩領事館被封的奇特原因，在其他任何文明國家內無論如何絕對不能發生」。但是所謂「奇特的原因」則未提到。這本小冊子列舉的片面的事實非常之多。小冊子的結論加強力量說：「蘇聯之卑劣、無人道，其種種不合法之行為，惟有更促日蘇邦交之惡化耳」（據四月九日塔斯社東京消息）。日本陸軍次官加藤更加露骨地在國會中聲稱：「日軍在庫頁島日蘇邊境應採取之行動業經決定」（據中央社東京九日路透電）。到這時候，前此廣田外相屢次宣稱「政府將竭其能力使兩國間關係入於常規」及日本無意與蘇聯啟釁的聲明，已不能取信於日本議會的議員及一般人民了。

三、日本進攻蘇聯的行動

日本軍閥每次在向蘇聯挑釁之前，必先在其輿論界散布蘇聯方面進犯日本的謠傳，四月中旬同盟社即謂「黑龍江的衝突難免」（四月十九日各報）；同時日本讀賣新聞也刊載謠言，稱四月四日外蒙兵士二人侵入內蒙，占據斯巴吉爾地方，四月十一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更稱：「蘇聯當局曾在北庫頁島一帶壓迫日僑破壞日方在該地之利益」，

繼之則又恫嚇說：「苟蘇聯有意增加現時局勢之嚴重性，則日本必將有所報復」（據四月十二日中央社電）。其為挑釁進攻主張本可以想見。

且看日本怎樣向蘇聯實際挑釁。記得在盧溝橋事變後不久日本即便調動大軍到北滿，並且即速完成包圍蘇聯遠東要塞的道路。其又繼今年初日本參謀部放出蘇聯將在三月至五月間出兵的空氣後，日偽越境挑戰的行動及利用白俄在蘇偽邊境活動，乃至反蘇間諜的陰謀，就沒有間斷過。其中最嚴重的第一事件就是去年十二月間蘇聯民航飛機及郵件在偽滿被扣。二月中，日本北海道當局又非法扣留遇難的蘇聯商船，雖然經過蘇聯的嚴重抗議，但日本當局依然加以懲罰並捏造船員及乘客招承間諜性的情報。四月上旬以後，跟著我國第一期抗戰勝利的進展及歐洲侵略者慶幸外交的成功，而日本更加大肆其向蘇聯的挑戰。四月十一日，即有日本軍用飛機九架侵入蘇聯邊境十四公里，飛至格羅得可佛省波爾塔伏卡南面地方，飛翔於蘇境五公里之上。數分鐘後又有日本驅逐機兩架，由偽滿邊境飛來，聯合在一處。因受蘇聯飛機的包圍而有一架被逼降落（據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日電）。最近蘇聯政府公布消息，日偽軍隊又不斷地圖謀侵入蘇聯邊境（據五月十一日各報）。日本最近還唆使偽滿停付購買中東路款項。這正如真理報所評論的，是一種「惡意的失信」，顯然表明日本反蘇聯的詭計，也是一種向蘇聯挑釁的新計劃。此外，日本強盜復又加緊「侵略者一種主要工具」的間諜活動。據法文莫斯科新聞報的分析，日本反蘇聯的間諜的嚴重性：日本反蘇聯間諜活動，範圍異常廣泛，其從事間諜的費用每年約有數千萬元，所用人員達數萬人，各國沒有一個國家可與日本比美。日本的間諜活動有一種特別組織和人員，專管搜集有關蘇聯的情報。在大多數國家內，日本外交機關，有專人主持對蘇聯的間諜活動，也有成群的流動偵探，自一國至他國企圖伸入蘇聯。整個海外日僑都在日本駐華沙大使齋藤指導之下，又受日本駐波羅的海各國公使

的實際援助，推進偵查組織工作。事實上，日本在海外僑民大多參加反蘇的間諜活動，幾乎「每一海外日僑均為一間諜」。

日本近來向蘇聯挑釁的積極，於此可以想見，但是我們始終要強調：日本這種挑戰完全和擴大侵略我國的戰爭配合著；「支那膺懲」和「赤露膺懲」始終是一譜交響曲。

四、蘇聯怎樣奉酬日本

蘇聯幾年來雖埋頭於經濟建設，「維護世界和平」雖然仍是蘇聯的外交方針，但是到領土及權益被侵犯時，蘇聯是不會示弱，更不會猶豫於「迎頭痛擊」的。自從我們全面抗戰爆發而日本積極挑釁以來，蘇聯當局即已屢次表示強硬態度。上次蘇維埃最高會議後，「不予敵人寸土」及還要「在敵人領土內打擊敵人」，已經成了蘇聯答覆日本進攻的最高原則。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日蘇關係」的演說中說過：「我們相信，我們定能反對外國的這種以及其他無理的行動而保障我們蘇聯的利益。我們敢向諸位同志擔保的，就是：凡是我們方面所必須採取的一切辦法，我都是一定會真正實行的。」最高會議外交委員長日丹諾夫也極力抨擊日本的行動，強調蘇聯遠東政策的積極化。最近，蘇聯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在他答覆日本大使重光抗議的聲明中，更可看出蘇聯態度之強硬。

蘇聯對日實際行動的報復，也不弱於言論上的反抗議。當四月十一日日本軍用飛機侵入蘇聯領空時，蘇聯驅逐機即不客氣加以包圍，迎頭痛擊，日機遂被逼落一架。同時亦於五月十一日封閉日本駐黑河及伯力的二處總領事館以防日本間諜的活動和陰謀。庫頁島及卡哈的日領事館早即被封。蘇聯政府還以斷絕郵務關係報復日本在偽滿境及扣留蘇聯郵機；扣留日本桅船及其船員以報復桅船維姆培案；對於去蘇聯活動的間諜，皆不

客氣地加以拘捕，三月中已有八名被捕。蘇聯給予日本在庫頁島北部的煤油開採權及他利權，將因偽滿停付中東路款而被蘇聯採用作報復手段吧！

然而蘇聯防備日本挑戰及阻止日本進攻的最積極的手段，應該首推蘇聯遠東軍事設備的強化，即令日本當局也都不能忽視。但本問題限於篇幅，擬不加剖述，但是「軍事冒險家」將不能得到任何便宜，則可斷言。

五、我們應有的認識

日蘇的糾紛和中日問題連著密切的關係，是無庸言的。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更要有深刻和正確的認識。至少下列幾點是值得順為一說的：

第一，日本最近反蘇聯宣傳及實際行動之積極化，是由於蘇聯在精神上及物質上援助我們抗戰。但從李維諾夫強硬反抗議之後，在日本強盜肆行之前，中蘇的關係客觀上是要愈益聯成一塊的。

第二，日本反蘇聯帶有侵略中國的烟幕彈的作用。日本強盜之侵略中國，原是找不出適當的理由，不得以而以「防共」為辭，以為搪塞歐美各國之用。

第三，最近行動之積極化，是具有響應德意孤立蘇聯之作用的。因此，日本的反蘇言論及行動需要積極化。

第四，日本反蘇也即間接疏遠中國與英美法等國的接近。現在世界和平的軸心不但建在英法，蘇聯特別是一個據點。日本宣傳蘇聯壓迫日本，無異於造謠說蘇聯破壞遠東和平，有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同時又極力宣傳蘇聯幫助中國作戰，結果冀望影響所及，英美各國不能積極援助中國抗戰到底。

日本侵略者的陰謀，處處都在中國身上用功夫，我們對於遠東的任何事變及動向都不能忽略或旁觀咧！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

原載一九三八年五月《時事月報》第十八卷第十期

日本軍隊的莫斯科

上月廿二日外電即傳日軍開五師團入陝西，日本參謀本部也同時揚言進攻蘭州。近日更加盛傳將以十八個師團犯戰陝甘寧區，切斷日方所稱「赤色國際路線」。日來華北各地日軍的調動又極忙碌，並已開始燒毀公路兩旁的民房，避免游擊隊的襲擊，集中駱駝向西運送汽油，華北敵酋亦恰於此時更迭，敵人冒險深入西北的動向似已相當顯明。

據說，這個侵逼西北的軍事計劃完全出於石原莞爾的傑作，日軍素稱石原為日本的拿破崙。他現任參謀本部的作戰部長，日本侵華的軍事計劃，大部分是這位日製拿破崙領導製作的，現在又要指揮「皇軍」向西北前進了。然而法國的拿破崙喪師在莫斯科，日製的拿破崙也要埋骨於西北，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好對照。日軍侵進西北只有送死一途，不用說日本已無法再調如許軍隊進西北，即令如數調來，結果依然是要全軍覆沒的。我們的理論根據如下：

(一) 西北一帶是第八路軍的政略及軍略浸透的地方，一般人民的民族思想非常濃厚，對日抗戰到底非常堅決，並且全部受過政訓與軍訓，游擊戰術相當精熟。當地軍民已經打成一片，一旦日軍到來，人民將必實行堅壁清野，全部參加軍隊作戰，日軍所遭遇到的，除游擊隊而外必無他物。日軍深入腹地，運輸已甚困難，所謂「現地主義」又無從實現，全部軍隊必至餓死。

(二) 西北交通不便，不是山陵崎嶇的小路就是地皮輕鬆的沙漠，軍馬尚難行走，何況重兵器部隊。山巔溪谷聯接的公路，一經破壞則不易修復，其時日軍不但前進困難後退卻亦不易，而我則可以利用這種自然環境襲擊，加以圍困，加以殲滅。平型關大戰以來山西各地的苦味，日軍當不至健忘。

(三) 再就軍隊生活一項言，日軍侵入西北將如迷困於北冰洋，不但飲食來源絕斷，即氣候亦不適宜。西北地勢高燥，飲水困難，掘井要深至五百公尺始能得到水源。因為西安已在海面五百公尺的高原，蘭州更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我們在撤退時將水井全部埋塞，即可不戰而制日軍的死命。當年西北軍退西北時因人口驟增，飲水不足供用而人飲馬尿，日軍所遭遇困難當更加劇數十倍。西北氣候嚴寒乾燥，對在島國生活慣的日軍是個大敵，日軍受此天然的大敵包圍，其死亡率將更高於長江上游一帶。

我們不是故作危言聳聽，日本軍閥如有決心調動大軍深入西北，企圖完成其隔絕中蘇合作的迷夢，則西北廣闊無垠的沙漠，盡夠埋葬帶著鹹魚臭味的一切侵略者。

然而日軍進攻西北的政治陰謀卻是我們應該深加注意的。第一，日軍伴為停止華南之進逼，用以緩和英美的強硬反對，避免目前更進一步的衝突，並可使英法對日的備戰鬆懈下去。第二，日軍伴為進攻西北包圍蘇聯，揚言切斷所謂「赤色的國際路線」，用以淆亂世界的視聽，離間英法與蘇聯之密切合作。第三，日本公然宣稱進攻西北為包圍蘇聯防堵赤化，欺騙中國的所謂流彈論者及一部分不諳國際情勢者，以收分化我內部的抗日勢力。我們在日閥這樣政略與戰略之前，除加強西北軍備的力量予以迎頭痛擊及包圍殲滅外，還須發動國外的宣傳力量，揭發敵人的陰謀，使外國人士及本國國民不為所動。

原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四期

日本進攻英國嗎？

日本試行更大的國際冒險，占領了英法日條約上不能占領的海南島，不但是對法國的威脅，事實上也就是對英美的威脅。日本抓住英國名為現實外交而本質未確定方向的外交弱點，每逢歐洲發生嚴重問題時即向英國作進一步的脅逼。日本繼占海南島，企圖包圍香港，切斷新加坡與菲律賓的聯絡，並威脅南部亞洲英國一切的屬地之後，第二步的工作以幾個漢奸被暗殺為理由要求掌握上海工部局的權柄。同時又向中英交界的深圳地區肆行轟炸，還有八架「怪機」飛越香港的上空。在這西班牙政府退出巴塞隆納而德意更加壓迫英法的時候，又在日本派遣代表參加柏林德意日三國會談而德意要求日本加緊威脅英美法昨天，尤其是在日本侵華戰爭已至十分疲憊而急於結束的今日，日本對英國進一步的緊逼，是具有很大的意義的。

日本對英國這一串的進攻，其粗暴狡猾的程度很明顯地已是玩弄著英國了。最近上海方面隨抗戰的進展，大批漢奸連三接四地被鋤奸團所槍殺，日本即謂上海工部局沒有維持治安的能力而要求交出治權。這明明是笑話。試問東京也常發生「神兵事件」，二、二六事件等類的凶殺案，是不是日本失掉維持治安的能力？這不過是對英國工部局的侮辱罷了。再如日本飛機居然敢對英界肆行轟炸，並以機槍掃射，死傷英國印警及關兵甚多，為香港有史以來所未觀。事後日本一方面由陸軍省發表公告，聲稱「此事是出於炸彈一枚之誤投」，並謂「日軍部已向英當局道歉」；但另一方面則由日本駐港領事織田否認其遵照日本政府訓令向港督羅富國表示憾意。這種反覆無常的詞令，當然不只是出於一個外交官的意思，而實在是日本故意玩弄英國。

日本看清楚英國能否提出更實際有力的抗議，完全決定於美國是否支撐英國的腰。

就目前看，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力量確實勝過英國，也勝過美國，但是英美能切實聯結則又可以勝過日本，美國實施經濟封鎖則日本立刻處於必敗之地。在去年巴納事件發生的時候，美國 Leahr 大將極力主張共同封鎖日本，則美國可不損失兩隻以上的兵艦而打勝日本，因為日本情形和意大利不同，這島國孤懸海面，和世界其他國家隔離，英國派二十四隻兵艦在新加坡，俄國已駐五十多隻潛水艇在海參崴，英俄很容易隔斷上海與長崎間的交通，日本軍隊沒有給養就不能生存，中國抗戰又這樣得力，不到三個月二個月工夫，日本經濟就崩潰了（見美國時事評論家 Pearson 及 Allen 所揭露的消息——《大公報》一月七日）。今日，巴納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太平洋上的情勢還沒有很大的變化——在日本經營海南島未完成以前。所以日本對英美法的壓迫，還不過是一種恫嚇。雖說日本這種威脅還有更進一步的可能。

日本威脅的用意，一方面固要英美停止援華，一方面又是在逼迫英國出為調人解決中日的戰爭。但是這種調人之難為，是英國所嘗過的苦味，相信英國不會再嘗試。那末抵抗日本的威脅和壓迫，就只有英法蘇切實聯結包圍日本，至少要真正拿出一隻「鐵拳頭」給準備擴大國際冒險的侵略者看看。

原載一九三九年二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六期

日本再度向蘇聯屈膝

脆弱的侵略者慣用的手段是虛作手勢欲藉恫嚇以達到目的。但是碰到強硬的對方示以嚴厲的目光或還以痛快的還擊時，即便屈膝跪地求饒。

日本自去年秋間的張鼓峰事件上對蘇聯屈膝後，這次在蘇日漁約糾紛上的屈膝，算是第二次。日本對於漁約的糾紛自始即大吹特播，態度極其強硬，甚至聲言要以武裝自由出擊，但是結果卻忍受了蘇聯所提解決漁約的基本條件。蘇聯全國人民「還侵略者以兩倍或三倍以上的打擊」的決意，獲得了最後的勝利，日本侵略者的「臉」卻丟盡了。

在這次新漁約的規定上，日本侵略者蒙受了極大的損失，各通訊社所傳蘇日新漁約的內容概要如下：

1. 蘇日兩國確已成立協定，將一九二八年漁業條約略加修正，並延長時效一年；
2. 在蘇日新漁約中，蘇聯為軍事上之必要，保留三十七處漁區，不予拍賣，但另於其他海面撥出無關軍事的十個漁區，以為抵充；
3. 日本方面所繳租費，應提高十%即增加三十萬日元。

要而言之，日本在新漁約簽訂上，不但蒙受了經濟上的損失，並且蒙受了軍事上的損失；至於政治上的作用，則更完全喪失（詳情參閱本期論文）。漁區縮小了，而租費卻反增加，軍事上必要的漁區則為蘇聯所收回，進攻蘇聯的假威風，更為英美法乃至幫凶的德意所看穿。最近風傳德國供我國以一部分軍火，並締結物物交易協定，這當然是對日本的一種威脅。日本的元老、重臣、政黨乃至一部分財界有力者，反對日本加入德

意日三國軍事同盟，已使希特勒大感不快，這次再向蘇聯屈膝，將更失掉了德意幫凶的歡心。日本侵略者到這地步，更加暴露其國際的孤立了。

但是日本侵略者絕不肯放棄進攻蘇聯所只發生的政治作用。所以新漁約成立未及一周間，蘇偽邊境重又發生嚴重的衝突。據哈爾濱的外訊，這次的衝突確是日偽軍先向蘇聯發炮挑戰的，那末日軍的用意是可知的了。重慶六日中央社傳外訊稱：日本政府又議決對我政治新陰謀若干條，電令其在華軍事首領切實執行。其中有一條是要在華軍政人員極力宣傳「反共侵蘇」，為欺騙世人及我國的「烟幕」。日本侵略者對於蘇聯，依然不停其烟幕式的恐嚇及虛作聲勢的挑釁，充分暴露其自家的無力。世界上實在沒有比日本侵略者更卑鄙、更怯弱的。日本人所自誇為「超人」的真面目就是這樣嗎？

原載一九三九年三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一期

日本排英運動

日本自從積極侵略中國以來即已種下排英的種子，前年對華全面侵略戰爭發動後，英日之間的利害衝突已演至無法調和的地步，英日重盟的幻夢也因此完全打破。一方面，英國為著維護她在華的權益積極幫助中國抗戰；另一方面日本則企圖獨吞中國排除各國，於是英日之對立遂日益尖銳化。所以在去年近衛內閣大改組而未次大將任內相的時候，日本排英的運動即帶上了政府正式發動的色彩，受到日本國內外諸多方面的批評。現在末次內相雖已辭職，但最近則因英日衝突的深化，而日本排英運動走上一個新的階段。

這次的排英運動依然是在極右派法西斯的指導之下發動的，政府發動的色彩比以前更為濃厚，其規模並且擴大到中國各淪陷地區。最近日本國內因為英法亦積極援華抗日的原由，排外運動採取一般的形式，但在中國淪陷區，則採取專一排英的方式。其主要原因是英國最近又再借與中國一千萬鎊的匯兌安定資金，積極支持中國法幣。日本認法幣為抗日的強韌力量之一，故日本各界皆認為英國此舉為「非友誼的措置」（日報《大阪每日》的特號標題）。有田對於英國對華的借款也公開聲言其為「強化蔣政權」。於是日本各報一齊著文強調：「英國若始終固執於其傳統的遠東政策，則今後日本在推進對英國的政策上，必須一擲從來的協力態度，加強採取新方策對付的決意」（《大阪每日》三月一日）。

日本在中國淪陷區發出排英最響亮的一炮，是東方會總裁中野正剛。他是排外最激烈的主帥，老早就已著作論文攻擊英法蘇為日本的真正敵人，稱他們為「覆面魔王」，主張把他們的勢力逐出極東天地之外。中野最近更在上海大發狂言，除攻擊日本的軟弱外交外，還主張：「當日本占領廣州時，余以為更應用帶甲的拳頭打倒英國。……英日

兩國在華勢力針鋒相對，如日本一退縮，英國即將擴大」（據三月七日美聯社）。

同時，中國淪陷區的偽組織也皆發起排英運動。日本除指揮偽組織排英外，並且公開聲明：「日軍占領區內的反英排外運動乃自動者，……因各外國援助重慶方面也」。

「反英運動如不侵及外人生命財產，則日方不擬加以制止」（美聯社三月三十一日電）。

日本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更就這種排英運動大吹特播，南北偽組織排英運動演至最近更加具體化。南京偽維新政府公然發表談話，主張：「公敵的英法蘇三國人，應即加以驅逐。」三月三十日南北兩偽聯合會又在南京發表宣言，肆意攻擊助我抗戰的各國，對英攻擊尤其厲害，該宣言且對英國大肆恫嚇，謂：「英法如果敢再對『維新政府』採取『反和平』的行動，『維新政府』將放棄其一貫的『友好』態度，不再尊重各國的既得權益。」

日本排英運動演至最近達到了一個新的情勢，即在中國各淪陷區普遍地發動並且集中到英國一國身上，淪陷區到處皆組織所謂「反英會」，即對於兒童也灌注反英教育。據南京特訊，在日本的占領區內，已有五十二個反英會成立，淪陷區各地的婦女會，也已開始抵制英貨。南京的反英會發表宣言，痛斥英國侵華，開封也開了一個民族大會，由男女傀儡大放謬論，並通過議案，警告英國協助我抗日政府。目前反英運動普遍採取的方式為二：其一是散發反英傳單，其二是舉行反英遊行。

日本在侵華的軍事及政治陰謀相繼失敗的今日，排英運動具有兩種的意義：一為壓迫英國停止援華，一為強制英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諒英國也不會上它的當罷！

日本對第三國政策的二元性

日本侵略者內部的矛盾、意見的分歧，及政策的錯亂，處處表現於內政和外交上。日本資本主義組織的複雜性，甚至於表映到外交的策略上，演成日本傳統的所謂「二元外交」。這種二元外交，一方面反映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複雜性，另一方面又恰好適應於狡猾陰險手段的運用。

具體地說來，日本平沼政府固然提倡著「親和萬邦」的外交政策，事實上依舊「踏襲」著宇垣外相的後塵，努力於調整日本與各國的關係。但另一方面，日本駐華軍隊及官憲卻繼續不斷地排斥歐美各國的權益，最近且已由經濟利益的驅逐，演至政治權限的侵奪了。天津租界問題還未根本解決，上海租界的大騷擾又繼之以起。最近更於五月十一日下午派遣陸戰隊在鼓浪嶼登陸，架設鐵絲網、沙包等作戰障礙物，隨意搜查住戶，大捕華人達二百多人，蹂躪英法三國的治權至於極度。後來雖得英法各國艦隊駛抵鼓浪嶼，並聯合派兵四十二名登陸維持秩序，日軍終不得不撤退一步。但是日方的態度依然強硬蠻橫，要求引渡工部局所拘捕的所謂擾亂分子，聲言接收鼓浪嶼法庭，上海日本領事且向領事團抗議英法三國海軍在鼓浪嶼登陸，情勢依然很緊張。

對於鼓浪嶼事件，我們首先應加認識的是：它不只是一個地方的問題，而實在構成日本對第三國政策的一方面，即軍部及駐外軍隊的態度。他們還在各地淪陷區發動排外反英運動，聲言要把歐美人的權益完全驅逐出去，更可知鼓浪嶼事件確是整個性的問題。這派蠻幹成性的傢伙素來即不服他們政府的命令，往往他們幹出了既成事實之後，其本國政府的外交方策始隨之改變或與之唱雙簧。

少壯派軍人認為日本與第三國的在華衝突是無法調和的；他們的機關報極力主張：

「若一味求之於第三國的關係，則不但失掉『事變』的意義，並且適足以永久束縛日本於第三國牽制之下」（《國民新聞》）。即對各國在華的租界問題，軍部系統的《讀賣新聞》也主張：「溫和手段已不足以解決公共租界，政府覺有對公共租界施以外科手術的必要。」死硬派的主張何嘗把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針放在眼下！

原載一九三九年六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三期

日本為什麼沒有參加德意同盟

五月上旬德意兩國政府一同宣布兩國軍事同盟的成立，其範圍尚涉及政治。意國外長齊亞諾在他們的機關報《電訊》上，就其主旨宣稱：「意德兩國均承認彼此各有利益範圍……兩國休戚相關，共同負保衛責任……蓋兩國均明白一國的失敗即別國的不幸。」這樣的內容在論理上是很適應於國際孤立的日本需要的，然而素來倚重德意為犄角的東方侵略者，竟未加入這個軍事同盟。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

然而自我國抗戰進入第二階段以來，日本的內政和外交均陷入於彷徨苦悶的情勢下，平時以革新領袖自命的平沼上台後，一隻字都不敢提到改革，對內主張「總親和」，對外則謂：「日本不該胡亂排除第三國在華的經濟活動乃至權益」（在興亞院的訓話），對於中國則夢想著：「國民政府也將達觀大局，拋棄容共抗日政策而歸於正道」（在精神總動會員的演說）。平沼的外交政策尤其具體表現於這麼一句談話上：「日本既不屬於民主集團，亦不是極權國家集團中的一員。」這自表面上看來，是一種外交的烟幕彈，但自其內幕看來，卻又實在反映著日本一派有力分子的政治意識。日本的元老、重臣、一部分財閥乃至穩健派軍人，皆感覺到中日戰爭延長下去的危險，希望能夠早日結束。在瘋狂的少壯派軍人執意孤行已達二十二個月，而實際上沒有得到什麼結果的今日，元老重臣派的這種意識，自然要占相當的優勢，再加以他們在日本憲法上及實權上的特殊地位，更很自然地形成支配的力量。這種支配的意識在對第三國的政策上就是表映為「親和萬邦」了。因此，日本對於德意的三國軍事同盟的主張，就很自然地分成兩派：其一是主張參加同盟的少壯派軍人；其二是主張持重中立的元老重臣派。據我的觀察，在世界兩大營壘的集中未大顯明以前，元老重臣派的主張是要占決定的勝利的，所以對於德

意日三國軍事同盟不敢悍然參加。

然而日本元老重臣派的主觀，終久是阻撓不了客觀情勢的發展。世界的情勢已進到相當於歐戰前的「同盟時代」，協約國與同盟國集中化的結果爆發了歐戰，現在世界大戰的危機已很逼切，各國的備戰已達相當高度，各國外交的縱橫捭闔正如歐戰前的緊張事實上，日本既不能中立，又不能加入英美法蘇的集團。剩下的一條路，就只有參加德意侵略者的集團。因此，我敢斷言：日本加入三國軍事同盟只是時間的問題。

原載一九三九年六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三期

德意軍事同盟與日本

德意兩國的政治軍事同盟，已於五月廿二日在柏林簽字成立，原是無可驚奇的，所奇的只是日本還沒有加入，在侵略集團與反侵略集團對立日益尖銳化的今日，在兩集團雙方皆深覺有緊密團結以實行集團鬥爭的必要的現在，特別是在世界各國積極備戰，勾心鬥角已到世界大戰的前夕的所謂「同盟時代」，日本侵略者竟沒有同時參加這一同盟的簽字，確是一樁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一）日本為什麼能夠不參加這個同盟？（二）日本是否永不參加這個同盟？

據我的觀察，日本參加德意日軍事同盟，只是時間的問題，日本究竟何時參加？完全要看日本對外政策的步驟來決定，這又和日本對華侵略戰爭著密切的關係，日本侵華軍事的疲敝，不但促成日本內政矛盾的深化，並且造成它的對外政策彷徨無定，自從我們的抗戰進入第二階段而日本軍隊事實上沒有更大的進展以來，日本對華政策即陷於極大的苦悶中，少壯軍人雖然仍夢想著武力的「征服」，但是受過較多事實教訓的元老、重臣、政黨、一部分財閥及穩健派軍人，都為著安定日本後方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起見，主張早日結束中日戰爭，於是所謂「親和外交」遂又實現於新內閣首相平沼的言論上。起初，少壯軍人的氣焰也曾稍被壓服下去，所以板垣以下的軍部跳梁漢，緘默了一個時期，沒有發表過意見。早日結束中日大戰，運用武力既不可能，自然要採取政治的手段，但，直接與中國抗日政府談判既不可能，自然需要一個第三國出頭調停，這個第三國當然以英國為最適宜，所以英國駐日本大使克萊琪到上海來和駐華大使寇爾聚談。不過，結果完全出了日本意料之外，對中國抗戰抱著熱烈同情和堅決信任心的寇爾的意志克服了克萊琪所想像的不可能的期望。同時，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對日本駐英大使重光葵試

探的答覆，又打斷了調整英日關係的希望，平沼的「親和外交」，事實上又陷入泥淖之中，日本外交又一度碰了壁。

日本所以不敢率然參加德意日軍事同盟，元老重臣們所以堅決反對參加這個同盟以免開罪於民主國家，是完全受到這一階段「親和外交」的意識的支配的。

然而，客觀事勢的發展，卻又使日本元老重臣等如意的算盤不得不紊亂了，因為中日大戰的結束，除了日本軍隊全部退出中國之外，就只有彼此死拚到底，並且要把關係密切的第三國捲進漩渦去，英國既不能為日本所利用，結果還只有一個打，於是少壯派軍人的手勢又來得更耀目了：華北、華中及華南各戰場增加了不少的新軍隊，日本海軍積極經營太平洋的海軍新根據地，如華南各據點，日本空軍又是慘無人道地到處大肆其殘暴的轟炸。另一方面，日本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及《讀賣新聞》等，則大做文章，先分析侵略戰爭的新階段，繼而討論對付第三國的問題，終於得到既不親和就須加以排斥的結論。近來中國淪陷區排外排英運動的普遍化，日本輿論之更積極攻擊英法蘇，以及陰謀對上海租界加以外科手術，悍然在鼓浪嶼登陸橫行，嚴密封鎖中國海岸，干涉外國輪船等等，都可證明日本對第三國的外交方針的確已在開始變化了。

最近日本屢次舉行的五相會議，結果如何雖未發表，但其關心於歐局的變化，並謀確定日本新外交政策的方針是事實。依我們的推測，日本終局不能夠逃出「同盟時代」的圈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各國外交極盡縱橫捭闔的能事，結果分成同盟國與協約國的兩大營壘，到形勢明朗化後，大戰就爆發了。現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積極準備階段，各國自然也以「同盟」的名目漸漸集中化，最近幾天這種集中過程確已有明顯的變化。自德意軍事同盟締結以後，英法受了極大的刺激，而英蘇的談判有更積極的發展，相信將必奠定反侵略陣線的基礎，把反侵略國家及有被侵略危險的國家集中團結起來。

英蘇法軍事同盟的影響將不獨限於歐洲，其必然的結果勢將遠東捲入侵略與反侵略兩集團鬥爭的漩渦中去。所謂軍事同盟的基本條件，當然要「在絕對相互動作的基礎上決定三國共同的措施」（所傳蘇聯提出的條件），其意思就是說：三國中任何一國受到侵略時，其他兩國應即出而援助，在遠東有被侵略可能的國家，已不獨限於蘇聯，英美的危險性尤其大。日本最近竟公開宣稱對上海租界有施以外科手術的必要，英法太平洋上的屬地恐怕也要受到外科手術刀的洗禮吧！這樣一來，將更促進日本與英法蘇的對立。

另一方面，希特勒要求日本加入軍事同盟，將更逼切，他甚至不惜對日加以威脅利誘，日本政府內迫於少壯派軍人的威脅，外制於德意幫凶的威脅，「親和萬邦」的政策既不可能，在兩大營壘的對立情勢又不能孤立，結果將必走到應走的路程上去，加入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或更廣大的世界法西斯集團軍事同盟。

（一九三九年五月廿三日）

原載一九三九年六月九日《廣西日報》

日軍南侵北攻下的新出醜

日本侵略軍事自在中國內地各戰場上無法再進展以後即移其槍口於中國南北的邊境，其作用與其說是對中國，倒不如說是對第三國。這裡含著極濃厚的國際意義，同時於軍事問題之外還具有政治的成份。

在國際關係發展至同盟時代的今日，歐洲侵略首凶的德意，更覺有趕快更嚴密締造侵略陣線的必要，但自德意軍事同盟成立而日本竟未參加以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對於日本政府特別是軍部，頗感快快不快。另一方面，日本傳統二重外交的陣營中，軍部自可以不管日本政府整個外交方針如何，而另外和外國進行不同的勾結。日本軍部欲討好德意的歡心，一方面暗中與希特勒及墨索里尼進行軍事同盟締結的磋商，一方面又於南北發動軍事行動響應德意在歐洲的橫行。

六月間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曾與希特勒磋商日本參加德意軍事同盟的問題，當時希特勒的要求有三：（一）日本趕快參加三國軍事同盟；（二）日本海軍在華南等地發動戰事，威脅英法，牽制英法的歐洲行動；（三）佯為進攻蘇聯以離間英蘇，另一方面積極壓迫英國，務使英蘇法三國協定不能正式成立。聞大島當時滿口答應。然而參加三國軍事同盟的消息為東京日本內閣所知悉後，引起了文治派與武功派間的極大糾紛，結果首相平沼拒絕加盟，板垣則加以威逼，小磯更從中操縱，日本政界起了一大漩渦。

但是無論東京政界如何波動，日本海軍居然在鼓浪嶼發動事件，果然如希特勒的要求，幹得有聲有色。可惜英法海軍的聯合行動，倒把冀圖僥倖的日本海軍軍人先兵後禮、先軍事而後外交的幻夢打個粉碎。繼上海事件之後，日本在外軍人又大丟一次臉。日本海軍依然出了希特勒意料之外，仍舊沒有用。

希特勒尤其對日本陸軍失望。據說，希特勒對大島說過一句「痛心話」！日本陸軍侵華作戰的失敗，需要十七八年後始能恢復元氣。陸軍主腦自然大感不安和不快了。於是為爭一口氣並且響應德意，遂向蘇蒙挑戰。在這戰爭中，日方雖然大吹其牛皮，但是事實卻又證明：日本皇軍又是一次大出其醜。日本飛機在第一次向蘇蒙侵犯中被毀了六十五架，第二次又發動六十架去侵犯，結果又被擊落二十五架。

日本政治和軍事方針已起了相當的慌亂，「皇軍」在中國各戰場碰了硬釘子，其北進對蘇聯，南侵對英美法荷，更要碰到強硬的釘子。英美蘇法必須有深刻的自信，日本現階段的一切軍事行動只是虛張聲勢，恐嚇恐嚇罷了。其間存著的唯一的危險性只是英法有時會受了日本的威逼利誘起了惶惑而已。東京談判已在進行中，但是日本的任何酷刻要求必不能使英法美接受，是又各國自己應有的覺悟！

日本軍事代表團赴德意

日本侵略者最近派遣軍事代表團赴德意（廿八日抵港轉歐），據日方所宣布表面的消息，其使命是在參加九月二日至十一日德國納粹黨大會及十月廿七日意大利法西斯黨羅馬進軍紀念大會。但據各方特殊消息及我們的推測，問題必不如是簡單。這次被派遣人員當中，有前華北日軍司令寺內壽一及前日本海相大角岑生，並附有陸海空軍軍官多人為隨員，其用意所在是不難想見的。若只為參加慶祝大會，則有駐德大使大島中將，及駐意大使白鳥敏夫，已夠資格了。日本此次軍事代表團之遣派實含有重大的軍事意義，寺內曾任駐德武官三年之久，有老牌「德國通」之稱；大角也曾任駐德武官，也有海軍老牌「德國通」之稱。又在代表團起程之先，已有一批軍事專家先行秘密赴歐，蓋欲先著手於歐局的研究，以備軍事代表團到後進行各種軍事談判。

很顯明的，日本這次軍事代表團的派遣，是應希特勒的要求準備加強侵略集團的勾結，日本與德意的軍事同盟，或者將由日本軍事代表團具體締結成功。觀察日本內政最近的演變及少壯派軍人指揮下日本外交最近的作風，日本之加入軍事同盟，似是侵略者勾結更高發展的必然歸趨。最近日本內部，少壯派軍人與元老重臣財閥之間曾發生尖銳的磨擦，「六月暴動」在戰時既不便於發動，則處於元老重臣特殊地位壓抑下的少壯派軍人，自然另找控制辦法於外交上。他們僥倖又得於恐嚇英國的策略上收了相當的效果，即秉承元老重臣財閥意旨的平沼，事實上也無可如何。

日本瘋狂的軍人到戰爭第二年的今日，也已覺出侵華戰爭是一樁極艱難的「事業」，而在這種艱難的後面還有更艱難的幾著棋跟著，國際風雨日益加緊，希特勒勸日本勿再耗費陸軍於中國戰場上，因截至今日，日本在華的損失非經十七八年不能恢復元氣，即

欲日本保存多少實力以對付英美法蘇。所以，日本軍人最近的作法，是縮短「板垣停戰線」，而著力於應付國際糾紛的準備工作，少壯派軍人所以毅然企圖強化德意日的軍事合作，原因即在於此。近來日軍及與軍人勾結最密的有田外交當局，特別與英國尋仇生非的原因，也在這裡。此後，日本不但要在外蒙邊境冒險，或者還要進一步在太平洋上發瘋呢！

然而太平洋上的風浪並不太平，英國雖對不起為他保衛權益的反侵略實行者的中國，對侵略者的日本表示相當讓步，但是日本要碰到的難關還是層出不窮的：第一，英國雖表示某程度的讓步，但他能否根本放棄遠東的權益，還是絕大的疑問，我們無寧相信，英國是在運用它的政策。第二，美國不能追隨英國的遠東政策，已於昨日宣告廢除美日商約的壯舉上充分表示出來，對於決定太平洋前途及中日大戰勝負，舉足重輕的美國，既準備以有效的辦法維護其本國在華的權益，英國諒亦不會再妄自菲薄了。第三，不折不扣而忠實執行他「給與侵略者加倍打擊」的政策蘇聯，已在蒙偽邊境用實際行動證明他的決心了。日本軍人欲借對外冒險的僥倖成功鎮壓元老重臣財閥，但其結果倒反會因對外冒險的失敗而增加國內活動的困難。

日本侵略者之加強德意日軍事合作，已不成問題，吾人要特別提醒的是：民主陣線支柱的英美法蘇，應有更深刻的覺悟，考慮如何去利用日本內部的矛盾。

美日鬥爭的新開展

一、日本對美態度的轉變

自從七月廿六日晚上美國國務卿向日本駐美代辦送致通牒，宣告廢除美日通商及航海條約以來，日本方面雖然憤慨，日本駐外軍人雖也鼓動傀儡反美，但其根本態度仍不失為慎重鎮靜。但在這鎮靜當中，逼於客觀情勢的發展，事實上卻醞釀著一種根本的轉變，這種轉變又足以增進美日兩國太平洋鬥爭的劇化。

美國廢除美日商約的消息到達日本時，日本各界也曾一度相當衝動過，日本各報著述評論，指摘美國此舉為「非友誼的舉動」，經濟界評為「經濟競爭之開始」，甚至如外務省美國司司長芳澤，接到通牒時表示「十分遺憾」，並謂：「如美國一日繼續堅持其目下對日的態度，則縱使美國提議另立新約，也難期獲得滿意的結果。」另一方面，蠻幹成性的日本在外軍人對美國僑民的侮辱事件，也是依然日有所聞。山西連續發生排美事件，霍縣的美籍教士竟被驅逐出境。岳陽的美僑也與英僑同時被驅逐而住宅被侵占，同時美孚洋行油池更被日軍燒毀。河南信陽城內竟於八月五日遍貼排斥英美的標語，是為以前所沒有的事例。但這些言論和行動，還是一種因一時憤慨激起的局部的瘋狂行為，還不是決定的基本的態度。在這些狂妄的言論與行動當中，還包含著慎重、鎮靜，討好美國，希望美國態度好轉的因素。日本官方認為在東京英日談判中，美國此舉是「要英國檢取火中之栗」。他們還表示：如美國願乘廢除美日商約的機會，重新確立美日的關係，則日本準備接受。日本民間也認為廢約效力須六個月後，其間尚有訂立新約的可能。

這種情形比之數年前美國實施《限制移民條例》的消息到達日本時，日本國民瘋狂至於「割腹」的情狀，真是鎮靜多了。即連駐華軍人及官憲也都客氣些，最近黎查斯夫人在天津被日軍批頰後，日本領事及北平日本大使館即向美國大使館北平辦事處道歉。這也是日本態度持重的一種表現，同時也是討好美國的餘音。

然而日本對美國所抱幻想已有逐漸消滅的可能。今日東京的外訊，告訴我們：「日本現正準備對美國最近廢止美日商務航行條約一舉，加以有力的答覆」。該項消息又稱：《朝日新聞》揭載日本外務省現正與某特別委員會聯合開會，討論日本將來對美政策，該報並謂新政策將為一「有力者」，俾以應付美國的態度。當然的，瘋狂侵略者總會想到：二十多年來日本向美洲侵進及活動所引起美日的尖銳對立，必然促使美國設法壓制日本，特別是目前日本陰謀排擠美國權益完全出於中國之外，美國更有加以制止的必要。這是侵略者日益孤立化的悲哀的自覺，同時又是國際冒險者在無軌道的妄動中要更進一步蠻幹的起點。

二、美國準備制裁日本的動機

美國廢除美日商約，雖然還不能算是制裁日本的實施，但卻可以說是制裁日本的準備。此項只查察美國國務卿送致日本駐美代辦的牒文及美國國務部的宣告，即可窺見一斑：「……基於目前形勢之進展，美國為求較為有效地保護美國利益及為利便新的考慮起見，特提出通告……」（國務卿牒文），「美國決廢止一九一一年美日商航條約，藉為禁止運載原料赴日先聲」（國務部的宣告）——華盛頓七月廿七日路透社電。美國國務卿赫爾對記者的談話，也有同樣的表示。

美國廢除美日商約的用意在於準備制裁日本，再自廢約的動機考察更可明瞭。美國

廢約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只就最近的四種動機分析看，即可理解美國準備制裁日本已經非常明顯，並且這種用意目前即已發生效力，無須乎等到六個月後。

美國政府突然宣告廢除美日商約的第一種動機，在於造成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提案發生效力的前提條件。畢德門是美國痛恨日本侵略者同情中國被侵略者的第一個人。自我對日全面抗戰發動後，畢氏即便大聲疾呼世界各國設法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動，要求美國早速對日實施經濟制裁，便於不戰而使侵略者就範。最近在修正中立法案被擱置後，更加急忙地提出禁止運輸軍火及各項原料品供給日本的提案。但是這一提案要發生效力，其前提條件須廢除美日通商及航海條約，取消該商約所加於美國的條約義務，因為美日商約規定美日彼此對於貿易不能以歧視加之對方，而畢德門提案恰與此項規定抵觸。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擱置畢德門的提案的理由，也就是這個現行美日通商條約的存在。美日商約今日被宣告廢除，即六個月後的一九四〇年一月廿六日以後，條約即告失其效力，明年一月間美國國會重開時，畢德門提案即可提付討論而獲得通過，並實施禁運。

宣告廢約的第二種動機，可以說是對東京談判進行中的英國提嚴重的警告，並勸日本勿苛求過甚。在東京英日談判中，英國實已出於日本意料之外（港地日人自己之宣稱）步步退讓了。在允許引渡刺程案四華人，違反中國國權之點，第三國還可忍受，但是日本要求交出天津存銀及禁止法幣之使用，若為英國所承認，則第三國將受貿易上巨大的損害，美國與中國貿易關係甚切，當然不能默認。在英國節節對日退讓的時候，美國即再三表示不能苟同，不能置身局外，含有警告英國的意思。英國不能領會，美國遂以實際的行動表示意志。《紐約泰晤士報》華盛頓訪員說得好：美國總統此項緊急措施「無殊向日本及世界宣告：關於天津事件，英國縱或可以讓步，但美國之政策不能與英國相同」。

美國此次廢約的第三種動機，在於對蘇聯表示願意共同制裁日本侵略者。美蘇親善關係隨遠東侵略者行動之日益瘋狂而有加速進展的必要及趨勢。美國欲根本制止日本侵

略者的瘋狂行動並消除本國及其鄰邦被侵犯的危險，固然須與英法合作，但是事實上更需要和蘇聯合作，因為蘇聯還擊日本侵略者的意志比較堅定，其實力也較雄厚而可靠。因此，年來美國對蘇貿易關係日益進展，美國且為美蘇親善進展前奏而改進兩國的貿易關係，決定延長美蘇通商條約一年。在美蘇商約延長條約未簽訂以前，率先宣告廢除美日商約，其用意即在於對蘇聯表示好感，表示美國願意與蘇聯採取共同步驟制裁日本，使蘇聯肯簽訂較有利於美國的美蘇商約（新約規定：蘇聯每年最低限度須購買美國貨物八百萬鎊，而蘇聯對美輸出額不得超過四百萬鎊）。

美國廢約的第四種動機，在於緊急報復日本對美國在華權益的侵犯及對美僑的侮辱。一年來美國在華北的權益，特別是青島方面的權益，日被侵略者所侵犯。這些權益最近更因日本掠奪華北經濟政策的實施而有完全喪失的可能。自日本封鎖天津英租界而英國隱忍順受及英美法不能聯合抵抗以來，日本的狂暴軍人更感覺到：不但英國軟弱，即美國也未嘗不可欺。所以許多暴行與侮辱不但加於英國僑民並且加於美國僑民身上，美國僑民之受辱事件就日有所聞了。七月三日駐紮蕪湖的日軍，曾以手掌猛擱一個美國僑民、一個美童，及一個加拿大婦人，引起了美國人士的憤恨。這是美國宣告廢除美日商約不幾天前的事。因此即謂美國此次之廢約為日本侮辱美僑所激成，並為美國保護在華權益的嚴重表示，也未嘗不可。《紐約泰晤士報》論美政府宣布廢止美日商約事稱：「美國不僅欲維持其權利，且願以報復行動作為日本所干犯的權利的後盾」。該報又稱：「美國此舉之意義即在於表示：倘日本令其在華士兵，不斷地擱美國人民之頰，藉以故意令美國在遠東丟臉，則遠東全體人士，必須明瞭美人將以強硬態度保持其權威……」（紐約七月廿七日路透社電）。這是代表美國民意的言論。

三、美國宣告廢約的直接影響

美國這次廢除美日商約，確如我駐法大使顧維鈞對新聞記者的談話，是「一種合時與勇敢的行動」。本刊也於前兩期著文，標題《美國宣告廢除美日商約的壯舉》，估量過它的效力。我們相信此舉對於英法維持遠東均勢的怠性打下一針興奮劑，對於維護人類正義與國際公約，對於增強遠東反侵略的力量，促進真正和平早日實現，必具有重大的作用。不過我們率先要承認的是：在美國這次廢約宣告的直接影響當中，精神的大於物質的，政治的大於經濟的。這裡只縷列重要的影響，剖述於下：

(一) 對於英國遠東政策的影響

在美國宣告廢約以前，英國政府雖然依舊常在那裡表示英國的基本政策不變，但是東京英日談判中的英國態度，卻是無疑地一再退讓著。在日本軍隊封鎖天津以後，英國確實對日本作過幾樁顯著的不合理的讓步。第一，英國答應地方性質的天津事件移日本東京去談判，這無異承認英國準備和日本磋商關於中日戰爭的一般性的問題，也即無異表示英國對中日戰爭的態度有改變的可能。倫敦《泰晤士報》也贊賞張伯倫這種辦法為「忍耐外交的成功」。第二，在東京談判的開首，英國即接受日本所提條件的第一條：天津不應容許華方用作反日活動的根據地。張伯倫居然在眾議院宣稱：將確定天津租界的性質，維持中立，英國甚至對於天津日軍當局所提「英日聯合管理租界」的提議答應加以考慮，並答應引渡刺程案嫌疑犯。第三，英國在七月廿一日成立的英日初步協調的原則上，承認「中日戰爭之事實存在，及日軍占領區域內，日本有特別需要，以保障其本身之安全及公共秩序」。這無異承認日本侵華戰爭所造成的事實，並否認淪陷區內我游擊隊的抗日行動了，英國竟喪心病狂至此地步。英國對遠東態度的軟化及對日無代價

的退讓，已陷遠東的局勢於萬分的危境。

但在英國節節退讓的過程中，幸得美國霹靂一聲宣告美日商約的廢除，英國態度遂發生九十度的轉變，對日態度驟趨強化。英國方面堅持只談治安問題不談經濟問題的立場。但是日本卻謂經濟問題不解決，不能單獨受理治安問題，東京談判遂自七月三十一日起一直擱置下來，現在已成破裂的情勢。這很顯明地是受到美國對日態度強硬的影響，如天津問題上，據傳，英方原已有意接受經濟條件至某程度，後因顧慮美國對日態度之強硬化及經濟問題與各國商務關係的密切（美法駐日代辦皆在英國與日本談論經濟問題的時候，先後向日本外務省聲明美法與天津法幣及存銀問題具有密切的關係），遂有後來的豹變。這很顯明地，英國應負改變遠東局勢的重大責任，而美國這次的壯舉卻挽救這個危局。《巴黎時報》下過正確的斷言，稱：「某某方面相信遠東局勢，因英國顯然的退讓，頗有足以招致東方人民受害之虞。美國採取此種有力的姿態，是為挽救頹勢。」這實在是公允而正確的立論。

（二）促進遠東反侵略勢力的結合及加強

這一點可以從英國與美國兩方面來說明。自美國宣告廢約後，英國對遠東軟化態度即已轉強，並且圖謀與美國切實合作。英美法對於天津法幣及存銀問題的磋商，直到八月四日始有完成具體案的消息，英美法政府決定支持法幣到底，以後英國的態度遂漸見強硬。倫敦《每日郵報》著文《另一警告》稱：「英美兩國頃正密切合作，以反對日本在華的強橫政策。……強硬的詞句或足令日本政府當局發生一種印象，但欲促日本軍閥省悟，則勢非再進一步不可。吾人必須向日本警告：英美兩國手中，握有強有力的經濟武器……」（倫敦八月三日路透社電）。這很顯明的是美國宣告廢約後的產物。英國政府也於美國宣告廢約後第二日決定考慮廢止一九一一年英日商務協定問題，目的在謀與

美國廢止美日商約一舉保持平行政策（倫敦七月廿七日電《大公晚報》）。國聯同志會執委會也於廿七日通過一個決議案，請求英政府跟隨美國的領導，通知日方廢止英日商約。美國對日態度強硬後，英國輿論及一般人士，更加積極督責政府對日採強硬政策。薛西爾在八月一日英國貴族院外交政策辯論會上極力主張援華制日，他說：英國若採取一種利於日本而不利於中國的行動，殊屬屈辱難堪。薛氏更要求外相說明關於美國宣告廢止美日商約事，將採取何等的平行行動。八月十九日倫敦各黨派各報皆一致著論嚴厲警告日本並督勵英國政府：英國突然有堅定的表示至為重要，如英國退讓，則不啻在中日戰爭中有所偏袒（工黨《每日前鋒報》），「英國政府最後似顯已決定，在遠東固守根基，此種立場必須予以熱烈的贊助」（自由黨《孟哲斯特衛報》）。《新聞記事報》更強調：英美法各國對於天津問題應採一致的步驟。

再自美國方面看，美國宣告廢除美日商約後，締結遠東反侵略的勢力的第一件努力，就是和蘇聯重訂通商條約，促進美蘇親善關係。八月五日華盛頓傳來「美蘇同意延長商約一年」的消息。美蘇新商約的規定是於美國大有益處：蘇聯每年最低限度須向美國購買貨物八百萬鎊，而對美輸出的煤斤不得超過四十萬鎊。美國每年可以多銷售八百萬鎊的貨物於蘇聯，而日本侈言對美國輸日商品的報復手段，也自歸於無效。美蘇新訂商約的最大作用還在於遠東的政治意義上。美蘇現在已成安定太平洋局勢的重心，他們能合作，則遠東侵略者不難使其就範。特別是蘇德互不侵犯協定成立後，蘇聯減少歐洲後顧之憂，美蘇遠東的力量將更雄厚。日本軍閥最近派遣軍事代表團赴德意，企圖促成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實現，其目的在嚇使德國在歐洲發動戰爭，牽制蘇聯，使蘇聯不能兼顧東方，以便它在東亞橫行，圓它「亞洲為亞洲人所有」的幻夢。但是德國早已看破了日本的紙老虎（希特勒曾對日本駐德大使大島講過：日本在侵華戰爭上陸軍的損失，非經十七八年不能恢復），所以站住實利主義的立場，它寧願特派里賓特羅甫赴莫斯科，簽

訂蘇德互不侵犯協定，它都不痛快和日本締結軍事同盟。日本所受到的打擊，將不在猶豫延宕英法蘇協定的英國之下。遠東蘇美力量的加強，英法荷等國也自俯首加入遠東反侵略陣線了。

四、美日鬥爭的展望

美國宣告廢除美日商約，固然還只是制裁日本的前提，未到實際制裁的階段，但其影響所及，已如上述，形成了制裁日本的基礎，以後美國果敢地實施制裁到如何程度雖尚不能預言，但是美國將與太平洋諸關係國家合作，在這基礎上建築制裁日本侵略者的包圍陣，卻是可以斷言的了。我們可以從三方面找得論據的端緒。

先自美國當局宣告廢約後的措施加以考慮。美國參議員凡登堡提議廢除美日商約的用意在於為畢德門提案（授權總統，禁止向違背九國公約的任何國家（指日本）輸出戰用品）闢一蹊徑。凡登堡的提案中，並且主張一九三七年的比京大會復會，以決定日本是否違犯九國公約中關於尊重中國政治領土完整的規定。從這裡可以看出美國宣告廢約的目的及其此後的措施，將不只限於商務的範圍。美國中立法修正案雖然已因孤立派的頑迷而被擱置，但是孤立派所恐懼的是參加歐洲的戰爭，或任何戰爭，美國對於日本的制裁卻未必就馬上變成戰爭；美國盡可以不戰而制服日本，即連孤立派人也都明瞭，他們甚至不很恐懼美日的戰爭。這次廢除美日商約的提案者凡登堡，是美國現政府反對黨的共和黨首領參議員，以及此案竟然得到孤立派一致的贊同諸點，更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美國宣告廢約的第二日，華盛頓方面即傳出一種消息，美國財部對於日本進口貨之以傾銷方式與美國貨物相競爭者，行將有所措施，而尤注重於日本棉織品進口的限制。其實施的程序是：（一）日本船舶寄碇美國各港口者，加徵海港稅；（二）日本貨物推

銷員限制進入美國；（三）禁止以軍械與軍用品運往日本。這種消息又告訴我們：「凡此種種，要當以日本在華如何對付美國利益，暨美國輿論與參議院是否決心有所作為為轉移」（華盛頓七月廿七日電）。自此後日本建設所謂「東亞新秩序」的趨勢觀察，日本之不能尊重美國在華之權益，當與其蹂躪英國權益一樣。只要這種事實存在，美國參議院及一般輿論當然支持政府的方針。美國政府宣告廢約旬日後，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重又發表聲明，稱：「如日本對美國人在華的權益，不更改其排斥的態度，則美國議會將授權總統，採取報復辦法。」畢氏更強調聲明：不承認日本建立「遠東新秩序」的要求。又共和黨與民主黨，在對日強硬之點，意見完全一致，國務部的遠東外交活動自能順利（八月七日華盛頓電）。

其次，美國輿論對美國政府廢除美日商約的一致擁護與制裁的督促，也是美國積極發動制裁的主要因素，因為在民主國家中，政府的施政方針大部分決定於民意。華盛頓《明星晚報》曾著文作冷靜之評論，美國人士視為美國輿論的代表，其言有曰：「政府此舉必為國人所擁護。查美國權利遭人蔑視，迭經抗議卒無效果。美國出以非常的忍耐心，歷兩年之久，特吾僑民迭受襲擊，吾國依據條約的合法權利迭受侵犯。凡此種種未便長此容忍，即日本掌握政權的狂熱軍閥，亦所念知。一言以蔽之，吾國忍耐心，已達極度」（同上電訊）。美國政府宣告廢約的第二日，《紐約泰晤士報》即著文稱讚為「一種堅決的政治行動」，該報且極力鼓勵美國政府稱：美國國務部此舉是向日本及整個世界宣布：美國無意追隨英國，接納日本的要求而表屈服。美將以其全力維持其在遠東的威信（七月廿七日紐約電）。

在美國未宣告廢約前，「美國反對日本侵略委員會」主席，格林即責備美國政府，稱：「美國現以原料供給日本，殊屬破壞九國公約」。美國人民更時常指摘說：倘若在華作戰的日本軍隊，更換了美國人，那末就無異美國在中國作戰，因為日本軍隊所用的

軍火大都是美國供給的，美國對於日本侵華，應負重大責任。

美國人民主張採取強硬政策對付日本，正與英國的人民一樣，而美國民意之表現於政府的施政方針上，比英國來得快速而切實。倫敦《新聞紀事報》曾就英國民意研究院及美國民意研究院測驗兩國民意的結果，作結論如下：「日本侵略中國，是英美兩國共同關切的事情，兩國民意測驗的結果；英方主張以強有力行動維護其在華利益者，共占五九%，主張無所舉動者，僅占一五%；美方主張強硬對日者，占五七%，主張無所舉動者，共占二五%」（七月廿四日倫敦電）。美國人民過去比較關心歐洲問題，但是此後將更關心太平洋的問題。上海英文《大美晚報》八月一日曾著文，題為《美國在遠東的命運》，警告其本國政府及人民有如下的警句：「美國在太平洋的利益，固不止投資，商務，與菲律賓的命運而已，美國的正確利益在於民族的前途。因為美國的國家命運，將必受太平洋西岸事態進展的影響與支配。」

「試從客觀上將太平洋局勢的中心點加以檢討，便知其勢有必然。查太平洋的東岸，有美國民族一億三千萬、加拿大民族一千萬，及文化水準較低的南美洲拉丁民族四千三百萬人；而在太平洋西岸，則有龐大的亞洲民族六億人，已感到地小人稠與礦源缺乏之苦，倘若這個民族在武力統治及好大喜功之下一致聯合起來，則太平洋的血戰，自所難免，美國及其較弱的鄰邦，將遭遇強烈的壓迫」。

倘若日本在亞洲的盟主地位一旦告成，則日本人之向外發展，將非用武力不能制止。蘇聯在西伯利亞的土地，因日本強盛而無法保全，於是日本的勢力可以擴展到北美阿拉斯加省之西四十裡之地。

因此，太平洋問題，就是其遠大處著想，有明顯的三大結論：

1. 日本侵略中國，美國所受根本影響，比歐洲諸國為尤甚；

2. 在列強中能與日本在太平洋上作實力對抗者只有美國，故美國為本身的前途計，應領導各國，抵抗這種威脅；

3. 日本現任的侵華政策，尚可以用聯合經濟制裁及外交方法加以制止。……如果日本侵華政策僥倖成功，則美國只有準備與一更強盛的日本爭取控制太平洋的地位，而爭衡的結果，就歷史過程看，就只有出於一戰了。

第三，再就美國近年來積極經營太平洋的努力加以考察，也可以明瞭美國重視太平洋西岸的事態，甚於重視大西洋彼岸的事態；其決心與企圖獨霸亞洲因而直接威脅美洲的日本決鬥，以保全其民族的存在，也可以在這裡看出。「美國通」的日本人，河上清最近著論，稱：「今日的美國已為擴軍熱所氾濫，美國人差不多九〇%的壓倒的半數，皆要求著龐大的軍備」（據《美國為什麼武裝？》）。即鼓吹美日親善的埃哈斯頓也都承認：「美國陸海軍全部經費的半數或將近三分之二的金額，投在太平洋方面」（據美國《現代史料》六月號《太平洋彼岸的和平》一文）。

美國近年的軍費確有飛躍的增加，一九三八年為一〇六，五七〇萬美元，一九三二年度只有六六，七八〇萬美元，其增加數將近一倍（據日文《經濟學者》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國本年度的軍備費，更有驚人的增加：本年度歲出總額比去年度減少四九，六〇〇萬美元，而一般國防費卻反增加了一〇，九〇〇萬美元，本年度還特設「特別國防費」一項，其數目為二一，〇〇〇萬美元的巨額（大部分用於太平洋的軍事建設上，只巴拿馬運河補強費即比去年度約略增加一倍——據日文《經濟學者》昭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然則美國為什麼需要這樣龐大的軍備，特別是太平洋方面的軍備呢？上引親日論客埃哈斯頓坦白承認：

「說為防禦蘇聯橫斷西伯利亞以攻擊美國領土而需要這麼龐大的軍隊的人，沒有一個。無論怎樣的恐英病者，也都不會說英國因擁有星加坡的海軍根據地，或在澳洲及新西蘭擁有利益，所以在太平洋上威脅美國。再如美國在阿拉斯加建築空軍根據地，絕對不能說是為著預防他和加拿大的紛爭。然則美國為什麼將其大部分的艦隊及空軍派往太平洋演習呢？那完全是因為美國預想著什麼時候美國總須和日本戰爭」（上引論文）。

美國已在太平洋上積極強化了軍事設備，不但美國的軍艦已極力擴充，和八年前九一八事變當時的情形完全兩樣，阿拉斯加半島及夏威夷的軍事設備也已加強，關島設防案雖然沒有通過美國議會，但其將建築成為美國的星加坡，卻已成為美國一般人民的要求。今年四月中旬，美國總統並將大西洋的艦隊調回太平洋，最近不斷地演習海戰及空戰，其增強太平洋的威勢，以便制止侵略者的瘋狂行動，已可以想見；美日太平洋上的鬥爭，將由此漸趨尖銳化，更可以預斷——除非日本侵略者因為孤立情勢的發展而對英退讓對美屈服，一如其對蘇聯的再三「屈服」！

關於預斷美日新鬥爭的必然開展，我們還可以追溯既往的歷史。「美日戰爭」一語二十多年來即常掛在日本人的嘴唇上，「敵視美國」的觀念，在日本人腦裡並不比「蘇日世仇」的觀念淡薄。美國對於日本的態度，素來即不示弱。特別自日本侵略者發動九一八事變而破壞了太平洋的均勢以後，美國對日的態度更為加強：當時即有史汀生不承認主義，駕英國以次各國的態度而上之。去年十月六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又有兩次對日強硬抗議，也是太平洋抗爭史上罕見的事例，結果逼得英法不得不追隨美國向日提出同樣性質的通牒，美國從那時候起顯已取得了太平洋反侵略陣線的領導權了。美國自這次宣告廢除美日商約以後，其太平洋上的威勢更見振作，蘇聯自己忍受較為不利的新通

商條約的規定，以示追隨美國的美意。今後的問題，只在於美國怎樣運用這個日益增高的威勢。美國能夠善用她那唯一足以與日本對抗的實力（《大美晚報》上引論文的意見），則將如畢德門前年的預言，「日本侵略者不難就範」！

（一九三九年八月廿六日）

原載一九三九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二期

蘇德協定與日本

一、德國遺棄日本？！

蘇德互不侵犯協定已於八月廿三日晚上，由里賓特羅甫和莫洛托夫在克里姆寧宮，舉行簽字，並約立時發生效力。蘇德協定的內容，極其平凡，概括一句話，就是締約兩國互保和平，所以沒有什麼可講的，問題只在於這個締約的運用。

蘇德協定是在出一般人意料之外實現的，給與世界各政府的衝動自不消說，即對於整個國際政治也給與了急角度的轉變。這個協定出現的原因，一方面固在於民主陣線領導者的英法和蘇聯的合作猶豫不決，遲遲不前；另一方面則又由於世界最聰明而又最狡猾的侵略者希特勒，看穿了東方幫凶的日本，實已不過是隻沒有骨頭的紙老虎，對於他在歐洲的活動不但不會有什麼幫助，反足以刺激蘇聯對他加以壓迫，成事不足，壞事有餘。我想後一種原因占更大的成分，因為蘇聯雖不敢與任何國家啟釁，但卻堅信德國目前決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於是，我們可知德國遺棄日本之念，不是萌芽於今日，其由來恐已相當久了。

我們相信德國之所以和日本締結《防共協定》，並準備訂定軍事同盟，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利用日本進攻蘇聯，牽制蘇聯西顧協助英法保障東歐諸弱小國家。但是日本這位不肖的朋友，並不完全聽從希特勒的命令，不攻蘇聯而侵略中國。若改換一個說法，或者可以說日本相當聰明，知道這隻「紅鵝」的厲害，惹不得，所以進攻蘇聯始終是虛張聲勢，正和德國在歐洲聲言進攻蘇聯一樣。但是希特勒卻因此大失所望，他早就再三

警告日本：勿多消耗兵力於對華戰爭上呀！最近更不客氣而坦白地對日本駐德大使大島講：「日本在中日戰爭上消耗的陸軍兵力，已非十七八年後不能完全恢復原狀」。希特勒遺棄日本之念頭早已萌芽，加之日本因其內部元老重臣財閥派與少壯派軍人的矛盾，使日本不能痛快敏捷加入德意軍事同盟。

二、軸心國家的破裂

德日不能密切結成一體，締結攻守同盟，是客觀情勢所決定的。我早在四五月間即反對德日軍事同盟業已確立之說，並主張日本的二元外交阻止這個同盟的實現。當時各方面皆主張德日軍事同盟事實存在說，並否認日本的二元外交。我當時的意見就是：「日本和德意兩國固然在軍事上聯結著緊密的關係，甚至在事實上彼此已有軍事合作……但是這些事實還只是軍事意義的合作，還與其他沒有軍事同盟的國家間發生的事實一樣，還不能夠遽行認為軍事同盟的事實。……日本對於德意還沒有負著軍事同盟的條約上的義務」（詳情參閱本刊二卷四期一三四頁）。同時，我又主張：「日本沒有參加德意軍事同盟的原因，雖如大家所闡明的，是因為日本對英美法玩弄外交手段使然的，但這只是一面的觀察，此外還有一面的原因，就是元老、重臣、穩健派軍人及一部分財閥極力的阻止。這種事實反映著日本政治的複雜性和外交的二重性。……日本的二重性外交，已是日本數十年來的外交傳統。這次日本少壯派軍人極力排除英美法，主張立刻加入德意軍事同盟而另一方面穩健派則仍在調和與日本與英美法的關係，保留立刻加入德意軍事同盟的作法（同上），德意的裂痕早即埋伏在這裡。」

希特勒窺破日本這種政治機構的複雜性與矛盾性，又看穿了日本陸軍兵力貧弱化的事實，所以打定了主意：與其追求一個進攻蘇聯擾亂美法的不可捉摸的力量，倒不如設

法緩和強有力的壓力，便於自己對英法來個較為自由的行動。於是希特勒斷然主動要求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協定，即令這個協定的內容非常平凡，但總比日本一個虛張的聲勢還來得有力。於是德日的軸心，開始破裂了。

德國準備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協定，事前並未與日本盟友商量，只於「德外長赴莫斯科之前，曾告日駐德大使大島，聲稱蘇德不侵犯協定，乃為對付英法進行與蘇聯締結軍事同盟，對但澤所加壓力的緊急措置，事出倉卒，不及向日本通知，極為抱歉」（平沼首相八月廿四日向內閣參議會的報告）。德國目無日本，自然難怪被棄的日本極度憤慨。蘇德協定簽字的當日，「日本即決定打消參加德意軍事同盟之議」（八月廿三日下午，平沼首相與陸相板垣及樞密院大臣近衛討論對歐政策的結果）。廿四日東京各報即盛稱「德國出賣思想同盟」，比較純潔的《朝日新聞》也抨擊說：「德國現已顯明地違背了反共協定之紙面與精神，使其變成廢紙」。廿五日平沼首相更加極度憤慨地宣布：「由於蘇德締結互不侵犯協定，德國肺腑已經洞悉，六月五日閣議所決定強化防共軸心的對歐政策，應予廢棄」。同日《讀賣新聞》稱：「德國不顧反共協定之存在，事先亦未與日本磋商，冒然與蘇聯締約的行為，其破壞國際信義的罪名，實屬無可逃避，現反共協定已毫無意義」。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更悲憤地加以攻擊，稱：「蘇德締約的結果，使反共協定變成廢紙。反共協定為集團反對蘇聯者，故與蘇德締約內容相抵觸。意國今後的政策，自將步德後塵，故德意兩國現已不復為日本的同盟國了。」

素來主張軸心政策最積極的日本陸軍當局，不但對德意完全失望，陸相板垣聽到平沼首相宣布「決定打消參加德意軍事同盟之議」時也垂頭喪氣，唯唯稱是，並且更進一步拉攏反對參加德意軍事同盟的海軍當局，接受海軍軍務局長井上「自主態度」的主張（八月廿三日陸軍軍務局長町尻訪問井上的結果）。

德日軸心的破裂，已成確定的局面，這自然不是日本政府對德國政府的抗議所能挽

回的。

三、蘇德協定對遠東的影響

蘇德不侵犯協定，對於歐洲局面發生極大的影響，但對於遠東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尤大於歐洲的局勢。而對遠東的各種影響皆直接及於日本。

蘇德協定對於遠東的第一種影響，當然要首推日本內政外交的激變。這個協定首先改變了日本依賴德意的政策為緩和英美法蘇的立場。這不但是對歐政策的新姿態，同時也是遠東政策的新起點。蘇德協定簽字的第二天，分歧對立的日本五相的意見，竟然趨於一致，贊成平沼所主張「以獨自的立場應付新事態」。日本不但放棄了德意兩國軸心國家，並且親英法的傾向相當濃厚。八月廿四日東京外訊即傳日本政府已向英國提出保證，謂：政府已訓令日本在華各當局，壓制各地反英運動。已經破裂的英日東京談判，且有由日本政府要求再開的消息。日本以前的政策，想利用德意在歐洲的搗亂，牽制英法，以便他在遠東儘量壓迫英法勢力，使英法與他協力，收拾「東亞事變」，圓他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夢。但是現在已為德意所遺棄了，其收拾「東亞事變」的手段，自須改採新方式，已不能對英採取壓迫的手段而須改為拉攏的手段了。這是由排斥英法變成拉攏英法的由來。

然而日本內政卻要因為外交的這樣激變引起莫大的矛盾與糾紛，平沼內閣原來就是秉承元老重臣穩健派的意旨的親英美緩和蘇聯的政府，蘇德協定成立後，他即於口頭上把依賴軸心政策一掃而光，主張「獨自」的立場，但是結果終難免於內閣總辭職的悲運，這不消說是少壯派軍人逼成的局面，也即在說明：親英美緩和蘇聯的前途還不平坦。平沼內閣在其總辭職的聲明書裡稱：「今歐洲形勢突然變化，蘇德締結互不侵犯協定，為

適應新情勢，日本政治必須「更始一新」。同時，新首相阿部信行的廣播演詞及談話中的所謂「日本將以徹底的『自主立場』應付萬變」，「對複雜多歧的國際現狀，日本堅持『獨自』立場，向『自主所信』邁進」，和平沼在蘇德協定成立後的主張，乃至以前所宣告「日本既非民主集團的國家，也不是極權國家集團的一員」，並沒有兩樣。

日本目前的政治主潮，確實需求著親英美緩和蘇聯的外交政策，在新內閣的構成分子中，表面上也不少親英派，但是阿部內閣卻和大改組後的近衛內閣不同，雖然「對外施政以阿部個人為中心」（東京八月三十日外電），但是阿部未必就是字垣一成、文治派親英人物的重光葵，雖有出任外長的呼聲，但是本人迄至現在尚未接到任何正式的命令。另一方面，阿部三十日廣播的外交政策，也只說：「歡迎第三國協助建立『東亞新秩序』，如第三國欲從中作梗時，則將斷然予以排除。」陸海軍人對內閣的要求也稱：「對歐政策基調，須徹底以自主見地，促各國協力。如妨礙日本事變處理，則應斷然排除。」這無異要求英美法無條件退出遠東，要求蘇聯旁觀侵略者的氣焰高漲，自然是此路不通的。

依我的觀察，日本少壯派軍人仍將要求政府以迫英的手勢親英，換句話說，壓迫英國來親日。素來無視政府方針的在外軍人，將更本著原來的意志前進，北平日本軍人的代言報紙，現在仍在主張「反共反英」。日本少壯派軍人的外交意識，依舊不能和元老重臣派的外交方針相吻合，新閣親英的空氣只瀰漫於倫敦（八月三十日倫敦路透社電）。日本新內閣的特色，是用軍人老前輩調和穩健派軍人與少壯派軍人的對立，因而調和軍政界各派的鬥爭，同時又欲藉接近元老重臣財閥的軍人，稍為壓抑少壯派軍人的氣焰。但在「迅速解決中國事變」的困難情勢之前和少壯派軍人不甘屈服的壓力之下，日本內閣的前面橫陳著兩條路：不隨少壯派軍人無軌道地蠻幹，就必激起穩健派與少壯派更激烈的鬥爭。阿部內閣既無赫赫的人物，此後依然是荊棘滿途呀！

蘇德協定對遠東的第二種影響，是促太平洋情勢起新的變化。從來執太平洋政治的牛耳者為英國，英國完全靠英美的平行行動及安定歐洲局勢，以取得太平洋的領導權。英美的平行政策，已因英日東京談判而發生了裂痕。英國欲安定歐洲，必須蘇聯協力。英法蘇談判竟經數月而未能解決，實在是英國外交的一大失敗。希特勒近更揚言：修改凡爾賽和約，但澤和波蘭走廊須先返還德國（希特勒覆達拉第函）；昨日德國軍隊更分三路進攻波蘭，華沙已成夾攻之勢。無疑地，歐洲的戰幕已經揭開，此後要視英國保證波蘭的程度，決定戰爭的消長。但無論如何，英國對遠東的態度必至稍為軟化。

在英國（因而法國）退場的反面起而代之的國家，是為蘇美兩國，蘇德協定後這種情勢更加進展。美國制裁日本還在準備中，蘇聯打擊日本的意志已有加強的可能。這正如華盛頓方面的批評：「希特勒減弱反共協定的力量，並在遠東方面將日本拋棄，使蒙受中蘇抵抗增強的威脅」（八月廿二日路透電）。

英法蘇談判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蘇聯所提擴充反侵略陣線至遠東的主張為英法所拒絕。蘇聯重視遠東的政治意義，所以斷然放開對他不利的英法而謀加強遠東的反侵略力量。許多論者已經承認蘇聯視遠東利益為第一位，而視歐洲利益為次要。蘇聯因為遠東領土的廣博多產，所以將視線集中到遠東，史塔林（斯大林）的政策是要「把那荒蕪和冷落的中亞和西比亞改造過來」，他為要加強遠東的領土必須加強遠東的外交政策。有人說蘇聯今日歐洲政策的限度「只及於足以保安他的歐洲邊境為止……歐洲沒有一件事能夠使史塔林犧牲他在遠東的計劃」——據裴士（Demaree Pees）在星期六晚郵報發表的《史塔林寧擇西比亞》。這次蘇德協定所表現的重大意義，並不在於偏重歐洲政策的李維諾夫的辭職之下。

列強中，遠東的地位及傾向類似蘇聯的國家，只有美國。美國人民現在注意中日大

戰遠過於過去歐洲大戰（參閱本期《美國排日運動》），美國近年來的軍備偏重於太平洋的建設（參閱本期《美日鬥爭的新開展》）。美國人現在雖仍重視歐洲，甚至如羅總統之言，美國國防線在萊茵河，但是美國對於遠東情勢的發展，也特別注意，因為亞洲事態的進展關係美國民族的興亡與消長太密切了。因此，美國反對英國遠東政策的妥協態度，政府和人民皆聲援中國抗戰，最近更宣告廢除美日商約，藉以打擊日本侵略者。美國近年已選擇蘇聯為其合作的對象，逐漸推進美蘇的親善關係。上月簽定了美蘇修改商約，這次蘇聯加強遠東政策，將更促進美國遠東政策強化，而漸與蘇聯取一致的步驟。

蘇德協定對遠東第三種影響，是中國抗戰的力量將因遠東國際情勢的轉好而增強起來。固然納粹東征十字軍已對波蘭試炮了，牽制著英法積極兼顧遠東，英國對日消極妥協的可能性多少存在著，但積極的英日合作，可斷定只是日本片面的單戀而已。英日消極的妥協即令成功，也於中國抗戰無多大損害。反之，蘇美兩國遠東政策的加強，卻實在是中國爭取最後勝利的基礎。

蘇聯既重視遠東的利益，自要設法防衛遠東的領土不為侵略者所侵犯。日本侵略者現在已在步步侵略中國的領土，對於蘇聯是個極大的威脅。日本並且一面常唆使許多「越境將軍」向蘇聯挑戰，一面又主張「對中蘇同時作戰論」，蘇聯事實上已和中國處於同一境遇之下。蘇聯不得不積極準備反抗日本，這次因簽訂蘇德協定而鞏固遠東的防衛，用意也即在此。裴士說得好：「史塔林曾公開援助中國抗戰，從他的政策上說，這是一種必然的舉措，蘇聯欲在遠東建立新的根基，自然不能對日本的行為，視若無睹。中國能協助蘇聯去掃除他的勁敵，自然是他的願望。（上引同文）」過去蘇聯的領袖常宣言：對侵略者的侵犯，必還以「加倍的痛擊」；蘇聯遠東紅軍也已屢次對日軍的侵犯，加以迎頭痛擊，相信蘇聯此後將更積極幫助中國抗戰，倍蓰於以前。

或許有人懷疑蘇日互不侵犯協定也有隨後實現的可能，但以今日蘇聯遠東政治立場

的重要，我們敢斷言：蘇聯必不會接受日本的提議。蘇聯將更積極以軍火及其他方式幫助中國，是很可能的，問題只在於中國怎樣接受蘇聯的幫助而已。

四、怎樣運用這個情勢

蘇德協定實現後的遠東國際情勢，確實於我有利，我們能善為運用則抗戰勝利更有把握。簡述其主要方針不外乎三種：第一，奉蘇美為遠東的指導力量，謀與切實合作，特別是蘇聯更應與採共同的行動，當然也不放棄英法的友誼。第二，設法促進日本內部矛盾的發展；其主要的力量在於堅持抗戰到底。第三，團結我們內部執行抗戰到底。這是最重要的動力，實現有利於我的國際情勢的最基本的條件。我們要以這個基本條件作基礎，利用遠東國際情勢的好轉，建設遠東反侵略陣線，縮成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共同制裁孤立化的日本侵略者。

原載一九三九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二期

日本設置「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意義

敵大本營陸軍部已於九月十二日下午公布所謂「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編制，其總司令官西尾大將及總參謀長板垣前陸相，也已於廿六日抵滬。敵軍在國外設立總司令部，在其過去的歷史上只有過一次，即日俄大戰當時，而這次的設置，算是第二次，其意義之重大，是不容忽視的。

吾人對於敵軍在華設總司令部，第一種認識就是敵人前此的「政治進攻」已告失敗。敵軍自從去年十月間攻占粵漢以來，蹉跎年餘，軍事沒有絲毫的發展。經鄂北的慘敗後更覺無力前進，所以積極改採政治進攻的方策。出走重慶背叛中華民國的汪逆精衛，始得由被忽視而再被重視，擁（用）汪的空氣略為增漲，汪逆登臨偽中央首位的幻夢，經過一度粉碎，現又幻現，開始組織猴子班。偽六中全會八月廿八日在上海召集，就是這個猴子班開演的序幕，他們準備在雙十節正式開演，但未必能夠實現。

據說敵軍對於汪記猴子班的囑望本來很大，汪班長給與日本的支票也非常堂皇。汪逆最初對日誇言可以拉攏到中國所有各黨各派開個國民代表大會，產生偽中央政府，但是各方面拉攏收買的結果，離預定的計劃仍太遠，終不得不改為偽國民黨六中全會，希圖草菅人事偽造一張招牌。然而結果完全暴露了漢奸的無力，敵人非常失望。

吾人的第二種認識，就是敵人仍欲依靠武力進攻，來結束中日大戰。這次阿部新內閣的政治綱領，竟以所謂「處理事變」為樞軸，自非偶然。其「處理事變」的方式分為兩方面進行：（一）調理日本的國際關係，（二）再用武力進攻，策應國際政策。依我們的推測國際的調整尚有重重的難關，日本與各國的根本矛盾絕對無法解決，所以少壯派軍人的蠻幹，依然要繼續下去。最近敵軍的連續慘敗及此後新進攻的前途，讓我們在

「日本對華新軍事攻勢」短評中去評論，只是這一事進攻的重演，卻已確定，並且非常的焦燥。

敵人眼看歐戰爆發大可以發點兒橫財的機會到來，非常地眼紅、焦急，很想再溫習上次歐戰中以參戰國得到政治利益以中立國得到經濟利益的美夢。日本上次歐戰中獲得出超額十四億元，貿易外國際收入一四一，〇〇〇萬元，所以戰前與戰後比較，償還外債三億元，在外債權增加一七四，〇〇〇萬元，日元正幣增加十八億元，共計獲得三九五，〇〇〇萬元的經濟利益（據田中庚夫《戰爭史》四十一至四十二頁）。經濟利益遠勝政治利益多多，現在日本特別急於獲得這個經濟利益。但要獲得經濟利益的基礎在於和平工業的振興，也即在戰爭的停止及備戰的和緩。但是現在的情勢已與上次大戰時不同，日本自己已先陷於戰爭的漩渦中，自己要先自拔於戰爭之外始有達到目的的可能。日本要自拔於戰爭之外，在日本軍閥眼中看來只有「用戰爭結束戰爭」一途，因為日本今日已不接受「三國干涉」的條件，所抱野心超過客觀的情勢所允許的範圍太遠。他們幻夢著運用更強大的武力為後盾，來和世界各國周旋，但這卻是一種危機百伏的惡性的幻夢。

原載一九三九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三期

日本對美軟硬並施

日本侵略者對美親善的幻夢，第一因為美國廢棄美日商約而起了裂痕，第二因為歐戰爆發後美國積極擁護第三國在華權益而達到瀕於破碎的境地。日本現在所感覺的，只是採取什麼方法，來和美國鬥爭，日本朝野所採方法，不外乎是軟硬並施，一方面竭盡恫嚇的能事，另一方面企圖調整美日關係。這自表面上看，似乎是唱著雙簧，但實際上又是日本二元外交的作祟。

日本的軍人大多主張對美強硬，如中將佐滕清勝，竟用驚人的標題「美日戰爭期近」，歷指美國對日「非友誼」的作法，更如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堅決聲言：「美國如不改變其對日態度，則太平洋將成為戰場」（東京九月廿九日外電）。最近日本方面，甚至紛紛宣傳：「如美日關係惡化，日本準備與美國一戰」（香港九月廿三日各報）。

日本穩健派對美的措置，就緩和些，如阿部新閣首相談國際情勢時，雖謂：「英法參加歐戰後，援華之手或將縮回，但尚有他國可取而代之，成為新的援華國」，但卻又謂：「余作此語，並非相信美國迅速出以援華行動」（阿部九月九日軍中談話）。聞阿部這次選拔野村吉三郎擔任外相，主要目的即在於調整美日關係，採取對美修好政策，因為野村是以「知米家」及「親米家」著名的。長久任駐美領事多年的松岡洋右被任駐美大使呼聲之高，用意當也不外乎美日親善的調整。

但自美國方面考察，則美國素來對日本持強硬態度，一切措置皆有特殊見地，既不怕任何威脅，如美國國務卿赫爾之言，又不受秋波的誘惑，如日本特別尊重美國在華權益的聲言，美國置之腦後。日本的雙簧對於美國，是唱不響亮的。

東京的輿論非難美國對日採「敵對行為」，指責歐戰發生後，美國在遠東為英法保護權益。其實，美國是對貪婪無厭的日本侵略者，屢次作善意的警告；美國不是為英法保護權益，而實是為自己的權益作最大的努力。歐戰發生後，日本已不把英法放在眼下，排除英法權益已成日本最近外交政策的基幹，但是排除英法權益，自然也害及美國。今日在太平洋上有保護權益的實力的國家，只有美國，美國要保全太平洋上的權益，也自不能忽視當前的危機，美國加強遠東政策及太平洋的軍備是一種自然而必要的趨勢。

只有一點是美國今日應該覺悟的，就是：美國每每提議召開九國公約會議解決中日戰爭，絕對不能獲得日本的同意，所提條件必不能為日本所接納，今日，只有中國對日抗戰得到最後勝利，中日問題始有解決的希望，各國在華的權益也才能有保障，太平洋的真正和平才能實現，美國民族的安全才能置於磐石之上。美國為維護她在華的權益計；為保障美國民族不受威脅計，只有積極幫助中國抗戰一途。吾人歡迎美國海軍部派遣大批軍艦駐紮「太平洋直布羅陀軍港」的珍珠港！我們更歡迎源源而來的信用借款！

原載一九三九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三期

美日談判的前途

日本目下調整國際關係的關鍵完全在於親美政策能否成功，英法日關係之決定於美日關係固無庸言，即蘇日關係也與美日關係具有關聯性。但是美日關係的調整又是最難打開的一關，因為美日關係的調整又須決定於中日戰爭。最近日本對美調整工作之忽冷忽熱、忽急忽緩的主要原因即在於此。

吾人在《日本外交往何處去》論文中，所斷定日本目下的外交方向集中於對美外交的調整及其前途的暗礁重重，近日已漸漸表面化，日本當局已否認了對美積極談判的意向，並且把這個問題作為偽中央政權樹立後的主要課題，不但完全暴露了日本外交的無力，並且預告：日本此後外交的困難，將與其對華侵略的困難一樣，與日俱進。

日本最近之急於誘和、求和，並且在求和的工作中抓住英美作媒介，但自我抗日政府把日本的和平提議一腳踢開並揭穿其謠言進攻的陰謀後，日本即時失掉了與英美談判的根據。上月底日方正對於不久將與英美談判興高采烈，但曾幾何時，十一月一日，日外務省發言人須磨又對記者聲言：「日本目前仍未有與英美兩國舉行正式或非正式談判之意」（東京一日外電）。須磨這個談話，又指中日直接談判為謠言，為絕無根據，其問題的關鍵所在，可不言而喻了。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固然已於四日與日外相野村會晤過，但其所談判內容卻更明顯暴露了美日兩國在中國境內利害之不可調和性。據《都新聞》透露的消息，美國對日本表示三點意見：（一）美國希望日本尊重現存的條約；（二）美國不但不能承認日本的所謂「新秩序」，且極力加以反對；（三）美國人民極度不滿日本破壞美國在中國及遠東的權益。格魯大使更率直指明：「美國絕對不能讓日本將美國踢出於遠東之外」（接近日本政府人士所透露消息）。

日本能夠尊重美國這三種意見嗎？更能夠把這三點原則實施於對華政策上嗎？我的答案是一萬個「不」字。日本今日所要實行的工作是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所要破毀的束縛，是在國際規範上阻礙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一切公約，又在日本獨霸東亞的程序上，自然要摒除美英法第三國在華的權益，美國人民的意見，自難為日方所接納。正如美國外交協會的斷言：「目前僅有兩條途徑可循，一為恢復中國領土之完整及門戶開放，一為任令日本建設遠東新秩序，而歐美各國退出遠東」（五日華盛頓電）。日本不能接受前者，美國不能屈服於後者，美日談判即令開至一百回，美日關係的調整，依然殘留在出發點上，或將更為增大美日間的鴻溝，惡化美日的關係。

日本目前已開始採取縱橫捭闔的外交謀略了。第一，欲把美國在華權益問題的交涉，諉之於未來的偽中央政府去處理，日前外相有田對記者之言「目前尚非改進美日關係的時候，在偽中央政權未出現以前與第三國進行談判，實屬徒勞無功」，實堪吾人玩味。第二，軍部極力主張緩和蘇聯，成立蘇日協定，醉翁之本意固不在酒，他們蓋欲抬出蘇聯以威脅美國，離間美蘇關係，使美國退讓，美日關係易於調整。然而日本的企圖依然是此路不通。偽中央政權的問題尚屬未知之數，日本要蘇聯對於中日戰爭袖手旁觀，也只是片面的幻想。

今日，我們不得已於言者，美國應有堅持解決更大問題的決心，防止日本前進政策，如美國外交協會所言。無論《讀賣新聞》怎樣鼓吹「對美關係比對蘇關係尤為重要」，但是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卻強調：「莫論根本的調整，即個別懸案，也極困難」（皆見東京七日外電）。美國應有深刻的覺悟，始可！

日本外交往何處去

——親英美可能嗎？

一、我國論者對於日本外交的論斷

日本外交的彷徨動蕩，自其開國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甚，這固然是日本政府主觀力量的薄弱所致，正如日本人自己所承認，自明治政府以降日本從未有過自主的外交。但是國際政治最近變化的多端與日本國際環境的特別困難，卻也是陷日本政治家於低能的主要原因。惟其如此，所以我國全才全能的國際政論家，對於日本此後外交方針的推測，也就呈現了光怪陸離的現象，甚至於有些論斷幾近於幻想。因此，我也無妨來談談日本外交究竟將往何處去的問題。最近我國國際政論家對於日本外交方針的觀察，固然極為紛繁歧離，但歸納起來可以得兩大主張：其一，論斷日本將加入英法集團，釀成反蘇戰爭（香港青年記者學會座談會的結論）；其二，日本將由德國的斡旋加入所謂德意蘇集團結成所謂「獨裁國家陣線」（蘇德協定成立後通行於重慶的一種主張）。但據我個人的觀察，這兩種推論者的考慮，皆過於深刻，後者固然是近視眼，但是前者也不過是遠視者，對於目前的現實，認識皆不正確。其實，日本政界所吵鬧爭執的問題，也不是締結「獨裁國家陣線」的問題與參加英法集團形成反蘇陣線的問題。目前他們所爭執的焦點，是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來達到建設所謂「東亞新秩序」的目的的問題。他們所爭論的方式及所表現的鬥爭，只有兩種：（一）趁歐洲大戰的良好機會斷然掃蕩英法美法等國在華乃至在亞洲的權益，以便直接了當完成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大業；或（二）調

整日本的國際關係，親英美以結束中日戰爭，安定局部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基石。第一種方針為日本瘋狂軍閥特別是少壯派軍人所要求；第二種方針則為日本元老重臣派所代表穩健派所堅持。日本這兩種不同外交方針的鬥爭，最近演成「一元化外交問題」，掀起了日本政界的大波。

二、日本外交彷徨的起點

日本各派關於外交方針的爭鬥雖然極其複雜錯綜，但就其總的情勢看，卻仍未離去動蕩彷徨；而其彷徨的起點則始於蘇德協定的成立及第二次歐戰的爆發。因此，欲討論日本外交往何處去的問題，似應自這個彷徨的起點談起。

日本外交在蘇德協定成立後彷徨起來，在歐戰爆發後更加深化，自有其劃階段的意義存在。日本幾年來的外交方針是：一方面強調反蘇反共以為侵略中國的口實，一方面加強所謂軸心集團的結托以威脅英法。蘇聯在日本侵華進攻之前是主要的敵人；而德國卻是它的盟友。日本軍閥或者相信：只要日本堅持反蘇反共的政策，德國將必永久是日本的靠得住的盟國。殊不知希特勒早即窺破了日本紙老虎的弱點，自從德國軍事代表團赴日探得日本軍力的虛實以後，希特勒警告大島大將「日本陸軍在中日戰爭上的損失，非經十七八年不能恢復」的信念更加深刻。日本軍閥尤其不能明瞭希特勒政治手腕微妙稀奇。日本沒有看清希特勒的葫蘆底，所以蘇德協定成立後大失所望，日本外交的彷徨與苦悶，也自從那時候開始了。

迨至緊跟而來的歐戰爆發，日本外交的彷徨更加深化。因為歐戰的爆發激動了日本的利欲，焦急於結束中日戰爭，恢復和平工業的生產。但是結束中日戰爭的方式，二年

來即成了日本政界各派鬥爭的主因，現在更加急燥爭執起來，致使日本的所謂「國策」莫知所措。在這際會成立的阿部新內閣的外交方針，也只能停頓在「以處理中國事變為樞軸」上面，而其具體的辦法仍然「頭頭死道」，「此路不通」，和平沼內閣所宣布「日本外交回到一張白紙上」，事實上尚無任何區別。索性乘歐戰的機會掃蕩英法的勢力，既為美國所阻梗，拉攏英美得罪德意又為軍部所不愜意。事實上，英法法既不容易拉攏，更不容易排除；德意的舊幫手雖無可愛惜，但也不能輕易放棄。這個時候的國際情勢，真正苦死了日本外交當局。阿部首相的初旨未始不想調整一下日本的國際關係，但在其組閣的過程中即便受到了軍部的壓迫，渲染一時的親英美派重光葵之回長外相，終於流產了，軍部要求阿部任命革新派外交首領白鳥敏夫為外相，逼得阿部不得不自己兼攝，但不幾何時，也終於不得不以木偶的野村尸其位而以曾與革新派結過姻緣的谷正之實握外相的大權。軍部分割外務省的權限「一元化對外貿易」的企圖，卻又來得不順利，素來對三宅阪（軍部大本營）怒目相對的霞關（外務省），終至抬出「一元化外交」的招牌拚命招架，日本外交陣容遂以貿易省設立問題掀起了一个空前的巨波。

現在盤據霞關以為最重要堡壘的日本官僚，雖然獲得了一時的勝利，軍部對於阿部內閣向美國獻媚向英國拉攏，雖然還沒有什麼斷然反對的具體表示，但是軍部不但沒有積極的支持，並且唆使著他們的直系機關報及旁系的言論機關，對美國大肆抨擊，甚至提倡「日美戰爭論」。解決所謂「中國事變」的成敗，是阿部內閣存續與坍台的決定點，要解決「中國事變」又須以調整日本的國際關係為第一頭關頭。現在到達解決事變的第一個關頭的路途原即不平坦，喜歡蠻幹到底的軍部作風，又在增加這條崎嶇險阻的路途上的荊棘，而第二次難關的難渡，將百倍於第一關。日本輿論界評為「廢物收容所」的阿部內閣，能夠打通這難關重重的外交前程嗎？

三、英日妥協可能嗎？

自從日軍在湘北慘敗而西尾與板垣的下馬威大受挫折之後，軍部的外交主張似稍為消沉些，阿部政府之進行其親英美的外交方針，已在軍部願意與不願意之下開始積極進行著了。東京英日談判已有斷藕重續的傾向，英駐日大使克萊琪也向記者稱：「英日談判的前途未致十分決裂，英日兩國如願解除前此的誤會，亦非極難的事情」（據十月廿九日東京訊）。日本政府因為英日談判之成功與否將決於美國的態度，美國宣告廢除的美日商約又將於兩個月後滿期，所以急急於要求美國與之談判，近聞野村外相與美大使格魯的會談，也將與英日談判同時在下周舉行。這是歐戰爆發以來，日本對於英美的外交作法最積極的表現。

然則日本與英美的談判能夠獲得日本所期待的效果嗎？前途依然是不可樂觀的。這點即連日本政界自己也都預料到了：「日本政界對於日本與英美談判的前途，頗覺悲觀。日方的意見，認為英美兩國顯有聯合對日的趨勢」（廿九日東京外訊）。是的，日本與英美的談判，確有許多困難的原因與事實橫陳著。

先自英日談判的困難說起罷。自歐戰爆發後日本對英的政策即陷於舉棋莫定的苦悶中，軍部主張索性採高壓手段逼英國屈服，所以曾經一度風聲鶴唳有進攻香港的聲勢。日本政府也曾以試探的手勢，一方面宣言對歐戰守中立，一方面又對英法要求撤退駐華的軍隊。在這情勢下，英國也曾被迫作過多少讓步的妥協，如刺程案四華人的引渡，稅關接收偽華興票，滬西警權的一度讓出，乃至假道運兵等等。日本更加得寸進尺，甚至對香港政府提出許多無理的要求。同時，日本對於法國也有同樣過分的要求。但是英法在遠東的問題，並不單純，是與美國在遠東的問題聯結在一起的。英法對日的退讓，日本對英法遠東權益的侵奪，馬上損及美國本身的利益，所以日本與英法的問題，還要從

日本與美國的關節上來觀察。阿部首相在他初次談國際情勢時即謂：「英法參加歐戰後援華之手或將縮回，但尚有他國可取而代之，成為新援華國」（九月九日軍中談話），蓋指美國對日積極干涉而言。日本輿論一致攻擊美國替英法保護他們在遠東的權益，也就是在說明這種新趨向。即連不久將要重開的東京談判，倫敦方面也都不能不聲明其談判內容只以天津事件為限（倫敦十月廿八日路透電）。英國沒有忘記上次東京談判中美國的有效警告，更可證明英國與美國的聯繫。日本最近也已深刻覺察出這一點來，所以外交上的努力集中到對美的方面，而調整美日關係的困難，將十倍於英日關係的調整。

四、日本親美能成功嗎？

說到美日的外交調整，更是困難。在歐戰爆發前美國對太平洋的積極政策，即已有堅決的自信。最近華盛頓可靠方面已經證實一種消息：羅斯福在歐戰前即向英首相張伯倫提出保證，謂：「英國對遠東事件雖在歐戰中，仍可希望獲得美國的援助，美國願對遠東採取有效的步驟」（羅斯福答張伯倫函——《珠江日報》十月三十日所載）。美國有效的步驟，自歐戰爆發後即已節節發動，如太平洋艦隊之西調，海空軍在太平洋上之演習，日軍擾亂上海租界的鎮壓，美日通商條約的宣告廢除，最近美國大使格魯對東京政府的強硬演說等等皆是。

美日衝突最近的展開，我在本刊前兩期已經詳為剖述過（參閱三卷二期《美日鬥爭的新開展》，三卷三期《歐洲大戰與日本》及其他短論），其間確有一個不能調和的基原因存在著。美國為要保持其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不能坐大日本成為亞洲的盟主（如《大美晚報》所論列），姑且不講，即在遠東權益的爭執上，美國也不能旁觀日本封鎖起亞洲的大門來。日本現在所強調及所努力的，是「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但是所謂「東亞

新秩序」的具體內容就是排除英法蘇的權益出於東亞之外，第一步也就是否定九國公約所規定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及列強機會均等原則。所以最近日本的輿論集中論鋒於九國公約的破棄上：「『中國事變』爆發之後，前年十一月在勃拉賽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有過規定『中國事變』為違反九國公約的議決案。……對於去年十一月三日帝國政府所聲明的『東亞新秩序』的建設，英法提出共同抗議，也是這個九國公約違反論。」

「既然決定『東亞新秩序』的建設為『中國事變』的最終目的，則把舊秩序從國際上規範化的九國公約，當然非予以否定不可」（十月五日《國民新聞》社評）。日本新聞首相阿部在其政綱中也明白聲言：歡迎第三國協助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否則斷然予以排除。這也就是說：日本既要建設「新秩序」，就須破壞舊秩序，廢除「把舊秩序規範化的九國公約」。但是九國公約是美國領導下的華盛頓九國會議所締結的，不但美國在遠東的權益不可侵犯，美國的國際威信更不容污損。日本方面也明知個中道理，所以近來一方面聲言廢除九國公約，一方面又集中火力攻擊美國。九月下旬以降東京各報皆指摘美國「非友誼」的作法，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堅決聲言：「美國如不改變其對日本的態度，則太平洋將成為戰場」（東京九月廿九日外電）。最近東京《都新聞》尤其大放厥言，其反美的激烈，一般視為多年來所未見，據稱：「日本若對美作戰，定有勝利的把握，故日本絕不因為美國的虛張聲勢而讓步。不論美國採取何項步驟，日本對於東亞的政策，絕對不加以變更」（十月廿八日東京訊）。該報又譏諷美國說：「美國似在睡夢之中，誤信可以戰勝日本，但若美國向日本橫加壓迫，則其後果的嚴重程度惟有上帝知之。」瘋狂好戰的軍人更加紛紛著論倡言「美日戰爭期近」。舊外務省情報部部長河相，甚至早在九月二十日即已公開發表意見，謂：「日本國民不滿美國對日的非友好行為，日本政府對此種輿論，不能無視」（對外國記者團談話），這是日本政府藉口於民意恫嚇美國，以為外交交涉的張本，討價還價的準備。

日本政府現階段的外交政策，依然固執著原來的方針，外相野村最近在地方長官會議席上的報告，重申九月四日日本政府的聲明，表示日本對處理「中國事變」的政策不變；日本的國際關係及對第三國的態度，以此政策為基礎進行調整（十月二日外電）。這個不變的政策，特別適用於對英美的調整。野村十月二十日更以書面具體申論這個「不變政策」的內容，關於處理「中國事變」的對策仍稱：日本決意建設「東亞新秩序」，對於第三國的反對乃至干涉，將不予顧慮；關於日美關係稱：「日本為百年之計，將以不退轉的決心，從事於再建東亞的『大業』，余願美國正確理解日本的目的」（野村由伊勢神社回東京晚對記者發表的外交政策）。日本在其集中全力調整美日關係的前夕，竟由外交最高當局發出這樣堅決的聲言，雖可視為討價還價的作用，同時美日關係之不可調和性，也已具體表現無遺。

然而美國素來的態度是不恐怕日本的恫嚇的，自九·一八事變當時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的精神及中日大戰以來羅總統及赫爾國務卿屢次發表的主張，將必能貫徹下去。過久的事實姑不提它，只就最近格魯由美返任所作演說考察，仍充分包含著軟中硬的骨節在，可注意的要點如下：

（一）反駁日本對美基本觀念的錯誤，格魯大使先舉事例指摘「日方認美國處理東亞問題的方法，拘泥於純法理觀點的態度」，為根本錯誤。大使謂若所謂「純法理觀點的態度」是「指尊重條約正式約束以及國際公法，則此種解釋自屬正確；條約正式約束及國際公法的尊重，始終為美國政策的一大原則」，繼之，大使轉達美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及其目的，謂：「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在於適合現代生活的需要」，「美國人民渴望舉世各國之間，俱能和平相處。」他更引用美國國務卿之言：「國際和平欲求其維繫於不墮，須賴國際交涉中力守具有一定法則的程序，始克濟事。」

(二) 抨擊日人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謬誤，格魯大使聲言「美國政府及人民對於所謂『東亞新秩序』意義瞭解的程度，並不下於日本」，但是日本所謂『東亞新秩序』中竟有取消美國人民久已在中國取得的權利，此則為美國人民所反對者也」。大使更具體指出：「今日日本人竟謂門戶開放主義在中國不能適用，若不然者，亦須大加刪改。」大使反駁說：「世界經濟的基礎建於國際間的購買能力及自由競爭之上，絕非每一國家獨占的條件所能維持。余頃所發表的意見，在任何場所均一律適用。」

(三) 指摘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暴行及日本獨占大陸的企圖，格魯大使率直地說出：「現時美國人民對於日本軍隊在華的行動及其目的的憤慨之心，日益加深……美國人民對於日本在中國廣大的區域內濫施轟炸，確極震駭，認為不但有違人道主義，亦且予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以直接的威脅」。繼之，大使更謂：「美人對於日本在華軍隊不顧美日間的條約及其他美日兩國共同參與的國際條約及協定，肆意干涉及破壞美國在華權益，認為嚴重程度日益加甚。」最後，大使指出：「美國人民已接到各方面的確實報告，深信日本現正努力在亞洲大陸上大部份土地內設立日本獨占利益的統制，並在該區實行封鎖經濟制度。凡此種種事實，再加之以在華的濫施轟炸、侮辱美僑及注意干涉美國權利等事件，遂至形成今日美國人民對於日本的態度。」

格魯大使的演說，他自信「完全由衷之言，足以代表美國政府及人民對於日本在遠東行動的觀感」，則其將影響美日關係調整上的重要性，自可不言而喻，只就上舉之點言，在日本與美國的遠東關係上，確已形成一條鴻溝，其調整的前途，無論阿部與野村是有多大的本領，恐也難以溝通。第一、美國堅持國際公約的法理根據，而日本之侵略

中國必須破壞這個法理根據；第二、日本要建設「東亞新秩序」，關閉東亞的門戶，而美國則要維持東亞舊秩序，開放東亞的門戶；第三、美國要求日本軍隊停止暴行，尊重美國在華的權益，而日本軍隊的暴行已非任何日本政府所能制止，破毀美國在華的權益是日本獨占亞洲的最主要內容。美日關係調整的失敗，已經明顯決定在這裡了。

五、日本的調整政策急轉直下

日本與英美在遠東的權益根本衝突，實無根本調和的辦法，所以日本對英美關係的調整雖經阿部及野村最近乘日軍在湘北慘敗的機會努力進行，但是難題依然照舊殘留著，日本外交這幾天又在開始一八〇度的急變。日本新任外務省情報部長須磨，已向外國記者發言：「日本政府向不擬與英美兩國舉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談判，以期解決與英美兩國有關的懸案。前傳日本將與英美會商之說，不過為報紙的揣測」。他甚至否認外相日前與美使格魯會見為「美日談判的開端」。他更將日本與英美談判第一關節的「日本開放長江及珠江」的傳說，諉為報紙「揣測之詞，日本政府並未有想及過此事」。他把日本與英美調整關係的問題，一腳踢開，而要求人民多注意行將成立的偽中央政權問題（見十月三十日美聯社東京電）。這不能單純視為須磨親軍少壯外交家的縱談，這個一八〇度的急變的原因實已不自今日始。日本外交的再轉變，至少可以歸結到下列三種原因：

1. 日本與英美法各國在遠東的利害衝突，已發展至無法調整的地步。這在上面及以前吾人的論述中，已詳細斷定過，無須再重複。

2. 日本的外交命脈握在中國的抗戰手中。日本無法圓滿解決所謂「中國事變」則無法調整它的外交關係。最近日本狡詐全國的腦汁，繼軍事進攻慘敗後，發動出來的「誘和謠言進攻」，又遇到了全面的挫折，各種謠言已雲消霧散，

誘和的條件更不為我國當局所顧盼。我國一日抗戰到底，英美不能單獨和日本談判遠東的調整問題。

3. 日本外交陣營內的暗鬥始終無法解決，日本國民「一元化外交」的希望，依然是幻想，日本二元外交永久是在賽跑。秉承老重臣意旨的阿部內閣的外交方針，不但在成形胎中既已受到了限制和改變，最近一度回轉舊轍的企圖，又碰到少壯派軍人的大打擊。

日本軍部始終堅持用武力解決「中國事變」的主張，不斷地由所謂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表示這種「決意」。西尾壽造十月一日由南京發出所謂指揮「全支的號令」，狂言要「粉碎蔣政權」，「向新秩序的建设邁進」；十月十二日又由所謂派遣軍總司令部情報部長聲言：「決無與抗日蔣政權妥協的意圖」；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皆以特大號字渲染出來。最近，日本軍部更加利用《國民新聞》的社評，正面向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集中炮火，大加攻擊。先自「事變解決與借用外力」的依賴觀念開始，繼而主張「日本應與德國堅固提携，東西相呼應，向排英一路邁進」，終而公然攻擊阿部內閣的變節與媚態外交（見該報十月十日，十二日、廿日、廿一日的社評及主張）。《國民新聞》所代表日本軍部的意志，現在正強硬要求著阿部放棄對美媚態外交，採取對美強硬外交，以打開對美外交，列為阿部內閣的重大課題。

在日本兩大勢力夾持下左右為難的阿部內閣的外交，畢竟親英美好呢，抑或索性掃蕩英美勢力好呢？談到日本外交往何處去的問題，我們不禁為阿部內閣捏把冷汗！

（一九三九年十月卅日）

日本急於與蘇聯談判的認識

自從美國對日採取積極政策不為日本所威迫利誘以來，日本政府即轉變方向，欲與蘇聯言歡，締結通商條約，談判其他蘇日間的懸案。日本軍閥已在夢想著一個蘇日互不侵犯協定能夠繼諾門罕停戰協定而實現，日本一般人更沉醉於一九二八年《漁業協定》已有修改的希望及北庫頁的礦權等問題也有適當解決的可能。但是日本朝野的這種空氣不自今日始，實則早在十月上旬日本軍部行動派的喉舌《國民新聞》，即已公然提倡排英美蘇聯的政策了。軍部對於政府的對英美外交調整工作，原即不感覺興趣，軍部雖未便正式反對，但卻一再唆使他們的機關報評為「媚態外交」，並極力強調「東亞新秩序」的建設與九國公約的不可調和性。其中早有日本軍部的一個主潮潛伏於其間；日本政府最近始有追隨的傾向罷了。

然則日本軍部為何必欲向蘇聯討好，希望蘇日成立更積極意義的協定呢？我們可以列舉幾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日本軍部夢想乘歐戰爆發的機會排除英法乃至美國在華的權益。歐戰之爆發，在日本各階層之間各有不同的感覺；貿易商人認為「神風」到來可以再發一次戰爭的橫財；政客和普通人，認為減輕解決中日戰爭的困難，可以早日拔出深陷泥淖中的戰爭泥足；但在軍部則認為可乘英法無力東顧的時候掃蕩英美法在華的權益出於中國或東亞，以完成其「獨霸東亞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第二，日本軍閥欲效法希特勒來一次投機，想利用蘇聯的勢力驅逐英法的勢力出於亞洲。《國民新聞》自己暴露出這種陰謀，主張：「如果日本與德國堅固提携，東西相應邁進於排英一途，則蘇聯的陸軍或將由中央亞洲，向印度及波斯進出，永久苦於英國

桎梏下的弱小民族的解放戰，或將因此而展開。蘇聯這樣作法，犧牲小而收益大，是種思想戰配合現實政治的良策。」（十月十一日該報社評），年來日本時常散布一種空氣，說要替傀儡收復租界及失地，現在又夢想借蘇聯之手以驅逐英法的勢力，真可謂為想入非非之境啊！

第三，日本軍閥仍不忘情於討好德意，近來更希望德國拉線以與蘇聯接近。在蘇德協定成立當時，平沼內閣儘管指斥德國，但是軍部則仍咬定日本的敵性國家依然是英蘇，到最近因為德國從中的斡旋，更加夢想著德意日能與蘇聯共同結成一個集團，以與民主國家對抗。日本軍部已經開始謳歌著「蘇德合作」的成功；德國「解決了波蘭問題，陸上的優勢更加確實，採取由巴爾幹近東威脅英國的姿勢；蘇聯也得參加波蘭的分肥」；還說蘇聯這種作法「當是一種不捲入歐洲戰禍而強化其地步的良策……，在其外交政策之點，的確別具獨特的眼光」（《國民新聞報》社評）。日本軍閥對於德國的斡旋，早則一再表示好感，最近更直接向蘇聯頻送曲線的秋波：「蘇聯固是世界有數的陸軍國，但是蘇聯的陸軍無論怎樣整備，若與東西的德日兩國的陸軍抗爭，必至兩虎俱傷，蘇聯雖愚也必不出此」（同上社評）。

第四，日本急於對蘇聯討好的一個最具體而有把握的期待，就是想藉蘇日關係的好轉以威脅英美法，特別是美國。美國近來對日本態度的強硬，已使日本束手無策，唯一的辦法就是假藉第三國的力量，逼迫美國退讓。這是以退為進的辦法。只就日本政府發言人須磨在上月初旬屢發否認進行日美談判的言論而最近卻在上海再三表示其討好美國的談話，及日本所謂駐華特使加藤活動於平滬之間，略加考察，日本葫蘆底的藥味，就不難猜透。這又告訴世人：日本決不能以蘇聯代替美國的作用。

日本軍部強調親蘇，索性排除英美法，但是元老重臣等穩健派，則尚不能盲目於現實，所以我們敢斷言：日本之親蘇不但不能獲得積極意義的成功，倒反徒然引起內部外

交主張的鬥爭。

原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六期

日本最近對美外交的剖述

一、日本調整對美外交的主因

日本最近各界的注意皆集中到美日邦交的發展上，這一個多月來美日關係的演變也演出了有史以來未有的曲折。阿部內閣在它的形成過程上，即已對元老重臣等穩健派負了調整美日關係的使命，專任野村為外相的目的，就是在於順利完成這個使命。另一方面，日本輿論界也被這個美日問題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即連老氣橫秋的蘇峰翁，也都談起了日本外交問題（見《國民新聞》十一月八日《八方美人式的外交是最不安全的外交》），美日問題的重大性，可不言而喻了。

幾乎阿部——野村外交的全部姿態，是在調整日本與美英法的關係，但其結果，問題卻歸結到對美關係的重點上。換言之，日本不能打通美日關係的難關，則對英法的調整，完全不可能。這不但是我們這樣觀察，即日本當局也是這樣承認了。日本當局屢次指摘美國為歐戰爆發後「新援華國」；屢次攻擊美國出頭為英法保護遠東權益，為英法充當遠東利益的「看門犬」，就是這種事實的證明。但是日本現階段對外關係之所以結集到調整美日關係上，自有國際現勢的客觀條件為之決定，且先就這些條件或主因，加以剖述。

（一）歐戰爆發以後，日本急於結束中日大戰。歐戰的爆發，在日本一般人皆認為絕好機會，甚至認為是「神風」，眼巴巴地望著第一次歐戰時爆發的三十八億元橫財，能夠再飛來一次，所以戰爭爆發不久，日本政府即便宣告中立。但是日本要能夠獲得「中立國」的經濟利益，自己須先擺脫了戰爭。它們又認為歐戰爆發後「援華國家的手已經

縮回」，中國自較容易「屈膝」，所以集中全力於結束中日戰爭上。最初採取謠言的進攻，並欲誘惑中國講和；繼又發動長沙軍事大進攻，欲以戰爭結束戰爭；現在又抬出頭號漢奸汪精衛來，欲借偽中央政權之成立結束中日戰爭。雖說這些進攻全部失敗了，但在日本任何節奏上，都極自然地參雜上英美法的關係。對英美法邦交的調整，自為應時的好戲了。

(二) 日本欲乘歐洲大戰的機會排除英法的權益 自日本看來，歐戰這陣「神風」不但要送來上次歐戰時那樣巨大的橫財，並且要吹走「事事為難」的英法的「魔手」，能乘這個千載一遇的好機會，把英法在中國甚至在亞洲的權益掃蕩出去，確是最聰明不過的打算喇！日本當局認為英法的力量完全被捲入歐戰中去，再無能力兼顧遠東，它盡可以為所欲為，日本這種氣勢充分表現在歐戰爆發前後的許多事實上。殊不知事情並不那麼單純，唇亡齒寒，與英法有密切關係的美國挺身而出，先給日本一個響亮的耳光，宣告廢除美日商約，於是日本上下感覺到：「現代日本的最大障礙物，就是美國」（載《時局月報》十一月號）。英美太平洋行政政策不可分的苦味，乃浸透到日本人的心坎裡去，於是日本不能不急忙設法調整對美外交。

(三) 美國遠東政策的強化和積極化 歐戰爆發在日本固認為是制抑中國的好機會，但在美國也未嘗不認為是制裁日本的好機會。歐戰爆發後，美國對日本經濟制裁實施上的許多阻力隨之減退或消滅，例如軍火商人可以不反對禁運軍火給日本。美國更視歐戰為清算二年餘來美日總帳的絕好機會：廢除美日商約，增強太平洋的軍備，格魯大使更率直說出了美國國民不滿日本的情緒，還有其他美國事事皆對日本提出最強硬的抗議，這些表示美國最近遠東政策的轉變，不只是更強硬，且有更積極作用含蓄在內。日本人對於美國過去的強硬，認為是「正義感」的播弄，「小孩氣」的玩耍，但現在卻認為「真幹」了。這樣，日本對美國自不能等閑視之了。

(四) 日本軍閥湘北的慘敗，使日本政府調整外交政策得以加強。日本軍閥素恃武力蠻幹，對於什麼政治的談判，什麼外交的調整，全都不看在眼下，簡直看做扭扭捏捏的兒女把戲。所以當謠言誘和的戲法還未閉幕的時候，即便發動七個師團的大兵，三面包圍長沙，並以迂迴部隊企圖抄襲後背，以期完成「打過折扣」的板垣停戰線。但不幸結果歸於慘敗，暴露了全恃武力蠻幹已不可能的總破局，於是日本軍部行動派的蠻幹外交又稍為失勢，而元老重臣等穩健派的調整外交，又占了全盤的優勢。軍部對阿部內閣所要求任命外交革新派領袖白鳥敏夫為外相，終被鄙棄，另任「知美家」的野村大將為外相，後又接受元老重臣暗中委派的谷正之為次官，對美外交的調整遂得公然以大闊步前進。最初，軍部雖未支持調整外交，但也未敢明顯反對。

二、日本的雙簧與曲線

數月來日本對美國的外交關係，極盡複雜曲折之妙，一面政府與輿論界唱著雙簧，一面又由政府走著曲線前進。十月間日本政府對美調整外交的調子唱得最高，阿部內閣任命了野村為外相，日本有些報紙也曾一度自吹自擂說：美國人民也皆企望野村外相上台，得以圓滑解決美日懸案，改善美日邦交。美國宣告廢除商約，再有三個多月即要生效，日本政客自不得不慌忙起來。不過最大的作用還在於日本欲借美日關係的調整，以增加對華的壓力，結束戰爭。所以那時候日本對中國的謠言進攻特別厲害。殊不知我們堅持抗戰的鐵石意志，絲毫不起動搖，美國支持我們當然更加堅強了，美國駐日大使格魯演說的強硬，自非偶然的。所以十月底以前日本政府最積極進行的美日關係的調整工作，到了十一月初即便起了一八〇度的變化，急轉直下，一面急忙於召集興亞院會議，討論樹立偽中央政權的具體辦法；一面更由外務省發言人再三聲言：「日本目前仍不願

與國民政府進行談判」。「日本目前仍未有與英美兩國舉行正式或非正式談判之意」、「日本從未與美大使格魯接洽，表示欲調整美日邦交之意」（十一月一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須磨對記者談話）。阿部首相更於二日晚會見近衛文麿後對記者發表談話如下：「日本對英美的關係雖有調整之必要，但目前（偽）中央政權正在成立中，日本未及考慮此事。」這很明顯地透露出日本政府因誘和的攻勢失敗，乃改採樹立偽政權的辦法，欲將調整各國在華關係的難題卸給偽政權去辦理。所以十一月四日野村與格魯會見後，日本各報所透露的消息，充滿著悲觀的論調，甚至如《國民新聞》所言：「美日關係，更見殆危」。前外相有田更慨而言之說：「目前尚非改進美日關係的時候。在偽中央政權未出現以前，與第三國進行談判，實屬徒勞無功」（《大公報》上海五日專電）。

自那時候起，日本偽中央政權的妄動盛極一時，興亞院的決議案也經日皇批准，軍部方面更欲以武力威脅我抗日政府。於是一方面上海群丑集議紛紛，南北三大漢奸且有集合青島的預定；另一方面日艦集中粵南海面，大舉進攻廣西南寧。但是日本各派軍人大都輕視汪精衛，華北及華中的漢奸也暗中擋駕，汪精衛的幻夢遂陷入漫漫長夜之中，偽府正式成立之期一再延改。但是美日商約轉瞬即便滿期，對外貿易幾乎專靠美國的日本，自不能不另圖與美國談判了。本月二十日前後起，日本的作風更加微妙，一方面加緊天津租界的封鎖，逼緊英國以孤立美國；另一方面又向蘇聯討好，進行蘇日談判以威脅英美，但以我們的觀察，日本因為美日貿易關係之密切，必不能斷然與美國為敵，美日關係的調整工作，是日本現政府所不能夠忘情的。最近更經由美聯社透露出日本將由汪逆居間以與「重慶政府」言和，日本作風的微妙與虛幻，實無以復加了。

在日本對美外交調整的曲折發展過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一方面努力討好美國，另一方面則又總動員輿論拚命恫嚇美國，攻擊美國人。

最近日本輿論對美最大最具體的攻擊，就是對格魯大使所集注的炮火。日本論客全

部評論格魯的演說為「不辨場合，不識時務」的「放言」。他們對格魯大使演說所起反應的代表意見，大約有如下數點（十月廿一日《國民新聞》記事）：

（一）日本應該努力於改正從來的媚態外交，率直表明自己的意見，促醒美國的正确認識；

（二）美國雖強調法理主義及九國公約，但是現在無寧是應該交涉改訂九國公約，使得適合「東亞新秩序」的理念；

（三）日本政府應早決定「新秩序」的內容，趁著偽「中央政權」實現的機會付諸實施；這不但是對美外交的出發點，並且是世界政策的出發點。如果美國不能同意日本的「新秩序」，則應強硬對抗，任何犧牲也在所不惜。

在格魯大使未演說以前，日本輿論界的謾罵與狂喊，即已充滿各報紙及各種雜誌。自九月下旬以降，東京各報即皆指摘美國「非友誼」的作風，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進一步警告說：「美國如不改變其對日本的態度，則太平洋將成為戰場。」二·二六事變前充當高橋前藏相的喉舌，攻擊過軍部的《都新聞》，今日也附和軍部，對美大放攻擊之詞，其激烈的程度一般認為是日本多年來所未有：「日本若對美作戰，定有勝利的把握，故日本絕不因為美國虛張聲勢而讓步。不論美國採取何項步驟，日本對於東亞的政策絕對不加以更改。美國似在睡夢之中，誤信可以戰勝日本，但若美國向日本橫加壓迫，則其後果的嚴重程度，惟有上帝知之」（十月廿八日東京電）。

自格魯大使第一次晤見野村外相正式表達美國政策的主張以後，日本報紙對美國的攻擊更帶上積極性，對政府提出具體主張。《國民新聞》首先倡言：「莫論根本的調整，即個別的懸案亦極困難，蓋因美國不承認中國大規模戰爭狀態存在也」（東京十一月七日電）。該報更於翌日論列「日本對華的『新次序』與未來控制太平洋的計劃，息息相

關，美國勢孤力薄，其人民缺乏精神上的力量……如美國執迷不悟，對日仍採取現時的敵對態度，則或有被摒於東亞之外的可能。」東京各報同時主張爭奪荷蘭在太平洋中的殖民地，以為對美作戰時的資源供給地。上次抨擊美國最激烈的《都新聞》，本月中旬以後更大放厥詞，謂：「美國久以遠東之警衛者自居，對於英美在華的利益，願意同樣予以保護；據傳，美國在遠東將任英國的『看門犬』，此說或非完全無據」（上海十五日電）。

然自汪逆的夢幻做得不順利以後，日本政府及在華軍人又改變口吻。上海日軍司令藤田十五日談話，謂：「在軍事需要所許可的範圍內，對第三國利益的限制，逐漸予以放鬆。」東京談判的結果，相信許多美日間的問題可獲得解決。」十七日須磨更對記者稱：「美國固然極關切日本對華行為，但不能謂其遠東政策，將來不會發生變化……日本政府極願與任何國家調整關係……我以為美政府或人民方面，均不欲將美日關係惡化。」日本的雙簧已經唱得更微妙，對美的討好仍為日本政府所牢記不忘的喇！

三、美日外交的前途

阿部——野村外交雖然著重於對美關係的調整，甚至於這種調整工作的成敗可以決定阿部內閣壽命的斷續，但是日本現時政治實際支配者的軍部行動派，對於這種調整工作並不十分感覺興趣。自阿部和野村開始對美調整工作時，軍部即未表示支持，自始即由代言者的《國民新聞》著論反對。該報在九月間即大唱其對美調整工作的悲觀論，入十月以來，又以「解決事變與依賴外力」的標題警告政府，特別督促人民注意中國所謂「新中央政權」的樹立問題（十月十日的社評）。

《國民新聞》嗣後更從正面批評政府對美調整工作，十月廿七日用「所謂美日國交

的調整」的諷刺標題，十月三十一日用「美國干涉『事變』的可能」的警惕標題，一方面攻擊美國，一方面也就是拆阿部內閣的台。其具體主張是：「在兩國關係不但停頓而且實已極端惡化的現狀下，即令兩國敞開衿懷，進行率直的討論，國民對之究竟應抱多大的期望，不能不說是一大疑問。」它指摘美國的態度，採取反對日本的「事變」處理方針及「新秩序」的建議，已經挺身而出，從正面充當日本外交的敵手。「它更攻擊美國「自願勇敢為英法實踐遠東『看門犬』的職務。」它對於調整工作的前途，強調悲觀論，說「一部分人所想像或所希望太平洋兩沿岸國民可以即刻握手言歡，還是未知之數，或竟可以預想其有更惡化的危險。」甚至於認這種調整工作為「近於不可能而又徒勞的努力，倒不如邁進於『事變』的處理，較為賢明」（十一月廿七日社評）。

《國民新聞》對於正在舉行的美日談判，認為不能得到結果，因為美日雙方所希望解決的對象，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它說「在華權益問題及美日通商問題，當然成為談判的主題，談判成否也決定於這兩種問題」。「然而不幸在中國問題和通商問題上，美日兩國的利害關係正完全相反，因而美日談判的前途極其黯淡」（十月三十一日社評）。

日本軍部對於美日外交的認識，倒比現政府正確些。美日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即令阿部和野村怎樣努力，恐怕也無法圓其幻夢。只就目前美日談判的主題講，美國所堅持的是如何解決美國在華的權益被損問題，美國要求日本有以圓滿解決的方法及保障其權益安全。但在日本方面則視此問題為不關痛癢的問題，它們認為「在現在大規模戰鬥行為進行中的實情下，第三國在華權益問題是第二義乃至第三義的東西。」甚至認為是「極其討厭的問題」所以「可談也可不談」（《國民新聞》社評），極力避免提它。日本政府已把這個問題諉卸給未可知的偽中央政權去處理；日本輿論主張美國不能提出在華權益問題，他們認為美國如果堅持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主義，則是「美國干涉中日戰爭」，「對於中日戰爭的解決取得某程度的發言權，乃至採取干涉的態度。」他們認

為「這是破壞日本始終排斥第三國干涉的對華根本方策」。總而言之，日本已視中國為其禁嚮，不能尊重第三國的權益，各國在華權益問題自無談判的餘地了。

反之，美日通商條約再訂問題卻是日本的生死關頭，無論在生絲等特殊商品的輸出上，或在軍火及軍需資源的輸入上，日本現在更非依賴美國不可，在這問題上，日本固欲借蘇聯以自重，欲以蘇日商約代償美日商約，但是事實上則不能收絲毫效果。日本每年輸往美國的生絲價值，可以抵償由美輸日軍需品一半以上，但是蘇聯卻沒有生絲市場。美國既不銷納日本生絲，即就自由通商而論，軍需卻也自不會輸去日本，加以政府禁運軍火的實施，更無庸言了。美國現在很顯明地，拿不再訂新商約的法寶，抵制著日本對美國在華權益的侵犯，日本若依舊堅持其不談第三國在華權益問題的方針，則美日外交的調整，自必不會發生任何效果。

日本重訂美日商約的期望儘管焦急，但是美國方面卻非常安閑，且自日本加緊封鎖天津以來，美國國務部更加一再提出強硬而嚴重的警告。最近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發表談話，明白表示「明年一月間美日商約滿期後將不再續訂新約」；威氏並強調「美國政府並未有任何訓令致格魯大使，涉及將來締約成為可能的特點」；否認「有試求與日本重訂新約的活動或談判」（華盛頓十一月廿二日美聯社電）。據報，威氏這次發表乃依據事先草就的備忘錄宣讀的，其重要性足以代表美國政府的正式宣言，更值得我們注意。畢德門復又倡儀於美日通商條約廢除後實施對日禁運軍火案。在歐戰爆發的今日，這種提議已具實施的條件，因為美國軍火已可供給英法而猶感不足，軍火商人既非特別有愛於日本，也就不會反對禁運案之實施了。

美國今日所企求的是如何恢復被破壞二年餘的和平工業品的中國市場，是如何把日本行將嚴密關閉的亞洲大門打開。美國現在不但怕軍火無處銷售，且可乘歐戰期中英帝國屬地所供給工業原料品來源斷絕的機會，對日本侵略者施以更大的壓力。倘若日本

堅持所謂「東亞新秩序」之建設，並欲否定九國公約，則美日關係的調整工作，將實實在在地成「徒勞無功」的把戲了。老氣橫秋的蘇峰翁也已替軍部向阿部內閣高聲警告說：阿部外交啊！「儘管八方美人，盡情撒嬌，或說盡諂詞，努力使無一敵存在，也絕不是可嘉的事情喲，在無一敵存在的背面，則有無一友的事情潛伏著。無一友的結果，即為四面皆敵」（十一月八日《國民新聞》論文）。

阿部內閣的對英法蘇外交調整工作，亦可悲矣！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八日於香港）

原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世界知識》第十卷第五期

日蘇談判及其問題

一、日本外交作風的「大旋轉」

內部意見分歧主張不一致而步伐始終在彷徨歧路上的日本外交，最近又起了一度的「大旋轉」。

十月整整的一箇月中，日本政府的外交作風完全集中在調整日本對英美的關係上，因為第二次歐戰的爆發造成美國在太平洋情勢，特別是在中日戰爭的情勢上，不但占了最重要地位，並且占了決定地位的結果，日本為著便利結束中日戰爭而自然將其調整外交關係的重點，置於對美外交的調整上。日本政府在十一月四日以前特別忙碌於對美頻送秋波，日本的輿論也與之同唱交響曲（即令是雙簧之調，也自有其特別的作用），就是這種趨向的具體表現，美日談判的消息，曾經引動全世界的注意。

但自十月與十一月之交以後，日本的外交作風又起了一個大變化，十一月四日野村外相與格魯大使會晤的不圓滿，在表面上就是這個變化的近因。日本侵略者原欲藉美日關係的好轉，以為對中國政治進攻的助力，殊不知美國對於自身在華權益的擁護，堅持不折不扣的主張，日本對中國抗日政府的謠言引誘攻勢，又完全為我中央政府所揭穿，美日外交的調整自然難期有什麼效果，即令必欲與美言歡，也覺有憑藉另外的力量或情勢的必要。因此，日本政府自十一月初起，暫時放棄對美積極調整的工作，而改向素來認為最主要「敵性國家」的蘇聯討好言歡。在日本軍部影響下最瘋狂的報紙，如《國民新聞》及《都新聞》等，對於莫洛托夫在蘇聯最高會議的演說，不但反對看做「赤色秋

波」，並且主張日本政府應即採取積極聯蘇的政策（見十一月三日《國民新聞》社評）。

日本聯蘇的趨勢在其調整對美關係的過程上，即已潛伏著客觀的條件與主觀的潮流。一方面遠東的情勢嚴格限制著美日關係的調整達到圓滿的結果，另一方面日本軍部對於日政府的這種工作並不以支持，無寧是譏為「媚態外交」，其外交的意向是在聯蘇方面。關於前一點，我在上期本刊，已有詳盡的剖析，關於後一點，且在這裡略加介紹。

日本軍部喉舌的《國民新聞》，早在九十月間嚴格批評日本政府的親英美外交，自十月中旬以降，即又積極主張親蘇的外交政策。自那時候起，該報一面繼續強調「日本外交方針，必須脫離親英美的傳統」，一面則開始謳歌蘇德協定的成功，並促日本外交當局省悟，其言有曰：「外交與思想問題，遇到目前的困難，在一國的存在上，已對世界指示新的意義了。這種事實對於日本當局者之愚昧，混同自主獨往與孤立獨善而對世界舞台掩耳閉目，加以冷笑了」（十月十二日社評）。

在日本軍部行動派之間最近由於德國從中的斡旋發生了一種幻想。第一、他們認為：「最近的蘇聯是以打破國際現狀維持派的一種勢力而登場，並以對抗舊勢力的新勢力而出現，這一點正與日本的國際地位具有類似性」（《國民新聞》十一月三日社評）。第二、他們還推測：「如果日本與德國堅固提攜，東西相應邁進於排英一途，則蘇聯的陸軍或將由中央亞洲向印度及波斯進出吧！」（同報十月十二日社評）第三、他們又以為：「諾門罕事件上彼此的重大損害……已促使蘇聯認識了東方日本的權威。」並謂蘇聯「……確認了日本排英政策的具體化……」（同上社評）。於是他們更幻想著一個所謂「日德意蘇集團」的出現。對於日本當前的外交，排斥「八方美人主義」，主張「對蘇對德關係的好轉與對英美國交的調整，是完全不相容的。」「日美國間的外交調整與日蘇關係的改善，不能同時期待，不犧牲一方則決不能成功一方」（同報十一月八日社評）。

日本政府在对美调整工作碰壁後，在軍部行動派外交意識的影響下，自不得不積極開始其調整蘇日關係的工作了。日本外務省發言人須磨，已繼其否認「日本與英美兩國舉行正式或非正式談判之意」（十一月一日談話）之後，一再表示願與蘇聯調整兩國關係，解決蘇日間的懸案。在東京方面由日本外相野村曲盡卑恭之禮一再邀請蘇聯駐日大使史密丹寧，進行談判，在莫斯科方面則由日駐蘇大使東鄉大事活動，求與莫洛托夫磋商蘇日關係的改進。

二、日本聯蘇的手段與目的

然則日本何以要在這個時候積極親蘇呢？關於這一點，就是我國權威評論家之間，也是議論紛紛，難下結論。這裡有兩種原因使觀望者迷亂：其一、日本外交方針素來即不一致，日本是以二元傳統外交著稱的，革新派外交主張與穩健派外交主張，常在賽跑；其二、日本各派外交主張的主觀要求，時常為客觀的情勢所阻礙而起旋轉狀態。這兩種原因迫使日本外交常在彷徨動蕩中，忽而親英美忽而親蘇德，一方面主張「親和萬邦」政策一方面則又排斥「八方美人」外交。現在日本處於美蘇兩大之間更暴露出它那舉棋莫定的姿態與其內部矛盾的尖銳了。

我們對於日本外交，不能做單純的觀察，特別在目前對蘇外交上，更須辨別它的手段與目的，認清各派主張的偏向。日本目前對蘇外交的戲法，包括著目的與手段的兩重性，這在兩派不同的外交主張裡面，又有重輕。日本親蘇外交，在軍部行動派所代表的革新外交上，是目的重於手段；但在現阿部政府所代表穩健外交上，卻是手段重於目的。日本軍部的外交主張始終是偏向於德意的，所以即在德蘇協定成立後日本朝野大多憤恨德國出賣思想盟友的時候，日本軍部還是緘默，以至反乎一致，聲言日本的敵性國家不

是德國。後來經由德國從中斡旋，日本軍部外交主張的偏向對象中，於德意之外再增加了蘇聯。歐戰爆發後，這種外交意識，逐漸具體化，表面化。日本軍部認為歐戰這陣「神風」送來發財的機會，日本可以乘機掃蕩英美法在華權益乃至亞洲的勢力，以完成其「獨霸東亞征服世界」的第一步。但是他們也自知力量單薄，在目前的階段上必須聯結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共同控制亞洲，於是河相達夫的「世界三分論」，變成蘇日平分亞洲的主張。這固然是一種夢想，但是他們卻偏要夢入非非，具體主張：日本應早接受德國的周旋，和蘇聯堅強携手，使蘇聯無東顧之憂，派遣陸軍由中央亞洲向印度及波斯進出，替「永久苦於英國桎梏下的弱小民族」，達成解放的目的。他們更夢想著：「日德意蘇的獨裁集團」能夠實現，整個世界就在他們掌握之中了。

反之，日本現政府代表穩健派的聯蘇外交主張，卻偏向於手段的運用。在他們的眼中，英美在遠東的關係不能忽視，目前日美關係重過日蘇關係多多，蘇聯是代替不了美國的。他們很重視歐戰爆發後美國若廢除美日商約則日本將遭遇兩重的劫運，日本的對外貿易姑不提它，只軍火來源一項已夠制日本的死命了。軍部對於這一點固然也不輕視，但是他們企圖在所謂「日滿支」布洛克內謀自給自足，所以《國民新聞》極力反對「沒有基本生產的軍火」的輸入。日本現政府的聯蘇外交戲法，是欲藉蘇日的接近威脅英美，特別是美國，對日本讓步，使日本得以結束中日戰爭，使歐戰「神風」得以吹來橫財，與英美妥協，結束中日戰爭，再發歐戰財，才是日本穩健派的目的，至於蘇日關係的改進，在他們只用做達到此項目的的手段罷了。

我們在日本政府的聯蘇戲法上，可以看出幾種和軍部的主張不同的作法。日本政府雖自對美調整工作挫折後，不得不追隨軍部偏向於蘇聯的工作，但卻同時對英美頻送秋波。即在十一月聯蘇最熱烈的月份中，日本外務省一面再三邀請蘇聯大使史密丹寧，談商蘇日各種懸案，一面又將對英美的調整移至中國境內，進行更加頻繁。特別自蘇日談

判已發覺不很順利的十一月中旬以後，中國境內的對英美談商更加積極，日本政府的外交無寧是偏向於英美方面，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須磨之來上海，日本「駐華特使」加藤於十一月二十一及二十二兩日連訪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及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談商中國問題等等，皆在證明日本政府外交之多邊的活動。十一月十六日須磨在上海的談話，更加有趣：「日本希冀與美國訂立一新商約，……至於蘇日關係。日本固企求解決蘇日各項懸案，但若謂現時『平滑關係』的目的，在於締結一互不侵犯條約，則未免言之過早。」尤其值得注意的，日本同時還透過美聯社的電訊，散布日本欲由「汪政權」以調整第三國在華權益，並欲由汪逆拉線以與我抗日政府言和（十一月十六日美聯社電）。

另一方面，親軍的革新派外交家，卻更加拚命吹起號角，主張排英美而親蘇聯。前駐意大利大使白鳥敏夫著文稱：「日本當前最切要的問題，乃在調整日蘇關係，及如何促使蘇聯中止援助中國國民政府。英國及美國均不願蘇日成立諒解，但正因此故，日本更應加緊與蘇聯締結協定。……英美兩國現均不能以實力阻止日本建立『新秩序』。美國欲與日本斷絕商業關係，不過是一種虛張聲勢的恫嚇而已。依余所信，美國既必須考慮有與德國作戰之可能，自無真正力量應付日本」（十一月十六日日本《報知新聞》所載）。日本前駐德大使大島昨日在橫濱對記者談話，排英美親蘇聯的主張尤其露骨，據稱：「德蘇將來之關係，對日本將來之外交政策，影響甚大。就目前情勢而論，德國如肯維持現狀，則德蘇關係仍不致破裂。蘇聯在亞洲，願與日本保持友誼關係，日本應敦促蘇聯停止援助中國。日本之外交政策，應為一元的，不應對蘇對英對美，分途並進」（十二月十二日《大公報》上海專電）。

軍部機關報的「都新聞」最近公然揭出軍部對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不滿的消息，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據稱：「軍部方面已逐漸感覺現內閣對於國內各種問題與對第三國複雜關係之調整及『中國事變』之解決，皆無力應付，故預料陸相不久即將提出強硬交涉」

(十二月十二日東京外訊)。這是蘇芬戰爭發生後日本政界新趨向的第一次表現。蘇芬戰爭所引起國際關係的新變化，增加了日本外交的困難，即軍部的外交主張也到了重新考慮的新階段，他們不會再來一次嫁禍倒閣的手段，如蘇德協定成立後滾走平沼內閣，要看此後國際情勢的旋轉角度如何決定。但是日本親蘇外交的真正目的，即不容易達到，用以牽制英美的手段，也不能發揮，則日本外交依然在泥沼中，徒然加深其內部的糾紛罷了。

三、蘇日關係的展望

日本各派親蘇聯蘇的如意算盤所以不能打得順手，自有兩國的基本癥結存在：第一、日本的最終目的在於獨霸東亞，蘇聯則須阻止這種趨向的發展。第二、日本要求蘇聯中止援助中國，蘇聯則要更加積極援助中國。第三、蘇聯只希望和日本訂一個空洞的原則上的協定，而日本則要求具體解決各項懸案。第四、日本在經濟上希望著蘇日通商關係得以代替美日通商，但是事實上絕對做不到，日本的態度也自不能捨英美以親蘇聯了。第五、日本在政治上幻夢著德意蘇關係更為密切，使日本當真可以加入一個強有力的「獨裁集團」，但是國際情勢的微妙變化卻阻礙日本的美夢難圓。

日本聯蘇親蘇工作此後的進展，主要的還是要由國際情勢的變化來決定。所以自從蘇芬戰事爆發後，日本對蘇的政策，又到重新考慮或暫時觀望的階段。歐洲新情勢的發展，是有重要的決定因素。自蘇聯進兵芬蘭以後，欲據芬蘭以為反蘇聯據點的資本主義諸國，皆同樣感到威脅，德國雖然因其與英法的矛盾的深刻還不敢聲張，但是黃連的苦味已上了心頭，對蘇的警惕不知增高了幾多哩！至於慣於投機的意大利的態度呢，日本報紙揭載早在十一月一日「意大利內閣大改造」及「黨軍首腦部更迭」的消息，認為親

德派巨頭（指宣傳相亞爾非里及法西斯黨書記長斯泰拉司）退陣，親英法人物（指陸軍總參謀長格拉齊尼等人）東山再起，暗示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將大起變化。而蘇芬戰爭爆發後意大利的反蘇狂叫，當然更使日本的憂慮加深。今日國聯限時警告蘇聯，雖然只是一個空架子，但在膽小如鼠的日本外交當局，自然已在戰慄不已了。何況美國早以「打草驚蛇」的手勢，藉對蘇聯的抨擊以警告日本勿與蘇聯接近了。是以日本外相野村特於十二月四日邀請美國大使格魯解釋一番，同日外務省發言人須磨宣稱：「余欲肯定聲言，與蘇聯訂定一不侵犯條約，絕非日本的計劃；吾人僅思將各項懸案予以解決而已。」九日野村更加邀請外交界的元老五人，談商調整英日、美日，及蘇日關係。這又使吾人覺得日本外交似又要回到「白紙外交」（！）。十二日東京方面已傳野村外相不久又要與格魯大使作第三次會商，是則日本外交又有回到十月間姿態。這裡已經證驗了，我們的預斷「日本不能以蘇聯代替美國」，日本利用蘇聯的如意算盤並不能夠如意打下去，是又可斷言的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原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世界知識》第十卷第六期

提防日閥製造「東方慕尼黑」的陰謀

日本侵略者對華二年又半的作戰，已經消耗實力至飽和點，數十年來壓榨九千萬日本民眾的脂膏堆成的積蓄，差不多已經完全蕩盡，日本國內普遍發生饑餓與凍寒的現象，即其統治階級與御用學者也都高喊：日本今日所遭遇的困難百倍於當初預料的程度。日本民眾甚且埋怨日本政府浪費國民的財富與力量至比原來預定程度多少倍以上，所以日本侵略者朝野皆痛感「中日戰爭有早日結束」的必要。所以日本元老重臣財閥等穩健派，指使末期近衛內閣以後每任內閣，執行結束中日戰爭的工作。雖然因為瘋狂好戰的軍部行動派加強「鯨吞政策」與「武力主義」，致使歷任戰時內閣幾乎全因外交問題而坍台，但是元老重臣派的陰謀始終沒有停止過。他們認為欲「征服中國」採用「蠶食政策」較為有效，這是更為毒辣的陰謀。

的確的，日本帝國主義之企圖滅亡中國，「蠶食政策」實較「鯨吞政策」毒辣得多；日本若貫徹其「鯨吞政策」，則將如日本幣原外相所自認，「等於吞炸彈」。日本更狡猾的元老重臣及財閥有見及此，所以主張一步步地前進，認為以小國吞滅大國，必須穩紮穩打始有效力。所以每逢日軍占我一個重要據點而戰爭告一階段即便努力謀毒計之實現。其所施用的方策就是「誘惑的進攻」與「外交的進攻」，質言之，即為努力製造「東方慕尼黑」的局面。

日本侵略者製造「東方慕尼黑」的陰謀，隨其戰爭泥足的深陷而益加積極，自第二次歐戰爆發以後，他們更認為千載一遇的「良機」不可遽失，所以對英法加緊壓迫，殊不知英法之外還有一個勁敵的美國挺身以出，遂至阿部內閣四個半月的努力，終歸變成泡影。倘若美國在華的權益不能獲得「安全的保證」則美國必不能白白為日本所利用，

日本政府也自覺出此點，所以最近佯做更大的退讓，欲以開放長江釣英美上鉤。阿部內閣雖然因為此種陰謀的執行沒有成就而終於總辭職，但是繼之成立的米內內閣卻帶著更積極的同樣使命，其國內政治經濟的困難，尤其送給米內內閣執行這種使命的必要，米內政府將更央英美出為拉線。

這次，日本首相的交椅授予一個海軍大將的米內政光，首先的意義就是企圖積極拉攏英美解決中日戰爭。元老重臣穩健派推出米內海軍大將，一方面是用以孤立陸軍繼續蠻幹的政策，一方面又欲以海軍威風幫助對英美「積極調整」。第二，米內內閣任用遠離德意軸心而親英美的有田為外相，其對英美積極拉致的傾向，更為明顯。元老重臣等穩健意識更為強烈的米內內閣的陣容，將必助長這種陰謀的實行。米內內閣第一次的宣言所稱三要點（一）決心建設「東亞新秩序」，（二）以解決「中國事件」為基本政策，（三）協助「汪政權」，完全表露了日本政府此後的外交方向。米內對記者所說明日本現內閣「鼎足而三」的政策，列解決「中國事件」及調整國際關係為首要，有田外相強調「自主外交」，米內更侈言新內閣「獨立立場」的特殊性，有田又誇張「目前日本正極力準備開放長江，並願與美國解決各種懸案」（皆見一月十七日東京外訊），更加具體指示了日本新內閣外交的著重點。

戰爭泥足深陷財政經濟十二分困難的日本侵略者急圖結束中日戰爭，並欲利用英美出頭幫凶以完成其毒計的第一步，確是真的，但是所謂開放長江，願與美國解決懸案等等，儘是一片佯言，絕對沒有誠意，只日本政府本身也無此種力量與把握。不幸，素來同情我抗戰最深的友邦，已有被日本蒙蔽的危險，英國過去曾經節節退讓，美國今日竟也開始希望日本對保全美國在華權益須先有確切的保證，英美兩國大使僕僕於南北，雖只是普通事務的接洽，但卻容易被缺欠東方特殊情形透視力的人，誤認為積極與日本接洽，替日本奔走。敵人更用做「和平進攻」的資料，總動員通訊社及報紙，極力渲染「和

平的消息」。

日本現政府顯然欲以扶植「汪政權」，分化我內部，並誘惑我抗戰政府言和，甚至以疏通在華軍人保全英美的權益，誘引英美，作為「外交進攻」的拉線。日本侵略者製造「東方慕尼黑」的毒辣，可說無以復加了。然而我們認為遠東的情勢既和歐洲局面不同，我政府與人民的同仇敵愾又非捷克可比，則日本侵略者的美夢，終必變成幻想。我們的論據是：第一，英美與日本在中國境內的利害衝突根本無法調和，軍部喉舌的《國民新聞》屢經強調「建設東亞新秩序與九國公約」的不能調和性，日本內閣雖屢有更迭，但其堅持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主張卻無二致。這無異說英美法各國必須退出中國。這是英美各國所不能忍受的。第二，日本現內閣或有代表元老重臣等穩健派的意識，盡可能對英美退讓以完成結束戰爭的工作，但是瘋狂的軍部決不能讓政府對英美付與過大的代價，特別是在華軍人擁有橫行不羈的特性，政府對英美的退讓，如開放長江，未必能行得通。第三，日本侵略者在戰爭中所消耗的財力與人力，正希望著極大的代價，既不能對英美退讓過大，更不能接受漢奸如汪派撤兵還地的要求。第四，日本即欲利用國際新情勢伴充東方反蘇先鋒以欺騙英美，或者英美也有利用日本的意向，但是日本既無力量 and 決心去進攻蘇聯，英美也自不會輕易幫助日本制服中國。第五，日本佯言保障英法法等國在華的權益，開放長江及珠江，但事實上並無誠意，完全是與英美討價還價的作法，所以即令表面上果然開放，事實上美英各國商務利益的享受也必受到種種阻礙。

世界上帝國主義體制對社會主義體制的矛盾存在，我們不否認，在遠東方面情形也復相同，但是兩體制矛盾之外還存在著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在遠東方面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似乎還大過兩體制間的矛盾，因為英法與日本的衝突是目前逼切而又實際的問題。整個國際情形的演變，雖有改變這兩種矛盾的比重的傾向，但在目前尚無演至英法幫助日本侵略者制壓中國的可能，「東方慕尼黑」自難形成的可能。

然而這裡有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中國堅持抗戰到底。中國為求生存與自主必須對日抗戰到底，中國能堅決抱定抗戰到底的意志，則英美各國即令一時為日本所誘惑或有放鬆制日的傾向也有其嚴格的極限。縱令日本扶植「汪政權」，其無實力為英美各國所洞悉，決無多大的作用。今日我們要提防日本製造「東方慕尼黑」，更要排斥抗戰意志的動搖。內部若能精誠團結，信奉「抗戰第一，勝利第一」，則敵人「東方慕尼黑」的陰謀自不得逞。

原載一九四〇年四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一期

日寇南進與對華策略

——日寇結束中日戰爭三部曲

一、日寇軍事南進的內因

自今日的國際情勢及其可能發展的趨向看，現在確是日寇軍事南進的絕好機會，如果日寇放過目前的機會，或許不久的將來，「大東亞新秩序」的美夢，就會幻滅了。日寇的狂暴侵略者正為此事十分焦急，遂致軍部激烈派走卒的中野正剛，甚至主張：「由中國撤兵一部分兵去侵占荷印及新加坡等地，並對英美強硬」（見日寇東洋經濟新報社座談會紀錄）。

日寇軍部激烈派為著它那「大東亞新秩序」的美夢，竟至不顧內部可能的糾紛與破裂而斷然接受希特勒的指令，締結「德意日軍事同盟」。日寇與軸心國家的進一步的勾結，不實現於英法蘇三國商談最熱烈的時候（一九三九年九月前的一段歐洲外交史）。也不實現於英法對德戰爭爆發的當時，而卻恰恰實現於對我侵略戰爭經過三年四個月而一切方式的進攻皆告失敗的今日，自然不是偶然的。換言之，三年有餘的中日戰爭，警告了日寇朝野人士及一般民眾：英勇抗戰的中國，是不能征服的了。中日戰爭爆發以來言論最瘋狂乖謬的中野正剛，對於中日戰爭的估計，也完全改變了觀念和態度。他最近對別人「打倒國民政府」的主張答道：「這件事情不可能，我看也不需要。日本人大體由國民的感情上說，並不想再向中國內地進兵去征服XXX，打倒國民政府乃次要的問題，我們只要與國民政府協力，使它不為害即可」（同上座談會紀錄）。中野更坦白

地承認：「迄現在為止，榨出國力，捨諸溝渠，越發進入泥淖之中，現在必需加以糾正」。這不是中野等瘋狂侵略者代言人主觀上願意「加以糾正」的，而實在是日寇一般人民已不能再忍受侵華戰爭重負的客觀事實，逼得他們不能不「加以糾正」，日寇政略已因為三年來侵華戰爭的徒勞無功，醞釀著激烈的政變，對於發動戰爭的禍首，已漸有追問的傾向了。這種事實表現在邇來日寇兩大勢力傾軋加強的動態上。侵華戰爭的禍首，如無辦法對付，則必發生激變。

然而戰爭的禍首絕對不會悔過的，他們慣用的伎倆，是「以毒攻毒」，是用戰爭移轉對於戰爭的視線。日寇陸軍侵華戰爭的失敗，已成朝野攻擊之的，結果給了海軍及元老重臣派占上風的機會。所以目前在陸軍激烈派最大的課題，就是怎樣轉嫁禍給海軍，怎樣在政治上壓服元老重臣派的優勢。前者的手段就是強制海軍隨它南征，後者的辦法是加強其與軸心國家的勾結。所以率先決定催近衛第二次內閣早產，逼走吉田海相，強制近衛，松崗簽訂「德意日軍事同盟」。軍事南進，準備到有聲有色，煞像有其事的樣子。

二、三國同盟與日寇南進

三國軍事同盟對於日寇的軍事南進，一方面是一種前提條件，同時又是一種刺激。三國同盟雖只是普通的協助條約，並沒有攻守同盟的內容，但是日寇的幫凶卻依此同盟允許了日寇南進，事實上也因為這個允許而日寇始得南進，才敢南進。在三國同盟未締結以前，日寇即已對南洋各地蠢蠢欲動，其最大的動機在於英法的戰敗與荷蘭的亡國，乘火打劫無主的越南和荷屬東印度，確為最大方便。在日寇心目中英法荷固無可顧慮的必要，但是越南和東印度卻換了新的宗主國——德國。所以日寇的南進發生更大的阻力，必須先打通德國這一個關頭。此時又值德意對英國作戰碰到必需改變策略而歐戰有擴大

成為世界戰爭的傾向，德國遂決定強拉日寇入其圈內，用犧牲亞洲的一部分利益，被征服國的亞洲殖民地權益，以作日寇軍事南進的條件。於是三國同盟始至完全實現。而日寇第一步，才得占領了越南。據某些消息，最近又暗中增兵五萬，以為軍事南進，侵占新加坡的基點。三國同盟廣泛地給了日寇獨霸東方的默契，其第二條規定：「德意承認並尊重日本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中之領導地位」。德意還在積極方面給日寇撐腰：「三國並保證：簽字國之一，苟被目前尚未參加歐戰或中日爭端之國家攻擊時，彼此應用政治、經濟，及軍事各種方法，互相援助」（第三條）。

在德意這樣積極及消極優容慫恿之下，又在侵華戰爭無法再進展的環境中，日寇軍部遂決定軍事南進的原則。軍事南進是陸軍所極力主張的，但又分成三大派：其一主張先孤注一擲，用軍事總攻結束中日戰爭，聞板垣即其代表者；其二，主張先與中國講和，然後撤兵南進，陸軍的元老派屬於此派；其三，主張先撤退一部分據點，縮小占領區，分兵南進，如杉山及東條等人，皆如此主張。總而言之，日寇軍事南進的步驟雖未一致，但其南進的原則卻已確定。

在這種確定之下，日寇政府遂對阻其南進的唯一力量的美國，大作其外交手勢了。近衛首相公然稱：「美國如繼續拒絕對日本在東方的地位表示適當的諒解與同情，並堅認日本軸心國家簽訂的軍事同盟，為對美的敵對行為，則除日美戰爭以外，別無他途可循」。松岡外相更謂：「德意日所以締結公約，其目的即在防止美國捲入歐戰」。這是應酬德國的辭令，其實松岡的本意卻在於：「日本對於美國的態度及威脅太平洋和平的禁輸辦法，已感不耐。……日本要求美國國務院須承認遠東的新秩序，否則，即須擔當太平洋以及世界戰爭的責任」（皆據十月十五日京都路透電）。

日寇狂暴政客及報界，也皆極力攻擊美國，並揚言不惜與美一戰。中野正岡十月七日對日日新聞記者公開宣稱：「日本必須在東亞各部分採取建立『新秩序』的有效措

置」。中野主張「請英國退遠東」，並謂：「英美兩國似已在幕後進行談判，以期使用『大東亞圈內』的海軍根據地，此種計劃如將付諸實施，則日本必須先占領具有軍略上重要性之各據點以擊破之」。中野甚至狂言：「吾人在必要時，甚至可以使用武力」（東京十月七日路透電）。日報初則叫囂切斷滇緬路（十月中旬），繼則主張武力侵占荷印，如謂「荷印一向依賴英美，為使之轉移於日本計，……或應訴諸武力」（東京朝日十月廿三日專論）。終則對美恫嚇，如中外商業新聞稱：「最近一切報告，皆顯示美國極力對日備戰，但日本早已準備就緒，一旦美國向日挑釁，日本必立即應戰」。

最值得注意的是：松岡的狂言經美國還擊一度沉默後復於十月十三日揚言：「日本必須準備與阻撓吾人努力之任何外國勢力作戰」（在東京日比谷公開向民眾講演）。誠如日日新聞所載：「日本締結三國同盟後，日政府在外交方面之意見已趨一致，現已決心積極推進南進政策」（十月十四日東京合眾電）。

三、「世界四分論」的夢想

日寇急激軍事南進的世界觀，是所謂「世界四分論」。這又和前日寇情報部長河相達夫所唱的所謂「世界三分論」大異其趣。這裡先介紹日人主張的大概內容於下。

「由於歐洲情勢的激變而將來的世界經濟分野，或將分成四大集團，這已成各方面的有趣話題了。其中，因為英法陣營的總崩潰而歐洲新秩序以德意為中心，出現了一個計劃經濟下的一大廣泛經濟圈。與此對立而東亞集團，泛美集團，及蘇聯集團的成立，似乎是世界秩序當然的形成。從前，占世界陸地六分之一蘇聯社會主義聯邦先誕生，繼之，大英帝國自奧大瓦會議以來也形成一大集團。此外，法國也團結其準保護國及殖民地，謀成立法國集團；美國也

努力於統一南美各國，結成泛美集團。

然而領土狹小資源貧乏的德意日，苟欲結成集團，無論如何必須先把世界領土，重新編制。英美二大集團的存在，一手壟斷了世界經濟的通商、金融、保險，及信用。其他的八十大小國家，若離開這個集團的聯繫則其經濟關係立陷於破局。例如就世界貿易的統計看，大英帝國集團即占世界貿易總額的二二%，但是這次歐戰的結果，這一大集團中核的英本國已歸消滅，其後若果出現了德意中心的歐洲集團，則世界經濟陣線，勢必發生大變動。……

於是世界各方面受其影響，企圖製造廣範圍地域的經濟圈以相對抗，形成在新時代自己保持的新傾向。因此，美國努力加強哈巴那泛美會議以來日益強化的泛美集團，而日本也聲明：「於（日滿支）之外再包括南洋，以建設廣大地域的經濟圈的意旨。……」（匝瑳胤次《東亞共榮國的確立》——載《改造》時局版九月號）

日寇太不自量，夢想著和蘇美及歐洲國家分庭抗禮，形成獨立的經濟集團。這正暴露了它的經濟弱點。日寇表面上是個獨立的國家，但是在經濟上卻是世界幾個大國的附庸，它若離開中國，英美，及其勢力圈，換言之，其經濟若離開這些聯繫，實在馬上「陷於破局」。現在，中國這塊肥肉噎在喉嚨上，依存英美的關係又不可靠，若不及早奪取新的廣大商品市場及資源供給地。以代替英美的廣泛地域，則日寇經濟勢必整個發生動搖。今日問題的關鍵完全繫於美國，所以美日衝突和緩則東京股票大漲，美日關係緊張則又暴跌。

今日，日寇當局所最頭痛的問題是如何去奪得代替英美廣泛地域的領土，其最理想的對象就是南洋群島。南洋群島從來對日的經濟價值尚低，在日寇總貿易中，只占九·

三%，較之亞洲大陸占三七·四%，北美占二七·六%，實低微之至。但因其現在低微所以將來大有希望。日寇地理學專家評定南洋在日本將來發展上的關係說過：「南洋有一億以上的消費者，尤其日本為獲得軍需資源，南洋實有日本貿易代替地的價值」（佐藤弘《太平洋經濟學》——《日本評論》八月號）。

因此，日寇決定脫離依存英美的關係決心爭奪南洋群島，南進成了它的國是。

四、日寇南進的絆腳繩

日寇要軍事南進，必定和美國正面衝突，以至掀起美日戰爭。美國非弱小國家可比，日本欲與美國作戰，必傾其全國的力量；欲傾其全國的力量必須結束其他部分的糾紛，使無後顧之憂。而拖住日寇戰爭泥腳的中國及擁有龐大陸海空軍的蘇聯，都是日寇南進的絆腳繩。海參威的潛水艇不但可以截斷日寇與大陸的聯絡，其航空隊更可以在數小時內毀滅日五大都市。日人也畏稱為一把尖對其心胸的匕首。所以日寇在其決定南進以後，附帶地決定親蘇外交，特派建川駐蘇聯，其使命為向蘇聯送秋波，並央托德國從中斡旋，欲求蘇聯與它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為達此目的，日寇不惜作最大的讓步，據說，甚至有人主張奉還南庫頁島，放棄北庫頁島的各種礦權及海業權。開放中東路及南滿鐵路與蘇聯共用，以為締約及利用西伯利亞鐵路的交換條件。日寇一般民間應聲蟲，也皆主張：「強化其與德意軸心的協調，調整其與蘇聯的外交」（《改造》時論版九月號）。以夢想一個德意日蘇集團實現。

自經蘇聯對於日寇先要以外交手段，繼又否認史塔林與建川美次的會談（塔斯社公報），最後且對我國表示繼續援助中國抗戰爭取民族解放以來，日寇的幻夢已經做得不甚圓滑。這姑且不談，日寇軍事南進最大的絆腳繩，卻是拖住它的後腿的中國抗日戰爭。

中日戰爭恰好經過了四十個月，已使日寇上下朝野束手無策，即最狂暴的軍閥也不得不主張暫移陣地南進。這因為日寇兵力實在有限，不能魚與熊掌兼而有之。據白崇禧將軍所發表實情：「敵人可能動員的兵力，最大限為七十五個師團到八十個師團。自發動侵華戰爭以來，敵人在華所使用的兵力，最多的時期竟達到四十二個師團，如果敵人在東北的九個半師團計算在內。那末敵人侵略戰爭所動員的兵力，已有五十個師團之多，達到可能動員的兵力總數三分之二了。在這龐大的動員數字之下，敵人的消耗數字，卻更表現得驚人。據敵人自己陸軍省的公布，三年以來他們死傷的官兵已有百餘萬，其中四分之一是死者，四分之三是傷者」（十一月四日在中樞紀念周報告）。

日寇在侵華戰爭上，已動員可能動員總兵數三分之二，欲以所留三分之一的兵力，用在鎮壓國內民眾及朝鮮台灣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再策動軍事南進，是絕對不可能的。未來的太平洋大戰雖說偏重於海戰，但是日寇要爭奪新加坡需要相當雄厚的陸軍，襲擊香港及緬甸等地，更需要陸軍。即令其他財政、經濟、資源等問題不加考慮而只討論這兵力的問題，日寇若不收束中日戰局，也是絕對無法軍事南進的。日寇陸軍目前三大南進派之中，據說是以局部放棄占領區，扼守要點之說占著優勢。若假定其縮小的範圍為板垣停戰線打通粵漢路以後採取守勢，則一萬公里的鐵路和十五個大據點的守兵，也需要九十五萬人（鐵路守備隊每公里二十人，以九·一八事變前南滿鐵路的警備力的倍數計算，十五個據點是綏遠、張家口、平津、濟南、太原、徐州、鄭州、西安、武漢、長沙、廣州、南昌、杭州、寧滬等地，平均每一據點以五萬人計算），則可移用去南進的兵數，依然極有限（以上計算根據本刊一卷四期吳平陽之作）。

日寇消費百餘萬的死傷軍隊，一六〇億日元的戰費，及三年四個月的時間（皆據白將軍的報告），艱難得來的肥肉，必不輕易放棄。日寇只有在結束中日戰爭與軍事南進中選擇其一途，魚與熊掌已不兼而享之，此點日寇一般人士頗有自知之明，所以外交協

會幹事田村幸策駁中野正岡的主張說：「應該言行相符，須由打倒國民政府入手。日本人從前看不起中國，並且否認國民政府，要打倒它，現在打了三年，國民政府還沒有打倒，不知道還能不能再和英美為敵呢？」（上引座談會記錄）

美國大選的結果完全出了日人的希望之外，羅斯福中選連任，美國在太平洋上的軍備擴充將更來得迅速。十一月八日倫敦合眾社電傳「英美澳進行談話後已締結太平洋上主要根據地聯防協定，俾在接獲緊急的消息時，立可採取應付的決策」。華盛頓合眾電又傳美國財部要求國會批准發行一五〇億美元的公債，以為完成國防計劃之需；摩根索財長並稱：「吾人正開始重整軍備」。這些事實和消息，真要急死了日寇軍部的南進派，但是中日戰爭這條絆腳繩總是要設法解去的，否則無法南進。

五、日寇結束中日戰爭的三部曲

日寇內部關於怎樣結束中日戰爭的意見，據說分三大派：其一是主張發動軍事總攻擊，運用軍事攻勢使中國完全屈服；其二主張放棄廣田三原則及近衛聲明，運用和平攻勢引誘中國上當；其三主張縮小戰場堅守據點，抽一部分軍隊去南進，待南進成功後再來結束中日戰爭。聽說，第三派主張占優勢，我國有些人士還誤信敵人撤退龍州及南寧為此種策略的第一步，並妄信敵人或將繼續撤退若干據點，但是以我的觀察，敵人在軍事南進前的對華策略，絕對不會如此簡單。日寇要軍事南進，必定先謀結束中日戰爭，自目前的國際情勢看來，美日戰爭又無立刻爆發的可能，且美日雙方均無立刻開戰的必要，則日寇之謀結束中日戰爭，依舊占其最主要的對外政策的地位。上述日寇的三種主張，可能的輪流採用，甚至同時並用兩種或三種。

這三種策略運用的方式，是：（一）謠言攻勢，（二）和平攻勢，（三）軍事攻勢，

敵人將輪流採用，可以名之曰日寇結束中日戰爭的三部曲。

謠言攻勢及和平攻勢，已經開始，並且還在繼續發展中。在十月與十一月之交，敵人運用謠言攻勢最起勁，東京方面拚命散播中日和平的空氣及日寇國際關係的好轉，說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將來華調停中日戰爭；說蘇德意日將結成四強集團；說蘇日關係好轉，日寇駐蘇大使建川與斯大林曾商過：說蘇聯將出頭調停中日戰爭，中國將加入所謂軸心集團，甚至於連中日和議的條件也都假擬，載於報上，等等。這些謠言攻勢，自經國際上有蘇聯當局發表公報闢謠，及美國方面羅斯福兩次的談話，指為「全係某某方面所散播；以期分化中美英三國自滇緬路開放後對日本的關係」以後，敵人的陰謀已漸失其效力。上海日文報每日新聞十月廿四日曾稱「德意法三國駐渝大使曾向中國政府建議與日本講和」。我外交當局即於十一月八日發表聲明稱：此種消息毫無根據，並以抗戰以來德意大使迄未來渝相印證。日寇謠言攻勢一時始歸消滅。

然而繼之而來的是和平攻勢，此種攻勢迄至現在還在繼續中，此後恐尚有一個時期與謠言攻勢配合進攻，和平攻勢開始於部分的撤退，佯示求和誠意，其起點為龍州之放棄，南寧之退出，其後尚有小據點之撤退。此段和平攻勢有四方面作用：其一是引誘我國政府，分化我們內部；其二是誘惑英國，欲使其與日寇妥協；其三是分化英美，使不得聯合壓迫日寇；其四動搖美國選民對羅斯福的信任，使不選舉羅氏任總統。但這些苦心絲毫沒有發生作用，我國團結抗戰愈加堅決，英美太平洋上的聯防日益具體化，如英美澳聯防辦法決定，英國已經開放了滇緬路，羅斯福也被選，連任總統，美國對日的種種設施更可以駕輕就熟，鉅款軍備費及公債之發行皆已有適當的決定，日寇的狡計已不得逞。

日寇的謠言攻勢現在已經完全失敗，和平攻勢也沒有發生效力，而美英的太平洋合

作日益積極化，結果急壞了急激的南進派，這幾天日寇政府各方面趕開各種會議，甚至於御前會議非常繁忙，阿部特使已回去，駐美大使堀內，赴南洋的小林，甚至如駐華的軍事重臣板垣征四郎，也皆相繼返國，日寇此後的對華動向，當決於這幾天會議。親美巨頭野村前外相已被派駐美，日寇並沒有忘情於對美妥協，英國也要受其影響，和平的攻勢還要繼續相當期間。但是日寇的陰謀在我們堅決抗戰之前必不能發生絲毫作用，最高領袖告訴中外：我們中國明白這一點，所以不僅決心抗戰來粉碎他征服中國的野心，且要以抗戰來打破它征服東亞的妄想。……無論敵人南進或北進，均是危害我中國的生存，我們為了自衛及建國，必盡力之所及，來徹底打擊敵人征服東亞的暴舉，我們中國與所謂「東亞新秩序」或「大東亞新秩序」，決不兩立（國慶日告軍民書）。

日寇謠言進攻及和平總攻失敗後，隨後來到的必是軍事進攻，這是目前對華策略的第三部。敵人雖已無力量作總的軍事進攻，鑒於八九月間的事實即可證明，但其集中一點的進攻還是可能的。如果歐戰的情勢沒有激烈的變化，英美太平洋的聯防沒有更具體的成就，美國對日的壓迫對華的援助，沒有更積極的作法，日寇收拾「中國事變」就會從容些。它就無須消極的立刻退出太多的據點，抽兵去南進，更無須施用單純的求和辦法。它可能的採軍事配合政治的辦法，進攻與誘和並用。前此撤退南寧等地，用意若是「以退為進」，那末最近將來的的手段，可以的是「以進為退」了，是為著撤兵去南洋而作一度大進攻，一直到軍事南進時機迫切始於無可奈何中真正撤退，而實行其扼守據點的政策，專心去南進。

因此，我們目前還須警惕日寇再來一度軍事的進攻，並是其未南進以前竭力予以消耗。正如白崇禧將軍的預計，「我們現在只要每一個戰區每日能消耗敵人三百人，合計一日可消耗敵人約三千人，一月可消耗敵人九萬人，一年可消耗敵人一百萬人」。則到

日寇南進的時候，其可能留駐的軍隊就極其有限，我們就可以總反攻，一鼓而驅逐日寇出於我國境外了。

（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三日於陪都）

原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二期

日寇南進呢？西進呢？

自去年九十月以來宣傳已久的日寇軍事南進問題，據我個人的觀察，最初日寇還不過是想用外交手勢和軍事恫嚇，達到他們所希望的經濟目的——占領南洋各地的資源和市場，以代替日本對英美的經濟依存關係。日寇所以悍然和德意締結軍事同盟，表面上雖是軍事問題，但是實質上則為外交作用占更大成分。日寇原想藉此手勢，威脅英美對它讓步，在消極方面緩施對日經濟壓迫，在積極方面讓它得在荷印、越南及泰國等方面設定經濟關係及軍事根據地。

然而日寇強硬手勢的紙老虎為英美所看穿，英美用軍備的積極布置與對日的經濟制裁，答覆了日寇，日寇主張軍事南進的激烈派軍閥，逼得沒有辦法，開始作種種的軍事措施，越南及華南沿海的施設，乃至近日在粵南各地的進攻，我們都可以認為是這一動態的具體表現。這是在準備著春季可能的軍事行動，掀起一個大規模的太平洋戰爭，實行正格的軍事南進。

但是日寇正格的軍事南進，取決於三方面的條件。第一、德國對英的進攻勝利或已有勝利把握，是最大的決定條件。日寇一向的侵略，是野心大過實力，所以進攻的方式是投機，是選擇最弱的部分進擊的。德國不佔優勢，英國反擊日寇自可裕如，美國安定太平洋力量更加充分，所以德國沒有達到勝利把握以前，日寇對英美的正面突擊還是要觀望的。第二，英美對日寇的制裁，若真正積極而有效，日寇冒險發動軍事南進，也有可能。日寇之急於南進，在經濟而不在於政治，這是日本侵略者覺悟到：從中日糾紛中派生的日英及日美關係，很難有圓滿調和的可能，日本對英美依存關係，不是永久可靠的，所以急於奪取南洋群島以代替英美。但若英美還可以和日寇妥協，則日寇為著「中

國事變」的拖累，自不願也不必急於多樹勁敵，英美對日妥協成分存在一日，則日寇一日不採取正格的軍事南進政策。第三，日寇內政上陸軍南進派是否占絕對優勢，也是日寇正格軍事南進的決定條件之一。日寇的政治勢力原分兩大派，元老穩健派與軍部急進派。兩派的對外政策很有急緩之差，在軍事南進政策上亦然。自去年九十月間第二次近衛內閣出現前後，軍部急進派很占優勢，所以正格的軍事南進的聲浪日益增漲，在越南的軍事準備更為積極。但是軍部急進派無論怎樣狂妄，每一行動也要幾成勝利的把握，始敢發動，也始能得到全國的支持。邇來因為軸心夥伴意大利軍事的挫折及德軍進展的停頓，日寇軍部急進派很受打擊，日寇正格軍事南進政策也難免起了動搖。參證近來日寇對美政策委婉及重光葵對丘吉爾一再保證「日本無進攻大英帝國任何領土之企圖」，並稱：「太平洋危機業已消散」，斤斤於解釋「三國同盟之目的，在防止戰爭延及遠東」。已可想見日寇推進正格的軍事南進，以至和英美發生正面衝突，還在躊躇不前的階段。

國際問題是整個的多方面有聯繫的，正如我們不能孤立地觀察歐洲問題一樣，我們也不能孤立地論斷日寇軍事南進問題，乃至太平洋戰爭問題。日寇不能專注意南進問題而忘卻了「中日戰爭」，英美也不能專為抑制日寇南進而忘卻了歐洲情勢的新發展。因此，最近松岡外相才又照會英相丘吉爾，開始對英施其花言巧語。日使重光與丘吉爾談話二五分鐘，專討論英日關係以及遠東時局問題（三月六日各報）。日寇提議泰越調解條件，法國承認越南割土，英美也沒有什麼特別表示，此後太平洋問題的新動向，更值得注意。不過我們要特別警惕的是，軸心國家的春季大攻勢中，日寇或者在正格的軍事南進前，先以進攻我們各地特別是重慶，用解決「中國事變」配合德意在巴爾幹的行動也未可知。再重複一句話，在上述三種條件未妥善具備以前，日寇正格的軍事南進以至掀起太平洋大戰，恐還有待，而中日問題仍占重要地位。

日寇今日的內外情勢，已逼得它的對外政策，須謀以政治配合武力，對華政策與對英美政策並駕齊驅。

原載一九四一年三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六期

日寇東亞圈外的圈圈

邇來日寇朝野皆以建設「東亞共榮圈」為其口頭禪，但其陰謀所在，全世界有眼光的人士，沒有不洞悉其奸的。東方文化協會會長于右任先生即曾以幽默有趣的口吻批評過：「日本人的這個圈那個圈，事實上都是我們死它們活的毒圈」。而日寇今日的毒圈，又不只限於東亞，據他們自供，要隨實力與需要擴大這個「圈」，我們可以說日寇要無窮盡地在其圈外加圈，終極的目的非至圈完整個世界不止。

「欲征服世界，須先征服中國」的陳話（據《田中奏摺》），姑不提它，即自最近的幾樁事實加以考察。其野心也已畢露於世界人士之前了。日寇朝野以前所談的是「東亞新秩序」。而自去年九十月間德意日軍事同盟成立前後，近衛政府即便在「東亞新秩序」上面加個「大」字，這是日制「東亞共榮圈」的擴大，但是這個「共榮圈」不只是擴大，事實上還在圈外加圈。近衛政府一面加一個「大」字於「東亞新秩序」上，另一面又宣稱其範圍包括南洋群島。

繼近衛政府的宣言之後，在「共榮圈」外再加圈的，是日寇前任軍事參議官高橋三吉海軍大將，他確定道：「大東亞新秩序的範圍，即以滿洲國為起點，南伸及於澳洲，西及於孟加拉灣與緬甸，日本依照其國力與領域的需要，逐步得由滿洲國、中國、越南、緬甸、海峽殖民地、荷屬東印度，新喀里多尼亞島、新幾內亞、太平洋若干海島、菲律賓、澳洲，及東印度若干地帶前進」。東亞的圈絕對圈不了這麼廣，圈外的圈又多了幾層，大了幾倍。日本不但退伍軍人如此主張，即其負責人的外相松岡，也曾一再公開宣稱過。松岡一月廿六日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演說，要美國「竭力在西半球方面取得控制勢力，在其他地域如日本享有穩定和平秩序力量的東亞方面，自以避免多事干涉較為

合理」。二月廿四日又在眾議院決算委員會上答福田幹次郎的質問說：「……南北一千二百哩、東西一千哩之大洋洲，務必成為亞洲民族移民之地帶，……本人認為白種人既不易於大洋洲依照其理想實際上推行政務，故務必以此轉讓與亞洲民族」云云。

日本侵略者圈來圈去，非把整個亞洲乃至整個世界，全部圈進去決不停止。然則日寇圈進去這麼廣的地域，做什麼呢？日寇外務省的一種秘本，主張組織「極東協力組織」，說道：「諸民族經過這一聯合，放棄其利己的立場而歸著於極東的立場。日本則先於極東努力於實現理想的協力組織。及其實現後，如有自發參加的國家，則歡迎其參加，或在實力所及的範圍內擴大組織，漸次努力於『掩八紘為宇』的建國理想之實現」（據本期孫哲生先生大作）。

日寇野心要建設一個世界聯邦，但這又是以日本帝國為主人的世界帝國，他們的指導原理就是所謂「日本主義」。他們對國際宣傳，說他們沒有領土野心，但是主張一切的土地與資源，皆屬於神或天皇所有，日本領導下的協力組織，有權限變更各國的領土，分配各地方的資源，他們雖然常說尊重歐美各國的權益，但又主張「極東的立場」，以與歐美各國的立場對立。他們對歐美各國談亞洲問題時主張民族主義與民族解放，但對亞洲諸民族談同一問題時則又主張「愛他主義」，而所謂「愛他主義」就是「內政干涉主義」。這很顯明的，日寇欲以自己為主而以其他亞洲諸民族為奴隸，來建設所謂極東聯邦，同時持此聯邦以與歐美對抗，驅逐歐美人士於亞洲之外，然後再「依照實力所及的範圍」，逐漸侵吞世界其他各部分。

日寇的東亞圈，已由中國一部分失地圈到中國全國，又圈進了南洋群島，最近又加上整個大洋洲，要求白種人退出去。今日最嚴重的問題。不獨是英美兩國與日寇爭霸的問題，同時也就是英美兩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存亡的問題。英美法等國過去曾經坐大了日寇，現在再不能予以姑息了。這是本刊兩年半來向世界正告，乃至大聲疾呼的。我們

英勇的戰士已在日寇所畫的圈內抗拒強權垂三年又半，此後還要精誠團結抗戰下去。凡此種種固然要靠我們自力更生，但是英法荷也應知援助中國以自助，並且及時給與日寇以迎頭的痛擊。希望國內外人士精讀本期所載孫哲生先生大作《日本極東協力組織大陰謀》，以窺日寇野心毒計的全貌。

原載一九四一年三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六期

再論日寇南進呢？西進呢？

去年八九月間我國大部分人即喧嚷著日寇立刻南進（當然是正格的軍事南進），筆者則主張日寇當時只能做經濟南進（見「中蘇文化」座談會），果然迄今八個月日寇對英美戰爭還沒有爆發。三個月前大家又嚷著日寇此次必定南進，筆者則在本刊上撰一〈日寇南進呢？西進呢？〉的短評，後來事實證明了日寇加強封鎖我們的沿海，進兵北線，同時對我軍事與政治的攻勢並施，尚無決心與英美一戰的意向。現在又到大家嚷著日寇正格南進以與英美決鬥的一個新階段了（五月四日政治部文化界辯論會的風光，就是一個例證）。事關抗戰甚巨，故特更檢討一下。

自從蘇日中立條約簽訂以來，我國各方面皆起了莫大的衝動，其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斷言日寇立刻整軍南進以與英美比個高低，而我們的挨揍，可以緩和一下。因此所謂「塞翁失馬論」遂為某些方面所主張，而一向富於僥倖心理的一部份同胞，鼓掌附和。

然而我們應該知道蘇日協定不是日寇軍事南進的決定條件，而日寇一貫的外交策略（包括政略與戰略）是「重點主義」。日寇帶著先天的貧血症，它的人力，財力，物力，乃至各方面的條件，皆不許他們的野心家作全盤的統籌的計劃，他們儘管標榜什麼「大東亞新秩序」懷抱什麼「征服世界」的野心，但是實際的作風究竟不能如希特勒的吡吡風雲，大刀闊斧地幹；他們只能夠一點一滴地幹，偷偷摸摸地做，每一階段的目標總是集中在某一極小局面之內。過去四年的對華作戰是如此，此後應付世界變局，也將更是如此。

日寇現在希冀南進，是不成問題的，這是它主觀上的希望，正和它企圖「征服世界」，有百步與五十步的相似。但是客觀的情勢怎樣呢？這一階段的國際情勢還沒有具

備充分的條件，使日寇實行正格的軍事南進，去奪取新加坡及荷屬東印度（請讀者注意「奪取新加坡及荷印」一點，因為日寇現階段的南進目標，應當在於完成「大東亞共榮圈」，完全控制太平洋，欲達此目的，不奪得新加坡及荷印，則在軍事上不能破壞形成中的英美的「澳亞地中海」的堅固根據地，在經濟上不能獨立自給以支持長期戰爭）。

第一，日寇自己也覺悟到美日戰爭是一場惡鬥，長期的戰爭，所以需要充分的物質準備，以前所積蓄的物資不幸已全部消耗在四年的侵華之戰上，在新的物資積蓄未成功以前，掀起更大的戰爭自要十分戒慎。日本海軍法西斯代表言論者高橋三吉，就是這樣主張的。固然日寇也可以對南洋施行「以戰養戰」的政策，奪取荷印以為補給地，但這又如高橋三吉所講的，「荷印並沒有和日本在地理上聯在一起，在奪取荷印的時候需要考慮到中途被截斷，尤其嚴重的問題是：荷印未拿到手，其他各部分如印度，馬來半島，菲律賓，澳洲，美國，中南美洲等地的資源，先已斷絕來源。這於日寇在立國上是一種最大的致命傷。日寇不能不充分考慮最安全的辦法。換一個角度來看，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遠東最大海軍根據地無恙存在一日，則日寇一日不能輕易奪取荷屬東印度，侵占荷印固是目的，奪取新加坡卻是必經的手段，而這又是一種絕大的難題。所以能夠「和平南進」，就和平南進一日。

第二，英德的地中海，戰爭還在激烈進行中，德國集中力量以期達到掃蕩英軍的目的，但是英國因為歐洲立足點所繫，歐亞聯繫關鍵所在，也集全副力量在保持地中海的兩頭據點。因為北非的關係，英國在這裡還擁有相當的方便。在這場的惡鬥上，德國要獲絕對的勝利，似乎還有相當的時間。而在日寇呢，正期待著德國切斷蘇伊士運河，把英國艦隊困在這個運河以西，不能經印度洋駛來遠東的時候，才好發動正格的軍事南進。這次松岡見希特勒時，就是拿這個理由，做日寇搪塞不敢貿然軍事南進的口實。在德國未獲得絕對優勢以前，日寇還不敢冒險得罪美國而自陷於絕地。何況英美對日寇，

尚無採取斷然的手段意向？！

第三，日寇尚未忘情於「東方慕尼黑」的收局，希望中國中途屈服，使它得以拔出深陷的泥足，恢復全國的元氣。最近日寇逼迫我國屈服的策略是軍事與政治並施，一面攻陷我閩浙海口，進兵北線，一面則散播和謠，以行其政治攻勢。日寇此刻在外交上又施用緩美嚇英的手段，對美國極盡其諂媚能事，對英國則要求其再封閉滇緬路。就這幾天英美的態度考察，日寇的外交戰似已失敗，但對中國的陰謀，則相信還要排演下去。即今日寇主觀上急於南進，但是這一把戲至少也要排演到地中海戰爭告一段落的時候。簡單一句話，結束「中國事變」才是日寇本階段政策的「重點」所在。

第四，日寇現政府不是軍事南進派而是強調結束「中國事變」的現狀維持派。陸軍死硬派雖然倡言大規模南進，但是一般資產階級，特別和輸出貿易有關的財閥，及他們支持下的政黨，元老重臣派等，皆反對軍事南進，他們代表者的近衛政府，愈加改組愈是維持現狀的成分占濃厚而反對太平洋戰爭更激烈，所以在日本現政局未大變動以前，日寇絕無決心與美國一戰，儘管日來日本報紙又在鼓吹，狂叫。

日寇對於蘇日中立條約發揮的作用，就是外交的神經戰，而尚無決心作正格的軍事南進。這正如蔣委員長敬告英美諸友邦的演詞中所分析的：

「自中國抗戰以來，將近四年，實已將日本國力消耗大半，目前日本實無餘力可遂行其預定侵略之計劃與其侵略之野心，而達成其上述政略戰略之目的，（指侵略太平洋處分美國）。因此今後將採一種買空賣空，卑劣手段來挑撥離間太平洋上各國之關係，而以種種威迫利誘之行動，間接的仍想達到其各個擊破，依次侵略之目的，此則為太平洋有關各國所尤應特別警戒者」（歡送唐森大使致詞——五月十二日各報）。

領袖的分析非常正確，日寇目前「依次侵略」之「重點」在解決「中國事變」，太平洋各國仍只是其「威迫利誘」的對象而已。中央社倫敦五月一日國際電所傳「據此間日方高級當局稱，此後日本外交上第一重要步驟，當為企圖改善對美關係，並設法成立諒解，維持太平洋上之和平，日本現益感不願參戰，並設法獲取保證，不再參加此後之戰爭」，不見得完全是烟幕吧！領袖更正確地下結論：「……因此，可知日本今日之戰略政略，與其侵略之傳統計劃，以及其實際上所採取之行動，實無一不暴露其先處分中國再來處分美國之陰謀與野心」（同上致詞），我們如何能存僥倖之念，而不深加警惕呢？！

（五月十日）

原載一九四一年六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二期

日寇欲勾結德國平分世界

日寇在侵華戰爭達四年的今日，陷入一個極端矛盾的苦悶中——即一方面食欲非常亢進而消化則極度不良。日寇在「東亞新秩序」上加一個「大」字，把南洋的幾乎全部包括進去，不過是幾個月前的事情，現在又提議取消美國在美洲的霸權，限制美國權力不得越過夏威夷群島以西，限制蘇伊士運河上英國的控制權，以便利它侵奪英國的亞洲殖民地，並欲解除蘇聯在西伯利亞與海參威的武裝，使它得在亞洲大陸上肆行無忌。質言之，日寇對英是要盡奪其亞洲的殖民地，對美要奪去太平洋屬地的大部分，對蘇要侵占亞洲的全部領土。這是日寇外務省機關報《廣知時報》四月三十日所提議的「和平條件」裡所列的一部分，可見日寇現在的食欲如何亢進了。

對於日寇的這一和平提案，我們首先應該認識的，是日寇欲勾結德國平分天下。提案中雖屢言「軸心」，但是意大利則被列為德國的附庸，事實上是主張德日分別獨霸歐亞兩洲，對於美英蘇暫允其偏安於極小部分，留為第二步的侵吞對象。若就其和平提案的內容分析，可以分三方面來考察：

(一) 德國統治區是：一、英國海軍退出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由英國與軸心國共管；二、北非洲自直布羅陀以至索馬利蘭之區域，應由軸心國處分；三、南非聯邦取得完全獨立，非洲其餘英國殖民地交由軸心管理；四、歐洲大陸於德國控制之下成立合眾國，各份子之政治合作須以柏林之意見為根據。

(二) 日寇統治區是：一、除已得領土及彼認為已歸控制的中國領土未提及者外，還有太平洋方面，美國勢力不得逾越夏威夷；二、美國還須允許日寇勢力侵入中南美洲；三、太平洋各島建立共管區域，推行合理之合作，並須聘用日本顧問（實是太上統治

者)；四、蘇聯解除西伯利亞與海參威之武裝；五、歐洲合眾國的東南邊境及範圍尚待未來解決，實際意思是由德日共同處分近東領土；六、言外，日寇應占領英國的全部亞洲殖民地。

(三) 留下的，只是：一、美國局促於北美，若干部分還須讓與加拿大；二、蘇聯不但須解除西伯利亞及海參威的武裝，歐洲部分還須歸入軸心本位的合眾國；三、英國完全孤懸於三島中，加拿大似乎還要它獨立；四、意大利實際附屬於德國。

以上剖述，日寇的野心如何擴大可知。但是這種提議當中卻表現著一點，日寇外強中乾及言不由衷，日寇這種提議，依舊是試探英美的態度，想借日蘇中立協定之成立對英美來一下神經戰，提出較高的價格，讓英美來還價。從反面來看，日寇如果視為今日是軍事南進以奪取英美的太平洋殖民地的最好機會，則必偃旗息鼓整軍而奔，自無再多此一舉，提出莫須有的所謂「和平計劃」的必要，從此點可看出日寇膽怯力量不夠，還冀待著一個「不戰而勝」的結果。

這個「不戰而勝」的結果是什麼呢？第一是日寇海軍法西斯代表論客海軍大將高橋三吉所說的「和平南進」。日寇希望在英美允許的前提下管理南洋群島，享受南洋各地的特種資源，英美主權外的地方，如安南及泰國等地，則歸它控制與操縱。這是經濟的南進，偷偷摸摸的南進。第二，是要英美停止援助中國，以便它逼迫中國屈服。這就是所謂「東方慕尼黑」的局面，邇來日寇一面媚美嚇英，一面進攻我北線封鎖我沿海，再一面又加緊散布謠言，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當然不是偶然的。

然而日寇的陰謀是徒然的，對於英美的試探已得到美國的反擊，赫爾國務卿已於三十日公開重申美國的態度，稱「在極權國實行軍事征伐之期間，並無和平可言。」繼之而來的就是羅斯福總統及斯汀生陸長擁護民主反對侵略的演說及加緊美國軍火生產的實

施。日寇欲「不戰而勝」的第一目標，顯已失敗。但是第二種目標卻要更加緊進行。我們除警告國人加深警惕以外，切望英美兩國政府及遠見人士明察日寇的整個陰謀。

我們的領袖說得透徹，《廣知時報》四月三十日發表的世界和平計劃，其性質與民國二七年十一月三日日本近衛首相對中國所宣布的「東亞新秩序」，實有同樣的意義，亦可說此即日本對美國所宣布的「太平洋新秩序」，日寇將「先處分中國再來處分美國」，「此後更將採取一種買空賣空之卑劣手段，來挑撥離間太平洋上各國的關係，而以種種逼迫利誘之行動，間接仍想達到其各個擊破，依次侵逐之目的，此則為太平洋有關各國所尤應特別警戒者」（歡送詹森大使致詞）。

今日，德日平分世界的陰謀能否成功完全取於英美能否及時打擊侵略，積極援助替他們打擊侵略者的中國。此點，至盼英美兩國人士多加考慮！為今日太平洋的權益，為將來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存在而多加考慮！！

（五月十三日）

原載一九四一年六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二期

美日談判的展望

美日談判在乍鬆乍緊一推一拉的情形下繼續兩個多月，現在則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論者或謂此種變化由於日本內閣的更迭，我則謂其動機已開始於若杉之赴美，近衛內閣坍塌已於其時露其機微。更具體言之，國際情勢新變化及其趨向，促使日本改變策略而這又改變了對美的態度，若杉赴美前後，日本對美的態度，可能完全不同。

近衛第三次組閣及其所執行政策，可說是現狀維持派（以元老重臣力量為背景）的最後努力，其對外政策的重點在於「和平」解決暴力造成的「中國事變」，所以當時對美是央托的，依賴的。但是三個月來蘇德戰爭的變化，也使日本的對外政策起了變化。當希特勒使用最大的力量一再冒險進攻蘇聯而得到多少進展的時候，特別是到德軍迫近莫斯科的時候，日本更大冒險的衝動驟然增大。另一方面三個月來，日本又眼看英美蘇聯合對德的步伐並不十分緊湊，只見雷聲大而雨點卻小之又小，它遂對於反侵略陣線的壓迫發生輕侮之意，而其追隨德國進行更大冒險，終於下了決意。第一個步驟就是攻蘇的衝動。其次當然要看德國炮口南轉後的情勢如何，再決定其在太平洋上的實際行動了。

外交常走在戰爭的前頭，日本目前對美的外交，已不復是央托的，依賴的了。若杉赴美後，對美姿態自然是戰爭的，強硬的，試探的了——為著戰爭而持強硬的態度玩弄試探的手段。日本目前確實需要更大規模的戰爭，但又須看看美國的顏色以決定步伐，所以必須試探清楚日本擴大戰爭到何程度，美國仍可忍受。若日本北攻蘇聯而美國仍可旁觀，則日本攻蘇必早；若日本南侵泰國而美國準備仍未充分對日作戰尚無決心，則日本也可以再向南前進一步。在美國方面也洞悉其奸，認清美日的根本矛盾已不可調和，美日戰爭或終不可避免，所以一面對日委蛇，拖延時間；一面則積極準備，求其預定的

軍備早日完成。日本要美國允許它繼續由美洲及南洋獲得戰爭資源，所以對美虛與委蛇；同時它又要攻蘇，希望美國不要因為援蘇而起衝突，故又對美用其恫嚇的口吻。東條內閣成立後，外務省機關報英文廣知時報即向美國提出警告，軟硬並施，稱：「美國倘仍利用海參威為運輸美國物資赴蘇之路線，則戰爭有延及遠東之虞」；但接著又謂：「美國如欲對蘇實行有效適當之援助，則太平洋關係之改善，當於美方有利，此種關係之調整，應以正確理解『東亞和平機構』中之日本政策為基礎。美國倘欲有效的援助蘇聯，並欲使援蘇物資經由海參威運蘇，則善意的日本，自極重要」（十月二十日社評）。

日本現正有求於美國，為著安定其在中國的立場，為著確保其來自美洲及太平洋的戰爭資源。但其對美的要求，到央托依賴的手段不能得到結果的時候，就改用強硬的恐嚇的手段。而這種手段之加強，正與莫斯科戰爭的緊急程度，成正比例。因為德軍迫近莫斯科一步，則日本北進的衝動增高一分，而對美的上述要求加緊一尺。東條內閣雖然不一定就是戰爭內閣，但最低限度總是「暴躁的」臨戰體制。「在世界範圍內解決中國事變」的幻想，到了東條才算變成了現實的希望。新海相島田繁太郎十月十九日向全國發表談話，竟稱「日本海軍已完成一切準備，不僅擬解決『中國事件』，且擬應付當前局勢中之任何變化」。繼之而各報應聲加強日本對美強硬的主張，可謂極盡其恐嚇的能事了。

談到這裡，我們自要敬告美國一句話：日本已急切需要戰爭，更大規模的戰爭，所以美國對日的談判必無結果，應該及早放棄與日謀和平的幻想。即令日本仍稱「竭力解決中日事件」（島田之語），但其手段卻是欲以戰爭結束戰爭，以更大規模的戰爭結束中日戰爭！

（十月廿三日）